

前 言

保尔·拉法格(1842—1911)是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

拉法格的著作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早在五十年前,他的一些重要论著(例如《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财产及其起源》)就译成了中文,有的还出了多种版本。瞿秋白同志在1932年所写的《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①一文中,介绍了拉法格的生平和事业,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述了他的文艺理论。解放后,我国翻译出版了他的许多政治、哲学和经济学论著,以及文学评论和语言学研究的论文。最近,我国还出版了三卷本的《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为了解和研究拉法格思想和革命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是,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编译过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拉法格著作选集。著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弗兰茨·梅林曾说,拉法格的书“全部都属于那些有永久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之列”^②。为了适应我国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促进对拉法格的斗争实践和理论活动的了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我们根据目前所收集到的材料,编了这部拉法格选集。选集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1870—1894年的著作;下卷包括1895—1910年的著作。

① 《瞿秋白文集》(二),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11—1125页。

②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1978年三联书店版第4页。

保尔·拉法格 1842 年 1 月 15 日生于古巴的圣地亚哥。祖父是从波尔多迁到圣多明各岛定居的法国人；祖母是这个岛上的黑白混血儿，在黑人暴动时期(1796—1802)逃亡到古巴；外祖父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和法国人的混血家庭，曾在法国受过正规教育；外祖母是牙买加的印第安人。父亲弗朗斯瓦·拉法格是一个不太富裕的葡萄种植场主，曾当过箍桶匠；母亲叫维吉妮·德·阿尔马雅克。保尔是他们的独生子。因此，正如梅林所说的，在保尔·拉法格的血管里，混合着三个被压迫种族的血液。

1851 年拉法格随父母从古巴回到法国，先后在波尔多、图卢兹读书，后来进入巴黎大学医学院学习。他积极参加了当时的进步学生运动，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暴虐统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属于共和主义的大学生团体。随着斗争的深入以及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拉法格逐渐脱离资产阶级共和派并同工人组织建立联系。1865 年，拉法格成为沙尔·龙格创办的急进民主主义报刊《左岸》的撰稿人。这时他在思想上还深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同时也接受了布朗基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一些观点。1865 年 1 月，拉法格加入了新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2 月，受巴黎支部委托前往伦敦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报告法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在那里首次会见了马克思。同年 10 月，出席了在比利时列日举行的国际大学生代表大会，回国后被反动当局开除了学籍。1866 年初，拉法格到伦敦继续学医，同时积极参加第一国际的活动。同年 2 月 27 日，他当选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3 月，任西班牙通讯书记；不久又接替被捕的龙格任比利时通讯书记。在此期间，他同马克思、恩格斯有着密切的交往。在两位革命导师的帮助下，他逐渐克服了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影响，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1868 年 4 月 2 日，他同马克思的次女劳拉举行了非宗教的结婚仪式。同年 7 月，在伦敦巴

托罗缪医院顺利完成了医科学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在医院担任助理外科医生。10月16日回到巴黎。在这一时期，他经常为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马赛曲报》和布朗基派的《自由思想》周刊撰稿，并同马克思保持密切的通讯联系。1870年4月，他协助瓦尔兰等人创建了国际巴黎联合会，并担任国际总委员会驻巴黎联合会的代表。

普法战争爆发后，拉法格携全家于1870年9月2日从巴黎迁居波尔多，重建了那里的国际支部，任支部书记。他创办了《国防报》，号召通过革命方式把战争进行下去，并揭露国防政府的背叛行为。该报不久被迫停刊。此后他曾担任《波尔多论坛报》和《联邦报》的撰稿人，积极宣传国际的思想。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起义后，他代表波尔多支部宣布支持公社的原则，并组织波尔多工人声援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1871年4月7—18日，他亲自前往巴黎会见公社领导人，目睹了公社战士们的英勇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他接受了在外省发动起义支援公社的任务，于4月19日回到波尔多。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他改组了国际支部。

公社失败后，他受到梯也尔政府的通缉，不得不逃亡西班牙。8月11日，他在韦斯卡被西班牙当局逮捕，梯也尔政府要求将他引渡，但遭到拒绝。十天后来拉法格获释，到达西班牙北部工业中心圣塞瓦斯田，12月24日又迁居马德里。在那里他同西班牙的革命者莫拉、梅萨和伊格列西亚斯等一起坚决捍卫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组织章程，同无政府主义展开不调和的斗争。他以法尔加的笔名在《解放报》上多次发表文章，揭露巴枯宁派的阴谋活动。总委员会曾授予他全权处理整个西班牙事务的权力。1872年6月9日，他和其他几位国际成员被开除出巴枯宁派所控制的马德里联合会。后来他们创建了新马德里联合会，并得到总委员会的承认。1872年9月，他作为新马德里联合会和葡萄牙联合会的代表出席

了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他在会上投票赞成关于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以及开除巴枯宁和吉约姆的决议。会后协助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重要文献，彻底揭露了巴枯宁派破坏国际的阴谋活动。

1872年10月，他迁居伦敦，为了维持生计，曾同勒穆修、乔治·穆尔合伙开设一家石印雕版厂，但很不顺利。他生活非常困难，在经济上常常不得不依靠恩格斯的慷慨援助。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下半期，法国工人运动开始从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低潮时期走向蓬勃发展。在1879年10月于马赛举行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了独立的工人政党——法国工人党。此后拉法格同盖得一起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密切合作，互相补充。如果说盖得是一位杰出的鼓动家和组织家，那末拉法格则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当时拉法格和盖得等人把自己称作“集体主义者”，以强调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或公有制。从1880年起，拉法格成为盖得派的《平等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1880年5月，拉法格同专程前往伦敦的盖得一起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起草了法国工人党纲领。这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纲领，它在1880年哈佛尔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被称作哈佛尔纲领。拉法格同时还写了一篇《法国工人党宣言》，对纲领的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论证。马克思曾阅读了这篇宣言的原稿，并提出修改意见。由于马隆等人的阻挠，此文未能公开发表。1882年4月，拉法格回到法国，在巴黎一家保险公司当了几个月的文牍员，不久便遭裁减。9月，他出席了工人党圣亚田代表大会，同以马隆和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由于可能派在会上占据多数，拉法格和其他革命者决定退出，并单独在卢昂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样，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派

和机会主义派在组织上就公开决裂了。恩格斯在1882年曾经指出：“在建立党的时候，盖得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象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①1883年，拉法格和盖得因在阿利埃省多次举行演讲会而被木兰法庭判处六个月徒刑和一百法郎罚款。他们在服刑期间合写了解释哈佛尔纲领的小册子《工人党的纲领：它的历史、绪论和条款》。

拉法格为筹建第二国际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同法国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起在恩格斯的亲自指导下挫败了可能派篡夺新的国际组织领导权的阴谋。在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他代表组织委员会致开幕词。为了筹备1890和1891年的五一节示威活动，他进行了大量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1891年5月1日富尔米市的示威者遭到军队的残酷镇压，拉法格被法庭判处一年徒刑和一百法郎罚款，又一次被关进圣珀拉惹监狱。为了抗议资产阶级法庭的卑鄙判决，利尔市工人在1891年议会补缺选举中推举拉法格为候选人。反动势力掀起了一场诽谤他的浪潮，妄图否认他的候选人资格。巴黎《回声报》说，拉法格是“一个外国人，首先是德国人”，因为“他是普鲁士人卡尔·马克思的女婿”。但是选举结果拉法格获得多数票，当选为众议员。政府以拉法格的国籍问题为借口，要求议会宣布选举结果无效。但是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79—380页。

一卑劣伎俩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它不得不将拉法格释放出狱。1891年11月18日，利尔市选民在剧院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热烈欢迎拉法格。会后数千人簇拥着他走上大街，同时高唱革命歌曲：“人家说的真是不假；走出圣珀拉惹监狱，他就去巴黎参加议会。”^①虽然拉法格只当了短短的几年议员，但是他在这一期间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卓有成效。恩格斯对此曾予以很高评价。1892年5月，拉法格同“反社会主义联盟”创建人德莫连在巴黎地理学会大厅就共产主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拉法格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发展规律，有力地驳斥了德莫连散布的“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空想”的谬论。

拉法格十分重视农民问题，曾在阿利埃和歇尔等省的农村中进行广泛的社会主义宣传。他参加了法国工人党土地纲领的制定工作，曾代表全国委员会向1894年南特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农民所有制和经济发展》的报告。工人党土地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要求，有助于把他们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但是它有着严重的缺陷。在它的绪论中说，社会主义的职责是保护小农对其土地的个人占有；即使对“剥削短工者”也应加以保护。这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国际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斗争日趋激烈。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成为一种国际思潮。拉法格起初认为伯恩斯坦的堕落是一种“生理现象”，是“多年来精神过度疲劳的结果”。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他很快认清了伯恩斯坦主义的实质并起来与之斗争。他指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康德的唯心主义。他

^① 《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第3卷，198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23页。

坚决谴责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反动内阁的背叛行为。

在1901年11月伊夫里代表会议上，反对米勒兰入阁的法国工人党、革命社会主义党（布朗基派）、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以及一些自治联合会通过了建立法兰西社会党的组织方案。1902年9月，法兰西社会党在科芒特里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拉法格同盖得一起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而拥护米勒兰入阁的饶勒斯派则在1902年3月的图尔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法国社会党。1905年4月，两个社会党合并，组成法国统一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拉法格当选为党的常务委员会委员，直至去世。

拉法格在晚年仍然坚持革命立场，同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在1908年图卢兹代表大会上既反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议会制上的改良主义，也反对完全否定议会斗争的无政府主义。在1911年4月圣康坦代表大会上，他批判了所谓市政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重申了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拉法格为在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同劳拉一起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法文，还在《平等报》、《社会主义者报》、《社会主义评论》和《新时代》等报刊上，撰文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思想。1884年他在巴黎的工人理论讲座上讲解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的欢迎，也得到了恩格斯的好评^①。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拉法格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而是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克服了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等小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后才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他在1880年所写的《进化——革命》、《蒲鲁东主义已经过时》、《阶级

^① 《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第1卷，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7页。

斗争》和《工人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等文章，是他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清算蒲鲁东主义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学说的初步尝试。他揭露蒲鲁东主义者竭力宣扬的“自由、正义和平等”只不过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并且指出，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获得解放。他在1882年写的《可能主义》、《工人党的目的》等文章中批驳了可能派的机会主义观点。他在《法国工人党纲领绪论部分解说》(1883)、《革命的次日》(1887)中进一步阐述了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要和途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指出，各国工人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在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拉法格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攻击。他在《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勒卢阿-博利约的批判》(1884)、《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布洛克先生的批判》(1884)、《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892)以及《驳对卡尔·马克思的批评》(1896)等文章中，捍卫了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种种谬论。他在《交易所的经济职能》(1897)和《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1903)中，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分析了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相结合的过程。他指出，托拉斯体系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个“特殊阶段”。后面这部书可说是在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发表前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作了独创性研究的著作。

拉法格的《财产及其起源》(1895)研究了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所有制形式的演变和发展，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到来。他写道：“那些注定会看到万象更新的人们将是幸福的，三倍的幸福！”他在《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895)、《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

德的唯心主义》(1900)、《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7)以及《认识问题》(1910)等哲学著作中坚持了物质的第一性的观点,强调了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捍卫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批判了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形而上学。

拉法格是一位卓越的政论家。他在《懒惰权》(1880)、《庇护九世上天堂去》(1881)、《资本的宗教》(1887)等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宣传了无神论,谴责了教会的伪善和腐败。他还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文学批评和语言学研究,写了《左拉的〈金钱〉》(1891)和《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1894)等论文。

拉法格的著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他的个别表达方式不够确切。他在解释唯物史观时有时表现出机械论的倾向。他在农民问题上缺乏具体的阶级分析,往往把农民看作是一个整体。他对巴黎公社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的评价有片面性。他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国家的作用估计不足,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国家不应 对生产进行任何干预。他在策略问题上有时也发生左右摇摆。例如,他曾把沙文主义的布朗热运动看作是一场“人民的运动”。后来在恩格斯的及时帮助下他纠正了这一错误。

当然,拉法格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只是局部的、次要的。如果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和斗争环境,这些缺点和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1911年11月25日,星期六,即将满七十周岁的保尔·拉法格和他的忠实伴侣劳拉一起到巴黎度了周末。他们拜访了自己的一些老朋友,看了电影,之后回到德腊韦的家里。当晚他们双双注射了氢氰酸毒剂,在自己的卧室里平静地与世长辞。拉法格留下了一封遗书,其中写道:

“我的身体和精神都还很健康。我不愿忍受无情的垂暮之年接连夺去我的生活乐趣,削弱我的体力和智力,耗尽我的精力,摧折我的意志,使我成为自己和别人的累赘。在这样的时刻到来之

前，我先行结束自己的生命。

很多年以来我就决定不逾越七十岁；我确定了自己离开人世的期限并准备了把我的决定付诸实行的方法：皮下注射氢氰酸。

我怀着无限欢乐的心情死去，深信我为之奋斗了四十五年的事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取得胜利。

共产主义万岁！

国际社会主义万岁！”^①

由此可见，拉法格的自杀并非象资产阶级报刊竭力散布的那样是由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悲观失望，或是由于精神上的颓废等等，恰恰相反，他去世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满怀着必胜的信念。

1911年12月3日，巴黎的两万工人为拉法格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十名代表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说。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也讲了话。他赞扬拉法格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②。他指出：“在拉法格的身上结合着两个时代：一个是法国革命青年同法国工人为了共和制的理想进攻帝国的时代；一个是法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坚定的阶级斗争、迎接反对资产阶级而争取社会主义的最后斗争的时代。”列宁强调了从拉法格的著作中“直接吸取欧洲工人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重要意义。^③

*

*

*

本文选所收入的拉法格著作大部分是根据法文原文翻译的。有一部分著作由于目前在国内找不到法文原文，我们只能根据德

① 1911年12月3—10日《社会主义者报》。

②③ 《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6—287页。

文本(他的很多文章用德文首次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和俄文本翻译。《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赞成共产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财产及其起源》和《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等著作采用了王子野的译文,其中凡能找到法文本的,我们都根据法文原文重新作了校订。《左拉的〈金钱〉》一文采用了罗大冈的译文,只在个别地方作了文字上的改动。所有著作都按照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我们作了一些注释,给一部分著作写了题解,书末附有人名和期刊索引。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编译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

1982年12月

目 录

组织起来.....	1
(1870年9月7日)	
4月7—18日巴黎之行.....	5
(1871年4月)	
致《汝拉联合会简报》编辑公民们.....	21
(1872年5月17日)	
进化——革命.....	26
(1880年2月18日)	
蒲鲁东主义已经过时(答公民丹尼尔).....	39
(1880年4月21日)	
阶级斗争.....	45
(1880年6月2日)	
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中国人.....	53
(1880年6月9日)	
工人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	60
(1880年8月11日)	
懒惰权(驳斥1848年“劳动权”).....	67
(1880年)	

庇护九世上天堂去	99
(1881年)	
可能主义	115
(1882年2月5日)	
工人党的目的	121
(1882年6月18日)	
法国工人党纲领绪论部分解说	125
(1883年)	
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	140
(1883年)	
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勒卢阿- 博利约的批判	181
(1884年9月)	
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布洛克先生的批判	197
(1884年10月)	
资本的宗教	209
(1886年2—7月)	
革命的次日	253
(1887年)	
集体主义——共产主义	262
(1888年)	
议会制和布朗热主义	264
(1888年)	
布朗热主义和国会议员	269
(1888年5月1日)	
在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 的开幕词	271
(1889年7月14日)	

1876—1890 年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	273
(1890 年 8 月)	
五一节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	298
(1891 年 5 月)	
社会主义候选人的声明	318
(1891 年 10 月)	
左拉的《金钱》	321
(1891 年)	
赞成共产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 (拉法格和德莫 连之间的辩论)	363
(1892 年 5 月 21 日)	
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同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	389
(1892 年 9 月)	
法国工人党土地纲领	399
(1894 年)	
赫伯特·斯宾塞和社会主义	423
(1894 年 5 月)	

组织起来*

(1870年9月7日)

让我们组织起来。

共和国宣布成立了。她将生存下去呢还是象已经不复存在的上一届1848年的共和国那样,被淹没在社会主义者和共和党人血泊之中呢?

新生的共和国,在人民群众一片欢呼声中呱呱落地不久,便面临着两种敌人:普鲁士人和奥尔良党人。

十八年的掠夺、压迫和屈辱把法国推向黑暗的深渊,一些完全无力抵抗的省份遭到侵犯和掠夺。由于将军们无能,我们的精锐部队被击败和摧毁;巴黎受到包围的威胁,这可能使巴黎最富饶的地区和辉煌瑰丽的古代建筑物遭到破坏。从不幸的斯特拉斯堡城,我们可以看到普鲁士人会带给我们什么东西;巴黎被围困了,这意味着所有邻近的省份处于同东部各省一样的状况,那里的人民被解除了武装。战前,军需部扬言军火库内有三百万支枪,实际上勉强强只有一百万支。其余的枪支在何处呢?造枪用的钱又落入什么人的腰包呢?军需部门的大员们可能认为提出这类问题是不得体的,但是他们所犯的罪行给祖国带来的灾难太惨重了,必须迅速地、严厉地惩罚他们。最近,波拿巴政府还在军事法庭上判处了

* 本文首次发表于1870年9月7日《纪龙德共和党人报》特刊第4版。——编者注

一些共和党人的死刑。

在1848年受到公众的蔑视而被驱逐出法国的奥尔良党跟在普鲁士人后边重新神气活现起来。在帝国统治时期，正当共和党遭到迫害之时，奥尔良党却趾高气扬地出现在所有的城市。保证金和印花税，这些卡芬雅克反动政府留下的可悲遗产，只能使富人们办得起报纸。由大腹便便的富豪组成的奥尔良党在法国的每一个城市里至少有一家报刊。

最近几年内，我们一直目睹着他们的所作所为。木乃伊式的老人基佐之流、奥迪隆-巴隆之流及其余党重新粉墨登场。年青人在成长起来，在这些蠢货中间分配政府的职位。普雷沃-帕拉多耳^①虽然遭到波拿巴党人的憎恨，但还是获得了领事的职位。一大群不为人所熟知的人物被派到外省，当上了省长、副省长和大法官等等。奥尔良党的许多成员，打着自由主义的招牌，钻进了立法机构。今天，甚至在共和国临时政府内，也还有好几个奥尔良党人。

尽管奥尔良党把贪婪的双手伸向政府各个职位，但是，他们只有在一部分商业资产阶级和大银行家中才能找到他们的真正的拥护者。因为这些商业资产阶级和大银行家们知道，只有在奥尔良党统治之下，才能恢复他们的美好时光，就象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一样。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则是反对他们的。

奥尔良党的阴谋家们妄图取代共和党的地位。他们的策略是显而易见的。梯也尔这个奥尔良党的老虔婆想让共和党人和波拿巴党人参加他所建议的临时政府，是为了让他们相互残杀，以便为他所设置的圈套做好准备。国民自卫军和流动自卫军的冲击却使他们这种诡谲的阴谋化为泡影。但是，在他们看来，这着棋还不至

^① 律西安·安那托尔·普雷沃-帕拉多耳（1829—1870）——法国温和的自由党人。——编者注

于输掉。

法国应该冷静地观察形势并且考虑到，在困难之时掌权的共和党有勇气正视这种局势，而其他任何政党都望而却步；可能由此而产生的灾祸的责任应该再次由旧政权的人们来承担；如果共和党的爱国的大无畏精神获得胜利，那么这个胜利应归功于这个党的坚忍不拔的牺牲；为了对付奥尔良党人的阴谋诡计，共和党人只有组织起来，然而时至今日，他们还处于无组织状态。

奥尔良党人希望共和国遭到失败。甚至温和的共和党人看到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时就大喊大叫，认为这是制造分裂。这样他们就不知不觉地为奥尔良党人效劳；可是，正当这些讲着娓娓动听语言的先生们为大街上看热闹的人们演出这幕闹剧时，奥尔良党人已经强有力地组织起来了，他们将继续他们的阴谋活动。

多年来，欧美的工人阶级积极地争取建立一个政党，在一切工业中心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他们相互联系，并在伦敦建立了一个总的中心。当今拯救人类的希望就在这个广泛而有力的组织身上。它遭到了欧洲所有政府的仇视。奥地利、普鲁士、立宪制的比利时、以及专制制的法国，都企图将它扼杀。然而，它站起来了！它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开始起作用了！

国际巴黎支部成员们引以为荣的是，他们曾经三次受到帝国政府的起诉。在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时候，六十多名支部的领导人被关在监狱中，有的半年，有的一年。今天，他们获得了自由，他们又重新开始从事宣传和组织的活动。

波尔多的共和党人！现在是投入把欧洲共和派力量组织起来这一广泛运动的时候了。我们共和党人人数众多，聪明能干。我们缺少的只是组织起来。

共和党人，让我们组织起来！让我们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党！新生的共和国尽管被阿谀奉承的叛徒包围着，然而我们所热爱和想

望的共和国终将战胜目前的灾难。

国际会员 保尔·拉法格

译自雅克·吉罗《公社和波尔多(1870—1871)》

1971年巴黎法文版第201—203页。

(刘棠译 李兴耕校)

4月7—18日巴黎之行*

(1871年4月)

一 巴黎一瞥

梯也尔—皮卡尔的电报，通篇充斥“下流无耻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卑鄙龌龊”的险恶用心和反动报刊的恶意诽谤，把外省弄得乌烟瘴气。这些反动报刊在它们编给老实人看的文章中说，巴黎的妇女现在是一片惊慌，正在寻找地方把自己的首饰收藏起来，城内居民的人身安全正遭到装扮成国民自卫军的强盗的严重威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一切使人觉得，梯也尔不过是一个掌管行政机构的首脑，而那些过去替比埃特里^①充当走卒的专栏作家们也只是在写文章，挣工资而已。

脑袋里装满这些绘声绘色、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而来到巴黎，耳闻目睹却叫人目瞪口呆。因为这座伟大的城市是那样庄严地沉浸在一片宁静的气氛中。

国民自卫军战士在执行任务时，态度之认真虽然无可挑剔，但

* 1871年4月7日至18日，保尔·拉法格访问了巴黎。这里的四篇文章是拉法格回到波尔多后于4月24、25、28日和5月3日发表在《波尔多论坛报》上的。其中第一篇当时没有署名。最后一篇的末尾曾标有“待续”字样，但后来并未继续发表。——编者注

① 约瑟夫·玛丽·比埃特里(1820—1902)——法国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巴黎警察局长。——编者注

举止十分笨拙，不由得令人发笑。这也难怪，这些人并不是经过长期训练的雇佣军，他们缺乏经验，但深信自己正在完成一项重大的使命。一旦任务圆满完成，他们的脸上便又浮现出纯朴的神态，并可同你攀谈几句。不过他们切不可轻易违反规定，否则就会被人狠狠抓住而送往别处，押送人员监视严密，简直比塞尔贝尔^①还要难以利诱。

我抵达巴黎后，于上午七时穿过市政厅广场。广场的一部分沐浴在明媚的晨光中，国民自卫军战士身上洒满阳光。他们有的躺在石板地上睡觉，有的则在准备早餐、擦拭枪支或抽着烟斗。在毗邻里沃利街的角落里，一些喜欢舒适的人，围成圆圈，把枪夹在两腿之间，坐在椅子上打盹，脑袋不住地往下垂，同年迈的老妪一模一样。看上去真是再温厚不过了。然而就在不远处，大炮和机枪正张着阴森可怖的大口。

市政厅的里院有一个十分别致的楼梯，楼梯从水池两边向上伸展，然后贴墙而上，直达宝座大厅。公社今天正在这里举行会议。从二楼窗口向院内俯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饶有兴味的图景。

院子里到处是国民自卫军士兵，地上架着一簇簇的枪，铺了一块块小垫子，并放了一些吃饭的桌子。一个角落里围了一大群人，他们在议论战局。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是一些自卫军战士的妻子和女儿，她们正带着惊异和欢乐的神色，张大眼睛，观看这华丽的宫殿。再往那边，二十来个公社战士正围在楼梯下面的一张桌旁，玩罗多游戏^②！

可是不久以前，就在这个院子里，五彩缤纷的烟火曾把整个院子照得通明，墙上布满常春藤和散发着浓烈香味的热带花草，上流

① 塞尔贝尔，希腊神话中地狱的守门犬。——编者注

② 罗多游戏是一种摸子填格的游戏。——编者注

社会的贵妇们在楼梯上上上下下，使得整个楼梯都在那波浪起伏、闪闪发光的衣裙下消失了。阳台上，欧斯曼男爵^①扬着他那豪门奴仆的阔脸，以一种对女人感到厌倦的神情注视着那些袒胸露臂的贵妇。如果你现在能合上眼，想一想那种场景，你就会明白这场革命的全部意义。今天这里已不再是寄生虫的天下而是劳动者的天下了。

在市政厅周围和偏远的街区，还残存着一些支离破碎的街垒。这些用石块堆起的街垒仿佛只是为了增添孩子们的乐趣而修建的。他们成天在上面跑上跑下，使得上面的石块每天都要脱落几块。现在，街垒委员会业已成立，看来英国旅游者可以看到真正象样的街垒了。

市内交通畅通无阻，所有街垒都给各种车辆放行。公社只是征用了公共马车，而且这些车辆都是马车公司废弃不用的，早已陈旧不堪，连玻璃也没有了。陆军部并不缺少车辆和马匹。公社的炮兵和骑兵所使用的马匹，是前陆军部遗留下来的，凡尔赛分子仓皇逃跑时忘记带走了。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应当说他们遗忘的东西并不只是这些马匹。

各个街区都可以自由通行，用不着有任何担心。说来也怪，自从警察逃走之后，就没有听说过发生偷窃和暗杀的事。一位爱国者深有感触地说，这是因为形形色色的“守旧派们都逃到凡尔赛去了”。小偷历来是私有制的最大维护者，波拿巴、路易-菲力浦及其一帮就是明证。我的朋友中有一位共产主义者。1848年6月以后，他在被囚期间结识了一些小偷。他发现他们身上维护私有制和守旧的本能十分强烈。他说：“确实，只要他们所从事的偷窃行当能得以进行，他们就非常热衷维护私有制。”而随着私有制的消

^① 若尔日·欧仁·欧斯曼(1809—1891)——法国波拿巴主义者，塞纳省省长(1853—1870)。——编者注

灭，有多少自由职业将因而无法维持。克维多就在他那部意趣横生、以描写小偷为内容的小说《塞哥维亚的唐·帕布洛》一书中，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说过这样一句话。“‘孩子’，——我父亲说，‘偷窃这一行，可不是终日刻板不变的工作，它是一门变化不定的自由职业。’”

在富人居住的街区，由于顾客逃走，许多商店都关了门。连妓女也为她们的顾客象惊弓之鸟一样，枪声一响便逃之夭夭而伤心不已。她们恨透了公社。现在，为了这些女人能够重操其“正当”的职业，那些旧秩序、宗教、道德和私有制的维护者们正在让来自人民的士兵去送死。他们如果想到这一点，应该感到很大的欣慰。但这些女人是不甘寂寞的。她们不顾长途跋涉，到圣德尼区和普鲁士军队占领下的其他地方去为自己失去情人而寻求慰藉。回来时，她们心满意足，直言不讳地承认她们更喜欢普鲁士人，因为普鲁士人“虽然没有法国人老练，但更加彬彬有礼，更加慷慨大方”。巴黎的堕落是一帖强烈的革命促进剂，它削弱了路易-菲力浦时代和波拿巴时代的统治阶级，如今又在腐蚀普鲁士的守旧势力。同样的情况又开始了。

大街区的咖啡馆和餐馆虽然杳无人迹，但在人口稠密的街区，一群群大声喧闹的孩子们却同往常一样，在广场中心的小花园和公园里来来往往，跑呀，叫呀，哭呀，妇女们则在那里聊天，有的打哈欠，有的手上拿着活计，早已把从阿尼埃尔和勒瓦卢瓦-佩勒到蒙卢热炮台和帕蒂-比塞特日夜进行的激烈战斗置诸脑后。无论炮弹发出低沉的隆隆声还是凄厉的呼啸声，她们都充耳不闻。在我整个逗留期间，我只有一次看到整个巴黎人心惶惶。那是在11日到12日夜间。前两天气氛十分宁静，炮声越来越远，几乎听不到了。平静的市民对这一情况感到分外高兴，因为对他们来说，这稀疏的炮声预示着好时光即将到来。几天前，经公社同意，已经派出

几个代表团去进行谈判，以结束这次内战。

二 巴黎一瞥(续)

这种宁静的气氛使人们觉得谈判结果一定会很好。有人甚至在私下认为双方可能已达成默契，在新的命令下来之前暂且停止冲突。可是到11日晚九时左右，突然一阵猛烈的炮击把巴黎震得地动山摇。大名鼎鼎的麦克马洪刚刚担任凡尔赛军队的总指挥。慌乱的人群纷纷奔向街头，人们三五成群，互相询问；女人们更是惶恐不安，提出的问题颠三倒四。在普鲁士人围困期间，他们从来也没有听到过如此疯狂，如此近在咫尺的炮击；保皇党似乎已进入巴黎。爱国者痛苦难言，纷纷跑去拿起武器，准备巷战。他们始终坚信，打巷战，他们可以稳操胜券。城中虽然笼罩着恐怖的气氛，但集合鼓终于没有敲响，两天来人们便预计凡尔赛会发动进攻，并作好了迎敌的准备，现在，这次进攻被狠狠击退了。一个半小时后，那穷凶极恶的炮击便已全部停息。保皇党被打败了。人人义愤填膺。凡尔赛普鲁士人如今在照搬俾斯麦普鲁士人的一套：他们以为那一个个和解姿态已经使公社战士丧失警惕，想趁此机会给予致命的打击。

这次突袭失败后，反动派方面陷入了一片混乱。4月9日，我曾有机会同几个反动的家伙在一起吃晚餐，他们当时声称同凡尔赛方面经常有联系，手舞足蹈地向我断言将在四十八小时内平定巴黎。现在，他们的梦想全部破灭了。但梯也尔这时却厚颜无耻地宣称，凡尔赛分子不但没有失败，而且有力地击退了公社战士的进攻。我回到波尔多后，有一次在维埃松同几个凡尔赛军官在一起吃午饭，他们向我一口咬定，4月5日之后，保皇党军队没有作过任何进攻性的举动，只是击退了起义者的进攻，况且这些起义者

大都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为了使这支军队去向起义者进攻而一味向他们编造诸如此类的谎言，在人们的心目中这究竟是一支怎样的军队，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梯也尔却夸耀这支军队是法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支军队。

巴黎人民并不缺乏激情，关于这一点，我可以高声说出来而不用担心有人反驳。我只在这一次才看到他们失去了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镇静。为了恐吓他们，梯也尔什么办法都用尽了：一会儿是普鲁士人兵临城下，向巴黎炫耀武力；一会儿是梯也尔本人让人在圣德尼区张贴布告，向起义者宣布，如果他不能战胜他们，普鲁士人就要在4月15日开进巴黎；一会儿是英国领事正式通知其侨民，从4月12日起，他不能保证为他们提供有效的保护；一会儿是梯也尔让人切断铁路线，眼看就要对巴黎实行全面封锁。巴黎人民本来是容易激动的，但这一次，却没有一种办法能够动摇他们的坚强意志。为了说明他们如何镇定自若，我想举两个例子：

战争一开始，保皇党便集中全力于马约门，妄图由此而一举攻占爱丽舍宫、土伊勒利宫和市政厅。他们在蒙瓦勒里安、讷伊桥和库尔布瓦的炮兵已经在马约门打开一个缺口，并摧毁了门下的吊桥，可是就在这时，东布罗夫斯基顺利迂回到阿尼埃尔，使他们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由于东布罗夫斯基这次迂回成功，九百多名凡尔赛分子被围困在格朗德-雅特岛上，勒瓦卢瓦-佩勒、维利埃和讷伊所受到的威胁已经解除，并在讷伊桥头打开一个缺口，同时，敌人在库尔布瓦的炮火也无法再逞其凶狂了。崩斯·德·科布伦茨将军和维努亚将军这时也想从侧翼向共和军队进攻，于是开进了圣多昂。大家当时都把圣多昂视为中立地带，我不明白这是何道理。巴黎人觉得，凡尔赛分子的进攻表明普鲁士人即将放弃其中立地位，而当天晚上就传出谣言说圣德尼、奥伯维耶、诺瓦西和夏朗东等炮台将于第二天——4月15日——交给凡尔赛分

子。这样，凡尔赛分子便可以从这些地方炮击巴黎。对于这次炮击，外省的人真是谈虎色变，但巴黎人却没有一个被吓倒。有的人还赶去观看，好象是去看中国大使馆一样。国民自卫军设置了警戒线，禁止人们进入远征军大街和香榭丽舍大街。否则，尽管有炮弹在空中呼啸，那里看热闹的人仍会不计其数。

3月18日以后，某些街区的反动势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试图在市中心制造混乱。住在帕西的一些无赖之徒——他们一生中所做的唯一的好事是把人们经过千辛万苦从田里种出的粮食变成肥料——这时打算助凡尔赛分子一臂之力。中央委员会代表、勒费夫尔公民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负责看管帕西的火药库。他叫人把当地几个为首分子找来，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是反对我们的，但奉劝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为好，否则，如果你们胆敢抢夺武器，制造混乱，我就把火药库点着，把整个帕西全部炸为灰烬。”这些维护旧秩序的英雄们，只有在受严格军纪约束的士兵保护下，才能表现出一点勇气来。这位长着金黄色头发的年青人虽然是寥寥数语，但他们听后一个个便泄了气，慌忙从这个危险之地溜走了。

在巴黎，人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抱有这样的信念：公社的人意志无比顽强，定会宁可战死也决不投降，从而给那些将军、卖国贼和懦夫们作出榜样来。可是尽管大家都这样想，整个巴黎仍显得十分平静。我就在市场上亲耳听到过一个女人说：“哎哟！听说有人要把成桶的煤油倒到阴沟里，把我们炸死。”接着，她又若无其事地为买一只兔子而同人家还起价来。

这样的人民，梯也尔先生竟想玩弄谈判的花招来恐吓他们。
老家伙真是昏庸到了极点！

三 3月18日至4月17日的军事形势

三月十八日革命与其说是经过长期准备的行动，不如说是一个自发的行动。那些所谓在马克思和布朗基等人的帮助下在伦敦拟定的起义计划，不过是专栏作家们凭借他们的丰富想象编造出来的。他们挖空心思，寻找各种理由为其主子的可耻逃跑开脱。不过，人们仍然可以发现，当初还是存在着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原始的组织。正是由于这个组织的存在，中央委员会、各防区司令和革命的区政府成员才得以把郊区的大量国民自卫军集中到市中心来。当维努亚听到郊区四面八方响起了集合鼓，看到奔向市中心的起义者象一条条巨大的长龙向那边蠕动时，他认为一定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组织。他不由地害怕起来，于是带着向来以勇敢闻名的梯也尔逃走了。

中央委员会进入市政厅后，对于自己的胜利感到十分担心，因为这个胜利来得太容易了。如果梯也尔和维努亚敢于留在巴黎，他们也许能够控制局势。中央委员会对于能否巩固自己的胜利感到很没有把握，所以匆忙接受了巴黎的区长和议员们的调停。但素来被人称赞为具有政治才干的梯也尔，这时却不知为什么越是虚弱越要提出苛刻的要求。这种可笑的固执态度激怒了中央委员会，使中央委员会再存在一两天。到这时候，它才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古代有一句至理名言：丘必特若想毁掉一个人，便去设法激怒他。议会和政府成员看来一定是受到了丘必特的激怒，因为他们全都只会毫无节制地大发雷霆。

梯也尔的进攻使巴黎的革命者从惊愕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从此结束了他们所犯的无数错误。

他们没有解除警察的武装，相反，却将城门大开，任其扬长而去；这些警察到达凡尔赛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被人们视为救星。他们让第四十三步兵团离开了巴黎，把同情过人民的士兵一一打发回家，对反动派在巴黎市中心纠集力量，也没有采取措施，而是听之任之。他们没有直捣敌人的巢穴——凡尔赛。不过他们知道凡尔赛分子是他们的不共戴天之敌，而且正在准备向他们进攻。他们也知道，敌人一旦得胜便会对他们进行残酷的镇压，从来的反动派在胜利之后都是毫不留情的。卡芬雅克是怎么发誓的，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虽有好几个人（特里东、雅克拉尔、瓦尔兰、瓦扬）主张立即去捣毁保皇党的巢穴，但由于普鲁士人就在巴黎城下，这一主张未能实现。

大家都知道，法夫尔和梯也尔当时正急不可待地同普鲁士当局交涉，希望他们能给予暗中的或公开的支持，镇压巴黎起义者。伦敦的报刊曾公开揭露这一阴谋，《劳埃德氏报》甚至指名要法国政府出来辟谣。在整个被围期间，甚至在停战协定签定之前，公社的人都一直要求同普鲁士人决一死战，但九月四日分子上台后则一心想不惜一切代价结束这场战争，以便腾出手来把正在社会各阶层蔓延的革命运动扼杀于萌芽状态中。现在，公社的人不得不对普鲁士人改变策略，于是直截了当地向巴黎人表明了自己的中立立场。从那以后直到今天，双方都严守中立，使得法夫尔之流大失所望。

梯也尔的第一份电报，大家现在都还记得。他在这份电报中眉飞色舞地吹嘘他取得了胜利。巴黎怒不可遏。第二天，全体国民自卫军便向凡尔赛进军了。

起义者希望蒙瓦勒里安守军能对他们采取中立的态度。中央委员会派吕利埃去占领炮台。他同炮台司令见了一面。炮台司令向他说，完全赞成人民的行动，只要他还活着，就决不向人民射击。

但没有上级的命令，他不能交出炮台，否则将为军人荣誉所不容。吕利埃见他的话如此中肯，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但在起义者向凡尔赛进攻的头一天晚上，同情他们的炮台司令和驻军突然全被撤换。所以当国民自卫军放心大胆地前进，到达炮台的射程之内时，他们遭到了炮火的猛烈袭击。

这时，你可以看到这些国民自卫军是一些怎样的士兵。在一阵惊慌之后，他们面无惧色，冒着枪林弹雨进到律埃重整队形。他们原定在这里同弗路朗斯指挥的、从北边下来的部队会合。

国民自卫军的这次行动要不是由于组织得不好，以及弹药和粮食接济不上而中途失败，蒙瓦勒里安守军是绝不能挡住他们的前进步伐的。

巴黎人民纷纷奋起：男人、女人、儿童都杂乱地参加到了向凡尔赛进军的行列。人们似乎又回到了上一世纪大革命的年代。

这支成份混杂的队伍没有带酒及其他各种食物，可是道路一堵塞，队伍就全乱了。杜瓦尔——关于他英勇就义的事迹大家已经知道了——和一千名起义者，在夏蒂荣被几百名宪兵截住。起义者一直战斗到弹尽粮绝。有好几个团饿了整整三十六小时终于回到巴黎。

整个巴黎陷入一片惊慌。这次失败给予人们的震惊同上次胜利一样强烈。

国民自卫军处于瓦解中。在整个被围期间，特罗胥和克列芒·托马一直是处心积虑地阻挠它充实武装、整顿组织。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仅举一例为证：那时候，国民自卫军的一位营长雅克拉尔主张在第十八区修建一个射击场，供士兵训练之用，但遭到克列芒·托马的阻止，理由是此类射击场他将很快修建一个，供巴黎全体国民自卫军使用。但他后来根本没有修建。3月18日以后，反动派所关心的主要是促使国民自卫军彻底瓦解，因此强迫那些

他们还能施加一定影响的军官全部辞职，从而给国民自卫军干部的配备造成极大困难。

起义者的这次失败在全体居民中震动很大，同时也动摇了国民自卫军这个可怜的组织。把所有战士都团结在一起的核心已不复存在。每个街区都各行其是。一有枪响，鼓手便把集合鼓敲得咚咚响，爱国者们于是涌向区政府广场。但并没有出现什么情况，信号发错了。如此两三次，再有鼓响大家都听而不闻了。仅仅这一点就大大挫伤了国民自卫军的士气。克吕泽烈对此十分清楚，所以禁止人们以任何借口敲集合鼓，除非有命令。

国民自卫军的解体还有另一原因。中央委员会虽有很多成员担任公社委员，但仍与公社争夺巴黎军事力量的指挥权。向凡尔赛进军是在公社一无所知、甚至同公社已经明显表示出来的意见完全背道而驰的情况下，由中央委员会一手决定、准备和进行的。

梯也尔对于他们的分歧了如指掌，在其电报中多次谈到。他指望能利用这些分歧来战胜起义者。

向凡尔赛的进攻失败后，公社乘机加强了控制，把克吕泽烈作为代表派到陆军部并任命东布罗夫斯基为巴黎城防司令。在当前情况下，公社不得不采取这些断然措施。3月18日，贝热瑞攻占旺多姆广场，从此占据了司令的职位。但他的军事才能很差，根本不适于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他最近所犯的错误就充分暴露出他对军事一窍不通。由于蒙瓦勒里安和库尔布瓦的炮火威胁很大，公社战士无法守住讷伊桥，贝热瑞不但不下令炸毁该桥，反而让保皇党占领。保皇党据桥固守，因而占据了一个通向巴黎的要冲。贝热瑞激烈反对公社的决定，不同意把位子让给那位波兰将军。冲突有可能激化，一天之内竟更换了三次口令。公社于是下令逮捕了他。

梯也尔的电报使中央委员会真正看清了形势，认识到同公社

争夺权力，只会给反动派帮忙，于是赶紧公开承认公社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样，梯也尔的如意打算也就完全落空了。

保皇党了解巴黎发生的情况，他们乘机大力开展军事行动。他们攻占了夏蒂荣的多面堡，并大大加派了援兵。库尔布瓦和讷伊桥的工事也相继被他们占领并加强防守。凡尔赛分子凭借蒙瓦勒里安炮火的掩护，已逐步推进到巴黎城下，攻占了讷伊公园和大路两旁的房屋，并把这些房屋的墙壁打通，使之互相连结起来。这期间，蒙瓦勒里安、库尔布瓦和讷伊桥头的炮火已在马约城门打开缺口。形势十分危急，伦敦已在传说克吕泽烈把各作战连都抽了回来，准备在巴黎城内筑垒固守，他们曾经取得极大成功的、无比激烈的巷战又要开始了。要不是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表现了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情况早已发展到这一地步。从蒙卢热到阿尼埃尔一线，一万至一万五千人终于挫败了凡尔赛分子的疯狂进攻。战斗分外激烈，日夜不停地进行。驻守贝尔维尔、蒙马特尔和拉维埃特等地的几个团在城外坚持了十多天之久。

这些战士勇敢战斗、吃苦耐劳的精神实在无与伦比。由国际成员、制作假花的工人若昂纳尔指挥的第一百团，为争夺讷伊路上的一座街垒，一天之内竟五易其手。由于讷伊桥和库尔布瓦射来的炮火太猛，他们当时无法守住这个街垒。战士们舍身忘死的战斗激情无比高涨，指挥员往往不得不强令他们有所克制。这真是一支无坚不克的军队。东布罗夫斯基只带了大约五千人便迂回到阿尼埃尔，扫荡了位于塞纳河、布瓦-科龙布和热纳维利埃之间的全部顽敌。

这些来自巴黎郊区的战士曾多次遭到特罗胥的竭力抵毁。现在，当我们看到他们勇敢顽强，战功卓绝，从而为他们未能奔赴疆场同普鲁士人决一雌雄而深感遗憾时，我们便可明白九月四日分子对此应负的严重责任。我在巴黎接触到的一些反动分子，包括

那些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对公社心怀不满的企业主，一提起法夫尔和特罗胥之流就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惩办他们。

这些天日日夜夜的战斗，不仅使未经过战火洗礼的国民自卫军明确了军队必须有严格的纪律，而且造就了一批军官，弥补了干部的不足。

国民自卫军已逐渐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并已习惯于服从中央政权的统一指挥。每个战士都对中央政权有着绝对的信赖。

到我动身的4月18日，巴黎的军事形势已经彻底改观。它已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了。

四 3月18日至4月17日的军事形势(续)

东布罗夫斯基攻占阿尼埃尔后，勒瓦卢瓦-佩勒、维利埃、讷伊公园和讷伊大路右侧的保皇党分子全被赶了出去。他在阿尼埃尔铁路桥的桥头设置了炮兵，直接威胁着库尔布瓦和蒙瓦勒里安，炮火打到讷伊桥上，严重破坏了大桥的一个桥孔。他在缪埃特门和特罗卡德罗也派了一支炮兵，迫使蒙瓦勒里安守敌停止了对马约门的炮击，马约门已被打坏的地方以及门下的吊桥也得以修复。

现在，除讷伊大路的左侧和讷伊桥头，整个塞纳河右岸地区都已掌握在公社战士手中。他们在这里构筑工事，沿着巴黎城墙的外沿又修建了一道防线。凡尔赛分子可以夺回阿尼埃尔，但阿尼埃尔已失去他们占据塞纳河右岸时的全部意义^①。

南郊各炮台也已增派援兵，补充了大量的食物和弹药。旺夫

^① 巴黎出版的报纸，外省能看到的只有《总汇通报》。4月22日的《总汇通报》，虽然有意写得十分隐晦，但若仔细阅读，仍可看出阿尼埃尔究竟是被起义者收复的，还是因为保皇党部队无法在那里呆下去而退到布瓦-科龙布去的。——拉法格注

和伊西已不必再担心夏蒂荣多面堡的炮火，夏蒂荣村已大部被国民自卫军收复。他们在这里筑垒据守，无比顽强，保皇党多次想夺回，但无法得逞。

保皇党虽然一再受挫，但仍傲慢不逊，根本不把起义者放在眼内，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谈不上有什么周详的作战计划，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梯也尔则不然，他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出色的司令部。帝国时代的英雄已被他怀着一片虔诚全部搜罗来。但在1870—1871年的那场可悲的战争中，亲眼看到他们如何指挥的那些士兵和军官们似乎并未受到这种殊荣。

麦克马洪于4月11日正式担任野战部队总司令，维努亚则已降到次要地位，去负责管理后备军了。为了对他表示安抚，人们还给他送了一个荣誉军团总管的头衔。他们认为，他的指挥太优柔寡断，犯了大错，没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巴黎。在凡尔赛生活过的人都觉得那里一片政治狂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事层出不穷，他们说，那些人的昏庸不堪简直难以想象。他们活在人间只是为了打败巴黎，因此心焦如焚，希望早日了结。之所以如此，有的想摆脱他人的无情指控，有的想乘机加官晋爵，有的则想再去过那灯红酒绿、眠花宿柳的生活……麦克马洪所肩负的使命可不平凡，他必须使这些强烈的要求都能如愿以偿。

他到任后的第一仗是攻打旺夫和伊西，但被狠狠顶了回来。14日到15日夜间，他再度发起进攻，但又遭到同样的惨败。凡尔赛分子于是只好放弃从这边进攻的念头。

梯也尔曾经得意忘形地宣称他有三种办法重返巴黎。可是，东布罗夫斯基轻而易举便从维努亚手中夺走了勒瓦卢瓦-佩勒、维利埃和讷伊，他的第一条锦囊妙计早已成为泡影。现在，麦克马洪对旺夫和伊西的两次进攻接连失利，把他的第二条妙计又葬送了。天晓得那第三条妙计会是怎样的结局！要是由拉德米罗来接

替麦克马洪，谁也不会感到意外。至于麦克马洪，他将会得到常败军团总管的头衔，负责指挥 11 日到 12 日夜间和 14 日到 15 日夜间的受伤者和战死的鬼魂。

在打击保皇党的同时，人们日夜操心的是国民自卫军这个军事组织。今天，它的许多团队已经是装备精良、弹药充足的部队。他们身上背着行军袋，在城外宿营，几乎同正规军一样了。每个兵团配备的兵种都很齐全，有骑兵、工兵、炮兵和步兵。从凡尔赛来的逃兵越来越多。他们一到巴黎，就被编入国民自卫军中正在建立的小分队。

武器在巴黎并不缺乏。每天都有人发现新的贮藏武器的地方。甚至在制造化妆品的地方也发现了几门大炮。有一次搜查竟然搜出了耶稣会教士收藏的几百枝沙斯波枪。那些教士说，这些枪是他们在普鲁士人围困期间照料过的伤兵作为纪念留下来的。连巴黎圣母院的祭坛里也发现了几箱沙斯波枪。这只能认为是上帝把这些枪收藏在那里，以备起义者使用的。

梯也尔最近的一份电报，谈到共和主义者拥有大量的火炮。他认为，这些火炮一定是在城墙上弄到的。他有意不提他们从武器库拿出来数量可观的机枪，特别是美国制新式机枪。这些美国制机枪已在凡尔赛和伊西首次用来对付保皇党分子，给宪兵和警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所以他们一谈起来便怒气冲冲。现在，新式机枪每天都在制造，一名制造商已答应每天交出两挺最新式的、更便于携带的机枪。这种机枪，两个人就可以抬走，据最新试验结果，其杀伤力似乎要大得多。反动派一直希望起义者的弹药能早日耗尽。起义者如果不节约使用，当然会使反动派称愿。因此克吕泽烈不得不两次提醒他们必须节省使用。斗争的时间越长，部队就越能得到锻炼，射击也就越加准确。但这种大量的消耗也正说明了起义者手中的各类弹药数量之多。其确切数目难以弄清，

即使粗略估算也不可能。许多防区的弹药库在普鲁士人打来时已被抢夺一空，陆军部目前正在让大家把当时抢去的武器和弹药交上来。这项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大家都在纷纷交出，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东西现在不会用来对付他们了。

一位军官告诉我，仅先贤祠的弹药库所存放的炸药就足够一支五万人的部队使用一个多月。只是子弹壳，特别是炮弹筒甚缺，不过好几家工厂已经赶制出一大批。

所以，巴黎现在既不缺乏枪支弹药，也不缺乏决心血战到底的人。它已经拥有一支组织精干、粮丰弹足的公民大军。这支大军如今正日益壮大，日益坚不可摧。

译自雅克·吉罗《公社和波尔多(1870—1871年)》

1971年巴黎法文版第231—246页。

(陈祚敏译)

致《汝拉联合会简报》编辑公民们*

1872年5月17日

于马德里

公民们!

你们觉得,“5月5日《布鲁塞尔自由报》上发表的关于萨拉戈沙代表大会的通讯是很奇怪的”。你们说得很有道理。这篇通讯揭露了旨在瓦解国际并在其内部建立一个贵族集团的阴谋。让我们协会全体成员认识到这些阴谋是十分必要的,这会使他们对伦敦代表会议的某些决议的全部价值作出评价。

你们向我们担保:“我们从来没有与先前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有过什么个人的联系。如果他们进行过分裂活动的话,我们对此也是一无所知的。因此,我们对这些分裂活动不能承担责任。汝拉的通告从来没有以分裂国际并建立第二个中心为目的。”你们为什么要制造谎言呢?我从未说过,先前的联合会委员会中出现过分裂;恰恰相反,我知道,只有委员会全体成员紧密团结,才会使它在遭到同盟分子攻击的情况下,不致于瓦解。这个同盟^①的中

* 本文首次发表于1872年6月1日《平等报》。该报编辑部在按语中说:“《布鲁塞尔自由报》发表了关于萨拉戈沙代表大会的两篇通讯。很遗憾,这两篇通讯却使汝拉《简报》感到不快,因为它们揭露了西班牙的同盟盟员的阴谋。《简报》认为揭露那个在法国受到通缉而西班牙政府力求把他引渡而不得的拉法格公民是合适的。拉法格公民把他给《简报》的答复寄给了我们,题为《致〈汝拉联合会简报〉的编辑公民们》。下面就是此信的全文。”——编者注

① 即巴枯宁派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

心设在瑞士。盟员证、口号以及由洛迦诺神秘的教皇^①亲手写的密令都是从这个中心发出的。由于不谨慎，Fascio Operaio^②的信徒们过早地泄露了这个秘密中心，你们不得不公开地否认它的存在。我要向你们，向你们在瑞士的上司们以及你们在西班牙的追随者们挑战，你们无法推翻我所说的任何一点。我保证，在全体大会上，我还要进一步揭露你们小集团的秘密。

你们说：“帕布洛·法尔加^③先生提出的一般理论正是我们的理论。”“社会科学博士”——他在信中用了这个头衔的全称——只是发展和补充了巴塞罗纳和瓦伦西亚代表大会详细制定的、在萨拉戈沙大会上遭到一些同盟盟员无力的攻击的组织计划。这个组织的目的在于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在任何战场上都能进行战斗的坚强的队伍。而你们却相反，你们作为同盟盟员在3月20日《简报》中声称：“组织是次要的”，“国际只是体现了左右现代社会的一切被剥削者之间的团结一致的感情。”由于对你们这一理论不满，马德里的《解放报》^④在5月4日一期中反驳你们：“请不要把团结一致的感情变成纯粹的柏拉图主义，即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慈善主义。”里斯本的《社会思想报》赞同《解放报》的看法，并补充说：“社会主义和国际之间的深刻差别恰恰表现在组织问题上；当社会主义这个词表述的是一个学派或若干个学派的学说的主体时，便存在这种差别。”如果今天你们改变理论，希望国际不是“对权威表示坚决抗议的体现”和“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汝拉通告^⑤），而是

① 指米·巴枯宁，他当时居住在洛迦诺。——编者注

② 意大利文，意为“工人联合会”。——编者注

③ 指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④ 《解放报》是国际西班牙联合会的机关报，拉法格曾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编者注

⑤ 即巴枯宁派于1871年11月在瑞士的桑维耳耶召开的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给国际工人协会各联合会的通告》。——编者注

组织起来进行战斗的团体，那末我就要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因为这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证明，尽管你们的纯洁思想还摆着权威的架子，但你们还是能够有所进步。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一些。萨拉戈沙代表大会通过的比利时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没有任何东西会使你们兴高彩烈的，因为：（一）表决是在会议结束之时进行的，甚至连决议都没有宣读。我没有参加会议，否则我将会投赞成票的；（二）这一表决是在对瓦伦西亚^①制定的组织章程表决之后立即进行的。这个组织章程把汝拉决议企图剥夺的一切权力赋予了联合会委员会，其中包括中止一个支部活动的权力。

由联合会委员会成员编辑的《解放报》是西班牙第一个发表并且赞成比利时代表大会决议的报刊。这是：

（1）因为这些决议称那些认为“国际是一个服从纪律和按照教阶制从上面下达到全体成员的命令的专制组织”的人是诽谤者。在这里，人们会考虑，究竟有什么东西阻止汝拉决议的签名者置身于诽谤者之列呢？

（2）因为这些决议同桑维耳耶通告相反，宣称“国际现在是，过去一直是由完全自治的一批联合会组成的”。西班牙联合会从未受到伦敦方面的任何压力；在共同章程以及各次代表大会决议中，联合会是完全自由地组织起来的，从这一点来看，它是真正的自治组织^②。

（3）因为这些决议要求修改“没有明确规定各联合会的权利、

① 指 1871 年 9 月 10 日国际西班牙会员在瓦伦西亚举行的秘密代表会议。——编者注

② “在不违背各次国际代表大会和地区代表大会决议以及不违反本章程的情况下，各地方联合会享有完全的自治权。”（西班牙组织地方联合会条例第 8 条）——编者注

也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章程”。

(4)因为这些决议对于桑维耳耶决议为使国际摆脱撒旦的魔爪并把它从永久的沉沦中拯救出来而要求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只字未提。

你们对比利时代表大会^①决议的赞同，你们的卑鄙的人身攻击，你们在书信中无节制的抱怨，以及你们针对我而写的文章，都清楚地证明，充斥了形而上学理论的汝拉通告的企图，只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去制造丑闻。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你们根本不会去关心协会的整体利益，而只是吹捧你们的教皇和某些红衣主教把代表们搞得疲惫不堪。

为使你们个人感到满意，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联合会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所有权的报告》^②，给萨拉戈沙代表大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著作是在卡尔·马克思这个“在国际中曾经出现过的唯一的提炼元素的炼金术士”的理论影响下完成的。当此书将来出版时，我奉劝诸位读一下，它将使你们懂得把唯物主义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中去的思想。我不建议你们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这本书太厚了。你们大概不知道，国际共同章程具有能够充分满足无产阶级的革命愿望的反形而上学的和实践的价值。这一共同章程，正如你们诙谐地指出那样，是这位“提炼元素的炼金术士”的成果。传教士们，不论他们奉行哪一种教义，都为这种极端的无知而洋洋自得！

至于你们扬言从巴塞罗纳得到的说我是“一个用假名隐蔽起来的人”的“直接情报”，任何一个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不可能提供这种情报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作为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

① 指 1871 年 12 月国际比利时联合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代表大会。——编者注

② 这个报告是拉法格起草的。——编者注

联合会的代表,是以真实的名字出席会议的,但为了不引起警察当局的怀疑,代表大会准许我将拉法格改为法尔加。

公民们,我希望,你们能够公正地把我对你们攻击的答复,发表在你们的《简报》上。汝拉联合会的成员们或许能从中获得某些收益。

敬礼及平等。

保尔·拉法格

译自雅克·弗雷蒙主编《第一国际》第2卷1962年
日内瓦法文版第308—311页。

(刘崇译 李兴耕校)

进化——革命*

(1880年2月18日)

一

有许多人,包括有学识的实证论者在内,都认为进化和革命这两种发展形式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其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自然和社会中的任何革命,事先都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进化阶段。在这一进化阶段的过程中开始出现新的机体;这一机体强而有力,可以一举突破孕育着它的旧形式,而且迫于死亡的威胁不得不摧毁这一形式,以求继续它的进化生存。正是由于我们当代学者不重视这两种发展道路,我们看到在地球形成史方面有两种理论进行着争论,一种就是居维叶的理论,他认为地球的形成是由于激变,另一种就是莱耶尔的理论,他认为地球是经过长期发展阶段而形成的。

因为我们仅仅是大众化的社会主义普及者,所以我们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首先举出每一个人、甚至最狂热的孔德派实证论者^①都知道的有机界的事实为例,然后把理论应用于社会现象领域。一个好鸡蛋,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或者在母鸡的孵

* 本文首次发表于1880年2月18日《平等报》第5号。——编者注

① 把“实证论”一词用于孔德派的形而上学的可笑理论,是辛辣的讽刺。其实,奥古斯特·孔德的真实东西不过是他的反科学的思想和一个莫明其妙的小学教师可笑的高傲而已,他的识字课本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赞许。——拉法格注

化下，或者放在孵化箱里，经过一系列进化过程，在十九或二十一天之后就会变成一只小鸡。于是这个小动物就会啄破外壳，吱吱地叫着来到世上。这种痛苦的叫声也象新生哺乳动物（人或家兔）的叫声一样，是由于空气突然进入呼吸道而引起的。要是象英国养禽家（达尔文）通过人工选择培育的短嘴鸽常有的情况那样，小动物不能啄破硬壳，那它必然会闷死。它在原有蛋壳中的进化阶段既已完成，要想继续生存就必须以革命方法来破坏这个外壳。

就动物的整体来说是这样，就其某一器官或部分来说也是这样。谁没有感到或看到智齿生长时产生的痛苦呢？牙齿在组织中慢慢形成，逐渐压挤破坏其组织来为本身开辟出路。读者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例子来论证，进化阶段总是要导致强迫的、痛苦的、革命的危机，这是使缓慢发展的新机体转到新的发展条件所注定不可避免的。

当代科学在哲学上的伟大成就在于：它证实了一切自然力量（热、光、电、生命起源、可移动性、精神刺激、思维等等）都不过是同一力量即运动（物质原子所体现的唯一力量）的转化而已；在一切无机的、有机的和社会的转化中都有着一个比较复杂而不易觉察的发展过程；为了研究一切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可以采取同一种科学方法，即辩证方法——“思维的最高形式”。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人们只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来看待人类的进化史和革命史的；换句话说，一切宗教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法律的设施，都被看作是有其自身的进化运动的现象来加以研究的，而这一进化运动又是不以经济环境为转移，似乎超越这些设施赖以产生的经济环境。这正象一个有实证主义观点的小酒店主，为了用辣味兔肉杂烩来款待自己的顾客，对他做的兔肉杂烩的辣味大讲一套道理，开始分析这种辣味，但他根本不谈杂烩所用的原料，如大葱、兔肉或猫肉等等。经济现象就是社会杂烩的组成部

分，政治的或宗教的设施就是辣味；组成部分即经济现象变换了，设施也就变换了。就拿众说纷纭的宗教来说吧。按照传教士的说法，它象麻疯或其他某种隐疾那样，是从天外来到人间的。在伏尔泰信徒及许多眼光短浅的无神论者看来，它是一些狡猾的恶棍所发明出来的，他们力图让所有的人、甚至那些本来决不会想到妖精的老太婆都来相信他们的胡说八道。在某些拥有部分真理的唯物主义者看来，宗教来源于被神化了的外界力量引起的印象。但是最主要的困难就在于要说清楚，为什么杂货店主或交易所经纪人象沙漠里的阿拉伯人一样，都是一神教教徒？奥古斯特·孔德明明知道克尔克或摩西所说的神的闪光是电，工业资本家促使自然力量为他创造了财富，却为何还是象火地岛的野人那样迷信呢？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任何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所以人间的力量就以超自然的力量形式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在历史的初期，首先反映的是自然的力量；随着各民族的发展，自然的力量就以各种复杂的形式被人格化了，可是不久，除自然的力量外，社会的力量也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显示了强大的作用，而且非常奇特和不可理解，也象自然的力量一样以其似乎是自然的必然性统治着人们。②

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形式（《资本论》第18—37页）③时首先指

① 孔德信仰神—人类。形而上学者孔德认为神就象一面镜子，它反映人的一切食欲和丑恶。实证论者孔德把这一虚幻的形象当作实际存在的东西，给它换一个名称，称之为“人类”，并匍伏拜倒在它面前。孔德虽主张保持天主教的教阶制度、圣礼仪式和宗教仪式，但他还是认为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宗教，因为他给这个宗教取名为“人类宗教”。这个教会的英国大主教理查·康格里弗（皮·拉菲特是这个教会的第二位教皇）去掉了孔德提出的名称，并代之以“人道的天主教”（Human Catholicism）之称。孔德的整个哲学无非是一堆空话和词藻而已。思想是旧的，而且往往已被彻底驳倒，但标签却是新的。而这对不可知论的学者来说已经足够了，英国的实证论者自称为不可知论者，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一无所知的学者。——拉法格注

出,抽象人类劳动,即人的劳动,由于它只是人的机体的有机耗损,就成为商品的价值的基本要素(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仅仅是由于这个特性);各种商品通过货币来表现它们的价值,而拥有货币就会象得到神赐一样拥有人间和天上的一切财富,在资本主义世界很多人都想拥有财富,可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做到。正是这种社会行动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后来在主观上变成了唯一的神。^④

因此,应该在人们的头脑对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反映中去寻求一切宗教思想产生的根源。只要还不能担保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只要人仍旧是社会力量的玩物,那么,“谋事在人,成事在神”这句古老的成语将作为真理而仍然有效,这也就是说人的活动是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异己力量支配的。但是,一旦社会实行平等原则,人能够支配生产和交换的力量,从不自觉地无谓奔忙而进到自觉地加以支配,那么“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原因很简单,这就是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弗·恩格斯)^⑤

我们现时在法律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公正观念也是如此。法律关系本身来源于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来源于蒲鲁东的交换双方缔结的**双方契约**,根据这种契约,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商品,总是被抢得精光。在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社会中,资本家阶级就会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355页。——编者注

^③ 拉法格这里引用的是《资本论》法文版(1872—187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87页。——编者注

^④ 如果我们把这一方法用来研究新教改革(它同因商品交换而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出现在历史上是同时的)就可以看到,新教及其关于神赐的教义(即天主教冉森教徒所信奉的教义),以及从原始的天主教保留的多神教中产生一神教,就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真正宗教。——拉法格注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366页。——编者注

消失，资本主义交换方式就会消失，而由此产生的一切公正观念也就随之消失（参看《资本论》第35页及以下各页）^①。

经济现象也决定历史上一切政治运动。原始公社解体后，经济现象就把人类社会大体分成两个阶级，即有产阶级和贫苦阶级；这两个阶级继续发展，改变了一切社会关系，并创造了一个新的阶级，即革命阶级。这个阶级终于形成，象那个小鸡一样，破坏了曾经孕育它的旧的社会形式，以便冲向尚不知晓的历史前程。

在下文中我将尽可能明确地说明，现代生产力（蒸汽和机器工具）由于它们的发展，是怎样把社会分为两个新的敌对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这些生产力是怎样使国家财富集聚在极少数资本家手中，从而完全剥夺其他资本家对这些生产力的控制，甚至使他们根本无法支配这些生产力的。同时，这些生产力是怎样使得在人数上日益增多、被剥夺程度日益加重的无产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从而在无产阶级内部培育着智力和组织能力，以便把管理社会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无产阶级唯一的出路就是打碎包着它的硬壳，即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

二

蒸汽和机器工具——工业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因素——推翻了社会的一切经济基础，动摇并改变了旧的经济条件所产生的一切社会关系、一切宗教的和哲学的观念。一架体积为一立方英尺的小小机器（车床），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对人类所起的激发作用，都比孔德派和斯宾塞派所杜撰的哲学要大得多。这个不大的车床不久就变成一架自动机械装置，它“不仅代替了某种特殊工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2章。——编者注

具，而且代替了人的手。它能制造出需要的几何形状，而且精确、轻易和迅速的程度是任何最熟练工人的富有经验的手都无法做到的。”（《资本论》第167页）^①。这架不大的机器使机器生产机器成为可能，使现代机器成为可能，使生产资料的进化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也就带来了它的一切社会后果。

谈到美洲的农业竞争，我要指出的是：铁路、轮船、电报把欧洲的小麦田同美洲的小麦田连成一片，在这些土地上已经采用而且将来还要大规模地采用农业机器，这就引起了欧洲的地产同美洲西部处女地的经济斗争，激发了那些惯于靠欧洲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过活的土地所有者、农场主和农民的热情。

下而举另一个例子。

里昂第一家丝纺织工厂建于十五世纪上半叶。1680年机床的台数为九千至一万二千台；1789年增加到一万八千台，1816年增加到二万台，1827年增加到二万七千台，1848年增加到五万台，1852年增加到六万三千台。但是到1863年，仓库里存放的报废工具按价值计竟达三百万法郎。当时，薄绸、单色料子、粗质丝绒，特别是丝织围巾，仍在里昂附近的山区和埃纳省生产，可是华丽的产品却集中在这个城市里，而且是由用最新机器装备起来的大工厂来生产的。里昂集中了大量工人，他们时而在一些工厂做工，时而在另一些工厂做工；克尔瓦-鲁斯和韦瑟等郊区变成了城市，另一些郊区，如吉奥蒂埃和布罗托，在1820年居民只有一万四千人，可是路易-菲力浦时代却增加到四万人，而到1863年则超过八万人。里昂曾经是国民公会不得不采取恐怖手段加以镇压的反动城市，现在却成了法国最革命的城市之一。无论1831年的里昂，还是后来1848年的卢昂，都成了十九世纪首先举起社会革命旗帜的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2页。——编者注

城市。

蒸汽和机器工具引起的社会革命是从上一世纪末才开始的，但是那些深入研究人类所处的经济条件的人，即本世纪上半叶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和下半叶科学的集体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却预见到社会制度将在与新的生产力性质相适应的新的基础上得到彻底改造。他们预见到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集体占有制将代替资本主义占有制。光荣属于马赛代表大会，它把这个伟大目标书写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旗帜之上！

当然，共产主义也象世界一样，早已有之；它见之于最兴旺的动物种类，正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见之于行将灭亡的种类一样。^①当然，共产主义在各个时代都有它的代表者，就连资产者也把这些代表者列入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之林（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圣拉伯雷，等等）；当然，在一切革命时期——德国的宗教改革时期，英国的十七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法国的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劳苦大众都是置身于事件的前列，并作出英勇的努力，以求实现人类始终憧憬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不管共产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沙尔·傅立叶、罗伯特·欧文，

^① 在最近一次圣彼得堡召开的自然科学家年会上，凯斯勒尔教授宣读了关于“互助定律”的报告。在他看来，光是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不能解释生物的进化，要想理解生物进化和物种构成，还必须注意到动物界中具有的共同生活和相互依存的原则。另一位自然科学家谢韦尔措夫先生，为了证实这一观点，举出了许多由于不能共同生活而趋于灭亡的动物，例如鹬就是这样，它虽然飞翔得很出色（某些机会主义金融家也是如此），但却逐渐灭绝。对这些事实和学说我不负责任，我之所以举出来是想告诉那些拿生存竞争作掩护来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唯理论者，在马尔萨斯学说（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达尔文学说已经开始被这些科学家推翻。达尔文学说，这个资产阶级哲学的最后的最勇敢的飞跃，已经太狭窄了，容纳不下那些使自然科学更加丰富的新的事实了，很快就会让位给另一个更全面的学说，而在这一学说中，生存竞争将占次要地位，而且它将证明：生存竞争在一定的环境中会成为生物进化的障碍，甚至是物种退化的原因。还必须补充一点：在达尔文那里是可以找到新的学说的萌芽的，可惜他的学生们却未能把它表达出来。——拉法格注

等等)多么伟大,不管他们的乌托邦多么令人神往,也不管劳苦大众的革命毅力多么巨大(法国恐怖时代的劳苦大众甚至把政权都拿到自己手里),共产主义仍然是没有实现的理想,因为还不曾具备能够使之实现的经济前提。但是现在已经具备了这种前提,这是由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结果,至少就生产资料来说是如此。

正如盖得同志在《社会主义评论》第一期上所指出的那样,“人类早先的某些制度,如选举制、普选权等,后来在文明昌盛时期又重新采用和恢复,作为最高文明的表现。”对共产主义来说也是如此。在动物界和人类共同生活的早期,财产是公有的。人类的这些原始公社在外界力量和内部力量作用下逐渐解体,让位给以阶级对抗和个体互相对抗为基础的社会。但是在这些对抗的作用下,我们却迅速地走向另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利益和阶级的对抗让位给利益的共同性和阶级的消灭。人类并不是如圣西门所设想的那样沿直线发展的,而是象天体围绕它们的中心或叶子围绕它们的茎干那样作螺旋运动。在运动的某些阶段,人类达到相应的地步,这时重新出现被认为已永久消失的原有形式,但这些形式是由于在间隔时期出现的经济现象而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式。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生产资料的历史进化是怎样使无产阶级不仅可能,而且在死亡的威胁下必须建立这些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制的。

三

在资产阶级进化运动的早期,生产者占有劳动工具和产品。这一运动导致劳动工具和产品不再为生产者所占有。

在这一运动的早期,劳动工具的规模不大,很简单,也不太值

钱，因此它可以属于个体生产者，——每个工匠都有他自己的工具箱。现在，劳动工具（机器、工具、大地产）变得复杂了，规模大了，而且价值巨大，因此就不再为也不可能再为个体生产者所占有，暂时为单个资本家和合伙经营的资本家^①所占有。在工具还不太大、还很简单的时候，个体生产者可以用来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一旦规模大了，而且复杂了，就要求有组织的工人的集体努力。因此，这种大规模的、复杂的劳动工具也就丧失了它的原始形式而具有社会的或共产主义的形式。但是，劳动工具虽然具有共产主义形式，却并没有因此而失掉它的个人占有形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产生新的革命阶级，即一无所有、灾难深重的工农业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死亡的威逼下，必然要强行突破孕育它的社会外壳——即劳动工具为单个资本家或合伙资本家占有的社会的外壳。

正是由于劳动工具在自己的进化运动中虽然也采取共产主义形式，但仍保留着个人占有形式，所以它就产生生产和交换的无政府状态，同时也对工厂劳动起了组织作用。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后果之一，就是劳动工具起来反对它的占有者资本家，使他们在工商业危机时期遭到破产，并把他们强行抛进无产阶级的队伍。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农业劳动工具——土地的进化运动。我们只能概括地加以说明，我们现在请有兴趣的读者参看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法文版第140—161页和第314—341页）。他在那里，以及恩格斯在《科学中的变革》的三章^②（不久就要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中都描绘了生产力辩证发展的图景。

农奴虽然依附于被封建主名义上占有的土地上，但他实际上

^① 资本家作为个人是单个存在的，作为社会力量则是集体存在的。资本，或它所体现的并作为其系数的积累起来的劳动，是由工人集体创造的。——拉法格注

^② 即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

占有土地及其产品。在以实物和个人劳动缴纳赋税后，其余一部分收成仍归他所有，而封建主也保护他免遭周围贵族的掠夺；封建主的城堡当时成了他和他的全家、他的牲畜和畜舍的避难所。农民私有主，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这一杰作，名义上占有自己的田地，实际上却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他可说是把一切都抵押给高利贷者了。他辛辛苦苦地在为高利贷者劳动。

法国大革命的完成，对高利贷者也是有利的。农民私有主向他交付的货币税，向国家交付的赋税和所服的兵役，要比封建贵族迫使交付的还要多。过去交的是实物税，现在要交的是货币。这样一来，农民不得不用农产品换取货币；因此他必须用货币交付双重赋税——先是向高利贷者和国家，后是向商人，而且农民越是需要货币，商人就越是对他苛刻。农奴还可以从自己的封建主那里得到保护，农民现在从高利贷者和国家那里能得到什么呢？法院审判，查封财产，拍卖一切，最后，被从他所眷恋的土地上赶走。^①资产阶级革命给了农民名义上占有土地的权利，但同时却组织了社会力量，这些力量迫使他和他的全家脱离土地，并把他们抛进工业城市无产阶级的队伍。

小地产只能在没有产品交换的地方实行。农民私有主应当在自己的土地上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他以及全家生活所需的一切。他应当成为一个农民和手工业者；他应当种他的小麦和亚麻，烤他的面包，织他的衣裳。

但是，一旦他为了向高利贷者和国家纳款而必须弄到货币，他就不得不把他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同其他农民（本地的和外地的）进行竞争。在他还不需要卖东西换取货币的时候，对于每一布瓦索^②小麦究竟值十个劳动日还是值一个劳动日，他并不象拥有资

^① 在《社会主义评论》第2期（1880年——编者注）第80—84页上，泰奥多罗维奇出色地描写了塞尔维亚地产的这种运动。——拉法格注

本的大业主那么感兴趣。他吃自己的小麦，别的一概不管。但是，一旦他把自己的小麦拿到市场上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的一布瓦索小麦就要同大地主的一布瓦索小麦发生冲突，并开始竞争。胜利属于生产费用少的人。售价不取决于农民私有主的生产费用，而取决于大地主和外地的地主的生产费用。

我要提请读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产品交换成了农业劳动工具——土地发生变化的最积极因素。其实，在工业生产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现象。为了交税还债，为了取得所需的而自己又不能生产的一切，农民私有主必须为交换而生产；他于是要同其他生产方式进行竞争，在破产的威胁下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这时就有两种经济力量统治着商品生产，因而也就统治着基于商品交换的一切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只有极端的孔德分子才会以为慈善行为可以缓和这些力量的作用。这些力量在加强，并扫除一切试图与之对抗的障碍（保护关税、对某些农作物实行封锁、制定生产规章，等等）。

这两种力量的不断作用势必破坏小私有制，并把农民私有主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社会主义的敌人总是洋洋得意地谈论小私有制，但小私有制的消失不过是时间问题。当谈到农产品时，看到外国竞争不断加强和工业家怀有自由贸易主义的倾向，就可以想象这个时候不会太久，而且这种急剧的变化定会引起革命的爆发。但是，地产的集中却使地产失去个体劳动工具的性质，而具有共产主义工具的形式。进行耕种和收割的不再是私有者了，而是雇佣工人。在法国某些地方按对分制耕种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对分制佃农每年得到一部分钱，另外一部分则是农产品。在其他地方主要是由租佃农场主来种地。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租给多少有点

② 谷物的旧的容量单位，约等于 12.5 公升。——编者注

资本并由自己承担风险的农民去种。在英国，大地产只归租佃农场主经营。在地产进一步集中的情况下，法国也会出现同样情况。

但是随着地产的集中，在国内外竞争的压力下，土地的耕作方法也会改变，会抛弃老一套方法，而采用科学方法。为了使土地休养生息，旧的耕作方法常年使土地不长庄稼，而现在这种方法为轮作制所代替；庄稼一茬接一茬，不让土地休闲。这种方法要求大量施用自然肥料和人工肥料，所以收获是巨大的。但是这样经营需要大量资本。此外，还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为满足这种需要而采用了农业机器，这当然就使农村变得荒无人烟，并重新实行分工，但这样一来却使劳动越来越轻，越来越需要智力。这时，耕种、收割、脱粒、簸扬和入仓等工作都由操纵机械的工人来做。在一切文明国度里，国家经常设立专门培养农业工人的学校。

随着农业生产具有科学性和规模不断扩大，就产生了农业工人组织。这种情况尤其可在美国和俄国某些地方看到。美国最有名的农场主之一的道尔莱姆普尔先生，在红河沿岸就拥有三个农场，其中之一就有土地二万四千公顷。他的工人是按军队形式组织起来的。冬天一过，他就带着自己的队伍来到农场，这队伍里既没有妇女也没有孩子。什么事情都有严格的规定，象工厂一样。一吹号就起床，上工、吃饭、睡觉都有一定的钟点。他的工人吃得很好，住得很好，待遇很好，工资也很高。秋收一结束，雪开始覆盖田野，这时他和他的队伍就回到他们的冬天住所即城里来。沙尔·傅立叶以他的有预见性的天才所预言的这些农业大军的出现，是美国和俄国的大规模谷物生产所必不可少的。随着现代大农业的发展，农民不再是栖息在自己的那个小窝里、不与任何人交往、苟且偷安的动物了。他成了无产者，过着城市里广泛的人的生活，成了一个大组织的成员；他的才智得到了提高和发展，他的革

命性也加强了。

大地产及其经营管理制度使农业工人的智力发展和合理组织成为必要，同时却使土地私有者丧失任何智力而成为无用的人。大土地所有者就好象是一头养肥了的猪。猪这个心平气和的动物活着的时候为我们寻找块菌，死后可以做成上等的火腿。我把它同那种纯粹是有害动物的土地所有者相比较，是委屈了它。^①

译自《拉法格选集》第1卷 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
俄文版第271—285页。

（刘功勋译）

① 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打开任何一本农艺学著作，就可以看到研究这门科学的人对于爱好农艺的土地占有者的农艺经验是多么惊奇。他们仅仅是走马观花地读了某种关于化肥和集约经营的指南，就自以为有了很好的素养，就可以把地种好了。这无异于一个人想通过阅读游泳指南就学会游泳一样。在最近一次利尔农业会议上，拉杜罗先生在他关于化肥的报告中举了一个爱好农艺的土地私有者的例子：他由于过多使用过磷酸钙，结果把自己的土地完全烧坏了。粘土、沙子和矿物在冬天的气候下本来就是粘在一起的。土壤一收缩，变成了灰白色，空气、水份和阳光几乎完全不能透过。这样一弄，土地就象石头那样坚硬，只能用铁棍才能把它敲碎。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拉法格注

蒲鲁东主义已经过时*

(答公民丹尼尔)

(1880年4月21日)

公民丹尼尔开诚布公。这一点我很高兴。我也要开诚布公。但是先得告诉他，在我的批评中毫无个人的东西。我只是读了他的文章才认识他的。从1871年起我远离了法国，从此也就同样远离了一切个人的纠纷。

现在言归正传。

公民丹尼尔对《平等报》编辑们的主要指责是，说他们促使各社会机体趋于集中，说他们要采取暴力来解决社会争端。公民，请告诉我，难道您认为，燕子宣告了春天的到来，燕子就是春天到来的原因吗？当科学社会主义者们谈论经济力量的集中时，他们并不引起这种集中，而只是确认这种集中的过程。

早在他们的头脑中开始有这种集中的想法以前，在经济现实中就已存在着这种集中了。可以拿您本人的行业——制鞋业来做例子。很抱歉，我的生产知识很贫乏，因此，请您纠正我的错误和弥补我的疏漏。

法国的制鞋业大约于1840年开始改革，使用钉子和螺丝来制造鞋子，虽然，顺便说说，早在1810年美国领事就试图在法国实行

* 本文首次发表于1880年4月21日《平等报》第9号。——编者注

这种机械制鞋。1844年在里昂库尔建立了第一个用钉子制造鞋子的作坊。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在此以前，鞋匠是亲自操作一切的师傅。他量尺码，裁剪皮革，上鞋楦和用蜡麻线缝制。这一切工作需要广泛的技术知识和很大的膂力。它使鞋匠们的智力大大发展；某些杰出的数学家就是鞋匠或鞋匠的儿子，而在我们的革命战争中鞋匠是最勇敢的战士。认为思维就是唯一的力量即运动的转化的生理学家们（请丹尼尔公民对这些话不要见怪），把这种长处说成是由于习惯于坐着和垂着头工作而引起的额部头脑的发达所造成的。

分工在小制鞋作坊中就已经存在，但机器的运用扩大了作坊，扩大和发展了作坊内部的分工。谁说“分工”，谁就是说制造从事局部工作的工人，使工人的技艺失去意义；谁说“采用机器”，谁就是说用妇女和少年代替男人。用缝纫机缝制粗制鞋的剪祥和鞍子，妇女很容易完成十二个男人做的活（1860年的调查）。在制鞋业中可以看到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为使“鞋垫”能够吃住所钉的钉子，有必要加厚鞋垫，这样就使鞋子变得比较沉重；掌钉子的鞋底具有缝的鞋底所没有的弹力，——因此只有粗制鞋由机械来掌钉子，而高级鞋用手工缝制。不过，虽然精制鞋，至少是部分地，仍是男人的活，但粗制鞋的制作主要是妇女的活。如里昂主要是生产在农村集市上出售的粗制鞋，低级鞋，1865年那里雇用了三千八百名男工和六千二百名女工。机器由于发展了妇女劳动这种分工而摧毁了小作坊和把成百个从前是独立劳动的男工和女工集中在大工场里。1863年里昂已经拥有大制鞋厂，每年平均生产四百七十万双鞋。我现在知道在伦敦有集中了超过五百工人的工场。因此，公民，您看，不是我们制造了集中，我们甚至还不想要它，是它强加于我们的，就象它强加于最主张分散的蒲鲁东主义者一样。

但请不要以为，你们能够阻止生产资料和开动生产资料的工

人的集中。请不要步我不幸认识的托伦分子和其他蒲鲁东主义者的后尘，他们在帝制时期鼓吹生产资料的分散，好象只要希望分散，就能实现分散似的。我告诉您，为什么这种分散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认为，您是会第一个赞同我的观点的。

可以断定，还在采用机器以前，甚至还在实行分工以前，在集中化的工场内劳动的十个或一百个工人生产出的经济利益就能比十个或一百个独立劳动的工人生产出的多；总的开支（工场用地的租金、照明、供暖等等）要低得多。就是这种精打细算使集中化的工场有可能打倒分散化的工场。但是只要一实行分工，尤其是采用机器，这些节约的打算就具有更大的意义。您是讲求实际的人，不用我细谈这一点。您是做出口工作的。法国的机制鞋很难经得住美国的竞争；仅美国的一个州，马萨诸塞州在1865年一年内就制作了一亿八千五百多万双靴子和鞋子，价值超过六千万美元，而它的生产从那时起提高了。因此，由于美国的这种竞争，法国的制鞋工业出口的就几乎只是手工缝制的鞋子；产自马赛、波尔多、巴黎、利摩日、图卢兹、勒凯努瓦及其他城市的精制鞋虽然还占据着欧洲、美洲甚至亚洲的市场。但是即使在那里，法国鞋也已经受到了英国和美国鞋的冲击。式样美观的法国鞋不久前还无可争议地独占鳌头，但是英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在精美和雅致方面也开始了竞争。不久，生产费用问题将成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问题，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毫无必要地去设置分散化的工场。

相反，法国的鞋业生产而临着更加强有力的集中化趋势。

我所讲的鞋业生产情况，也可以适用于其他一切工业部门。蒲鲁东主义者可以用永恒的真理、自由、正义和其他类似的美好东西的名义来反对，但这并不能阻挡经济力量的运动走自己的路。

谁说集中化的工场，谁说分工，谁说机器生产，谁也就是说用劳动抑制人的个性和人的自由；现代工人在得到命令时不能表示

异议，不管他对命令是否理解，他都必须服从。请设想一个铁路扳道员对接到的电报命令表示异议，这可是等于使千百个乘客的生命遭到危险！难道您允许接受您分配工作的裁缝们对您命令他们缝制的那类式样表示异议？在现代工场里劳动是自动化的，工场装备得越完善，劳动就越是机械化。现代工场扼杀了人的个性。正因为它导致如此可怕的结果，引起如此多的灾祸，所以我们要通过科学地组织劳动来把劳动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一天工作三小时或四小时，以便使人能够在工场外发挥自己的个性和通过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来发展个性。我们认为，只有使现代社会的非生产分子参加社会生产，才能达到这一点。公民，请您只要想想五十万士兵，他们在军队里，您必须每天供养他们而他们却什么也不创造。

我们也并不认为，把劳动时间限制在一天三小时或四小时这样一个大问题，能够通过小小的法米里斯特^①或者其他合作的尝试而得到解决；我们认为，只有在国家占有一切已经集中化大企业的基础上完全改组社会才能改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命运。我们也不认为，用关于正义、平等、真理和其他美好的东西等人道的词句就能达到这个结果，只有合理地 and 适时地使用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提供某些重大的结果，如果您不这样认为，那么这证明，您虔信若干世纪来一直在向世代受苦的人宣传要顺从的基督教的慈善事业。

还是一句话。您对“资产阶级的子弟们”抱不信任的态度，说他们“不可能用其他办法来达到政治上的飞黄腾达，所以来迎合你们，以便给自己制造声望”。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虽然我本人也是资产者的子弟。很遗憾，许多善于发表关于正义、平等、分散化

^① 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信徒企图在法国组织的生产消费公社。——编者注

等等豪言壮语的资产阶级冒险家，把国民的真诚和热情当作飞黄腾达的手段，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太多了。但是您也应当担心那些多少得到了自由的工人，他们属于工人阶级的特权阶层，他们踩着自己同志的肩膀爬进了众议院，如纳多，或参议院，如托伦。至于我们，那么，当必须揭露政治冒险家时，不管他们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还是出身于工人阶级，我们将尽自己的职守。而且我们指望在这方面得到您的帮助。

工人阶级并不是清一色的；在它的队伍里存在着这样一些工人阶层，他们处于或多或少不同的地位和有时具有不同于大多数工人群众的需要和利益。例如，您本人就属于这些阶层之一。您的裁剪匠的才能给您在工场里创造了较高的地位，您的工资当然高于您的同伴们的工资，而您同老板的关系当然比较独立。

如果您同我们一样希望无产阶级群众得到经济上的解放（虽然您也知道，为这一事业而奋斗的战士得到的，将是打击多于奖赏），那么这使您只是得到更多的荣誉罢了，因为您即使没有这一点也已经一半是自由人了。但是，您这个阶层的工人通常并不是很为工场里自己同伴的命运担忧的。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

1867年，伦敦的裁缝宣布罢工。这是发生在春天。英国老板，就象好心的爱国主义者一样，派人去巴黎和布鲁塞尔雇用工人。（您作为一个蒲鲁东主义者，当然是有点儿沙文主义的，——别忙，当问题涉及失去还是获得几个法郎的时候，您的老板就会告诉您，爱国主义值几个钱。）国际总委员会（其中也有资产阶级子弟，我当时就是其中之一）向法国和比利时发去了电报，因而阻止了运来工人。老板们当时就是这样做的。裁剪匠们没有参加罢工，——他们如参加就会损失太多——，他们继续替老板干活，老板让他们裁剪服装的各部分并加以编号，全部送到外省去缝制。尽管国际竭尽了全力，老板们靠裁剪匠们的帮助取得了胜利。经过三个月的

穷困生活，工人们不得不屈服了。

您瞧，公民，在工人阶级中，也象在资产阶级的叛逆者中一样，存在着无产阶级必须防范的叛徒。无产阶级为了防范未来的路易·勃朗和托伦之流，就必须强有力地组织起来，只信任那些它早就了解和经过考验的人，同时无情地揭露任何一个开始离开正道的自己的代表人物。

工人阶级的口号必须是国际的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当它从自己的队伍中推举出必定会引导他们去进行革命战斗的领袖们的时候，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但是，如果在享有特权的工人队伍里，或在资产阶级的队伍里有些人决心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战斗，那么决不应该推开他们，更不应该象您那样侮辱他们。其实，还从来没有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没有特权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这些人背弃了那些阶级，要把自己的意愿同那个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战斗的阶级的意愿融合在一起，——永远也不要推开这样的叛逆者。难道杜瓦尔和瓦尔兰推开或者侮辱过弗路朗斯或托尼·穆瓦兰吗？没有，他们肩并肩地战斗、并且英勇地为同一事业而献出了生命。

译自《拉法格选集》第1卷 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
俄文版第306—312页。

（董荣卿译）

阶级斗争*

(1880年6月2日)

巴黎公社是使资本主义社会分裂的阶级斗争的最光辉表现。使拿破仑神话彻底破灭了的俾斯麦一波拿巴战争、将要得到惩罚的共和派的叛卖和国防政府的丑行、以担心出现工人阶级(它害怕王朝的幽灵再现和农民提出要求)的共和国为借口而让无产阶级流血的梯也尔的阴谋诡计等等,都不过是掀起运动的偶然原因,是引爆那填满甘油炸药的炸弹的电火花而已。3月18日的革命虽然不象1831年的里昂起义那样(里昂工人群众的不朽功绩就在于他们在本世纪首次举起无产阶级斗争的旗帜:与其劳苦而生,不如战斗而死!)具有纯粹的阶级斗争的特点,但毕竟是中央委员会发动的运动,本可以在自由发展的情况下把其中的资产阶级分子排除出去,而只留下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工人阶级是十九世纪法国唯一的革命阶级,对所有制这一社会的整个宗教、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具有新的理解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唯一阶级。梯也尔和凡尔赛的议员们一开始就预见到国家政权要转到无产阶级的代表手里(这是争取公社自治的斗争的必然后果)。残酷的镇压把巴黎变成一个大屠场,资产阶级被吓得至今仍神魂不定,这就是证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它于公社失败后第二天代表两半球无产阶级发表的关于内战的宣言中维护了失败者。各资本主义国家的

* 本文首次发表于1880年6月2日《平等报》第20号。——编者注

资产阶级都随声附和刽子手们来加以侮辱，完全公开地承认了巴黎的斗争具有社会性质。资产阶级激进派不能抹杀这一斗争的伟大历史意义。

人类的历史只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植物界和动物界搬到人类社会的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具有阶级斗争的形式。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从十三——十四世纪起就开始缓慢并艰难地形成起来。作为一个阶级，它在上一世纪^①一举推翻了妨碍它发展的贵族社会；从上一世纪末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在十九世纪就骚动起来，并作了极大的努力，要炸毁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

通过自由发展最新的生产力，资产阶级不仅改造了在它产生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那些社会条件，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造就了一支强制结束资产阶级生存的无产阶级大军。**

大生产机体把整个社会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寄生者——私有者阶级和被剥夺的生产者阶级。一方面，是在**社会生产中只起造粪者作用的施奈德之流、普野-克尔蒂约之流和路特希尔德^②之流**；另一方面，是现代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者及他们中间的管理领导人才。

消灭寄生者阶级之所以成为当前的历史必要，并非因为正义、平等、博爱以及人的头脑中对实际运动的其他一些形而上学观念要求如此，而是因为工业机体和无产阶级群众的进化绝对需要这样。

资产阶级所领导的社会生产具有无政府性质。资产阶级的领导只能导致对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侵吞，导致工人群众的贫困等等。

① 指十八世纪。——编者注

② 施奈德、普野-克尔蒂约、路特希尔德都是法国的大资本家。——编者注

在一切工业部门，在无秩序的生产时期之后，总要周期地停顿三四个月。不久前还在拚命干活的工人，现在就要因失业而饿死。从1825年起，每十年就要来一次工业危机，它震撼整个社会，造成大批人破产，使工人陷入极其可怕的饥饿之中，最后以生产资料和产品被大量侵吞而告终。经济学家绞尽脑汁来解释这些工业危机，但除了一派胡言乱语外，他们还能说些什么呢？这些危机不容置辩地证明资产阶级是绝对不能领导现代社会生产的。

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无能的受害者；它肩负社会劳动的重担，同时也承受着一切不幸。大工业中的所有工人（男工、女工和童工）每天被关在工业监狱里长达十至十四小时之久，但持续的、令人厌倦的、侮辱性的劳动却并不能保证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资产阶级的无能周期地造成可怕的失业，使工人无事可干，连一点点微薄的工资都挣不到。但这种毫无保障的贫困生活总有一天会使无产阶级成为社会中曾经存在过的最革命的阶级。

在资本主义生产下，这种贫困和没有保障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政治变革和社会改良也不可能改善这种状况，除非以集体所有制取代生产资料和产品资本主义所有制。

古老的生产形式——奴隶制、农奴制、行会形式，虽然是用或多或少狭窄的铁环把人圈在里面，但至少直接或间接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证人的生活资料。但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充分扩大，即**备受饥饿折磨的生产者除工资外得不到任何生活资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把生产者从农奴制和行会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就必须宣布人身自由。让我们看一看，资本主义剥削把它打着正义、平等、人的尊严等旗号刚刚解放出来的生产者弄到何等贫困和受屈辱的地步。下面几段话摘自布朗基院士于1848年发表的文章。其中引用了维勒姆博士于1835年提到的事实和《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的工人状况调查报告。

“这些被压迫者(利尔的工人)好象注定要过极端贫困的生活,甚至要处于野蛮状态…… 他们的住房被穿过小院的阴暗狭窄的小胡同隔成一个一个小孤岛,这些胡同同时也是排水沟和堆放各种垃圾的地方,一年四季潮湿不堪。住所的窗户和地窖的门(利尔的居民住在地下)就朝着这些发恶臭的过道开着,过道的尽头就是有栅栏的污水坑,这里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是公共厕所。公共住所就在这些传染病发生地附近。客人一来到这些小院,就会有一大群奇形怪状的孩子围上来,他们都是些病弱的、伛偻的、不象样子的孩子,脸色苍白,还带有一点土灰色。这些可怜的孩子,大多数都赤身露体,少数能有一件破衣服遮体就算是幸运的了……他们常常睡在地上、干草上、干马铃薯皮上、沙子上和捡来的破烂东西上。

他们的栖身之所,根本没什么家具,只有最幸运的人才有一个佛来米式的炉子、一把木椅子和别的什么家什。一个老太婆指着另一个坐在地窖的潮湿的地上的邻居老太婆对我们说:‘我不富裕,但是谢天谢地我有一捆干草。’我们写这个报告时,在利尔市的地窖里就有三千人过着这种极端恶劣的生活,而利尔市是以它的居民具有仁慈的耶稣精神而著称的…… 据利尔的著名医生戈塞尔博士说,在二万一千个五岁以下的孩子中,就有二万零七百个死掉…… 尽管诺尔省土地肥沃,文化很高,尽管它有各种行业,尽管它在各方面都取得惊人的成就,但是都不能消除该省工人的赤贫现象,凡是劳动被组织在大工场里的地方,就会有这种赤贫现象……”。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看了埃塔涅大街的地窖、格阿和索瓦热等胡同及瓦尼翁广场之后,我来到囚有一千八百至一千九百名男女犯人的洛斯中心监狱。这些非常好看的地方,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外观是多么令人满意!甚至以为是在宫殿里。走廊干净极

了，牢房里床铺摆得整整齐齐，有很好的铺盖，有空气新鲜、明亮温暖的大厅。犯人都穿着新衣服，脚上穿着很好的木鞋和毛袜……厨房和贮藏室一点可挑剔的地方都没有，这里贮藏的卫生食品丝毫不差地分发下去。”^①

这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为自由生产者提供的那份社会乐趣。但是，资本主义剥削迫使工人干力不胜任的劳动，而且常常使他们没有工作可做，得不到生活资料，同时还在社会生产中使用女工和童工，从而破坏工人的家庭，这样也就消除了小生产者特有的那种保守和反动的本能。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大工业中的工人的生活更靠不住的了，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他们的生活更悲惨的了；资产阶级监狱里的生活比起工人的生活来就成了黄金国里的生活，所以他们往往不加思索地干各种冒险的事情。他们是不屈不挠的。妇女和孩子也同样充满革命激情。现在让我们再引一段布朗基院士的话：“里昂工人不理解，既然力量在人民方面，为什么他们不能去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一切呢？在他们看来，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力量；在他们眼里，强者的权利是唯一神圣的权利。里昂有一些男青年，他们生性好闹事，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他们在类似战争的各种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勇敢使他们在我们的革命时期享有盛誉。他们总是第一个上火线，最后一个上工。这是当代的病态。”巴黎的妇女在街垒上冒着枪林弹雨，这表明，她们也感染了“当代的病态”。

这就是当代革命大军中的战士。习惯于共同劳动，共同受资本主义剥削，机器使无产者处于同样屈辱地位，——这一切促使尚未定形的无产阶级群众团结起来，促使他们采取共同行动。

无产阶级的斗争一开始是以罢工形式在经济基础上开展的。

^① 布朗基《1848年时期法国的工人阶级》。——拉法希注

“罢工的巨大作用与其说在于保持工资，不如说在于使工人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在罢工时最明显地暴露出所谓劳资团结、厂主和工人利益一致等花言巧语的全部虚伪性。”再也没有甜言蜜语了，有的却是辱骂、枪杀、审判。这时就赤裸裸地显露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抗，“这种对抗只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行改造才能消除。”^①但是罢工如果局限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工业部门，那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罢工只是在具有普遍性并把全国工人群众发动起来时，才能得到很好的结果。然而这时罢工已经不是为提高工资或缩短工作日而斗争，但是工人群众将为争取由国家来调解工人和厂主之间的纠纷而斗争。工人阶级将从政治行动中找到解决社会对抗的方法。资产阶级对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

到目前为止，除1831年的里昂革命外，还没有一次革命是纯工人性质的革命。人民总是充当被愚弄者的角色，他们把胸膛袒露出来让人家开枪射击，来为反对派的代表扫清道路，而这些人一旦上台就照老样子去办，以共和的名义来镇压他们（人民）。自由派的全部政策就是要取缔工人阶级的任何政治行动。他们说，难道人权宣言发表后还有阶级差别吗？难道不是人人平等吗？难道佩尔坦、西蒙、弗洛凯、奥利维耶、甘必大、克列孟梭之流上台执政后不是更好地代表了自由、正义和其他无稽之谈的利益吗？当自由派集团迫于形势不得不容许工人参加时，他们就挑选那些出卖和背叛本阶级的人，如托伦、纳多、科尔崩。^②

我们早已脱离了这些幼稚时期。我们是生活在共和制下；完全象“忧郁的鸚鵡”^③时代一样，我们看到甘必大先生的尉官政权，

^① 保尔·拉法格《达勒姆矿工罢工》，载于《法国革命》1879年6月3日。——拉法格注

^② 提出工人候选人的想法被说成是甘必大提出的，我们早就知道提出这些候选人的原则是怎样炮制出来的。——拉法格注

我们看到在鲁贝和阿尔曼蒂埃发生的骑兵冲击，而所有那些善于甜蜜地高唱永恒原则的共和派报刊却似乎舌头完全不听使唤了！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只有组织成政党的工人阶级。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及其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对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具有决定意义。政治斗争被看作是组织工人阶级的最好手段，也是准备工人阶级去进行社会革命的最好手段。

法国无产阶级现在是一个组织得很好的阶级，其组织程度比上一世纪的资产阶级还要好。它现在在好几个省都举行了罢工，从而证实了自己的存在，证实了它能够经济上进行斗争。罢工的次数和规模使资产阶级以为有一个什么秘密组织在领导和操纵这些罢工。其实这些罢工不过是使法国社会分化的那种对抗的独立表现而已。无产阶级通过巴黎公社、通过里昂革命而在政治领域站立起来了。

本世纪的一切革命都是人民进行的，但却被资产阶级所利用。胜利的公社是由人民建立的同时也是为人民建立的。可是在中央委员会胜利后的第二天，工人阶级拿不定主意，不知究竟由谁来代表工人阶级，这些代表应该采取哪些革命措施。无产阶级在本世纪所要完成的社会革命，就是使生产资料国有化。这个革命将同资产阶级在上一世纪所进行的革命一样伟大。如果我们什么事情也不做而只是等待；或者到最后才做点事情，那我们是完不成这一革命的。革命社会党人应当利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安定和相对自由的时期。革命社会党人应当在这一时期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应当使工人阶级领会必须完全剥夺资本家的思想；应当通过日常的斗争、通过市政斗争（象工人在马赛所出色地开展的那样）、通过立法斗争来准备工人去进行本世纪的伟大革命。这

④ 拿破仑第三的绰号。——编者注

个革命一定会消灭阶级统治,也一定会消灭社会对抗。

译自《拉法格选集》第1卷 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
俄文版第285—293页。

(刘功勋译)

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中国人*

(1880年6月9日)

上一世纪，革命的资产阶级宣布实行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由于资产阶级的行动完全出于自私的动机，特别是当它提出永恒的原则时更是如此，所以实行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意味着各民族起来反对为恢复法国旧制度和对工人阶级不分民族、种族和肤色进行兄弟般的剥削而武装起来的贵族阶级政府。但是当封建主义的欧洲被打败，而资产阶级牢牢掌握了政权时，它就开始煽动沙文主义，并把它变成了统治的工具。梯也尔就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而有哪一个苏沃洛夫、布吕歇尔、俾斯麦会敢于在巴黎进行一场象这个凶神恶煞，这个当代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仇恨的化身所进行的大屠杀。

资产阶级在向工人阶级鼓吹沙文主义的同时，继续把资产阶级的剥削看作国际性的事业。资本没有祖国，什么地方有利可图，它就到什么地方去。无论在友好的国家还是在敌对的国家，法国的资本都要从事竞争性的生产，平衡预算，为它们提供战争经费。我们的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的工业家们毫无二致地迫使自己法国的、比利时的、德国的、瑞士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工人从事同样使人愚笨的劳动。在鲁贝、兰斯、里昂或者巴黎，无论是德国老板还是法国老板，当需要镇压罢工工人时，总能找到军队和法庭

* 本文首次发表于1880年6月9日《平等报》第21号。——编者注

来为自己服务。俾斯麦也同样愿意利用普鲁士军队和普鲁士法庭来迫使愤怒反对自己的法国老板或者波美拉尼亚老板的德国工人遵守秩序。各国资产阶级兄弟般地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剥削的国际性质，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的产生，尽管资产阶级竭尽全力煽起和怂恿民族敌对。德国的国际主义者因要求停止反对共和制法国的战争而遭到俾斯麦的逮捕，而巴黎工人抗议驱逐他们的敢于同法国社会主义者一致行动的德国弟兄。但是，当资产阶级报刊竭力挑起民族敌对，法国政府设想只要驱逐住在法国的外国人就可以消灭社会主义运动的时候，让我们听一听经济学家们，这些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代表说些什么。5月5日，在“政治经济学协会”进行了一场题为“中国人问题和劳动自由”的辩论^①。引号里的话完全是从《经济学家杂志》和《法国经济学家》上引来的。

众所周知，在美洲和澳洲，不论是属于白种人的还是属于黑种人的工人阶级，都把输入中国苦力（人们对待他们比对待安的列斯群岛的奴隶还要残酷）看作是对自己的生活资料的威胁，要求他们的政府停止买卖黄种人。而在加利福尼亚这个问题甚至具有革命的性质。在事先作了这些说明之后，我们就可以让经济学家们来发表意见了。

博克尔（美国总领事）：“中国人是美国胃里的一个异物，就象难以消化的食物，无法消化和排泄它……非洲人即使处于奴隶地位，还总是对所在国依恋不舍，接受它的思想、它的习惯、它的政治。他天生就非常令人喜欢、非常善于摹仿；所以从获得解放以来，他发展得非常迅速。但是中国人始终还是中国人…… 他们在

^① 这次辩论是由于1880年2月在加利福尼亚发生的迫害华工的事件引起的。《法国经济学家》（1880年5月15日）和《经济学家杂志》（1880年第5期）报道了这场辩论的情况。——编者注

旧金山的中心建立了一个中国城，过着没有妻室和子女的生活……非洲的奴隶制度在美国已经消灭，达到了一个伟大的目的，而且做得非常适当，使得以后任何其他的奴隶人口……都不会落到黑种人在奴隶制度下所处的那种境地。”

热·加尔涅：“博克尔所涉及的政治问题是对人类错误认识的结果。”这是“拼命想捞选票的政客”的语言，“真心实意追求真理的朋友是不应该这么说的。而真理在于，劳动自由就是原则，这个原则使生产更富成效，使分配更加公平。无论如何必须使人数最多、生活最贫穷的阶级仍然积极地劳动和表现出种种审慎，首先包括马尔萨斯所提出的那种审慎……”（啊！饶舌的老家伙，你过于积极地用舌头为自己低下的智能效劳！）

西莫宁：“这个问题仅仅是劳动自由问题的一个方面……劳动自由有没有界限？在某些情况下不应该绝对尊重供求的自然规律吗？”（美国领事说，中国人问题不过是黄种人的奴隶地位的问题；经济学家们说，中国人问题是劳动自由问题。）

热·加尔涅：“实质上这里可以看到一种同工业中采用机器相类似的现象：比较廉价的生产……是一种福利、进步……”（饶舌者，住嘴！）

阿·库尔图瓦：“中国人问题类似妇女劳动问题。工人们把中国人排挤出工厂，特别是排挤出印刷所，他们究竟指责中国人什么呢？他们指责说，中国人靠廉价劳动和靠节制个人费用来搞竞争，使工资降低。工人们对那些用崇高的品质同他们进行竞争的人不能容忍，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你说工人的崇高品质就是善于节制个人费用；如果我们抓住你的话，你会看到，我们会如何赋予你崇高的品质，尽管你是个资产者！）

拉弗勒：“必须保持原则。”

伟大的原则，你们在那里？你们在那里？

是谁打碎了杯子、
罐子、汤盆！…… 等等。

温：“中国人的移居所能提出的一切问题应该归结为正义和自由这一个问题”（瞧，这些原则，它们引起了多少的议论！）……“在正义和有益之间不可能有矛盾”。（对谁有益？温，特鲁瓦的银行家，你说，因为贷出的资本（银行家没有生产出过资本）生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对银行家有利，所以他们的高利贷利息是正义的。如果无产者认为没收法国的和纳瓦拉的银行家的资本和利益是有利的，那你怎么回答他们呢？）

布什罗：“应该扩大问题的范围和遵循正义与经济科学的起码原则。凡是导致廉价的东西，我都欢迎。凡是为我们廉价提供自己的产品或自己的劳动的人，总是会被愉快地接受的。如果中国人劳动好又能满足于微薄的工资，那为什么要推开他们呢？是为了鼓励民族的贪欲吗？……但这是发疯。”（亲爱的主张廉价的朋友！集体主义者也有自己降低物价的手段，——这就是消灭资本家的利润。）

拉弗勒：“中国人非常勤劳，并且他们的需要极其有限，因此他们能满足于非常微薄的工资…… 中国人的到来是有益的，因为凡是有中国人到来的地方，生产的增长和交换的发展都加快了。”（集体主义者要强迫全体资产者劳动，他们有着比你的中国人更好的加强生产和交换的计划，这难道你没有想到吗？）

西莫宁：“在加利福尼亚，白种人一天要价两到三美元，而黄种人有半个美元就满足了。博克尔先生，你们说中国人威胁着文明，但是你们能有文明应当大大归功于中国人。第一，南方的先生们，你们很幸运找到了黄种人来代替不愿意更多地劳动的获得解放的黑人…… 这就是中国工人，而且他们同意冒生命危险在巴拿马那些流行恶性疟疾和鼠疫的地方修筑铁路路堤，…… 中国人呵！

真是恩人，新大陆的上帝…… 模范的劳动者…… 中国人根据经验证明了，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靠微薄的工资可以生活并做到有积蓄。这就是人们不能原谅他们的地方！”（西莫宁，我们也不能原谅你如此热情地表现出的这些高尚的感情。你居然说，中国人以繁重的劳动为代价，在获得解放的黑人理智地拒绝劳动的那些盛行鼠疫的地方创造着文明的财富，而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工资！）

勃罗克博士：“澳洲和美洲的欧洲人不应该驱逐他们，而应该使用他们…… 对于那些喜欢生活好而懒惰的工人来说，他们是危险的竞争者。”（你说喜欢生活好而什么事也不干是罪恶。但是，博士，资产阶级的全部道德就是这种罪恶。）

保·勒卢阿-博利约：“欧洲工人的过高要求最终将迫使把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带进欧洲，大家知道，他们是很节制的。即使他们不来欧洲，如果他们掌握机器和我们的完善的生产方式，对于西方人来说，也将是严重的竞争者…… 由于世界性的竞争和自由贸易，造成这样的局面：在随便哪一个国家，工资的数额单靠本国所固有的条件将无法调节，对它起影响的将是全世界的劳动市场的状况。”（噢，原来如此！博利约，你可以因自己的自由思想超过自己的同行而自豪，你对本质的和经济的演变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你真以为付给你报酬的金融家是动物系列的最后一环，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系列的最后一环，无产阶级不可能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九三年和建立起新的社会环境，使生产者有可能自由地发展被挤在资本主义社会框框里的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你真以为这样吗？）

柳涅博士（内务部行政总监）：“非常可能，中国移民很快将由陆路而来，欧洲东部将出现移民…… 他们将给我们古老的欧洲带来他们的节制、职业上的忍耐和廉价的劳动。”（行政长官，伪善

的共和派，你说“如果我国的工人消费的只是必要的东西，那末其中的大多数能够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并且能很好地养育自己的子女”，难道你在内务部为中国人的涌来作准备，是为了降低法国人的劳动价格吗？这将会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应得的胜利成果。）

帕·加尔涅：“问题很简单：要让他们来去自由。这就是规律和必然趋势！…… 这些黄种人移居法国的前景丝毫不使我害怕，我愿意接受他们。有人说，他们的繁殖力很强，——就算这样吧；一旦他们熟悉了我国的文明，他们自己也将成为马尔萨斯主义者。”（可是有人对你说，中国人在别的国家的时候，他们是热尔明尼分子^①！——饶舌的老家伙，真的要把你的脑袋拧下来，你才能停止向我们唠叨你的马尔萨斯主义吗？）

布什罗：“如果他们，这些中国人，来我们这里，大概不会象在他们自己国内、或在巽他群岛、或在澳洲、或甚至在加利福尼亚那样生活；他们不会去教法国人多劳动少消费，而会很快地从法国人那里学会生活要好劳动要尽量少的技巧。”（可怜的布什罗，你说对了，自由自在快乐的生活很快就会教坏这些可爱的中国人。）

罗比诺：“如果中国人是象西莫宁和拉弗勒所说的那样，如果他们节制、勤劳、节俭、守纪律，那末不仅不应该把他们推开，而且应该召唤他们来。让他们，这些善良的中国人来吧！如果阻挠他们来，则对法国工人更坏！让他们拿中国人做榜样吧；让他们成为明白事理、有节制的人吧，让他们不辜负劳动者这个名字吧，他们喜欢给自己取这个名字，但是他们并不总是能配得上这个名字。如果中国人教会他们少跑来跑去、少离开作坊和家园而去酒馆，少喝酒而多节约，那末这对他们将是巨大的帮助。中国人万岁！”（这是内心的呼声！）

^① 欧仁·热尔明尼是1877年轰动一时的丑闻事件的主人公，因被判刑而逃亡巴西。——编者注

利穆津：“我不同意……”

但是正当这位冒名者发言时，大家都起身悄悄地走了，因而这场出色的辩论就此结束。

总之，资产阶级的永恒原则，就是降低劳动价格……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要在欧洲，在法国建立无非是更加残酷的奴隶制度的苦力制度；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就是让那些……劳动多消费少的亚洲人充斥法国，用饥饿来折磨法国工人。

据说，类似的辩论正在巴黎进行，资产阶级的报纸纷纷转载并大加赞扬，这些演说家都是认真的、头脑健全的人，是道德政治科学院院士，总之，他们反映的不过是波拿巴主义的或共和主义的、耶稣会的或自由思想的充满了法国资产阶级灵魂的高尚感情！

同这些大腹便便的高尚的资产者的计划相比，路易十六和巴赞的罪恶计划显得多么可怜和无害！

译自《拉法格选集》第 1 卷 1925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
俄文版第 319—325 页。

（董荣卿译）

工人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

(1880年8月11日)

马萨尔公民在巴黎工人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说：“几年以前，尽管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投入血泊之中，但在法国各城市举行的多次代表大会上还是产生了成立一个大党的想法。这个大党要把一切被剥削者团结到自己的队伍里来，这些被剥削者感到必须不分性别和民族为解放全人类而积极地工作。”马赛代表大会把“劳动工具国有化”写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旗帜上，明确地确定了无产阶级的一切和平斗争和革命斗争所应追求的目标。巴黎代表大会通过了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能立即实行的措施的纲领，成立了工人党。代表大会主张参加竞选，主张“只要他们还没有装好子弹，就要利用选票”，这样就使党有了活动的场所，借以集合自己的队伍，从事训练，使之遵守纪律，学会日常斗争并准备去进行革命搏斗。

有一句谚语说，打铁就能成为铁匠。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就能成为革命者。那些不去这样做的人，就是一些只会不切实际地玩弄政权、自由、革命、团结等等词句的无能之辈。这种脱离实际的革命空谈使精神上堕落的资产者感到心满意足，他们自以为就是马拉、费雷，因为他们用火和血等词藻来吓唬自己，因为他们好心肠地要求爆发革命，就象一个善良的关心家庭的人要求得到他

* 本文首次发表于1880年8月11日《平等报》第30号。——编者注

的绒衣那样。这些革命者过于脱离现实世界，所以根本不管无产阶级的迫切物质需要。他们过于满足，所以根本不考虑无产阶级的意愿及其经历。相反，他们却要人民忘掉自己的一切革命传统，压制自己的一切物质本能，克制自己的一切最迫切要求，一心一意地信奉这些愚蠢的革命者从他们丘必特式的头脑中各个部位臆想出来的迂腐理论。

我们是革命唯物主义者，我们既不想拥有绝对真理，也不想同绝对革命发生关系。我们不过是一些在无产阶级旗帜下前进的战士，要为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了给它灌输或多或少是糊涂的或反动的观点和偏见。唯物主义者否定绝对的东西，他们不承认政权，如同不承认天父或天鸽之类的圣灵一样。他们只知道，政府是要推翻的，阶级是要消灭的。如果说他们没有象他们的俄国兄弟、最近时期的虚无主义者那样在斗争中使用炸药和手枪，那么，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采取这种手段，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无益而有害的。社会环境决定斗争方式，正如地理气候环境决定植物的果实一样。如果他们不愿意直接采取暴力手段，那决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是想睡大觉和养得发胖。在我们所处的平静时期，唯一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用行动来进行宣传，反对资产阶级的支柱——资本主义国家。

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国家就是恶魔。他们为了活命，唯恐躲之不及。但是我们并不这样害怕这个恶魔。让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发展的社会，都是由国家来管理的，“即由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来管理，以便维持它的剥削方式，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要求的那种屈从的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①。

消灭阶级统治，也就要消灭国家。本世纪初共产主义者就要

求“把对人的政治统治改造成对生产力的行政领导”(圣西门)。但是要求并不等于现实。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剥削,即只要劳动工具还没有成为全民的公共财产,国家就将存在,不管它称作什么。在资本主义阶段,这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在革命阶段则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当劳动工具国有化、所有资产者自愿或被迫加入无产阶级队伍时,阶级统治才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才会变成对生产“过程”的和平管理。只有进行长期紧张的宣传准备工作以及一系列革命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将会象上一世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那样牺牲自己的生命),才能完成这一伟大事业。

巴黎代表大会,以及法国所有其他地区的代表大会,都承认绝对必须进行政治革命,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利用它来开始经济革命,把生产工具国有化。但是,无产者作为革命者,并不象叛乱者那样号召进行暴动。现在有大批军队,调动集中也很迅速和容易,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再也不可能是象1830年和1848年那样突然发生的巴黎的冲突。顺便说说,3月18日的起义是得到某些省城的大力支援的,它最雄辩地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把全国工人群众发动起来才有可能获得胜利。9月4日的革命,虽然由于多年的共和主义宣传,由于金融投机引起的普遍不满以及大工业的骤然发展而做了准备工作,它同样也表明:为了推翻现政府,除了必须有国内的不满情绪和骚乱外,还必须有对外政策方面的复杂情况。

无产阶级革命将既不具有地方性质也不具有民族性质,——它将是国际性的,否则根本不会发生。

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恐惧丝毫不会延缓这一革命的到来;革命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3页。拉法格的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编者注

者的急不可待也不能加速它的到来。比无政府主义的词句要强有力得多的盲目力量，在暗暗地准备这一革命。资产阶级的欧洲一方面被处于自身的1789年前夕^①的俄国，另一方面被美洲的工农业竞争象两把钳子一样夹住。美国的工业竞争刚刚开始，农业竞争从1877年才开始。首先感到竞争打击的英国看到，它的使现代农学家大为赞叹的农业在衰退，而爱尔兰农民也骚动起来，造成很大的威胁。第二年就将轮到法国农民。只要俄国一开始革命，风暴就将袭击欧洲。用欧洲资本建筑的俄国铁路的被没收，俄国财政的破产、用欧洲资本清偿的全部债务，将使欧洲的金融界摇摇欲坠。波兰的复兴将在欧洲东部引起革命战争。一些人由于急躁，另一些人由于无知，都来谴责德国社会党人胆怯，因为他们不想让俾斯麦如愿以偿地把无产阶级投入血泊之中。但是，尽管有残酷的法律，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继续进行他们的宣传，——到那时德国社会党人将行动起来。到那时，法国无产阶级也大概会愿意同德国和俄国的兄弟们携起手来；但是为了使法国无产阶级在那时能够利用欧洲政治中的一切机会，还必须使工人党的党员都是实干家，而不是信宗教的无政府主义者，指靠什么和平的上帝来用和谐代替现时的对抗，使竞争让位于协和，使一切欲望和激情得到充分发展，等等，等等。^②工人党只有进行日常的斗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它才能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去进行革命搏斗。

① 即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编者注

② 即列马尔公民在巴黎代表大会上宣读的无政府主义者宣言。因为他可能指责我，说我把他那些含混的话说得太明确了，所以我现在还它的本来面目：“为了让人类发现自己的道路，为了让和谐排除现时的对抗，为了让协和的表现取代竞争的地位，必须以一切欲望和一切激情的自由表现来确立平衡，让协和的自然规律发挥作用，来支配理性和感情。”只要以神的仁慈来代替协和，以原罪代替现时的对抗，以灵魂的追求代替欲望和激情，那么你们就会觉得好象是在读冉森教徒和加尔文教徒关于神的仁慈的神学格言。——拉法格注

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想象之物，象长着犄角的鬼怪那样。它就在这里，在我们面前，它拥有带枪的士兵，它拥有用赋税使生产者破产以利于资本家的议员，它拥有支配市有财产以利于资本家的市参议员……还拥有各种咒语，这些咒语把政权、自由、协和、欲望的自由表现和无政府宗教的其他神学的德行混在一起，并且不让这些东西象煤尘那样消散。必须通过猛攻把资本主义国家攻下来；必须把它的全部牙齿一个一个地拔下来，把它的全部爪子一只一只地砍下来。

巴黎盲人院区俱乐部代表法伊埃公民说得很对，他说：“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就意味着做一个保守派……因为我们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最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无政府状态就是经济学家的自由放任主义，就是建立在自然斜面上的平衡。这是由于道德和经济领域（象物理领域一样）中的和谐所固有的自然定律发生作用的结果，——这个定律就象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对任何因素都是绝对的。”^①无政府状态就是放任无节制的个人利益的欲望而进行的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就是蒲鲁东的个人主义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就是对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否定。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做一个资产者。

官方的经济学家如果不向工人们宣传正统的无政府状态，那他们还能宣传什么呢？“你们什么也不要从国家那里等待，任何时候也不要过问政治，让你们的老板去为社会事业操心 and 担忧吧，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比你们懂得多。在经济问题上，国家和政治是无能

^① 米歇尔·舍伐利埃《活动工资等级制和谷物贸易》，1856年版。在经济学家那里可以听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全部响亮的词句。既然在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的废话说了十年都没有使他们相信自己绝对不能起任何经济作用和政治作用，那我们总有一天有机会向他们证明：他们的那些荒谬的理论不过是从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那里可鄙地抄袭来的罢了。——拉法格注

为力的，丝毫也改善不了你们的境遇；把你们的全部信任和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经济力量的**自由竞赛**上吧……”在帝国时期，蒲鲁东，这位无政府主义的圣托马斯·阿奎那^①，就曾经建议以各种形式来进行节制。他认为，工人不应该再建立什么同盟和组织什么罢工；工作日的任何缩短和工资的任何提高都会使产品的价格提高；要想降低消费品价格，必须降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日^②；工人的政策应该是软体动物的政策：每个人都藏在自己的甲壳里，而让甘必大和西蒙之流去考虑一切。资产阶级激进派现在不是还对工人党的纲领三缄其口吗？《口令报》听说工人要求国家参与调节工作日一事之后，难道它没有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吗？这些伪善者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国家让他们心安理得地去腐蚀青年人，教年青的军官去率领反动军队进行屠杀。温顺的女修道士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国家让她们虔诚地在她们举办的救济所里剥削无产阶级的妻子儿女。工业资本家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国家让他们在他们的工业苦役营里心安理得地去折磨无产阶级的妻子儿女。

但是，这一切必须结束。工人党党员在和平时期要制止国家的行动，不让它叫法国警察去为梅利科夫和俾斯麦服务，把加特曼等人交出去，并按普鲁士大使馆的旨意放逐社会党人；他们要使市参议会不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把对城市公有财产的行政管理权和税收的分配权掌握起来；他们要在所有讲坛上听取无产阶级的申诉并进行真正革命的鼓动，力求实现人民的物质需要，而不是

①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中世纪烦琐哲学的著名代表，西欧封建主义的思想家。——编者注

② 1872年我曾经在马德里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头目莫拉哥主编的《被判罪者》所散布的这种无政府主义理论进行过斗争。1869年在木匠大罢工期间，伦敦的《泰晤士报》曾经满意地引用了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以便向工人灌输合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拉法格注

脱离实际地“空谈”什么政权、自由、协和等等；他们要尽可能地利用国家的力量来减轻工人的负担。他们还对那些无所事事的无政府主义者加以嘲笑，因为这些人就象皮阿和马雷一样，作报告时以教训的口吻对待人民，而且象农民那样，要反对工人在1848年的街垒战中争得的普选权，以便剥夺工人选举自己的代表和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的权利。

如果无政府主义反动派以他们的软化手腕得以使工人就范，那么情况会是怎样呢？结果就会发生9月4日的事情。1848年2月，虽然工人运动尚处于形成阶段，临时政府不得不让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进去，并许诺给予很多东西。9月4日，造成民族溃败的西蒙和甘必大之流甚至当他们因退却而使工人血流成河的时候，也没有暗示要进行普遍要求的改革。经过这么多年财政的和甘必大的压迫之后，法国无产阶级难道还想进行那种让人民运动的浪潮把弗洛凯及出版界和律师界的蠢货们推进市政厅的革命吗？

工人党党员不是一些好说空话的人，不会盲目地相信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说的那一套。而这些话现在连《世纪报》的编辑们也吓唬不了；工人党党员是一些实干家，他们认为，为了粉碎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对它采取忽视和回避的态度，而要天天同它作斗争，一部分一部分地占领它。堡垒只有通过猛攻占领后才能加以摧毁。

译自《拉法格选集》第1卷 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
俄文版第293—300页。

（刘功勋译）

懒惰权*

(驳斥 1848 年“劳动权”)

(1880年)

序 言

1849年，梯也尔先生在初等教育委员会中说：“我想使僧侣拥有无上的权力，因为我指望他们去传播这样一种健康的哲学：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受苦，而不是去传播那种相反地劝告人们尽情享受的哲学”。梯也尔先生的这些话概括了资产阶级的道德，他是这个阶级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和低下智能的代表。

当资产阶级在反对得到僧侣支持的贵族的时候，它举起了自由研究和无神论的旗帜。但是，一旦取得胜利，它就改变自己的腔调和态度；今天，它力图利用宗教来维持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统治。十五至十六世纪，它兴高彩烈地重新抬出多神教的传统并颂扬曾遭到基督教斥责的肉欲及肉欲的享乐；而现在，它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它摒弃了自己的思想家拉伯雷和狄德罗的教导，而无产阶级鼓吹节欲。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督教道德的拙劣可笑的模仿——用咒骂来攻击工人的肉欲；它所追求的理想就是把生产者的需要削减到最低限度，窒息他们的一切欢乐和一切激情并且使他们沦为片刻不停地运转的机器。

* 本文首次发表于1880年6—8月《平等报》，后来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编者注

革命社会主义者必须开始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抨击文作家所进行过的那种斗争。他们必须向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和道德发起冲击；他们必须把统治阶级散布的偏见从负有行动责任的阶级的头脑里铲除掉；他们必须向一切道德的伪君子当面宣布，地球将不再是工人的苦难深渊；并宣布，在我们行将创造的——“假如可能，将用和平的方法，假如不可能，则用暴力的方法”，——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激情将获得完全自由的发展，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所有的激情都是好的，只是我们不应当滥用它们”^①，面要避免激情的滥用，只有依靠它们之间的互相平衡，只有依靠人体的和谐发展，因为正如贝多博士所说，“只有当人的机体高度发达的时候，他们的精力和道德力量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伟大的博物学家达尔文也持有类似的见解^②。

《驳斥“劳动权”》曾刊登在1880年第二次出版的《平等报》周刊上，现增加一些注释后，重新予以出版。

保尔·拉法格

1883年于圣·珀拉惹监狱

我们对于一切，除了爱情和美酒，
对于一切，除了懒惰本身，都懒得去管。

——莱辛

一 毁灭性的信条

一种奇怪的狂热支配着那些受资本主义文明统治的国家里的

① 笛卡尔《精神的激情》。——拉法格注

② 贝多博士《人类学会志》；查·达尔文《人类的起源》。——拉法格注

工人阶级。而正是这种狂热带来了两世纪以来一直折磨着人类的个人和社会的灾难。这种狂热就是对劳动的爱，就是最终把个人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命力消耗殆尽的那种对劳动的酷爱。牧师、经济学家和道德家们不去反对这种偏执狂，相反却把这种劳动奉为神圣。他们这些盲目的和狭隘的人，居然想比他们的上帝更聪明；他们这些软弱无能的可怜虫，居然想恢复遭到上帝诅咒的东西的名誉。我，——不是基督教徒，不是道德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我要把他们的决定诉诸他们的上帝；我要把他们那一套宗教的、经济的和自由思想的道德宣传诉诸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的种种恶果。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是造成智力衰退和身体畸形的根源。请拿路特希尔德马厩里的纯种马（有一批长着两只手的奴隶为它们服务）同诺曼底农场里的笨拙的畜牲（它们要耕地，搬运肥料，把收割下的庄稼送进谷仓）比较一下。请看一看高尚的原始野蛮人，——他们尚未被商业的传教士和宗教的商品推销员用基督教义、梅毒和劳动的信条毒害过，——然后拿他们同我们这些可怜的机器的奴隶比一比^①。

^① 原始民族男子的健壮体魄和豪迈风度使欧洲探险家们惊叹不已，因为他们尚未遭到被帕比称之为“文明世界有毒空气”的污染。乔治·坎伯尔在谈到居住在大洋洲岛屿上的土著居民时写道：“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象他们那样，初次接触便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皮肤光滑滋润，略呈古铜色，卷曲的头发金光闪闪，满脸快活的神情。总之，他们的整个身躯都是人类的典范和样板。相比之下，我们只好甘拜下风，自愧不如。”古罗马的凯撒和塔西佗对入侵罗马帝国的原始公社制部落的日耳曼人也大为赞赏。十世纪时，外号叫“主教的导师”的萨耳维安神父，和塔西佗一样，也把野蛮民族捧为开化民族和基督教世界的楷模：“在野蛮民族中间，我们简直是一群不知廉耻的恶棍。他们要比我们纯洁得多。不仅如此，他们对我们的那些秽行恶迹深恶痛绝。不过，哥特人却对他们当中存在的淫荡熟视无睹。他们中间，只有罗马人因为种姓高贵，才有权胡作非为。（当时，鸡奸在异教徒和基督教徒中间均很流行。）被压迫者只能到野蛮民族那里去寻找人的本性和庇护所。”（《论神的统治》）古老的文明和新兴的基督教毒害了旧大陆上的野蛮民族，就象陈旧的基督教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正在毒

假如我们想在文明的欧洲找到一点人的自然美的痕迹，那么我们就需要到这样一些民族那里去找：那里人们对劳动的憎恨还没有被经济偏见所根除。西班牙虽然已经在退化，但是它还可以骄傲地说，在它那里的工厂比我们这里的兵营和监狱要少些，因而艺术家们在看到慥慥的、有着栗子般深褐色皮肤的、象钢一样正直而有弹性的安达卢西亚人时便赞叹不已。当你看到一个披着破旧不堪的斗篷但气概不凡的西班牙乞丐，口喊“amigo”（朋友），向某一位奥苏纳公爵伸手求乞的时候，你的心将会颤抖。在西班牙人（他们的身上还残存着原始的野蛮人的本能）看来，劳动是最坏的奴隶制^②。即使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也用同样的轻蔑态度来对待劳动：只有奴隶才被准许从事劳动，自由民则只知道体操和精神方面的娱乐。在亚里士多德、菲迪亚斯、阿里斯托芬的民族行动和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在一小批勇士在马拉松战役中歼灭大量亚洲部落的时代也是这样。这次战役之后不久，亚历山大就征服了亚洲的这些部落。古代哲学家劝人轻视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劳动会使自由民堕落；诗人颂扬懒惰是神的礼物。

诗人维吉尔写道：“啊，梅利贝，神赐给我们悠闲的生活。”

耶稣在山区传道时也赞扬懒惰：“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的？它既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

害新大陆上的野蛮民族一样。

尽管人们不能接受费·勒普莱在社会学方面所作的结论，因为他的结论带有慈善家和基督教徒的那种调和折衷的味道，但是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却是无法否认的。他在《欧洲工人》（1885年）一书中写道：“巴什基尔人的懒惰秉性（巴什基尔人居住在乌拉尔山脉的亚洲一侧，他们过着半游牧生活），悠闲的游牧生活，以及在他们当中最有才华的人身上养成的沉思的习惯，使他们在举止、智力和对事物的判断方面，远远超过发达的文明社会里的人。他们最厌恶农业劳动；他们干什么愿意，就是不肯种地。”实际上，农业劳动是人类奴役性劳动的最早表现形式。圣经里的第一个罪犯该隐就是一个农夫。——拉法格注

② 西班牙谚语说：“休息就是健康”。——拉法格注

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漂亮呢！”^①

不修边幅、满腮胡子的上帝耶和华给自己的信徒们作出了理想的懒惰的最高典范：他在六天劳动之后就永久休息了。

相反地，劳动对哪些人种来说是本性的需要呢？奥弗涅人；苏格兰人，这些大不列颠的奥弗涅人；加列戈斯人，这些西班牙的奥弗涅人；波美拉尼亚人，这些德国的奥弗涅人；中国人，这些亚洲的奥弗涅人。在我们的社会里，哪些阶级为了劳动而喜爱劳动呢？农民私有主和小资产阶级。前者整天在自己的土地上弯腰干活，后者被禁锢在自己的小铺子里，他们象田鼠一样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忙碌碌，从来不会伸直腰背来尽情地欣赏一下大自然。

可是，无产阶级，这个包括一切文明民族的生产者的伟大阶级，这个在解放自己的同时将把全人类从奴隶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使之从动物变成自由人的阶级，竟违背自己的本能，不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让劳动的信条把自己引入歧途！它受到的惩罚是残酷的和严厉的，一切个人的和社会的灾难都出于他们这种对劳动的酷爱。

二 劳动的恩典

1770年，有人匿名在伦敦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工业和商业》的著作，当时在读者中间曾引起较大的轰动。作者愤慨地写道：“普通的英国手工工场工人有这样一个固执的想法：凡是英国人，生来就应该比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人享受更多的自由和独立。这种思想对于一个士兵来说，或许是有用的，因为它可以激励士气。但是，它在手工工场工人的头脑里——无论是为了他们自己还是为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拉法格注

了国家——则愈少愈好。工人决不应该认为自己可以不依附自己的上司而独立。在我们这样一个以贸易为主的商业国里，没有或者很少有财产的人几乎占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七，因此，对这类想法采取纵容的态度是极其危险的。只要贫穷的工人不肯服服帖帖地干六天的活并只拿相当于他们现在四天的工资，那么这种状况就不可能根本改变。”

可见，在基佐以前将近一百年，就有人在伦敦公开鼓吹说，劳动对人们高尚的激情可起抑制的作用。1807年，拿破仑在奥斯特罗德写道：“我的人民劳动愈多，他们身上的恶习就愈少。我是当权者……我颁布命令让小商店在星期日做完礼拜之后仍旧开门，让工人们继续工作。”为了消灭懒惰以及由懒惰产生的自豪感和独立性，《论工业和商业》一文的作者建议把所有的穷人关进一个理想的劳动营，“让他们在这种可怕的地方，每天劳动十四个小时；即便扣除吃饭的时间，他们仍要干整整十二个小时的活。”

一天劳动十二个小时，这就是十八世纪博爱主义者和道德家的理想！而我们现在则有过之无不及！现代工厂变成理想的感化院，工人们被关在里面，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做十二至十四个小时的苦工。^①那些恐怖年代里的英雄好汉们的后代对劳动如此顶礼膜拜，居然堕落到把1848年通过的、规定每天工作时间为十二小时的法律视作一项革命成果。他们公然宣称，“劳动权”是革命的原则。这简直是法国无产阶级的耻辱！只有奴隶才会如此卑躬屈

^① 1857年，慈善家们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斯克里夫是利尔附近的马尔凯特市最有钱的工厂主之一。会上，他在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中，洋洋得意地说：“为了让孩子们散散心，我们采取了一些办法。我们教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或者一边干活一边数数字。这使他们在精神上得到调剂，从而乐意接受他们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十二小时工作制。”让不满十二岁的儿童干十二小时的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啊！就连唯物主义也希望最好有个地狱，以便把这些基督徒、慈善家、残害儿童的刽子手关进去。——拉法格注

节。需要二十年的资本主义文明，才能使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理解这样的堕落。

如果说今天的无产阶级受到比圣经中描绘的蝗灾更为可怕的苦役和饥饿的折磨，这是他们自食其果。他们把在1848年手执武器争取来的劳动强加在自己家庭的身上。他们把自己的妻儿送到工厂主那里干活。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破坏了家庭，用自己的双手挤干了妻子的乳汁，那些正在怀孕或者要给孩子喂奶的不幸的妇女被迫到工厂或矿山去干活，累得精疲力尽；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断送了子女的青春和生命——这是无产者的奇耻大辱！寓言和古老传说中的那些泼辣、豪放、爱喝葡萄酒的妇女，如今在哪里才能找到？那些整天无忧无虑、跳跳蹦蹦的，围着锅台忙忙碌碌、嘴里不停地哼着曲子的，给周围带来欢乐和生命的，毫无痛苦地生下健康、结实娃娃的快活的女人，现在又在何方？……现在工厂里的妇女和姑娘，一个个营养不良，面色苍白，形容枯槁，骨瘦如柴！……她们从未尝过人间的欢乐，也未曾有过少女初恋时的激情！那么儿童又怎样呢？他们每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多么悲惨啊！资本主义工厂里的极其恶劣的劳动环境使儿童的智力衰退，本能退化，健康横遭摧残。连道德政治科学院的茹尔·西蒙之流和耶稣会教士热尔明尼之流都想象不出这样罪恶的勾当。

有人说，我们今天的时代是劳动的时代。其实，这是痛苦、贫困和蜕化堕落的时代。

可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从晦涩难懂的奥古斯特·孔德到通俗易懂的勒卢阿-博利约）以及资产阶级作家（从招摇撞骗的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到滑稽可笑的保尔·德·科克），他们都令人作呕地对劳动的长子——进步之神大唱赞歌。按照他们的说法，幸福即将普降人间，而且人们已经能感觉到这一点了。他们钻到古代封建社会的废墟和灾难里，搜罗材料，用一些阴

暗的例子来烘托今天这个光辉灿烂的人间乐园。这些酒足饭饱、心满意足的家伙不久以前还是封建领主的奴才，现在被资产阶级重金收买，成了替他们摇唇鼓舌的御用文人。他们老是拿夸夸其谈的拉·布鲁伊尔所描写的农民悲惨生活向我们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使我们厌倦不堪。请看，他们中间的那位院士——维莱尔梅博士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反映1840年进步时代无产阶级“幸福生活”的多么动人的图景！这位博士也是在1848年向群众宣扬资产阶级经济和道德方面的糊涂观念的学者圈子里的人物（其中包括梯也尔、古赞、帕西和布朗基院士）。

维莱尔梅博士指的是阿尔萨斯工业区，就是博爱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精华凯斯特内尔和多耳富斯之流的阿尔萨斯。不过，在博士向我们展示无产阶级的种种苦难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听听阿尔萨斯的工厂主、多耳富斯—米格公司代表米格先生是怎样描述旧式工业体系中的手工业工人的生活状况的：“五十年前（即在1813年，现代机器制造业刚刚兴起的时候），米卢兹的工人都还是土地的儿子，他们住在城里或郊区的农村里；几乎每家都有一幢房子，有时还有一小块土地。”^①

这是工人的黄金时代。当时，阿尔萨斯的工业还没有达到用棉织品充斥世界市场的地步，也还没有使多耳富斯和凯斯特内尔家族变成百万富翁。但是，二十五年后，当维莱尔梅访问阿尔萨斯时，现代的米诺塔弗^②——资本主义工厂——已经完全征服这个地区。这一怪物贪婪地吞噬人的劳动，它把工人从他们的家中驱赶出来，以便更多地榨取他们的劳动。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汽笛声中涌进工厂的大门。

^① 1863年5月在巴黎社会经济实用研究国际协会的讲话。发表在同年《法兰西经济学家》上。——拉法格注

^② 古希腊神话中牛首人身的怪物。——编者注

维莱尔梅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即一万七千人中有五千人，因为付不起昂贵的房租，被迫住在郊区农村；其中有些人的住处距离工作地点竟有八、九公里之远。

在米卢兹，在多那赫，工人每天早上从五点钟开始干活，一直要干到晚上五点钟，才收工回家；不论盛夏还是隆冬，一年四季天天如此……人们只有在他们早上进城上工或者晚上下工回家时，才能见到他们。他们中间有一大批脸色苍白、骨瘦如柴的女工，她们赤着脚在泥泞的路上行走，下雨下雪时，就把围裙或外裙顶在头上，保护脸和脖子不被淋湿。童工的人数更多，他们身体瘦弱、肮脏不堪，破烂的衣服由于沾满了机器的油污，在下雨时，反倒不易透水；这些孩子不象女工那样，手挎着一个盛放一天食物的篮子，而是在手里或怀中揣着几片面包，用来充饥，直至晚上收工回家。

因此，工人除了每天起码要劳动十五个小时之外，还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艰难地往返于工厂和他们的住地之间。这样，每晚回家后，他们已经精疲力尽，只得和衣而睡，而第二天一清早，虽然还没有得充分休息，又得赶去上工。”

下面介绍一下城里工人的居住情况：“我在米卢兹，在多那赫，在毗邻的房子周围看到的是一些极其简陋的住房：两家合住一间房间，每家都睡在角落里，底下铺些干草，两边用几块木板挡着……上莱因省的纺织工人的生活非常贫困，以至他们的孩子中有一半未满两岁就夭折了，而工厂主、棉布商和企业经理的子女有一半已达到二十一岁。”

维莱尔梅在谈到工厂劳动情况时说：“这不是劳动，不是工作，而是苦刑，六岁至八岁的儿童就要开始忍受这种苦刑……日复一日的长期折磨，使棉纺织业工人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的摧残。”

关于劳动时间，维莱尔梅指出：监狱里服苦役的犯人每天只劳动十个小时，安的列斯群岛的奴隶每天平均劳动九个小时，而在曾

经爆发过 1789 年革命的法国，在这个发表庄严的人权宣言的国家里，有些工厂的劳动时间竟长达十六个小时，其中给工人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①

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可悲破产！这是进步之神带给人们的可怜的礼物！那些驱使穷人干活而自己发财致富的寄生虫被博爱主义者吹捧为人类的慈善家。哪怕是在乡村散布瘟疫或投毒下井，也要比在那里开设工厂好些——到工厂里去干活，就等于向欢乐、健康、自由告别，向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告别。^②

经济学家却喋喋不休地向工人们说：为了增加社会财富，你们去做工吧！一位名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经济学家反驳道：“在贫穷的国家里，人民很富足；而在富有的国家里，一般来说，人民都很贫困。”他的学生舍尔比利埃补充说：“工人在促使生产资本积累的时候，也将促使迟早会剥夺他们工资份额的事情发生。”变得越来越糊涂的经济学家仍在声嘶力竭地说：“为了你们的福利，工作吧。不停地工作吧！”可敬的英国圣公会牧师唐森以基督教的仁慈的名义说：工作吧，日日夜夜地工作吧！虽然你们的劳动将使你们变得更加贫困，但是由于你们的贫困，我们将不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来强制你们劳动。用法律来强迫人们劳动，“将会带来很多

^① 维莱尔梅：《棉纺业、毛纺业和丝织业工人的精神和身体状况》（1840 年）。决不是因为多耳富斯、克希林和其他阿尔萨斯的工厂主是共和派、爱国主义者和新教的慈善家，所以他们才这样对待他们的工人。科学院院士布朗基、日罗姆·帕图罗的桔模雷博和政治老手茹尔·西蒙发现，尽管利尔和里昂的工厂主是十足的旧教徒和保皇派，但是那里的工人也受到类似的待遇。资本主义的德行已经与政治、宗教信念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了。——拉法格注

^② 巴西凶悍好斗的印第安人将他们中间的残废者和老年人杀死，因为这些人再也不能享受打仗、过节和跳舞的乐趣了。一切原始民族均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他人的友好情感。里海地区的马萨热特人（参见希罗多德的著作）、日耳曼的维恩人和高卢的凯尔特人都有这种风俗。瑞典教堂里，不久前还保留着用于帮助家中老人摆脱痛苦的狼牙大棒。如果现代无产者默默忍受工厂劳动的巨大折磨，那么，他们该堕落到何等地步！——拉法格注

麻烦，将会导致许多暴力行为的发生，将会引起种种议论。与此相反，饥饿是一种和平的、无声的和经常性的压力，是工业和劳动的最自然的推动力，它将使人发挥其最大的效能”。无产者们，为了增加社会财富和加剧你们个人的贫困，工作吧！你们越贫穷，就越应该劳动，就越应该忍受贫困的折磨。这便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可抗拒的法则！

无产者们听从了经济学家的花言巧语，尽心尽力地从事劳动，从而使整个社会面临生产过剩的工业危机——这一危机引起了社会机体的动荡。由于商品过剩，购买者日趋减少，工厂便纷纷关闭，饥饿象一根皮鞭，狠狠地抽打着工人。被劳动的教条弄得糊里糊涂的无产者不懂得，在所谓的繁荣时期产生的生产过剩，是造成他们现在生活贫困的原因。他们不到粮库前去叫喊：“我们肚子饿，我们要吃饭！真的，我们的确身无分文；虽然我们是穷光蛋，但是小麦和葡萄却正是我们这些人收割的呀……”他们不去包围茹约里埃的崩讷先生的商号——他正是这些修道院式的工厂的创始人——并高喊：“崩讷先生，你的拈丝工、缫丝工、纺纱工、织布工来了。她们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冻得直发抖，看到这些破烂不堪的衣服，就连最吝啬的犹太人也会落泪的。然而，就是这些女工为基督教世界的娼妇们织出了上等的丝绸裙子。这些可怜的女人一天劳动十三个小时，哪有功夫去关心自己的衣饰打扮！现在，她们失去了工作，有时间用她们过去生产的丝绸料子替自己做身漂亮的衣服。她们从掉落乳齿时起，就为你创造财富，而自己则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现在，她们有空闲的时间了，想享受一下她们的劳动果实。好吧，请崩讷先生拿出他的丝绸来，请阿尔梅尔先生拿出他的平纹细布来，请普野-克尔蒂约先生拿出他的白布来，请比内先生拿出他的靴子来，穿在她们那瘦小的、又冷又湿的脚上……把她们从头到脚打扮得漂漂亮亮，你一定会对她们大为欣赏的。就这

么办吧，可不要躲躲闪闪。你是人类的朋友，而且还是基督教徒，难道不是这样吗？把女工们用自己的血肉创造出来的财富奉还给她们吧！你不是喜欢做生意吗？那就请加速商品的流通吧！她们是现成的消费者。请发放给她们没有限制的贷款吧。你不是也向那些你素不相识的、连一杯白水也没有请你喝过的商人发放贷款吗？你的女工们会尽力偿还的；万一她们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无法如期还清债务，那么你可以宣布她们破产；如果从她们家里查抄不出什么东西，你就让她们用祈祷来偿还吧；她们一定比那些身披口袋式黑长袍，满身烟草味的牧师更虔诚地送你进天堂。”

饥肠辘辘的工人不去利用这个危机时期把产品分配给大家，让人们共同享用，却想用自己的头去撞开工厂的大门；这些干瘦的、疲惫不堪的工人围着工厂主，苦苦地哀求说：“好心肠的夏果先生，仁慈的施奈德尔先生，请给我们工作吧！折磨我们的不是饥饿，而是对劳动的酷爱。”于是，这些勉强能站立的、可怜的工人就以比过去低廉一半的价格出卖十二至十四小时的劳动。过去，他们还有块面包可以充饥，而现在，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工业慈善家利用工人的失业，进一步降低生产费用。

假如工业危机紧随着生产过剩时期，就象黑夜紧随白天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假如工业危机必然造成工人失业和没有出路的贫困，那么它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破产。只要工厂主能得到贷款，他就让工厂开足马力进行生产。他到处伸手要贷款，以便有足够的原料供工人生产。他不考虑市场是否已经饱和，也不考虑如果商品销售不出去，他就无力偿还贷款，他只知道驱使工人生产。当他走投无路处于绝境的时候，他不惜跪倒在犹太人的脚下，用自己的声誉和门第担保，乞求贷款。犹太血统的银行家路特希尔德回答说：“只要手头上有点现金，事情就好办多了。你的仓库里有两万双袜子，每双标价二十个苏，我愿出四个苏一双把它们买进。”

袜子到手后，这位银行家再以六至八个苏的价格卖出，净赚许多闪闪发光的法郎。工厂主则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但是，到头来，工厂还是破产，大批库存需要清理。因此而从窗户抛出去的商品如此之多，以致谁也不清楚，当初它们是怎样通过大门进去的。上一世纪，人们干脆把商品烧掉或抛入大海。^①

不过，在决定这么做之前，工厂主先要在世界各地为积压的商品寻找市场。他们要求政府併吞刚果，侵占东京^②，炮轰中国的城门，以便向这些地方倾销他们的棉织品。最近几个世纪里，英国和法国为了垄断美洲和印度的市场，彼此之间不断进行殊死的斗争。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在殖民战争中，成千上万的身强力壮的青年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海水。

资本也和商品一样过剩。金融资本家不知往哪里投资。于是，他们跑到那些懒洋洋地一边晒太阳一边抽烟的幸福快乐的民族那里去修筑铁路，兴办工厂和输入可诅咒的劳动。法国用这种方法输出资本，结果在某一天早晨引起了外交纠纷：在埃及、法国、英国和德国由于在应该首先向哪一国的高利贷者偿还贷款的问题上争执不下，结果相互揪住对方的头发不放，扭打成一团。法国还为了索取那笔肮脏的贷款，居然派遣军队作为执达员前往墨西哥。^③

① 1879年1月21日在柏林召开的工业会议上，有人估计，在上一次经济危机中，德国的钢铁工业共亏损五亿六千八百万法郎。——拉法格注

② 指越南北部。——编者注

③ 克列孟梭在1880年4月6日的《正义报》金融专栏里写道：“我们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即使没有普鲁士，法国照样也会象在1870年战争中那样白白损失数十亿法郎，这就是以定期发放贷款的形式去帮助别国维持财政收入平衡。我们确实是这样认为的*。英国给南美各共和国的贷款损失估计达五十亿。法国劳动者不仅要付给俾斯麦五十亿巨款，而且还要继续替挑起战争并导致战争失败的、享受丰厚俸禄的奥利维耶、巴赞、日拉丹之流负担战争赔款的利息。不过，他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不会为了讨还这几十亿法郎而爆发战争。——拉法格注

这些个人的和社会的灾难，不管它们有多么严重和多么频繁，也不管它们持续的时间有多久，只要无产阶级说一声：“我要这个”，它们就会象鬣狗和胡狼遇见狮子一样，悄悄地溜走。但是，无产阶级若要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坚决摒弃基督教的、经济的和自由思想的道德偏见，就应当恢复他们的天然本性，就应该宣布他们有**懒惰权**——这一权利要比资产阶级革命的形而上学的辩护士所炮制的干巴巴的**人权**神圣和高贵千万倍——他们应该每天只工作三小时，而在其余的时间里尽情地娱乐或者闲荡。

到此为止，我的任务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我只需描述那些众所周知的、实实在在存在着的邪恶。但是，使无产阶级相信：人家向他们灌输的都是一些邪说，他们从十九世纪初就开始从事的疯狂的劳动是人类最大的祸害，只有当劳动被合理地组织起来并限制在每天三小时之内，劳动才会变成对悠闲懒散生活的一种令人愉快的调剂——要使无产阶级相信所有这些，那是一项我无力完成的艰巨任务。只有共产主义的生理学家、卫生学家和经济学家才能胜任。在以下的篇幅里，我只想说明，由于现代生产资料具有无比强大的生产能力，因此必须克制工人对劳动的狂热，促使他们去消费他们自己生产的商品。

三 生产过剩带来的后果

西塞罗的同代人、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颂扬用于磨碎谷粒的水磨坊的发明。按照他的看法，水磨坊将把女奴隶解放出来，将恢复过去的黄金时代：“珍惜你们的双手吧！磨坊的女工。放心地睡吧！让公鸡徒劳地去报晓吧！达奥已让山林水泽女神代替奴隶

* 1880年版中，在这后面还有这样一句话：“因为我们似乎看到，即使没有这场冲突也会发生的事情在今天果然发生了。”——《拉法格选集》法文版编者注

们的劳动；看，她们正在轮子上欢畅地跳跃，旋转的齿轮带动沉重的石磨一起转动。我们将和我们的父辈一样，过着悠闲的生活，尽情地享受女神赐予我们的礼物。”

唉！这位多神教诗人所宣布的悠闲日子并没有到来。对劳动盲目的、可恶的和极其有害的热情把机器这个解放者变成奴役自由人的工具。机器的生产力使自由人变为穷人。

一个心灵手巧的女编织工靠编结花边用的木筒子每分钟只能结五个网结，而一些编织机在同样的时间内可结三万个网结。一架机器每分钟的工作量相当于一名工人一百小时的工作量，或者换句话说，机器工作一分钟，可让工人休息十天。在用现代机器装备起来的其他工业部门里，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况。随着机器设备日臻完善，随着它们的速度和精确度不断提高，人的劳动逐渐被淘汰。但是，工人并没因此而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相反，他们的劳动劲头反倒更足了，似乎想要与机器比个高低。这是多么愚蠢和致命的竞赛啊！

为了让人能够更好地同机器竞争，无产阶级取消了限制旧行会手工业者劳动的合理的法规，取消了节假日。^①由于当时一星期只劳动五天，他们是否以为象骗人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生产

^① 旧制度下，教会的法律明文规定，工人全年有九十个休息日（五十二个礼拜天和三十八个节假日），并严格禁止利用节假日加班。这是天主教最大的罪过，因为这是导致工商资产阶级不信教的主要原因。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一上台，就下令取消节假日，用每工作九天休息一天代替原来的每工作六天休息一天。资产阶级在把工人从教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之后，又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了沉重的劳动的枷锁。

十五、十六世纪，现代工商资产阶级刚刚形成，就已经流露出对节假日的仇视。亨利四世曾请求教皇减少节假日，但遭到拒绝，因为“当今异端之一就是表现在节日方面”（奥萨红衣主教的信）。但是到了1666年，巴黎大主教佩雷菲克斯在他的教区内取消了十七个节假日。新教虽然也信奉基督，但较能迎合工商资产阶级的要求，所以它不怎么关心人民的休息。它废黜天上的神以便取消人间的节日。

宗教改革和自由的哲学思想只不过是凶狠贪婪的资产阶级教徒们用来取消人民群众节假日的借口。——拉法格注

者是靠空气和水过活的？但愿不是这样才好！当时的生产者有充分的闲暇享受大地赐予的欢乐，谈情说爱和寻欢作乐；他们可以大摆筵席，欢迎懒惰之神的光临。如今涂上新教色彩的、死气沉沉的英国，当时曾有“快乐的英国”之称。当我们从拉伯雷、凯维多、塞万提斯和其他一些专写冒险题材小说的不知名的作家那里读到描写盛大筵席的场面时，我们不禁垂涎欲滴。^①在战役间歇时举行的这类筵席上，真是酒池肉林，喧声震天。约尔丹和佛来米画派也曾用他们的画笔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场面。今天，哪里才能见到食量如此惊人的肠胃？又在哪里才能找到容纳整个人类思想的如此奇妙的头脑？我们现在的确退化了，变得渺小了。病牛肉、马铃薯、着了色的红酒、普鲁士烧酒——所有这一切同苦役般的劳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损害了我们的机体，使我们的头脑变得愚钝。于是，我们的胃变小了，而机器的生产率却大大提高了；于是，经济学家便向我们宣扬马尔萨斯理论，鼓吹节欲的宗教和劳动的信条。事情难道不正是这样吗？应当割下这些家伙的舌头拿去喂狗！

因为工人阶级思想单纯，易受愚弄，因为他们带着天生的热情盲目地沉溺于劳动和节欲之中，所以资产阶级才注定懒惰和享乐，才注定不从事生产和过度消费。但是，如果说工人的过度劳动会损害工人的健康和摧残他们的神经，那么它也会给资产阶级带来不少痛苦。

^① 盛大的节日往往持续好几个星期。拉腊的唐·罗德里戈在把摩尔人从卡拉特拉瓦旧城里赶走，举行了婚礼。《歌谣集》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婚礼在布尔戈斯举行，
接着女方又在沙拉斯大摆筵席，
婚礼和回门共持续七个星期。
天天车水马龙，宾客如云，
迟来的客人竟无法找到一席之地。”

参加长达七个星期婚礼的人都是经历过独立战争的英雄的士兵。——拉法格注

生产者阶级的节欲促使资产阶级大肆消费他们盲目生产出来的产品。资本主义生产初期，即在一、二百年前，资产者曾是安份守己、品行端正的人。他们满足于和自己的妻子生活，或者说基本上如此。他们从不大吃大喝，把放荡、荒淫的“高尚美德”留给宫廷中的朝臣和贵妇人。现在，没有一个暴发户的子弟不认为应该大力提倡卖淫和采用汞疗法，为的是让汞矿工人的劳动具有某种意义；也没有一个资产者不用香菇阉鸡和拉斐特红酒填塞自己的肚皮，为的是鼓励拉弗莱什家禽饲养工和波尔多的葡萄酒酿造工。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人体的机能很快衰退，头发变稀，牙齿脱落，躯干变形，肚子隆起，呼吸困难，十指不能伸屈。有些人，例如从事政治经济研究的加尔涅先生之流和从事法哲学研究的阿科拉先生之流，他们由于身体过分虚弱，经受不起放荡生活的折腾，但是他们颇有舞文弄墨的才干；他们绞尽脑汁，写出很多起催眠作用的大部头著作，来剥夺排字工和印刷工的休息时间。

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也过着殉难者一般的生活。为了把自己打扮得象仙女一样漂亮，她们在一天中不知要换穿多少件衣裙（缝纫女工为了缝制这些服装，累垮了身子）；她们不惜化上几个小时，让理发师在她们空虚的脑袋上梳个假发髻；她们穿着紧身裙和窄小的鞋子，袒胸露背得连大兵们看了都会脸红，在以慈善事业名义举办的舞会上，通宵达旦地转圈子，为的是替穷人募集几个铜板。多么高尚的心灵啊！

为了执行既是非生产者又是过度消费者的双重社会职能，资产阶级不仅要使过去颇有节制的欲望变得十分强烈，丢掉两个世纪以前从事劳动的习惯，去过花天酒地、荒淫无度的生活，而且还要使一大批人脱离生产性劳动，来为他们服务。

这里有一些数字，足以说明生产力的损失有多大。根据 1861 年的人口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为二千零六万六千二百

二十四人，其中男子九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九人，妇女一千零二十八万九千九百六十五人。从中减掉不宜劳动的老幼，所有“非生产”的妇女、少年和儿童，再减掉官吏、牧师、律师、军人、娼妓、艺术家、科学家等“从事意识形态的”阶层以及所有专门以地租、利息、股息等形式消费别人劳动的人，大致还剩下八百万不同年龄的男女，其中包括在生产、商业、金融等部门供职的资本家。在这八百万人中有：

农业工人（包括牧人和住在农场主家里的雇农与使女）……

1 098 261人

棉、毛、大麻、亚麻、丝等纺织厂和编织业的工人……642 607

人

煤矿和金属矿的工人……565 835人

冶金厂（炼铁厂、延压厂等）的工人……396 998人

仆役阶级……1 208 648人

“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煤矿、金属矿的人员加在一起是1 208 442人；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冶金厂人员加在一起是1 039 605人；二者都少于现代家奴的人数。请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获得了多么辉煌的结果！”^①

除了这个仆役阶级之外——其人数的多少是资本主义文明程度的标志——，还有一个为数很多的不幸者阶级，他们是专门为富有者阶级的那些很花钱的但又毫无意义的癖好服务的：例如钻石磨研工，花边女工，绣花女工，缝制高级时装的成衣工，别墅的装修工等等。^②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9页。——编者注

② “为有钱阶级服务的仆人在一个国家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该国国民财富和文明程度的标志。”（马丁《加入联邦前后的爱尔兰》，1813年）。甘必大自不再作为一个贫困潦倒的律师经常光顾普洛科波咖啡馆*之后，便否认社会问题的存在。他所说

资产阶级一旦陷入了懒惰和享乐，尽管也吃了不少苦头，最终还是适应了这一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变革，都感到惶惶不安。当看到工人忍声吞气地过着悲惨的生活，当看到工人的身体被病态的劳动热情折磨得越来越坏时，资产阶级便更加厌恶劳动和对享乐的限制。

恰恰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不顾资产阶级把道德败坏视为社会义务这一点，竟心血来潮地想把劳动强加给资本家。那些头脑过于简单的人，对经济学家和道德学家有关劳动的理论信以为真，不遗余力地强迫资本家去实践这些理论。于是，无产阶级提出“**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1831年，里昂的起义者提出：“**不能靠劳动生，则饮弹而死**”。1871年3月，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把他们的起义宣布为**劳动的革命**。

对这些企图消灭资产阶级的懒惰和享乐的狂暴举动，资产阶级则报之以残酷的镇压。不过，他们知道，即使他们能把这些爆发出来的革命镇压下去，他们却无法用大规模的血腥屠杀来打消无产阶级想把劳动强加给那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有闲阶级的这样一个荒唐的念头。正是为了防止这类不幸的发生，资产阶级在自己的身边豢养着一大批宪兵、警察、法官、狱吏，让他们专门从事这项非生产性的工作。人们不应再对现代军队的性质抱有幻想：这些常备军队的职能是对付“内部的敌人”。巴黎和里昂的工事修筑起来不是为了保护这两座城市免遭外敌的入侵，而是为了镇压内部发生的暴动。比利时是资本主义的乐土。它的军队便是这方面的不容争辩的极好例子。它的中立地位得到欧洲列强的保

新的社会阶层，就是指不断壮大的仆役阶级。——拉法格注

* 十八世纪的一家著名的咖啡馆，它是当时文人相聚的场所。大革命时期，它成了一个民主俱乐部。王朝复辟后，它又变为知识界中反对派的活动中心。甘必大和瓦累斯曾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拉法格选集》法文版编者注

证，但是，按全国人口比例来计算，它的军队的人数却是相当庞大的。骁勇的比利时军队曾在博里纳日和沙勒罗瓦平原上立下显赫的战功，比利时军官们用手无寸铁的工人的鲜血磨快了自己的佩剑，换来了金光闪闪的肩章。欧洲各国没有国民军，只有保护资本家和对付人民反抗的雇佣军，因为人民想让资本家也在纺织厂和矿山里劳动十个小时。

这样一来，工人阶级在勒紧裤腰带的同时，大大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胃口。资产阶级因此而不得不进行过度的消费。

为了减轻自己的这项繁重工作，资产阶级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抽出一大批人（其数目要比从事有益劳动的人多得多），让他们不从事生产性劳动，只是大量消费。不管这些不从事有益劳动的人的胃口有多么大，他们都无法消费掉工人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工人则被劳动的信条迷住了心窍，一味生产，从未想到消费，甚至不想想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能否找到消费者。

工人一方面毫无节制地拼命劳动，另一方面节衣缩食，过着清贫的生活，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不再是寻找生产者和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而是寻找消费者，刺激他们的胃口和制造虚假的需求。由于饥寒交迫的欧洲工人拒绝穿他们自己织的布，拒绝喝他们自己酿造的酒，可怜的工厂主只得赶快去寻找与欧洲工人截然不同的另一些人：每年，欧洲向世界各地输出成千上万件商品，而在有的地方，人们还根本不知道拿这些商品作什么用。^①已经发现的大陆太小了，不够用，工厂主需要开拓新的疆土；他们日夜梦想着非洲，撒哈拉沙漠中的绿洲，苏丹大铁

^① 试举两个例子：英国政府为了讨好印度农民（虽然连年灾荒，农民们仍坚持种植罂粟而不种水稻和小麦），曾不得不挑起流血战争来迫使中国政府自由输入印度的鸦片。为了推销苏格兰酿酒厂和曼彻斯特纺织厂的产品，波利尼西亚的原始居民被迫使象英国人那样穿着打扮并喝得酩酊大醉，甚至因酒精中毒而死掉。——拉法格注

路。他们紧张地注视着利文斯顿、斯坦利、谢尤、布拉柴等人的探险成果，出神地倾听这些勇敢的旅行家讲述他们的种种奇遇。“黑色大陆”蕴藏着多少尚未被人知道的宝贝啊！满山遍野的象牙，注流成河的椰子油，闪闪发光的金沙。那里有千百万黑人，他们裸露着的身子就象杜弗尔和日拉丹的脸一样，他们正期待着欧洲的棉布，以便变得体面一些，他们正期待着圣经和烧酒，以便了解文明的美德。

酒足饭饱的资产阶级，人数超过生产阶级的仆役阶级，被欧洲商品淹没的其他各大洲的尚未开化的民族，——所有这些都无力消费掉堆积起来比埃及金字塔不知高多少倍的商品。欧洲工人的生产率大大超过了一切消费和浪费。工厂主为此感到惊惶失措。他们无法向酷爱劳动的工人提供足够的原料。于是，毛纺厂只得利用又脏又烂的下脚料生产所谓的“再生布”，其牢靠的程度与议员们在竞选时所作的诺言差不多。里昂的缫丝厂为了增加纤维的份量，在又轻又软的天然丝中掺入矿物质，结果使产品变得又硬又脆，使用寿命大大缩短。在产品中掺假，这是为了加速商品流通和缩短产品的使用寿命。我们的时代将被称为“掺假”的时代，就象按生产的性质把古代划分为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一样。有人指责我们虔诚的工业家弄虚作假，其实他们不知道，资本家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给工人工作，因为工人决不肯闲着什么事也不干；工厂主的弄虚作假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当然，他们同时也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假如说这种做法对产品的质量是极其有害的，并造成巨大的人力浪费，但它毕竟能说明，资产阶级是多么聪明能干，而工人则已堕落到何等地步。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对劳动的癖好，竟使得工业家昧着良心，破坏了商业信誉的法则。

虽然商品生产过剩，虽然在工业中存在着弄虚作假的现象，但是工人们仍大量地涌向劳动市场，他们高呼：工作，工作！虽然工

人的数量已经过多，但是工人并不因此而抑制自己的劳动热情，相反，他们把这种热情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旦什么地方有工作的机会，他们便蜂涌而至。他们要求一天能劳动十二至十四小时，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觉得过瘾。尽管如此，他们仍很快地被赶出工厂大门，失去了满足这一欲望的可能。每年，工业部门里的失业现象就象春夏秋冬一样地准时出现。在损害健康的过度劳动之后，便是连续两个月、四个月的绝对休息。失去了劳动，也就断绝了生计。既然这种对劳动的癖好已象毒蛇一般牢牢地盘踞在工人的心上，既然它已经扼杀了工人身上的其他本能，既然社会所需要的劳动数量必然受到消费和原料的限制，那么，何必非要在六个月内完成全年的劳动量呢？为什么不把劳动平均地分配在十二个月里，强迫工人长年地每天只劳动五、六个小时，而非要让他们在一年的六个月中每天拼命地干十二个小时呢？当工人的每天工作得到保障时，他们将不再彼此嫉妒，将不再互相争夺工作和口粮，他们的肉体和精神将不再被弄得疲惫不堪，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开始具有懒惰的美德。

工人被对劳动的癖好弄得稀里糊涂，以至无法理解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了使人人都有工作可做，应该采取定量分配的办法，就象在一条快要沉没的船上定额分配淡水一样。工业家从资本主义剥削的角度出发，早就要求立法限制劳动时间。1860年，阿尔萨斯的最大企业家鲍卡尔先生在职业教育委员会上宣称：“十二小时工作日太长了，应该缩短为十一小时，应该在星期六下午两点钟以后停止工作。我建议采取这项措施，尽管乍看起来，这么做的代价太大了。我们早在四年前就这样做了，效果不错，生产的平均数字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帕西在《论机器》一文中引用了比利时大工业家奥塔维尔的一封信：“我们的机器没有达到应有的生产能力；它们的产量比英国

纺织厂的同类机器要低，虽然英国纺织工人每天比我们的工人少劳动两个小时……而我们则多劳动两小时。我确信，如果我们把工作日从十三小时缩短为十一小时，我们也能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而且会更经济些。”

另一方面，勒卢阿-博利约断言：“根据一位比利时大企业家的观察，一个有节假日的星期的产量并不比普通一星期的产量少。”^①

我们的人民头脑过于简单，受了道德家的蒙蔽，他们所不敢做的事情，贵族政府却做了。经济学家象不祥的乌鸦那样预言：把劳动时间缩短一小时，就会使英国工业破产。但是，英国政府对他们在道德和工业方面的这种深谋远虑嗤之以鼻，它制定了一项极为严格的法律，禁止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十小时。尽管如此，英国和过去一样，仍然是世界上头等的工业强国。

我们的面前有英国的成功经验，有一些明智的资本家的经验。所有这些经验都无可辩驳地证明，要想提高人的生产效率，就必须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假日的天数。但是，法国人民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假如因为劳动时间仅仅缩短两小时，英国的生产便在十年内增长了几乎三分之一，^②那么把工作日缩减三小时，法国的生产岂不可以以更快的步伐突飞猛进？难道不应该让工人们懂得：承担过于繁重的劳动，将会耗尽他们以及他们子孙后代的精力；由于过度疲劳，他们将过早地丧失工作能力；在他们唯一的癖好的支配下，他们不再是人，而只是一些毫无思想的躯壳；他们扼杀了自己

① 保尔·勒卢阿-博利约《十九世纪的工人问题》1872年版。——拉法格注

② 伦敦统计局著名的统计学家吉芬提供了有关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国民财富增加情况的一些数字：

1814年——550亿法郎

1865年——1625亿法郎

1875年——2125亿法郎

——拉法格注

的一切才干，只剩下对劳动的狂热？

唉！他们鹦鹉学舌般地不断重复经济学家的那些说教：“为了增加国民财富，让我们工作吧！”你们太傻了！正是因为你们工作得太多了，所以工业的技术装备才发展得如此缓慢。请不要再叫嚷了，还是听听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吧！此人不是什么超人一等的天才，他就是几个月前刚去世的雷博先生：“一般来说，生产方法的变革要视劳动力的条件而定。当劳动力便宜时，就大量雇用工人；但是一旦它变得昂贵起来，便尽量裁减工人。”①

为了迫使资本家改进他们的用铁木制成的机器，必须提高工人的工资，缩短有血有肉的活机器的工作时间。何以见得呢？人们可以举出成百个这方面的例子：走锭精纺机之所以能够问世并在曼彻斯特的纺织厂中被采用，这是因为纺纱女工拒绝象过去那样长的劳动时间。

在美国，机器席卷农业生产的各个部门：从制造黄油到麦田除草。为什么呢？因为自由和懒惰的美国人宁死也不愿象法国农民那样当牛做马。在我们光荣的法兰西，犁地是一项极其繁重和累人的活计；而在美国西部地区，它却是一种惬意的消遣：在辽阔的田野里，农民坐在机器上，一边干活，一边悠然地抽着烟斗。

四 什么鸟儿唱什么歌

假如缩短工作时间能为社会生产创造新的机器，那么迫使工人消费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则可以大大壮大劳动大军。到那时候，资产阶级将不再是彻头彻尾的纯消费者，它将迫不及待地让那些脱离有益劳动、专门帮它消费和浪费社会财富的军人、法官、美

① 路易·雷博《棉花及其体制和问题》1863年版。——拉法格注

容师、拉皮条者散伙。到那时候，劳动市场就会有人满之患。于是，人们不得不颁布一项严禁劳动的法律，因为根本无法替这些不生产任何东西的、但比蝗虫还要多的人，找到一份工作。除此之外，不应该忘记，还有一批人是专门为满足耗资巨大但毫无意义的爱好和需要服务的。当不再有需要佩戴金银边饰的将军和仆人时，当不再有需要穿花边裙子的妓女和新娘时，当不再需要铸造火炮时，当不再需要盖造宫殿时，——到那时候，就不得不借助严格的法律条文，强迫编织金银边饰的，刺绣花边的，铸造火炮的和盖造宫殿的男女工人去练习划船或学习跳舞，以此来恢复他们的健康和提高人种的质量。当欧洲各国的产品将在当地消费，不再远销到鬼知道什么地方去的时候，海员、码头装卸工、运输工人将学会如何闭目养神。幸福的波利尼西亚青年将可以自由地谈情说爱，不必害怕文明世界的维纳斯女神的鞭笞或欧洲道德卫士的训斥。

此外，为了替现代社会中一切非生产人员找到一份工作，为了使工业技术不断发展，工人阶级应该仿效资产阶级，断然与节欲的陋习一刀两断，无限制地提高自己的消费能力。不要再每日只吃一、二盎司硬得咬不动的肉，而应吃一、二磅鲜嫩的煎牛排；不必比教皇更虔诚，每天只喝少量的劣等酒，而应大杯大杯地畅怀痛饮波尔多红酒或布尔贡酒，把水留给牲畜去喝。

如果无产阶级执意想把炼铁工人和炼油工人的十小时工作日强加给资本家，这就大错特错了，这是引起社会对抗和内战的根源。不应该强迫别人劳动，而应该禁止劳动。满可以允许路特希尔德、萨伊之流终身做个懒汉。尽管劳动已成为一种潮流，但是只要他们愿意过懒汉的生活，就让他们去市政府登记一下，然后每天早上发给他们二十法郎的娱乐费。这样一来，社会上的种种纷争就会平息。当不劳而获的资本家一旦确信，人们对他们并无恶意，

只希望把他们从生下来便注定要承担的过度消费和挥霍浪费的重荷下解脱出来，他们便会第一个报名参加人民党。至于那些无力表明自己想做懒汉意愿的资产者，就让他们按自己的本能行事吧！总归可以替他们找到一份令他们生厌的工作：让杜弗尔去打扫公共厕所，让加利费去宰长满癣疥的猪和得鼻疽病的马，让派往普瓦西的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们去登记送往屠宰场的牛羊的数目；让那些爱好盛大葬礼的参议员去当吹鼓手，演奏葬礼进行曲。还可以替别的人找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让路日里尔、布洛利去盖香槟酒的瓶塞子，不过事先得把他们的嘴巴罩住，免得他们喝醉；让费里、弗雷西讷、蒂拉尔去消除政府部门里的臭虫和污垢，但是要把公款藏好，防止他们恶习不改，顺手牵羊。

不过，引诱人类堕落、装模作样骗人的道德家、伪君子、假好人将长期受到人们严厉的报复。

“这帮家伙以伪装的面目出现，欺骗世人。他们诡称，他们终日祈祷诵经，修身养心；其实不然，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乌七八糟的勾当。他们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居鲁斯^①，实际上他们是一群酒神节浮雕上所描写的酒鬼。他们那副肠肥脑满、油头粉面的模样便是明证。”^②

在人民欢乐的节日里，共产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将不再象在资产阶级的节日——8月15日和7月14日——那样尽吃尘土，而是痛饮美酒，大嚼美味的火腿；与此同时，那些道德政治科学院院士，那些身穿长袍或短褂的形形色色的传教士——经济学的、基督教的、耶稣教的、犹太教的、实证主义的和信奉思想自由的传教士，马尔萨斯主义、基督教道德——不管是独树一帜的还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利他主义——的吹鼓手，他们都将身披黄袍，手持蜡

① 居鲁斯——古波斯帝国国王（前558—前529）。——编者注

② 拉伯雷《巨人传》第2卷第74章。——拉法格注

烛，在威尔士妇女的身旁，在摆满佳肴、水果、鲜花的餐桌旁，饿得两眼发黑；他们将在满满的酒桶旁口渴得嗓子直冒烟。一年四次，即每逢变换季节的时候，他们将同狗一起，被关在风磨坊里，被迫推十小时的磨。律师和法学家也将受到同样的惩罚。

在懒惰国里，为了打发一秒一秒地消耗我们生命的时间，将组织丰富多采的文艺演出。这对资产阶级立法者来说，倒是一项最合适不过的工作了。他们将分成许多小组，跑遍乡村和集市，到处作立法的表演。脚蹬高统皮靴、胸佩奖章和荣誉军团勋章的将军们，将穿街走巷，招摇过市，为的是拉拢一些好心肠的人。甘必大和卡桑尼亚克^①将站在大门口大吹大擂。卡桑尼亚克身穿笔挺的礼服，不停转动眼珠，捻着胡子，手中握着他父亲的手枪，唾沫四溅地恫吓整个世界。但是，一旦人们当着他的面拿出吕利埃^②的画像时，他就恨不得钻入地缝。甘必大将滔滔不绝地大谈对外政策：大谈为把土耳其弄到手而不惜在欧洲挑起战火的小小的希腊；大谈想同普鲁士结盟的大俄罗斯，因为它希望欧洲西部各国被打得鼻青眼肿，这样一来，它便可以向东方挺进和镇压国内想入非非的虚无主义者；大谈俾斯麦，说此人相当不错，可以就大赦问题表态……然后，他敲打着他那袒露的、涂有红、白、蓝三种颜色的大肚皮，反复列举诸如雪鹑、块菰、马尔高酒和依根酒之类的山珍海味和名牌好酒，为的是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并使贝尔维尔选民个个兴高采烈。

在用木板搭起来的舞台上，首先上演一出选举闹剧。

① 贝尔纳·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1806—1880)是波拿巴主义者，热尔省的众议员。他的儿子保尔·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也是热尔省议员。——编者注

② 厄内斯特·沙尔·吕利埃(1838—1891)——1871年3月18日起义的参加者，曾企图同凡尔赛谈判，公社失败后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在1868年曾要求同保尔·德·卡桑尼亚克决斗，但遭到后者拒绝。——编者注

在呆头呆脑的选民面前，小丑装束的资产阶级候选人跳起了政治自由舞，用写有各种各样许诺的竞选纲领遮盖自己的脸蛋和下身。当讲到人民的苦难时，眼泪在他们的眼眶里打转；当讲到法兰西的光荣业绩时，声音顿时变得象铜钟一样洪亮。选民们则发出驴子一般的叫唤声。

然后，开始伟大的一幕：盗窃国民财富。

资本主义的法兰西，这位身躯高大、脸上多毛、头颅光秃、皮肉松弛、肥胖臃肿、萎靡不振、眼珠失去光泽的女人，懒洋洋地斜躺在丝绒软椅上。在她的脚下，工业资本主义这个铁制的庞然大物，戴着猴子的假面具，机械地吞噬男人、妇女和小孩，空中充满了撕裂人心的惨叫声。长着貂的嘴脸、鬣狗的身躯和针鼹的四肢的银行家，动作敏捷地把钱一个一个地偷走。衣着褴褛、瘦骨嶙峋、可怜巴巴的无产阶级，在手持明晃晃马刀的宪兵的押送下，在拿着饥饿皮鞭的复仇女神的驱赶下，把一堆堆商品、一桶桶酒、一袋袋粮食和金子奉献给资本主义的法兰西。朗格卢瓦^①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拿着蒲鲁东的遗书，嘴里还衔着一本财政预算，率领一批人看管国库。当工人放下身上所背的东西，他们使用枪托和刺刀把工人驱逐走，然后给工业家、商人、银行家打开库门，这帮家伙即刻蜂涌而上，拼命抢夺棉布、粮食、金条，倒空酒桶。最后，他们再也没有力气了，浑身又脏又臭，一个个软瘫在垃圾和呕吐物堆里。这时候，一声霹雳，大地被震裂，从中跳出历史的“必然性”，它举起铁脚，踩踏一切跌倒在地上抽泣和来不及躲避的人，并用粗壮的双手推翻被吓得目瞪口呆、直冒冷汗的资本主义法兰西。

如果工人阶级必须根除身上的使他们堕落的恶习，使出全部气力站立起来，这不是为了争取人权，因为那只是资本主义剥削的

^① 朗格卢瓦是蒲鲁东的信徒，在1865年是蒲鲁东的遗嘱执行人之一。——编者注

权利；不是为了争取劳动权，因为那只是贫困的权利；而是为了争取制定一项禁止人们每天劳动三小时以上的铁一般的法律。到那时候，古老的大地将会快乐得发颤，感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在自己的身上诞生……但是，怎样才能使一个被资本主义道德腐蚀了的无产阶级作出如此有魄力的决定呢？

一个世纪以来，由男人、妇女和儿童组成的无产阶级，象古代奴役的化身耶稣一样，艰难地攀登苦难的骷髅地^①；沉重的苦役折断了他们的筋骨，毁坏了他们的身躯，撕裂了他们的神经；一个世纪以来，饥饿损害了他们的内脏和脑子……啊，懒惰，可怜可怜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吧！啊，懒惰，你是艺术和崇高美德的母亲，但愿你能成为消除人类苦难的镇痛剂！

附 注

我们的道德家十分谦虚。虽然他们炮制了关于劳动的信条，但是他们对它的安神、散心、健肾等功能却一直持审慎的态度。他们打算先在普通人的身上进行“活体试验”，然后再用于资本家，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替资本家的罪恶辩护。

但是，一文不值的哲学家们，既然你们不敢向你们的主人兜售你们的道德，那又何必如此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呢？你们是否愿意看一看，你们引以自豪的劳动信条曾经遭到怎样的践踏和唾弃？让我们重温一下古代历史以及古代哲学家和立法者的著作吧！

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道：“我不能断定，希腊人是不是因为受了埃及人的影响，才轻视劳动的。因我发现，色雷斯人、西锡人、波斯人、吕底亚人也同样地轻视劳动。总之，在大多数半开化的民

① 圣经中，耶稣受难的地方。——编者注

族中间，学手艺的人，甚至包括他们的子女，都被视作最下等的公民……所有的希腊人，特别是斯巴达人，都是按这一原则培养的”。^①

“在雅典，只有参与保卫和管理国家的公民才被认为是真正高尚的人，就象他们的祖先只看得起打仗的武士一样。为了能够自由地支配时间，从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用于维护共和国的利益，他们强迫奴隶从事各项劳动。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妇女的高贵身份，竟不让她们纺纱织布。”^②

罗马人只会两种高尚的职业：种田和打仗。全体公民均有权靠国家养活，他们不必学会什么“肮脏的技能”（他们是这样称呼的），因为做工纯属奴隶的事情。为了发动人民，老布鲁土斯指责暴君塔克文把自由公民变成泥瓦匠和工匠。^③

古代哲学家虽然就思想起源的问题争论不休，但是，他们在厌恶劳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柏拉图在谈到社会乌托邦和理想共和国时指出：“大自然既没有创造鞋匠，也没有创造铁匠。从事这类职业的人都是低贱的；这些受雇用的卑微的无名小卒，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至于那些惯于骗人、撒谎的商人，只是作为一种必要的邪恶，才被容许存在于社会里。凡是不惜降低身份，开店经商的公民都将被判罪。如果他们伏罪，他们将被监禁一年。如果出狱后重犯，必将受到加倍的惩罚。”^④

色诺芬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写道：“从事手工劳动的人决不能担任任何较高的职务。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他们中间的大多

① 《希罗多德全集》第2卷，拉尔歌译，1876年版。——拉法格注

② 比约《论西方古代奴隶制的消灭》1840年版。——拉法格注

③ 《梯利·李维全集》第1卷。——拉法格注

④ 柏拉图《共和国》第5卷。——拉法格注

数人整天坐着干活，有的甚至要受到炉火的烘烤，他们的身体和脑子决不会不因此而受到损害”。

西塞罗声称，“店铺会做出什么体面的事情来呢？难道商人真能做到童叟无欺吗？正直的人决不会去开铺子……商人不撒谎，就不可能赚钱。难道还有比欺骗更无耻的事情吗？因此，所有出卖劳动和技能的人，都是卑鄙下流的小人。谁出卖劳动，谁就是出卖他自己，使自己沦为奴隶。”^①

受劳动的信条愚弄的无产者，请你们听听这些哲学家是怎么说的吧（有人千方百计地不让你们知道这些话）：一个公民出卖自己的劳动，就是使自己沦为奴隶，成为罪犯，他将被判处几年监禁。

基督教的伪善行为和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还没有使古代共和国的哲学家变坏。这些哲学家敢于向自由人说出自己天真的想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最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的库辛、卡罗、西蒙远远比不上他们）希望在他们理想的共和国里的公民都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色诺芬补充说，因为“劳动夺走了全部时间，人们再也没有功夫来为共和国和朋友们服务了”。按普卢塔克的说法，莱喀古士这位“大圣人”曾主张禁止共和国的公民从事任何劳动，而应让他们有充分的闲暇时间。^②

巴斯夏、杜邦鲁、博利约以及其他资本主义道德和基督教道德的卫士回答说：“这些思想家和哲学家可是在宣扬奴隶制啊！”完全正确。不过，在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难道他们能不这样做吗？古代社会里，战争是极为平常的事情，自由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用于讨论国事和守卫国家。当时的手工劳动是十分原始和低级的，因此从事手工劳动的人不可能同时又履行士兵和公民的

^① 西塞罗《论权利》第1卷第2编第42章。——拉法格注

^② 柏拉图《共和国》第5卷；《法律》第3卷；亚里士多德《政治》第1卷和第7卷；色诺芬《经济学》第4卷和第6卷；普卢塔克《莱喀古士传》。——拉法格注

职责。为了拥有士兵和公民，哲学家和立法者不得不在英雄的共和国里容忍奴隶的存在。试问，资本主义的道德家和经济学家不是也在宣扬现代的奴隶制——雇佣制吗？在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下，谁有闲暇时间呢？——路特希尔德、施奈德、布西珂太太之流！这些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家伙也是他们身上恶习的和家中仆人的奴隶。

有人鄙夷地写道：“奴隶制的偏见支配了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但是，亚里士多德预见到：“如果每件工具都不需要人的监督，便能自动地工作，就象德达尔发明的自动机或象武尔坎的能自动完成圣职的三脚供桌一样，如果织布梭子会自动织布，那么工场的师傅就不需要帮手，主人也就不需要奴隶了。”

亚里士多德的梦想如今已经实现。现代机器能“口喷火焰”，具有不知疲倦的钢铁“四肢”和奇妙的“繁殖能力”；它们驯服地替我们干活。但是，资本主义哲学家的才智却受雇佣制偏见的支配，他们不理解，机器是人类的救世主，是把人从肮脏的手工劳动和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上帝，是带来闲暇和自由的上帝。

译自《拉法格选集》1970年巴黎
法文版第98—145页。

（王鹏译）

庇护九世上天堂去*

(1881年)

一

1871年12月13日在梵蒂冈的一个大厅里有两个老年人在谈话。一个穿着白衣,另一个穿着红衣。

穿白衣的老人衰朽不堪,时时失掉记忆,象小孩一样,同一句话要重复讲几次他才能听得懂它们的意义。这个人是教皇“永无谬误的人”。

穿红衣的老人有一头白发,一副不可一世的、高傲的面孔。这是庇护九世的第一顾问,红衣主教安东涅利。他焦急地期待着永无谬误的人死去,为的是可以自己登上教皇的宝座。

——一切都失掉了!一切都失掉了!——永无谬误的人嘟嘟囔囔地说。

——对那没有失掉勇气的人来说什么也没有失掉。

* 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于1881年《平等报》。

庇护九世(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1854年曾宣布关于童贞女马利亚的贞洁受孕的信条;1864年公布《现代错误学说汇编》(Syllabus errorum),把一切反对教皇统治的学说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列为“错误学说”;1870年宣布了“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1870年意大利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夺取了教皇的辖区,占领了罗马并宣布它是意大利王国的首都。1871年意大利议会承认教皇是独立的君主,但是限制他的权力不能越出梵蒂冈。庇护九世宣称自己是“梵蒂冈的囚徒”。——编者注

——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失掉？我们还留下什么呢？这些该死的东西，这些匪徒从我手里把我的地盘一个一个夺去。在许多世纪以来教皇、我的前辈象国王一样在那里发号施令的地方，现在我却过着监禁的生活；教皇过去曾经走进走出的、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梵蒂冈的大门，如今被革出教门的、该死的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士兵守卫着。他把我掠夺精光，现在我同基督一样穷，比彼得还要可怜，当时他用自己的网打鱼，为的是获得一块面包。

——啊，教皇啊！你握有格雷哥里七世^①所没有掌握过的东西，国王和皇帝在那个格雷哥里七世面前发抖，象森林的野兽当日蚀的时候发抖一样。你握有的东西，任何一个教皇，不管他多么伟大，还从来没有掌握过；你是永无谬误的人。你是伟人中的最伟大者。你比上帝还要伟大。上帝完成了自己的创造，又后悔了；他让自己的创造物被洪水吞没。而你是永无谬误的人。你不应当、不能够犯错误，你不能后悔。而你斥责别人，因为你登得这么高，超过了上帝本人。他是你的仆人。你发号施令，而上帝则服从。

——唉，假如无情的衰老摧毁我的身体，夺去我的牙齿，使我的智慧变糊涂和只留给我一种痴呆的感觉，那么我还能谈得上什么伟大，什么永无谬误呢？假如腿上的溃疡把我钉在椅子上并且使我失去食欲，这种土地之子中的最不幸者所享有的福祉，那么我还有什么伟大可言？永久的青春，永久的享乐，这就是我需要的东西。

——笨蛋！为什么死亡的时刻还长久不来结束你的早已成为一具化装僵尸的躯体呢！——被这位神父的不断哭诉激怒了的那个穿红衣的人想道。

——假如明天那些没有眼睛和没有耳朵的蛆虫啃掉永无谬误

^① 格雷哥里七世（希尔德布兰德）（1020左右—1085）——罗马教皇（1073—1085）。——编者注

的人的躯体，那么我还有什么永无谬误可言？——教皇继续哭诉着说。

——我们将把你的尸体用香料防腐，我们要使你变得象石头一样硬，以便让第一个永无谬误的人的面孔永世长存。当你应当象大丈夫那样行动的时候，为什么反而象妇女那样哭泣呢？你的肉体虚弱是因为你允许不信教的人损害你的灵魂。人不只是靠面包和肉类活着。假如你恢复自己的权力，假如你变得比利奥、西克斯丁、格雷哥里^①更加强大有力，假如那些伟人中的伟人在你面前低头，假如在那无数跪倒在地、前额触着尘土的人们中间唯有你挺胸站立，那么你可以重新获得青春朝气。

——谁能创造这奇迹？——被他的仆人，其实曾经是他的主人的强烈的虚荣心激动了的教皇发问道。

——信仰！

——她已经死了。

——死了？我们复活她。几千年来我们把人类拴在沾满血污的拷问架上。现在我们将重新用烧红的烙铁来撕裂他们的躯体，为的是把信仰灌输到他们心里去。信仰是恐怖的女儿。我们要迫使人们发抖。

——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

——难道你的眼睛只是为了不看什么东西而长的吗？难道你没有看到一切都在走向毁灭吗？我们的权力已经动摇了，摇摇欲坠了，但是终究唯有我们在文明的废墟上站住了脚跟，因为我们是扼杀人类个性的过去时代的精神的代表，这种精神是不灭的。难道你没有看见，资产阶级——正是那个在前一世纪靠着智慧、嘲笑和断头台的刀子战胜了我们的资产阶级——被吓坏了，四面环顾，

^① 这些人曾是罗马教皇。——编者注

想找到保卫者和拯救者？难道你没有看见国王和皇帝因感到他们脚下的基石已在动摇，于是把目光转向我们？我们是救生的铁锚，资产阶级的避难所，因为我们利用对未知的恐惧来驱使人群；我们知道许多咒语，可以摧毁毅力，削弱意志，迫使人群众放掉手里的小山雀而去追求天上的仙鹤。难道你没有看见，象为了挤碎蛋壳而在蛋内挣扎的鸷鸟一样，粗手黑脚的工人阶级为了炸毁旧的社会形式而痉挛地奋起？为了在它脱壳之前扼杀这个怪物，一切特权阶级都应当联合起来。难道你没有看见，对无产阶级要求归还从它那里夺走的一切的恐惧，对国际的恐惧，对共产主义的害怕，已经把一切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联结在一起？难道你没有看见，为了围剿社会主义而恢复了神圣同盟？啊，永无谬误的教皇呀！正是我们这些旧时代的精神的代表成了反对文明破坏者十字军的领导者。这些人想消灭一切社会，一切道德，一切正义。

——那该怎么办呢？——那位改变了面色的穿白衣的老人高声说。

——需要出奇迹。

——奇迹？——永无谬误的人问道，他的脑袋无精打采地低垂下去，他的声音逐渐微弱。

——对，巨大的奇迹，它将使整个世界大吃一惊，使敌人闻风丧胆。

——但是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圣彼得的骨殖创造过奇迹。信徒崇拜过它们。但是解剖学家走来，把它们抓在自己的肮脏的手里并说了渎神的话：“这是羊骨头！”于是奇迹的骨头停止了自身的奇迹。在法国曾出现童贞女马利亚，——她说话，走路，不信教的人就发出哈哈大笑。

——这都是普通的奇迹。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巨大的奇迹。

——你应当上天去同上帝认真谈一谈。上帝对待自己的职业过于轻松了。假如他做了可怜的六天工作，就想使一年中其余的日子对于他都是礼拜天和闲逛的日子。假如工人也学他的榜样，那末他该说什么，我们大家又该说什么呢？上帝太会偷懒了，应当让他克服自己的懒惰，让他为我们做点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为他做得很多了。如果没有我们，上帝会变成什么样子？在人类的语言中甚至不会有上帝的名字。神父呀，上天去把耶稣或圣灵带回到地上来。我们跟他在一起将创造出奇迹和复活信仰。

永无谬误的人大吃一惊。

——登天！要我这样年老衰迈的人登天？——他用手势和痴呆的声音重复着说。

——新鲜空气、旅行的愉快将使你精神振奋。在天上上帝将治愈你的痔疮。医生曾预言你的肛门上将长出一个新的瘤子。上帝的手指能够治好它。好啦，你赶快上天去吧，而我将代你进行管理。

痔疮是安东涅利的无法辩驳的论据。

——但是当我回来时你不会把我关在门外吧？——焦虑不安的永无谬误的人发问道。

——啊，神父，我是你的忠实奴仆！

——好！我就登天吧。但是我将委托什么人监视你。——穿白衣的人心里想。

——啊，但愿你在路上摔死！——穿红衣的人暗暗地这样想。

二

在取得进入天堂的门票之前，教皇穿上了自己的最好的法衣。

他把自己的口袋装满以备万一。他记起了小饭馆老板曾经献给骑士唐·吉珂德的劝告：少许的钱和几件干净衬衫在路上是必要的。

教皇大约在晚上十一点到达天堂之门。在大门的守卫室里还有亮光。他小心地叩了叩门；没有人回答。他使出全力来叩门，——圣彼得匆匆地把门打开。他怒气冲冲，他的醉熏熏的面孔发红。他准备狠狠地把这个不速之客教训一顿，因为他这样不识趣地破坏了他每晚同神瓶谈话的习惯。

——哪一个坏蛋在叩门？——他用发怒的声音喊道。但是他喉咙里的声音马上就卡住了，脱下自己的海狸帽和弯腰曲膝地鞠了一躬。他说：——请原谅，至圣的阁下，我以为这么晚的时候只有多虱的圣拉弗尔才会来。请原谅……

教皇的华丽的衣服在圣彼得的精神上引起了革命。被激怒了的庇护九世丢了一块钱给天堂的看门人，然后走进去，嘴里嘟囔着说：

——还说我是这个喝醉的和蛮横不讲理的奴仆的继承者呢！他在危急的时刻背弃了他的主人。这个酒鬼为了满足自己的酒瘾还会背弃一百次。

稍稍有点兴奋的圣彼得用赞赏的眼光看着向天堂的大道走去的庇护九世。

——真正是一个衣着漂亮的家伙！狗！他只给了我两个法郎。该死！这是贖制的教皇的钱……骗子！

教皇迷路乱走了整整一夜，最后他终于弄清了上帝住宅的位置。这是一间可怜的小茅屋。人们警告他不要叩门，因为没有人叫得开。据说上帝进入衰迈之年就成了厌世者。他过孤独的生活并且不想听见人的声音。这些消息使教皇发愁。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行动会不会成功。可是他坚决地推开门并且毫不犹豫地走进了茅屋的唯一的房间。它的外观是可怜的。糊墙纸又脏又破而且到

处都掉落了。在熏黑的顶棚上出现了锯齿形的裂缝。在炉灶的旁边安放一张伏尔泰式的椅子和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只盛着锦葵汤的瓦罐和一只有缺口的杯。一个弯成两半的老人坐在椅子上搅弄一些只发烟不发热的焦枯木头。

这个老人就是上帝。

这已经不是那个曾经在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的强有力的工人；这已经不是那个严厉的耶和华，他曾在梭登大发雷霆，他曾下起滂沱大雨，要把人类淹死；这已经不是那个可怕的摩西的上帝，他曾在闪电中显灵，他曾为了令人爱慕而散播恐怖，他曾把毁灭、鼠疫和饥饉送往大地。

这不是中世纪的阴森的上帝，他曾隐藏在被阴影盖住的游动神庙的深处，呼吸着烧烤的人肉的香味和享受着受宗教裁判所拷问的人的痛楚呻吟和嚎哭之声，这不是理查五世和路易十四世的专制的上帝，他曾把地球抓在自己强有力的手里；这甚至不是伏尔泰的上帝，可怜的钟表匠，他每天早晨开动宇宙的机器；这甚至不是资产阶级的上帝，立宪的君主，他统治，但不管理；这甚至不是德国形而上学者的虚无缥缈的上帝，——第一反题，否定的否定。

这是一个肮脏的小老头，样子极丑，有一把蓬乱的和吐脏了的胡子，发抖，咳嗽，发出沉重的呼吸声，身上沾满唾沫，一双脚包裹着绒布，身上穿着一件缝了补钉的和穿破了的长袍，臀部露出一块红衬布。

非常吃惊的教皇忘其所以，高声说：

——就是这个衰老的、虚弱不堪的、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的伟大人物，我作了他在地上的代表。

——谁在这里说话？——上帝扬声说，抬起自己的微黄的面孔，面孔上显出一个塞满烟草的犹太人的大鼻子。——你自称是我在地上的代表而你又敢在我而前放肆说话！你竟敢在天堂的这

一角里打搅我，在这里我虽然不能死掉，但我试图强迫别人把我忘掉……既然你已经擅自闯进了我的隐匿之所，你就欣赏一下你所说的虚弱不堪的伟大人物，欣赏一下你的创造物和你的先辈们、万恶的教皇的创造物。我产生派遣我的儿子耶稣到人间去的想法的那个日子真该死。在这之前我是人间和天上的最高统治者。人们只服从我。现在人们把我当作老废物送进游动神庙，人们于是在痴呆的耶稣的塑像面前和在他的母亲、荒淫的童贞女面前，在污秽的和臭气冲天的圣安东尼的双腿面前，在他的伙伴面前下跪和点燃蜡烛，把他们变成圣物。财神马门的时代又回来了，金猪用自己的脚踏踏万军之主^①……我给予人们智慧的那个日子真该死。在这之前我用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生物填满宇宙，我打雷，我刮风，我下暴雨，我掀起海浪，我震撼大地直到它的最深之处。但是象小儿残酷地把昆虫身上的腿和翅膀拔掉一样，理性也从我身上把我的功能一个接一个除掉。它把这些功能归之于无意识的自然力量。我只执行天意的职能，使国王登上王座和把恩典赐给人们。但是残酷无情的理性却教导说，国王之所以成为国王，强者之所以致富，是因为人民群众愚蠢和胆怯，并且俯首贴耳地听从指挥和剥削。理性发展起来，它压低我的地位。理性充满宇宙。理性真是该死的东西！我的地位降低了，我变弱了。但是无知识的、愚昧的、胆小的人仍然需要我。我是为他们存在的。只有我有权作为永无谬误的人。而你，愚蠢的老人，你剥夺了我的最后的特权，你把我从我的王位上推翻，你把上帝变成玩具般的跳舞人，它的牵线掌握在你的手里。于是我必须借你的眼睛看，我必须借你的舌头撒谎。爱虚荣的和渎神的老家伙该死！那个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之后又把我丢弃的人类该死！那个创造了人的家伙真该死！

^① 犹太教中上帝耶和华的称号之一。——编者注

真该死！……啊，但愿我能用石头痛打大地的儿子，将他们捣碎，但愿我能淹死他们，把所有的处罚和所有的霹雳都投在他们身上！唉，可惜我是软弱无力的！

于是上帝耷拉下脑袋，显出精疲力竭的样子。

“要知道这是一个躁狂者！”——教皇想，“一切都很糟糕，不论是他做的，也不论是别人做的。我猜想，假如我说起自己的痔疮，象安东涅利所建议的那样，那就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这是没有什么用的。上帝本身是毫无用处的……耶稣——这才是我所需要的上帝……”

庇护九世默不作声并且匆匆地离去。

三

离开天父上帝的小茅屋不远之处，教皇遇到一群穿着鲜艳的和五颜六色的衣服的嘻嘻哈哈的妇女和年轻姑娘。这欢乐的一群围着一个有发亮的头发，有用最上等的红颜色涂抹过的面颊和嘴唇，有丰满的和戴了宝石戒指的双手的淡黄发的年轻人跳跃。这个容光焕发的年轻人打扮得油头粉面，十分俏皮好看，看来他只想到自己的头发和想到他的漂亮会给周围的娘们以什么样的印象。这个小胖子就是耶稣。

啊，他同那个拿撒勒的耶稣、木匠的儿子、施洗者约翰的朋友、躲在山洞里睡觉和吃蝗虫的野蛮牧人有多么大的区别呀！他同那个因人间苦难的阅历而变得抑郁寡欢的基督很不相象，那个基督曾远去荒漠和为了分担挨饿者的痛苦而持斋；那个基督曾经光脚在石板路上行走和骑着柔顺的驴子庄重地去到耶路撒冷；那个基督曾经用自己的神的破烂衣衫吸引了穷苦大众，使僧侣和富人恐怖并且向不知希望为何物的穷人宣布希望！他同古罗马的奴隶在

苦难中产生的那个基督很不相象，那个基督是他们拴在一条锁链上的同伴，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象英勇的角斗士斯巴达克一样，是一个可怕的革命者！他同中世纪那个忧郁的、瘦削的、象征着法国农民的苦难的基督又是多么不相象！这些基督是非常可爱的、伟大的，作为人民的疾苦的代言人，他们在贫苦群众的心中生长起来、受尽折磨并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基督都死了！……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卷发的耶稣，资产者的耶稣，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和妓女的耶稣，甜得发腻的年轻人仍然活着。

受窘的教皇目瞪口呆地瞧着他。

——欢迎你，高贵的外来人！——耶稣对他说。——我从你的窘态看出你是新来的人。多么幸运呀！我们将听到来自人间的消息。你带来了最近一期的《时装评论》吗？上帝的确是幸福的，而你，可尊敬的老人，将同他在一起。好，请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吧！我的温柔的小鸽子比年轻的猴子更富有好奇心。怎么，地上的妇女都还穿袒胸的衣服吗？还使用撑裙褶的腰垫吗？我非常喜欢这种服装，它很轻便，雅致！

——主呀，我来是为了同你商量你的教堂的困境，——教皇打断他说。

——巴黎女人仍然还是用黄色来染自己的头发吗？讨厌的式样！我的胡子和我的头发正在失掉原有的魅力，我想把它们染成黑色。你们对这件事怎么看法？我的心爱的女王们！

——最甜蜜的耶稣，你是我们的模范，对你来说染发同给百合花上颜色一样。——这群恋人齐声高喊。

——我的心肝宝贝，你们的愿望对于我就是法律。

——主呀，你的教堂正受到攻击。

——妇女们仍然还用米粉作的香粉来搽脸吗？呸！或许以为你拥抱的是面口袋。凡是献身于我的人，我都禁止他们使用香粉

和胭脂，假如男人们也这样做的话……

——主呀，你的庙宇正在遭到玷污……

——那么，拉舍尔是不是终于发明了新的饮料来使精神陶醉和激起被爱情弄衰竭了的力量呢？

——主呀，你的信徒陷于绝望之境。他们不再哭泣了。他们把所有眼泪都哭干了。他们不再抱怨诉苦，——读神者的手封住了他们的嘴。主呀，你被人从你的宫殿里逐了出来，而你在地上的全权代表是在监狱的稻草上睡觉。

——这当然是令人难堪的事。难道这就是你从活人的住处给我们带来的唯一消息吗？好啦，你究竟是谁，为什么对我的教堂有这么大的兴趣？

——主呀，我是庇护九世。

——哈哈！——那快乐的一群发出了哈哈大笑声。——这个可怜的老头子，我们亲爱的耶稣（他的接吻是这么甜蜜，他的抚爱可以使我们神魂颠倒）的全权代表就是这样吗？现在我们懂得为什么妇女们的心中正在失去信仰。

愤怒充满了神父的灵魂，他的多皱的面孔因生气而发红。但是耶稣愚蠢地微微一笑并抚摸自己的胡子，用手扶靠在自己的宠姬马德莱娜的身上，正在这时候圣泰莉莎的一双因爱欲而发烧的眼睛恨不得把他吞下去。

——老头子，请你不要见怪这一群神魂颠倒的女人所说的话。她们由于爱我而忘记对你采取应有的尊敬态度。咱们老实说吧，她们是正确的。谁会产生这样奇怪的想法，让患痛风病和丑恶的老人成为我的全权代表？我是这么漂亮，以致我的姿态可以促使妇女的心象小山羊一样跳动。让我来把我的头脑里出现的想法讲给你听听。让我的想法白白地消失，这是不常发生的事情。我提议改革：从地上的最美丽的儿童中选择男的和女的教皇。不去写

什么《现代错误学说汇编》，这些东西只能使易怒的和爱哭的忧郁病者高兴，我的教堂的这两位首领将把自己的恩典赐给那些最崇拜我的人……请你不要耸肩。我的思想抵得上你的那个滑稽可笑的、引起我的父亲发怒的永无谬误的思想。最后，我是无所谓，对我的教堂，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罢。

——主呀，请不要把你的目光引开你的教堂，请不要嘲笑你的仆人的苦难。

——老头子，我是认真的，象咖啡馆里的仆役送上帐单时一样认真……一劳永逸地让我的教堂见魔鬼去吧！我不想为此绞尽脑汁，我的一群苏丹王后已经够找麻烦的了。单是一个圣泰莉莎就需要十个海格立斯去对付。这是真正的美莉莎琳娜^①。到我父亲那儿去吧。

——上帝诅咒我！

——就是这么一回事！不要装出这样生气的面孔，这会引起我消化不良。我能为你做什么？

——同我一起到人间去。

——你怎么啦，发疯了吗？要我回人间去！……我永远不要再看见人们……请看，那是圣灵！它保留了关于地球的美好回忆，或许它会跟着你去。

四

童贞女马利亚穿着一件有曳地长后襟的、天蓝色的、没有腰带的外衣，懒洋洋地走来。

白鸽，圣灵，爬在她的肩上，咕咕作声并且爱恋地微微触到她

^① 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一世的第三个妻子；以荒淫著名。——编者注

的面颊和颈项。

圣约瑟在她背后走着。有无数分枝的两只大角长在他的脑门上。这些角起初使善良的约瑟发愁，但是听从自己的忠实女友的劝告，他曾去请教过一位年轻的医生，于是他安心了。他知道了角标志着某种优越性。他开始爱它们了，他觉察到马利亚的依恋随着它们的长大而愈益强烈。最后他把它们视为天堂里最宝贵的东西。

这三位一体的形象引起教皇发笑。

——圣童贞女，我的母亲，——耶稣说，——给我们圣灵，我的肉体上的父亲。而你，被指派作为我家圣灵的鸽子，请给庇护九世出点主意吧！

——假如需要的只是圣灵^①，那末我在海伊-卢萨克街第九十五号就有；不是酒，而是神的，甚至是最好的……

——这很快就会结束吗？——教皇打断说。

——永远不。我可以在一个钟头之内编出六十个双关语，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编出一千四百四十个。只有最厚颜无耻的人才会否认我的神性，难道不对吗？

马利亚陶醉于自己的鸽子说话，然而庇护九世暗暗地骂了一句：

——这是什么样的家庭！在他们中间最聪明的是鸟。假如不幸人们知道天上所发生的事，那会怎样呢？……什么样的一群白痴！

——庇护九世建议我回到地上去，——耶稣说，——假如我再次被拖到那里去，那么我现在就开放我的后宫，停止倾轧，并且娶妻。但是你不要指责人们，特别是妇女；你可以帮助贫苦的老人。你能飞，在需要的时刻翅膀会把你从困境中救出来。

——你是骗子，庇护九世！你一文不名，因此你想在我的参与

① 双关语。法语中“esprit”一词既有圣灵的意思，又有酒精的意思。——编者注

下开设当铺，以便虔诚地掠夺虔诚的信徒，你想把我变成一只喜鹊，偷东西的喜鹊^①。

于是神圣的鸽子高傲地竖起羽毛和展开自己的尾巴，对钟情的马利亚的温柔的眼光采取冷淡的态度。

——好的，我同意重新下降人间，但是首先我应当说出我的信念。

圣灵坐在圣约瑟的一只角上，咳了几下，清了一清自己的嗓子，说：

——我是三位一体的成员，但是我不象上帝那样抱有偏见，也不象我的儿子耶稣那样没有脑筋。

——我在天堂的面前宣布我拥护进步的进程，拥护人和神的完善的改善。我拥护铁路；我反对用来拉公牛和大学学生的板车；我拥护电灯而反对冒烟的蜡烛。我拥护安全剃刀；我拥护国际和共产主义……哎，不是这样，我失口了！你知道，当这么多的思想挤在脑子里的时候，你就会弄得糊里糊涂，说话颠三倒四。言归正传，我再说下来。我拥护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我拥护联邦制的、议会的、自由的、分权的共和国。如果仔细地观察一下，那么三位一体也是联邦制的、平等的共和国，共和国的理想。请好好地体会我的思想：耶稣虽然是傻瓜，但总是神；上帝虽然是疯子，但也是神；我，虽然我是圣灵，我也是神。所有的神都是平等的而且相互之间构成联邦的关系。所以……

——让鸽子讲这些卑鄙的事情，这多么不体面！——教皇高声说。

——亲爱的圣灵，——约瑟说，——假如你到人间去了，那末谁来安慰我的无可安慰的夫人呢？当她离开我的床去哭泣和祈祷

^① 双关语。法语中“Pie”既是人名庇护，又有“喜鹊”的意思。——编者注

时，谁在不眠之夜给她作伴呢？

——马利亚会去找那个安慰过你的年轻医生，我的好约瑟，——圣灵回答说，——他将作为奸夫来安慰她……小心照料你的妻子，她很快就要做母亲了。

——再做母亲，——圣约瑟高声说。——啊，我决不承认这个私生子。这件事与我毫无关系，我管不了这许多。我不打算再承认我的妻子的孩子。马利亚拒绝我的爱抚，一心保持自己的贞操，然而她生的孩子，比母兔还要多。

——约瑟，为什么为这点小事就这么吵吵嚷嚷？又将有一个孩子，这算得了什么。须知是我供养全家，我在你的妻子每一次生产之后，给你购买公债。使马利亚受孕的是我，圣灵。但是她虽然怀孕，却仍然是处女，并且在生孩子之后仍然是处女。这是一个秘密，是你所不能理解的。只有当你的角长到十公尺的时候，你或许能猜破它……可是出发的时间已到。圣火在我的胸中燃烧。我想给人们鼓劲，鼓励他们爱自由，爱自由贸易，爱无息贷款，教会他们使用英国的雨衣。

——必须把这畜生的喉咙堵起来，——教皇嘟囔着说，——现在我要用棉花堵住自己的耳朵。

马利亚哭了。约瑟发笑，他感到他的角在长高。

圣父和圣灵来到天堂的门边并要求看门人准许他们通过。

——圣灵，你上哪儿去？——圣彼得问道。

——到地上去。

——你是勇敢的。打猎的季节开始了，说不定子弹会打中你的背部。

——哎，糟糕！……的确如此，问题很严重。

——永无谬误的教皇，——它继续用傲慢的声调说，——我必须完成伟大的使命。我不能象一只平平常常的鸽子一样去冒生命

的危险。这些不信神的人只顾自己的胃，——他们可能射死我，拔去我的毛，把我放在铁叉子上烧烤。假如我这个三位一体的灵魂被放在油里煎熟，那么三位一体将变成什么样子？而可怜的童贞女马利亚又将如何？老头子，神圣的、公共的和私人的义务把我拴在天堂的岸边。多么可惜！为了在人间建立市政自治、议会制共和国和马尔萨斯主义，我本来很愿意牺牲自己。再见！

于是鸽子展翅高飞。

——你究竟是谁？——看门人问。

——我是你的继承者，彼得。难道你不能为我做点什么事吗？

——怎么，你就是那个小偷庇护九世吗？你就是那个滥用我的名字并借此勒索钱财的人吗？你把那些借圣彼得的名字搞来的钱藏进口袋去，连一个铜板也不肯拿出来给我。你这坏蛋，滚开！

于是圣彼得一脚就把教皇踢到地上来了。

* * *

在梵蒂冈的一个大厅里有两个老年人在谈话，一个穿着白衣，另一个穿着红衣。穿白衣的在呻吟和哭泣。穿红衣的怒气冲冲地高声说道：

——我们的王国完蛋了。人们真该死！

强大的声音充满空间，这是盘①的声音，大自然的声音。它轰隆隆地响着：

——天上是空虚的！

选自拉法格《宗教和资本》（王子野译）1963年三联书店版第123—138页，并根据《拉法格选集》第3卷193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389—400页作了校订。

① 希腊神话中的森林和牧场之神。牧人和猎人的保护神。——编者注

可能主义

(1882年2月5日)

第一次出版的《平等报》批判了合作社主义和合作社主义者，第二次出版的《平等报》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而没有进行个人攻击，第三次出版的《平等报》也完全一样，它要批判的是可能主义和可能主义者。我们并不想辱骂我们的对手和诋毁他们的名誉，而是要使他们信服。我们不指责他们用报纸来宣传他们的思想，因为我们并不害怕他们的思想。相反，我们希望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发表出来，使大家知道，并同我们的思想进行交锋。如果人们确信自己的思想具有科学价值，就会欢迎别人的批评。

《无产者报》曾认为，把《平等报》称为“战斗的报纸”，就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要感谢它，因为我们一直渴望得到这样的称号。不管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都会看到，《平等报》将始终不渝地捍卫历次工人代表大会的集体主义理论，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体制和活动家。

对于那些想使工人党放弃集体主义而接受可能主义的人所搞的阴谋，《平等报》曾予以揭露。为了使工人党党员认识到有些人想把党引到何处去，只要让他们读一下布鲁斯11月12日在《无产者报》上发表的《再论社会主义者的团结》一文就足够了。这篇文章曾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们将要对它进行批判。可能派在竖起他们的大旗之前，首先宣布《无产者报》为他们的正式机关报，以此表明他们的理论、行动和对集体主义者的攻击是得到正式批准的。

布鲁斯在文章中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这是难得的。第二次出版的《平等报》和他的伦敦之行曾把一些新的思想灌输到他的头脑里。但是这个根特代表大会（1879年^① 9月）上的反集体主义者决不会满足于共产主义者的称号。他是极端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实现国家范围内的集体所有制是不够的，应该实现全世界的、普遍的集体所有制。《平等报》对于他的这种极端的共产主义思想不负任何责任，这个荣誉应归于马隆在《不妥协派报》上竭力吹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艾·德·拉弗勒^②。这位被马隆奉为“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把基督教的仁慈看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他同样认为，只在国家范围内实现集体所有制是非常狭隘的。他在《两大陆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声称：“地球属于集体所有。但是，既然应该取消国与国之间的划分，那么集体一词又意味着什么呢？它可以指人类集体，指整个人类。这样，我将是祖鲁人^③和爱斯基摩人^④的财产的共有人，同样的，他们也将是我所耕种的土地的共有人。”^⑤这是范围广阔的共产主义，是世界性的共产主义。你们这些国际的集体主义者只要求在欧洲和美洲实现生产工具的国有化。而我只是一个基督教经济学家，我要求使北极的冰川和非洲荒无人烟的灼热沙漠都归集体所有！这位口气很大的经济学家是马隆和布鲁斯这两个人的老师。

而《无产者报》宣扬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端的共产主义只是为可能主义铺平道路。让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发展过程。

① 原文有误，此处应为1877年。——编者注

② 艾米尔·德·拉弗勒（1822—1892）——比利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编者注

③ 指非洲南部说班图语的部分居民。——编者注

④ 爱斯基摩人居住在北极格陵兰岛以及哈得孙海湾与白令海峡之间。——编者注

⑤ 见《国际的兴亡》，载于1880年3月15日《两大陆评论》。——拉法格注

当巴黎代表大会和哈佛尔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决定党应参加竞选斗争以发挥和扩大它的影响时，他们既没有想到要取得竞选的胜利，也没有想到要进行在选举过程中很容易展开的宣传：他们宣布要把马赛代表大会通过的集体主义决议当作党的旗帜，应使这面旗帜在每个选区上空飘扬，并应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它，而无需考虑在竞选中将会取得胜利还是遭到失败。《无产者报》说得很好，它认为“仅仅对党的理想进行描绘……是不够的，甚至也不是十分明智的。还应该通过艰苦的工作，使它的思想渗入被压迫的各阶层群众中去。”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竞选运动开始的时候，当需要进行紧张而有效的宣传的时候，当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将不得不在被压迫的群众面前公开承认他们在社会改良方面是绝对软弱无力的、并将被证实是一伙江湖骗子的时候，可能派放弃了党的旗帜，或象激进派领导人的喉舌《正义报》所谴责的那样，把“纲领导言中的集体主义”抛在一边。

为什么要回避集体主义呢？《无产者报》对我们说，这是因为，“我们在理论上大大超过其他社会主义流派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们**在实践中**提出的要求只能获得少数人的支持，那么，这些要求是无法得到实际效果的”。因此，《无产者报》建议我们把只能赢得少数支持者的集体主义导言丢进垃圾箱。尽管布鲁斯在《无产者报》上自称为极端的世界性的共产主义者，但这并不能保证可能派会有所作为，因为他们在资产阶级面前抛弃了集体主义，如同“茹尔德朋友”的同盟中有些人打趣地说的那样，把它放到2000年去考虑。因为他们并不想“徒劳地踏步不前，或者象关于蓝胡子的童话中说的**那样住在空想之塔里，永远也看不到具体的、可以感觉到的东西出现**”。

《无产者报》宣称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集体所有制，因为它认为实现国家范围内的集体所有制太狭隘了。但是，尽管它是狭隘

的，却同时又显得过于广泛了，以致不能把很多战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请看看选举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所以《无产者报》抛弃了国家范围内的集体所有制，而想代之以市镇和行会的集体所有制。在下一期《平等报》上我将要论证这种市镇和行会的集体所有制同实现北极冰川的国有化一样是不可能的。由于《无产者报》一心想取得可以感觉到的结果，因而将把它的极端共产主义的愿望限制在资产阶级的集体所有制即股份公司的范围之内。促使《无产者报》朝这方面发展的人就是沙·利穆津先生，他大概还是马隆的“挚友”。顺便说一句，在经济方面，他比马隆—布鲁斯这两个人懂得多一些。不过可能派当心自己遭到与甘必大一样的命运：他为了成为可能，在十年内一直实行机会主义政策，但最后成为不可能的了。

为了成为可能，《无产者报》把集体主义说成是一种空想。不仅如此，它为了使人们对集体主义产生反感，还责难集体主义将会“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十年来一直使我们大伤元气的血腥屠杀”。这真是致命的一击。可怜的集体主义！但是，如果说要把三月十八日起义的失败归咎于一种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就是自治主义的、市政主义的和联邦主义的理论，正是这种理论要为起义的失败承担责任。

主张集中制的集体主义者由于已经与巴黎的历史传统决裂，因而决不会宣布巴黎公社^①。因为他们懂得巴黎不能陷于孤立状态，否则就会象 1848 年 6 月一样被外省打垮。而且，只有整个法国都获得解放，巴黎也才能得到解放。主张集中制的集体主义者要求的不是巴黎的公社，而是巴黎的法国。他们不会尊重法兰西

^① 巴枯宁是马隆和布鲁斯从前的导师，向他们传授了无定形的无政府主义，他们则一直是他的传声筒。巴枯宁在 1870 年《致一个法国人》一书中，陈述了自治主义革命的计划，要“起义的首都按公社形式组织起来，等等”。——拉法格注

银行的自治，而是要夺取它的全部金子，以收买凡尔赛分子的将领。他们决不会使工人们及其家属以及在起义中捐躯的战士的孤儿寡母在贫困中度日，而要征用资产阶级住宅，以便使他们住在人应住的地方。

但是要指责公社领导人未采取这些能够使三月十八日起义获胜的革命措施，这会是不公正的。因为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主张集中制的集体主义者。本世纪开始的工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尚未达到这样高的阶段，到那时，用集体主义解决社会问题不再是伟大人物的天才发现或者说受尽苦难的群众情感上的愿望，而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这种必然性是显而易见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明摆着的。

工人群众在 1848 年由于受到当时很多社会主义流派宣传的影响，抱着很多的共产主义的愿望。而在帝国时期，他们由于受到蒲鲁东思想和自治主义、市政主义及联邦主义理论的影响而在思想上堕落了。领导国际巴黎支部的朗格卢瓦和托伦之流，如同可能派想要否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集体主义决议一样，抛弃了历次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集体主义决议。时刻准备响应革命号角召唤的巴黎工人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勇敢地献出了一切，他们对运动没有给予任何领导，而是盲目地追随蒲鲁东主义者贝累^①之流和很会装腔作势的皮阿^②之流。

正因为主张集中制的集体主义者没有忘记五月的流血日，所以他们对自治主义、市政主义和联邦主义以及一切资产阶级的极

① 沙尔·贝累(1795—1873)——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和公社财政委员会委员，驻法兰西银行代表；奉行拒绝银行国有化和不干涉银行内务的政策，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和英国。——编者注

② 费里克斯·皮阿(1810—1889)——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 年大赦后回到法国。——编者注

端自由主义的词句深恶痛绝。他们继承了国际的集体主义传统，并认为，使工人阶级背离它的最终目的即实现生产资料集体占有，就是背叛它的利益。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昏昏欲睡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革命。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受到震动，发生动摇。三十年内铁路的发展不是打乱了城市和乡村的一切经济和社会关系吗？我们在第一期《平等报》上指出的从里昂开始的金融危机不是波及巴黎、柏林、维也纳、法兰克福、日内瓦和伦敦吗？这场危机不是把成千上万的资产者抛入了无产阶级的苦海之中吗？它不是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吗？在政治界如同经济界一样不是都掀起了轩然大波吗？

欧洲工人革命的形势逼人。它要求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向群众传播集体主义思想，以便有一天使每个工厂的工人不需要什么口号就知道他们应干些什么，并永远仿效圣亚田工人在 1848 年做出的、令人难忘的榜样，那时，圣亚田的工人驱逐了老板指定的工头和工程师，在没有厂主干涉的情况下，经营开发煤矿。

译自 1882 年 2 月 5 日《平等报》。

（陈双苑译 李兴耕校）

工人党的目的

(1882年6月18日)

在工人党内存在着两个派别，它们在相互斗争。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斗争并不象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会使党瓦解，正相反，斗争使党变得更加活跃；斗争将使党摆脱阴谋家，将使党得到统一和加强。所有政党在它们建立的初期都会遇到这样的斗争。工人政党中组织得最好、最强大的德国社会主义党也曾有过危机时期。但党克服了危机；工人党也将克服自己的危机。必须找到缩短危机期的办法。清楚而准确地确定党的目的将使我们找到这种办法。

可能派和革命派这两个派别在互相斗争。可能派想要通过和平的市政改良达到工人阶级的解放；革命派则认为只有通过革命力量才能使两大陆的无产阶级获得解放。

可能派希望党接纳所有的人，包括克洛维斯·雨盖之流、阿尔芒·莱维之流，并且接受各种各样的理论。被人用侮辱的口气称为集体主义者、宗派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派则要求党拒绝任何资产阶级理论和任何资产阶级分子。

革命派尽管对于社会组织问题各自有着独特的观点，但是应该齐心协力，团结起来。为此，他们不应该相信他们为了显示与众不同而使用的那些辞藻。这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也在使用这些辞藻；其次是因为这些辞藻因使用者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含义。

某些党的活动分子认为说几句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集体主

义、共产主义的词句就可以同资产者区别开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些词句曾经使资产者感到恐惧，现在却正在被他们所接受。

所有资产者今天都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社会改良的拥护者；但是什么样的社会改良呢？他们是所有有利于他们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改良的拥护者。过去就有过，现在也依然存在着波拿巴的社会主义、俾斯麦的社会主义、可能主义的或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

“你们自称无政府主义者，——加尔涅、拉弗勒、莫利纳里等自由贸易经济学家说，——但是我们有着同样的理想；和你们一样，我们也希望使国家的作用化为乌有；我们也希望国家消失；国家对我们毫无用处，它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羁绊，一种障碍。国家垄断了一些工业，比如烟草业、制币业、征收捐税；它还垄断了公用事业部门，如：警察、军队、邮政，而我们希望这些部门由私人公司来经营。”天啊！资本家先生们是多么希望拥有和使用国家手中的所有工业和公用事业部门；由此带来的利润将是无法估量的。最激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一蒲鲁东就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他用两句话概括了这种无政府主义。

由于《平等报》的宣传，集体主义成为人们常见的词汇，它在资产阶级激进派中引起了混乱。起初，他们觉得这是他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竭力到处散布说，集体主义者不过是一些伪装的波拿巴主义者，一些疯子，一些“狂妄的人”。但后来这些激进党人对集体主义这个词逐渐习以为常，并且找到了使这个词丧失革命的含义的方法。

——“集体主义者！——但谁又不是集体主义者呢？他们说。铁路、工厂、矿山不都是属于股东集体的集体财产吗？”克洛维斯·雨盖这个可能派的宠儿在大庭广众前自称为集体主义者，并在马赛发表了“批发商的集体主义”的演说。

也许可以设想共产主义这个词会阻止资产阶级这样做，因为这个词具有伟大的历史，它在资产阶级心中激起了仇恨和恐惧，尤其是因为资产阶级作家们向共产主义者身上倾泄了下流的和愚蠢的造谣中伤。但是不行。可能派的先生们正在制造一种彬彬有礼的温和的共产主义，资产者们可以毫不蹙眉就接受过去。

可能派的最有学问的博士^①说：“对资产阶级来说，没有什么比共产主义更无害、甚至更有用的了。什么是共产主义？——这是一种成为公用事业的工业。邮政、电报就是共产主义的工业，它们是不分阶级为整个人类社会服务的公用事业部门。应该扩大这种对资产者和工人都如此有利的共产主义。我，可能派的博士，我建议巴黎市政当局建筑五千套工人住宅并宣布这是可能的；这不过需要两千万法郎；这将是一种市政共产主义。这将有利于工人，使他们少付房租；也将有利于老板，使他们可以减少付给工人的工资。你们看，我的共产主义不是宗派主义的，因为它对所有人都有利。我，可能派的博士，我希望首都的铁路建设由市政当局负担费用，这将是一条市政的和共产主义的铁路。其结果将使巴黎从壅塞在这里的、使巴黎变成革命的城市的工人中摆脱出来。真幸运！资产者将不再害怕革命了。”得意洋洋的可能派的博士没有直说他的可耻的可能主义而侈谈他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这个词使他看起来是站在工人一边，但是他的共产主义显然不再使资产阶级感到不安。这位以前不过是私人信件伪造术的发明家的博士现在只不过是剽窃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

资产阶级用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这些词掩盖自己的利益和阴谋诡计：这些词还会引起我们队伍中的思想混乱和无益争吵。我们之中有许多人自称为集体主义者、无政府

^① 暗指布鲁斯。——编者注

主义者，然而他们对集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却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我有这方面的证据。另一些人则完全相反：尽管有的人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有的人自称为集体主义者，但他们的解释却是一样的。这种滥用模棱两可的词句的做法正使革命党变成巴比伦塔，在这里每个人都对他所使用的词句赋予不同的含义。有些人想用加修饰语的办法来使问题简单化：如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等等，结果，他们只是使问题复杂化了。

可能派狡猾地运用这些词在我们中间制造不和，这使我们迫切需要制定一个明确规定工人党的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纲领。

各次代表大会已经对党的目的作了说明，这就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把从资产者那里夺取过来的生产资料交给集体或国家占有。手段是革命暴力。**党的战士们应当团结在这面旗帜周围。这样，他们就可以确信，在他们的队伍中间不可能混入任何资产阶级政客。

译自 1882 年 6 月 18 日《平等报》

(彭光译)

法国工人党纲领绪论部分解说*

(1883年)

一

对人类社会及其起源的最新研究表明：所有人类社会开始时都是共同占有土地及其产品。个体所有制开始出现的时候，只是限于**纯属个人使用的物品**：诸如野兽的毛皮、从敌人身上缴获的战利品、装饰品、武器等，这些物品通常和所有主的尸体一道埋葬。个人使用既是产生个体所有制的起因，也是个体所有制的最大限度。

土地及其产品的个体所有制出现得较晚：个体所有制在封建制度下要承担各式各样的捐税，法国是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时，个体所有制才具有绝对的或资产阶级的性质。当然，个体所有制是在侵犯集体所有制或公有制的基础上，经过多少世纪，通过暴力和欺骗才逐步建立起来的。然而，甚至在最**资产阶级化**的国家，它也从来未能把集体所有制全部兼并过去，因为公共产业（市镇财产、国有森林等）还普遍存留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因此，纲领的绪论中说“**个体所有制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

* 1883年，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在圣·珀拉惹监狱中合写了《工人党的纲领：它的历史、绪论和条款》一书，对法国工人党1880年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作了通俗解说。这里发表的是小册子中关于纲领绪论部分的解说，是由保尔·拉法格起草的。——编者注

个体所有制的基本特征是**个人使用**自己所有或专有的财产，在小农业和小工业时期，一直保持这种特征。农民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织布工人用自己的手摇织布机进行生产，雕刻家使用自己的刻刀，画家使用自己的画笔，木匠使用自己的工具；他们不仅是**名义上或法律上的**所有主，而且是**实际上的**所有主，因为他们亲自使用自己的财产，因为他们自己操作自己所拥有的工具。财产和所有主紧密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财产的生产能力取决于所有主的灵巧和精力；如果所有主抄手不干，或者年老体衰，生产能力就不可能不受影响。因此，所有主当时在生产中起着有益的作用。

但是，随着地产的扩大，随着工业的变革和机械化，个体所有制的使用性、实际性和有益性逐渐趋于消失。当农民的小块土地发展成为一、二百公顷以上产业的时候，从事耕作的就不再是所有主，而是分成制佃农或一般佃农、长工或短工了。当手摇织布机变成了机械纺织机，手锯变成了机械圆锯的时候，所有主就不再织布或锯木了，而是雇用工人去从事这种劳动。财产就成了**法律上或名义上的**东西，所有主则失去了对财产的个人使用，他和财产不再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财产的生产能力和所有主的个人技巧无关，而且也不会因为他游手好闲或年迈体衰而受影响。所有主在生产中不再起任何作用。他只是在**掠夺**生产者，即掠夺那些由于使用财产而应成为**名义上或法律上的**所有主的人，而这些生产者的劳动不但要创造出相当于他们每天所消耗的东西，而且还要为所有主创造**剩余价值，即利润**；雇佣劳动者人数越多，受剥削越厉害，这种利润就越高。

名义上或法律上的所有主既然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利润掠夺者**，那么，完全可以让路特希尔德取代多耳富斯，让梅纳尔·多里昂取代施奈德尔，而生产能力并不会因此有所下降。所有主甚

至可以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家公司（例如卡伊公司），或者成为股东或债券持有人的团体。矿山、铁路、运河、冶炼厂就是这种情况，那些财产证书已变成**无人称**的东西，可以畅行无阻地转手流通，在交易所里一天之内几次转换**法律上**的所有主。

这就结束了所有制的个体性质，或者正如纲领的绪论所说的，“**财产的个体占有方式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

工业进步排斥了财产的个体占有方式，同时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它就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创造了这种形式的物质和精神因素。

当人们还没有蒸汽犁、收割机、脱粒机以及其他农业机械的时候，可以继续保留小块土地并以这种形式由个人占有。但是，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到来，只有把原来的小块土地合并而成的大片土地才可以存在，这使得土地集中势在必行。这种集中促使并要求实行土地的社会占有，且不说地产在股份公司的手中日益成为**未分割的**，即共同的产业。

工业方面的变化也是一样，而且还要迅速；个人可以占有的手摇织布机、纺车、手锯以及其他几乎是家庭式的工具已经被纺纱厂、锯木厂、机织厂所取代；这些工厂汇集了几十副锯子、几百部纺织机、成千上万个锭子。这便是工业的集中，是大型手工工场〔manufacturiers〕^①机构的社会占有的前奏；这些机构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再是某一个人的产业，而成为**未分割的和不可分割的**共同产业。一条铁路拥有大量车箱、机车、车站以及这种集体设备的其他部分，怎么能确定它的每个股票持有者的个人财产究竟是

① 准确的用语应为“mécari-facteur”（机器工场），因为它不是手工劳动，而是使用机器劳动。但是由于法语中还没有这个词，不妨可以仿效英国人，他们把机械化工业都包括在 fabrique（工厂）这个词里面，所以我们最好是用 usine（工厂），usinier（工）这样的词来指机器生产。——拉法格注

多少呢！

这种集中，是商业的规律，也是工业和农业的规律；它和它所带来的那种股份集产制是“**财产的集体占有方式的物质因素**”，绪论谈到这种占有方式时，说它是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所创造的**”。

小块土地和工具是个人使用的手段，也就是说，一个人就足以经营或运用这些小块土地和工具。但是，大地产、纺织厂、纺纱厂、机器锯木厂则必然是集体使用的手段，也就是说，要靠大批工人的合作才能进行生产。

自耕农必须自己从事生产——自己耕耘、播种、收割、脱粒、修剪葡萄枝、收获葡萄和酿酒；个体工人，例如细木匠，就得自己挑选木料，设计家具，制作和装配各部件；而在**机械化的工业和农业中**，分工非常精细，所有操作都由各工种的工人同时去完成。大农业需要化学家对土壤和肥料进行分析，需要机械师开动蒸汽犁，需要专门家进行选种，如此等等。一个机械工场不能没有场长、会计、司炉、壮工、工头等。这些生产者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单独制作整件产品，而是要由大家一起协作进行生产，各人所占的比例不定，也不可能确定。例如在一公尺呢绒中，且不谈纺织工，怎么能够算出机械师、司炉、工头、场长、壮工在那上面所付出的劳动量呢！所有这些人，虽然身份不一，但对于生产这一公尺呢绒都是缺一不可的。虽然——更正确地说**因为**——这些人所属的类别不同，但他们都是必不可少的，简直是谁都缺少不了谁，所以任何人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时间随心所欲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当纺织工六点或七点钟就到织布机旁等候蒸汽把机器开动，那么，最不守纪律的**极端自由主义的司炉**也不能等到十点钟才上班。只有对现代化生产毫无概念的人才会认为，不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而且在任何时期，个人都可以在机械工场中随心所欲^①地工作，个别人可以任意开

始或中止全体人的工作。劳动者一走进这种工场的大门，无论是场长、机械师或壮工就都得放弃自己的意志和个性而仅仅成为庞大机械的一个自动化不等和重要程度不同的齿轮，受这个机械支配，被这个机械带动。

集体劳动或共同劳动的必要性，各劳动者之间的互相依存，这些都是**财产的集体占有方式的精神因素**，**这些因素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当然，精神因素还不仅是这些。

现代化生产最特出的现象之一，就是生产力的指挥转到非所有主即无产者的手里。工程师、化学家、场长、工头、领班等等，一句话，工业的整个**指挥班子**都是从广大雇佣劳动者中招募来的。不管这些经济领导人的科学知识水平有多高，也不管他们个人的才能有多大，他们跟自己所指挥的工人一样，都是雇佣劳动者；他们只是在工资的数额方面有别于工人——还加上他们表现得傲慢一些。尽管他们之间大部分人对于每天只领五、六个法郎的工人可以表现出奴才的傲慢无礼，但他们仍然和后者一样都得听任游手好闲的产业主或金融家的支配。这些产业主或金融家的个人意愿对他们和对工人同样都有约束力。由于无产阶级既提供了生产的体力因素，也提供了生产的**精神因素**，因而，有朝一日，整个产业主阶级都会消灭，其财产将实现集体化或社会化，但生产并不会因此而受到**丝毫损失**。

① 拉伯雷（无政府主义的文人试图拿他来替自己辩护）可以在他的德康美修道院门上刻上：“**做你所愿做的事**”。不过，我们那些玩弄词藻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却没考虑到：首先，当这位十分大胆的中世纪的思想家在纸上建造他的理想的修道院的时候，那种把人变成机器的仆从的机械生产还没有出现；其次，这所修道院不是一个生产场所，而是一个娱乐或消费的场所。然而，在消费方面“**做你所愿做的事**”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拉伯雷在这方面是个预言家。他预料到我们所要走向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产品异常丰富，可以随意消费。但是，自由消费和自由生产之间，存在一条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可能做到的（而且也是将要做的），那就是为每个人和所有人逐渐缩减个人不能自由行动的劳动时间。——拉法格注

换句话说，或者概括一下：人类社会以共同或集体所有制开始，个体所有制则是从纯属个人使用的物品（装饰品、武器等）开始，接着是占有房屋、土地、工具、资本，到了资产阶级掌握社会权力时，个体所有制才具备了它的绝对形式；然而，原始的集体所有制却从未完全消失。

随着个体所有制的扩大和实行机械化，**名义上或法律上的**所有主就不再**使用**其产业，而成为掠夺雇佣劳动者的人，由雇佣劳动者去使用这种产业，也只有雇佣劳动者才能使这种产业发挥效益。

这样，个体所有制就完全失去存在的意义。

另一方面，随着个体所有制的扩大和实行机械化，越来越以集体的方式使用这种产业。它需要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集体，并导致新的高级集体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是靠损害个体所有制建立起来的，正如个体所有制也是靠损害最初的集体所有制才建立起来的，二者同样都是势在必行。

二

由于生产资料（工厂、土地、商店）在其使用方面越来越成为集体的，而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却仍然是个体的，这样，就产生两种结果：产品积聚在非生产者的所有主（**资本家**）手中，而非所有主的生产者却随着生产的增长而更加贫困。

劳动者所创造的一切财富都不为他们自己所掌握，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劳动者并不拥有他们集体使用的工具。他们享用的那部分劳动产品只限于维持生计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方面，而游手好闲的所有主对于劳动者为维持生计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即工资，总是力图而且必然要加以削减的，因为这是增加其利润的唯一手段。

因此，所有主就尽量延长工作日，而且延长得太过份了，使得资产阶级政府也不得不通过法律来进行干预，限制滥用工人的劳动力。在工业家之间所进行的斗争或竞争中，胜利是属于从工人身上榨取无偿劳动最多的那些工业家；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降低成本，从而廉价抛售，垄断市场。因此，任何一个“好老板”（如果有好老板的话）都不可能超出微乎其微的限度去改善他的那些象机器一样的工人的状况。在雇主阶级当中，非但不去关心这种改善，反而竞相责备其雇佣工人偷懒，指责他们因为提出各种要求而使民族工业遭到破产^①。

因此，为了降低劳动力的费用，工厂主竟然彻底破坏工人的家庭；继雇用妇女之后还雇用儿童，让他们在工场中累断筋骨。妇女和儿童是比男子更为廉价的工具；所以，不管他们是愿意还是被迫，都被卷进了工业的齿轮机构中去，然而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为了掩盖不顾年龄和性别的资本主义剥削的丑恶，却一味在侈谈提高工人家庭的福利。

工厂机械的改进也并非为了其他目的。这种改进促使劳动简单化，同时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可以使雇主节省一部分人员，用普通工人去代替熟练工人（因为后者的报酬较高），用妇女和儿童去代替成年男子。由于机器的使用和改进而被赶出工厂的失业工人，在饥饿的驱使下，不得不廉价出卖劳动力；从而他们就不由自主地成了压低在业同伴工资的工具。最终的结果是为劳动繁忙时期造成一批工业过剩人口即后备军，有了这支后备军就可以在平时克扣工资和延长劳动日。当本国的工业过剩人口不足的时候，那也不必担心；对老板来说，并不存在国际主义的罪过。他总是有来自外国的人力资源可以利用，而且越来越加以滥用； he 可以从意

^① 1883年5月召开的中部地区可能派代表大会也随声附和资本家的这些怨言，把“提高工资”也列为“法国工商业不振”的原因之一（第七项决议）。——拉法格注

大利、德国——必要时从中国——的饿鬼储备库中吸收所需要的人力，以此压低劳动力的价格，让本国同胞去忍饥挨饿。

机器的普及、发展和**自动化**，使产品和老板的利润成百倍地增加，但给雇佣生产者带来的只是劳动和穷困的加重。雇佣生产者为其主人创造的财富愈多，给自己制造的贫困就愈甚。他们所生产的和他们可以消费的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的工资只够维持生计；他们生产的产品越多，他们就越是无法买回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品。

日益普及的职业训练以及其他训练也不会产生别的效果。工人阶级所组成的活的机器的完善，使得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用较少的人力完成同质等量的劳动，它使生产增加了，但是使又一批生产者遭到失业。

只要雇佣劳动制度使劳动者成为那些劳动工具占有者手里的工具，也就是正如纲领的绪论所说的那样，只要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土地、工厂、船舶、银行等等），不管在任何制度下，所有进步都会反过来损害劳动者。

只有当生产者阶级破除了生产资料的个体占有，并以集体占有或社会占有来代替它的时候，**生产者阶级才能不分性别和种族获得自由**①，亦即掌握自己的命运并掌握现有的一切以及自己创造出来的一切。

三

只有**剥夺资本家阶级**才能对已经变为集体使用的生产资料实行社会化或集体化。

那些回避说出剥夺这个字眼的革命者——因为有这样的人——认为，不应用剥夺这个字眼来吓唬群众；他们同那些害怕实

行剥夺、而试图通过市镇竞争或举办公用事业来加以代替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一样，没有看到或不愿看到：

(1) 剥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变革的规律；

(2) 由于现制度的自然和必然的发展，所说的剥夺越来越易于实现；

(3) 只有剥夺才是对被剥夺者的唯一补偿；

(4) 生产条件越来越使剥夺成为必不可免。

被奉为本世纪之神的工业进步的结果是对那些从前用自己的工具在家里劳动的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进行剥夺。他们被剥夺了：

(1) 他们的劳动工具。这些工具在他们手中已无用处，成了可以付之一炬的木头(纺车、刨子、织机等)；

(2) 他们多年学得的技艺。这套技艺已被车床所取代；

① 而且，正如绪论所说的，在这种解放全社会的变革中获得自由的将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现制度下的那些享受特权者(资本家)可能自以为他们现在是自由的，但是他们真的是自由的吗？他们甚至连自身都保护不了，经常要受到工人阶级因贫困而引起和传播的瘟疫、伤寒、霍乱等的威胁，而且有时自己也被传染上。他们为了防止群众“袭击”而不得不以军队、法官、警察等形式维持和发展一支盲目的、消极的力量，但这支力量是随时都可以发动雾月十八日和十二月二日这一类政变的；因此，他们并不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力量而在政治自由方面得到更好的保障。至于他们的财产(对于这些来路不正而又十分庞大的财产，他们就象海上遇难者抓住轮船的残骸那样，紧紧抱住不放)，由于各种折换(这是一种局部的破产)、崩图一弗德式的暴跌、不可靠的公证人、娜娜式的贪得无厌的女人(这是对于迫使无产者的妻女卖淫的一种报复)，他们的财产不也是越来越保不住吗？

当然，尽管那些因破产而弄得家破人亡(每年六千家以上)或因生产过剩危机而垮台的资产阶级会象工人阶级一样从集体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社会中获得好处，但是却不要指望资产阶级会建设这种社会，也不要指望贵族阶级，因为贵族阶级作为所有主，本来可以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但它不是去促进、而只能说是“容忍了”这场革命。

那些特权阶级一向表现出不可能为自己成员的真正、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眼前的、表面的利益。因此，必须不顾他们的反对，用革命的方式去解放他们。——拉法格注

(3) 他们的家庭。由于妻子儿女都到工厂中去干活，这些家庭已空无一人；

(4) 他们的劳动果实。这些果实已由个体或集体雇主(老板、股东、证券持有人等)在利润或股息的名义下集中起来，纳入金库。

这就是现代化生产的过程，它完全是建筑在大鱼吃小鱼所造成的废墟上，可以说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都是如此：象“卢浮”和“邦马舍”这类特大商店的繁荣就是靠大批小铺子倒闭所造成的，正如“克列索”和“费夫—里尔”的发迹也是由几百个小作坊的破产而造成的一样。

相反，工人党纲领所要求和争取实现的剥夺是剥夺大产业主，为穷苦者谋利益，也就是剥夺少数掠夺者为大多数被掠夺者谋利益；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夺剥夺者**。

对那些剥夺群众的人，只是让他们**退还**而已；这些剥夺者的人数由于彼此间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正在一天天减少；他们对生产漠不关心，象苏丹一样对生产一窍不通，这样，工人党的任务不但可能而且更易于实现。其实，领导生产的不是他们，而是一批优秀的雇佣劳动者。因此，剥夺他们的财产对于铁路、矿山、冶炼厂、炼钢厂、纱厂、织造厂等毫无影响，生产活动将一如既往，照样进行。

另一方面，唯有这种剥夺才是有补偿的；而到目前为止进行的所有其他剥夺都是没有任何赔偿的。试问，由于机织厂的出现而被剥夺的手工织布工人的赔偿金在哪里呢？由于铁路的建成而被剥夺的马车夫和卡车司机的赔偿金在哪里呢？由于自来水总公司的开设而被剥夺的挑水工的赔偿金在哪里呢？由于“布西科”和“雅吕佐”这样的大商场的建立而被剥夺的服饰用品商、衬衫商、鞋匠、地毯商等的赔偿金又在哪里呢？

在实行社会剥夺的情况下，将建立一系列保护儿童、老人和防止疾病等真正公用事业；那些名义上的受损者，即以前的资本

家，也和其他人一样，可以享受这些公用事业，而且还会让他们参与掌管全部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公共财产并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分享共同生产的果实。

卢昂全国代表大会把马赛和哈佛尔大会的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光荣地在纲领的绪论中明确地补充写上这种社会剥夺。这种剥夺不仅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或资本主义所有制给劳动者阶级带来超额劳动和贫困所引起的。它的出现是一种经济必然性，因为在机械和蒸汽的作用下，生产资料变得异常庞大，使得个体所有主无力指挥和控制。生产资料支配这些所有主，后者已无法按照消费的需要进行生产。生产资料迫使所有主让产品充斥市场，造成十年一度的生产过剩危机。这种生产危机比一次大战或一场瘟疫所造成的损失还要大，它扰乱了整个社会结构，只有掌握自己的劳动工具和社会劳动产品的社会才能预防和制止这种危机^①。

四

但是，为了公益而剥夺那些谋私利的剥夺者的所有权，取决于由组成工人党的生产者阶级取得政权。资产阶级依靠所掌握的国家保护它所掠夺的财产，因此，正如我们的绪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要从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首先必须从政治上或政权上对它进行剥夺。

而且在这方面，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工人阶级的任务大大简单化了。过去——将近三十年前——，大资产阶级从勤劳和富有生气的小资产阶级那里找到了反对工人起义的盾牌和利剑。1848年，不仅巴黎的中产阶级，而且还有外省的中产阶级，完全步调一

^① 例如，通过对需求的统计，以此作为生产的尺度和准则，同时可按照这些需求分配劳动者到社会活动的各个部门，并限制各种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拉法格注

致地反对六月的起义者。那些新的资本老爷们对于这种效劳——真是救命之恩——究竟如何报答呢？他们竟不断榨取自己的同盟者和救星。大商号扼杀小店主，大工业家拧死小工业主，金融家掏空小资本家——甚至中等资本家——的腰包。小资产阶级不但不再维护大资产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而且由于不断被剥夺，已被抛到敌人的行列里。1871年，在二十几万张支持三月十八日反资产阶级运动的选票中，有一半以上是属于小商业和小工业方面的。外省大量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同情巴黎起义；好几个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还用武装支持了起义，同时巴黎的一些资产者第一次在工人的指挥下参加了战斗。

1848年，巴黎和外省的国民自卫军争相屠杀那些“均产者”。1871年，尽管梯也尔得到路易·勃朗、格雷波和朗格卢瓦之流的支持，而且还一再号召，并以高额军饷为诱饵，但他连一个连的民兵也未能动员去屠杀官方电讯中所说的巴黎“共产主义者”，即公社社员们。

大资产阶级既不知道也没有能力自己保卫自己，它只好把这一差事托付给警察、宪兵和被俘的士兵；由于出卖法国工业^①，凡尔赛镇压巴黎无产者的盟友俾斯麦把这些士兵交付给大资产阶级。

当大资产阶级还没有失掉全部锐气，当它还和小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要求组织国民自卫军的。它以自己能够保卫自己的财产和人身为荣；正因为波旁王朝不相信大资产阶级维持内部秩序的力量，才被迫于1830年永远走上流亡之路。今天，大资产阶级觉得再也得不到它的受骗者和受害者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它怯懦万分；尽管国民自卫军不过是也只能是一支资产

^① 法兰克福条约规定给予德国及其产品以最惠国待遇，但这不是互惠的。——拉法格注

阶级民团而已，因为玩刀弄枪必须要有闲余时间，但大资产阶级竟要求解散整个国民自卫军，把这看作自身安全的首要条件。在共和制度下反而解散自卫军，那更是说明问题。

为了保卫自己所积聚的赃物，大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只有依靠警察和军队了。但是，警察的棍棒用来对付无害的游行示威者可能绰绰有余，而要对付战士那就完全无能为力了。至于军队，尽管今天还起保卫作用，明天将是个危险。军队陆续将健壮的居民吸收入伍，培养工人学会使用武器和集体作战，换一句话说，它在为行将到来的工人革命培养一批训练有素和遵守纪律的士兵。

正如纲领的绪论中所说的那样，唯有**革命**才能使生产者阶级夺取政权，并使政权服务于从经济上剥夺占少数的法国资本家以及实行生产力的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化^①。

这场不可避免的革命将不是靠关于要使用炸药的激烈言论，靠个别一些人物的英勇狂热行为，也不是靠和警察进行地方性搏斗或者局部拿起武器就能引起的。它也不会由于激进派首领或可能派首领的那一套政治经济玩艺儿，或由于连资产阶级国家也不得不实行的那一套工人改革而被制止或推迟。它将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和欧洲的工业发展以及美洲和大洋洲的农业竞争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动荡而爆发。

可以说任何个人甚至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加速或制止象十九世纪所孕育的那样一场革命，但是一个明确认识到以经济变革为目标的政党是可以领导这场革命的。从马赛、哈佛尔和卢昂全国代

^① 为了避免任何曲解，我们应当指出，工人革命之后，只能是剥夺那些拥有由集体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诸如大地主，工厂主，冶炼厂主，银行、铁路、矿山、船舶等的股东和债券持有人。任何革命政府都不可能也不愿意剥夺自耕农的小块土地，剥夺雕刻匠的雕刻刀，剥夺细木匠的刨子和锤子。而且，一个胜任的革命政府还要让他们摆脱剥削他们的高利贷者和商人，并帮助他们减轻如此繁重而又报酬低微的劳动，直至通过事例使他们相信集体生产比个体生产具有优越性的时候为止。——拉法格注

表大会诞生的工人党正是要发挥而且能够发挥这种作用。

1848年2月24日和1870年9月4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让临时政府和所谓国防政府的资产者登上本阶级的国王和皇帝尚有余温的宝座。当劳动者大失所望，幻想破灭，拿起武器要求应得权益时——1848年6月是一次，1871年3月又是一次——，已经为时太晚了。这一点，他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些新当权者——他们就是新的有产者阶层——已经有时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把不久以前还在互相争斗的资本家阶级各派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们已经能够以血腥镇压的手段来对付工人的要求，因而他们实际上先发制人，主动挑战，例如关闭国有工场，夜袭蒙马特高地的炮台。

无论是1848年还是1870年，无产阶级都没有领导革命的准备。无产阶级虽然能够夺取胜利，但却不会利用胜利的果实，原因是没有纲领和组织。即使假定它仍然还掌握着巴黎，但它在任其自治的各省中也得不到必要的支持，同时它也不懂得进行哪些经济改革。它的执政结果只是暴露了它的无能。它的胜利仅仅是暂时的。革命时期的困难之处，不在于夺取政权，而在于保住政权。

只有当各工业中心都发动起来并互相支持，而且在这些工业中心——它们是我们的积极的和第一线的队伍——中找到一些知道该做什么而且身体力行的人的时候，执政的无产阶级才能保住政权。

为此，应该使法国各地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领导人物熟悉有关剥夺资本家和实行国家占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一任务不久将要落在他们身上，而且时间日益临近；同时应该使他们对立即实行的第一批改革措施取得一致意见。

在马赛、哈佛尔和卢昂举行的无产者代表大会因此制定了纲领，这是有关我们一旦掌握了国家以后所要实现的目标和实施办

法的唯一纲领。

工人党过去致力于传播这个纲领；党不过是也只能是个**指导者**和**组织者**，它用一切办法进行组织和指导：口头宣传（集会和报告会），书面宣传（书籍和报刊），实际行为的宣传（罢工、请愿、竞选等）。

当然，工人党之所以参加竞选，并不是为了赢得几个参议员或众议员的席位（它把这些席位让给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痔疮患者），而是因为竞选期间可以让平时对会议最漠不关心、最无动于衷的那部分群众受到我们的教育，还因为在竞选期间可以迫使那些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物亲自出马，暴露他们的不良意图和无能，因为他们作为候选人角色是无法逃避表演的。

如果我们有些人真的闯开代议机构的大门，那也不过是为了在那里继续进行关于剥夺的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宣传，并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这个场所，把那些与拥有财产的资产者联成一体**的资产阶级领导人物逼得走投无路**。

译自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工人党的纲领：它的历史、绪论和条款》1883年巴黎法文版第29—53页。

（建恩译）

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

(1883年)

一 历史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公民们!

在工人党的“社会主义图书阅读小组”所组织的一系列的报告里,我们的同志杰维尔准备讲《资本及其生产的现象》,而我将谈谈经济环境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从马克思学派的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人是两种环境的产物:宇宙的或自然的环境和经济的或人为的环境的产物,我说“人为的”环境,是因为它是人类创造的产物。人类社会的民事的和政治的制度、宗教、哲学体系和文学都是植根于经济环境里。它们在经济的土壤里获得自己盛衰的因素。历史哲学家应当在经济的环境里——也只有在这中间——找出社会进化和革命的基本原因。

当我同你们一起研究两种经济环境——**封建的或者农奴制的环境和资本主义的环境或者雇佣劳动制度**——的时候,我将对马克思的伟大学说进行历史的检验。但是在开始研究这些环境之前,我认为有必要把我的第一个讲话专门用来谈谈某些试图解释人类历史事件的唯心主义理论,而把第二个讲话专门用来谈谈对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的影响的一般看法。

1

人们不是用物质力量的作用来解释人的机体的现象和自然的现象，而是首先把它们归因于，——这是最简单的解释，——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的创造物的干涉。这是在任务的困难面前的退让，而不是解决它；这甚至是创造新的困难。因此人类理性的任务之一就在于：一个接一个地破坏人在不同时期用来理解宇宙的宗教的和哲学的体系。破坏是为了重建，消灭那已经理解的东西是为了重新理解，——一切社会的和个人的生活的基本条件就是如此。

个人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出生、发育成长、性交、生病、死)被看作是想象中的神的意志造成的。天主教所获得的很少，破坏的也很少，但是更换了许多名称，它改革了多神教的神和宗教的仪式(洗礼、圣餐礼、加冕礼、涂油礼)。起初，人们都认为有许多神分别管太阳的移动、风暴的掀起、闪电的放出，——后来的一神宗才把这许许多多的特性集中在一个神的身上。

但是人还必须弄明白社会现象，社会现象使他吃惊比自然现象还要厉害。他为此也求助于同样的方法。他说，神把人从尘世的乐园逐出而使他命中注定要劳动和受苦。国家的盛衰也是由上帝的天意加以调节。

为了给你们举出例子来证明那些把社会现象归因于想象中的人物的意志的人们是怎样去解释历史事实的链条的，我不能找到比博胥埃^①的《世界通史讲话》(世界历史的最著名的宗教总结之一)更好的选择了。从博胥埃的观点来看，正如从一切唯灵论体系的唯心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一样，不是生存的物质条件、不是由它们

^① 雅克·博胥埃(1627—1704)——法国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教。——编者注

产生的需要、兴趣、情欲和本能推动人们和各个民族前进，——而是上帝催促他们，并且引导他们沿着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道路走向他们所不知道的目标。

这个上帝，博胥埃的儿子，利用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来惩罚犹太民族，利用波斯人来恢复它，利用亚历山大^①及其初期的后继者来保护它利用著名的安条克^②及其后继者来考验它，利用罗马人来支持它的自由……犹太人在耶稣基督之前就已生活在那些罗马人的统治之下。而当他们不承认他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时，那些罗马人就不知不觉地助长了神的报复和消灭了这个忘恩负义的民族。上帝决定就在这时候从所有民族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民族，首先把陆地和海洋统一在那个帝国的统治之下。如此不同的各个民族（它们从前有个时候是彼此敌视的，而后又在罗马的统治权之下结合在一起）的商业关系，是上帝用来宣传福音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

维科^③在自己的《新科学的要素》里非常正确地指出希腊人因为害怕假如他们采行一些对立的风俗习惯，就会引起神的反对，所以他们就干脆把自己的或多或少不洁净的习惯分给神。博胥埃同样地在自己的神面前充满了对救世主的恐怖，因为神曾这么轻易地惩罚过列国。为了使神对自己有利，他就把他自己身上充满的那种奴颜婢膝的感情加在神的身上。他向自己的戴王冠的学生说：“我可以向你证明，在所有国王当中，圣经的一切有名的预言最无可怀疑地恰恰是与你的祖先有关”^④。因此，为了让教皇安坐在

①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 356—323) ——古代著名的统帅，马其顿王(公元前 336—323)。——编者注

② 安条克——塞琉古王朝的叙利亚王(公元前175—164)。——编者注

③ 维科(1668—1741)——意大利哲学家、社会学家。——编者注

④ 博胥埃《论世界通史》。——拉法格注

罗马和颂扬路易十四，上帝就让大地布满废墟和用苦难来毁坏人类。人类历史的最著名的构想之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

我用一切唯心主义者所共有的这种博胥埃的手法，可以向你们证明，上帝施行的用恐怖办法来更替国家，只是为了颂扬通奸和对面首表示好感。

上帝到底从所有大地上的儿子中间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做自己钟爱的民族的父亲，来奠定一系列国王的始基（这系列后来受到大卫和所罗门的颂扬和由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最后完成）？他选出亚伯兰，一个最平常的面首。关于这件事圣经正是这样说的，而圣经的传播是神明的预见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当亚伯兰所在的那个国家遭遇饥馑时，他就去到埃及。但是在首途之前，他对自己的妻子撒莱说了以下的话（我逐字逐句引用，因为这处地方配得上左拉学派的《人类的文件》）：

“13. 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14. 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

“15. 法老的大臣看见了，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

“16. 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①

神圣的家长找到了如此合意的获取驴子和男女奴仆的方法，以致再次使用它。当他迁居到基拉耳并在加低斯和苏尔之间定居下来时，他“称他的妻子撒拉（即撒莱）为妹子”。基拉耳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莱夺取了去。

“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即亚伯兰），又把他的

^①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十二章第十三——十六节。——拉法格注

妻子撒拉归还他。

“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①。

你们不要以为其它民族的历史不包括这样可靠的和无可辩驳的神的意志的证据。相反地，上帝恰恰希望民族之间的伟大冲突都是由婚姻的瓜葛而引起。由特洛伊战争开始而绵延到亚历山大夺取亚洲的希腊与亚洲之间的战争，就是由于美丽的海伦同牧人帕里斯的风流艳事而发生，当马其顿的战士从大流士②的手中夺去他的无数的妻子时才告终结。

上帝授予统治世界的权利的罗马人只在他们把萨平③妇女从她们的丈夫手里夺去之后才成为上帝垂青的民族。当他们被胜利冲昏头脑而丢掉古代风俗时，上帝为了复兴自己的败坏的民族而提拔严厉的卡托④并把他提高到监察官的称号，在他的身上复活了亚伯兰的美德，他取得一笔不大的钱就暂时把自己的妻子让与演说家霍登西乌斯⑤。

在中世纪以各种形式享受所谓“初夜权”的封建贵族是自己国家内得到上帝恩惠的第一流人物，而我们时代的有产者，不满足于用各种形式对自己作坊里的农奴妇女使用这种权利，强迫她们用妓女的血泪工资来弥补她们的低微的工业工资。他们是上帝的宠儿，上帝拿自己的恩惠的金雨洒在他们身上。而站在人行道上的庸俗的面首，只剥削一两个不幸者的劳动，上帝决定他们当警察和

①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二十章第十四、十五节。——拉法格注

② 大流士——公元前522—486年的古代波斯王。——编者注

③ 萨平人，古代意大利的民族之一。——编者注

④ 卡托（公元前234—149）——公元前195年为罗马执政官，后为监察官。——编者注

⑤ 昆图斯·霍登西乌斯（公元前114—50）——罗马法学家和演说家。——编者注

让他们去惩罚社会主义者——否定上帝及其神的天意的存在的渎神者。

墨守成规的和妄自尊大的人们可能认为这种让私通者和面首获得荣誉的世界历史多少有些荒诞不经和滑稽。然而，假如它不象博胥埃的世界通史那样奴颜婢膝，它无论如何是同样合乎逻辑的。当我用粗线画出它的轮廓时，我是要着重指出唯心主义者的历史哲学的荒谬，而不管他们是崇拜唯一的神或许多的永恒概念（其中包括正义、自由、博爱等等）。

2

神可耻地被逐出自然界。以前曾经归功于他的职能，现在被认为是物质的属性。从十八世纪开始，人们徒劳无益地试图把他从历史中赶出来。凡是百科全书派的无情的批评所到之处，以色列人的天真的神就过时了。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他象一个普通的乡村小警官似的被命令废除了。为了使人民驯服地承担加在他们肩上的重荷，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就着手工作并制造出一批新的神。天主教的神为资产阶级神话的半神——进步、自由、正义、祖国、博爱等神，所代替。他们把被废除了的神的品质赋予新的神，这些新的神是不死的，负有带领人们走向未来的天职。为了完成幻想，他们使这些神具有人的形象，使他们象耶稣和丘必特一样赋有人的形态。但是这些资产阶级的奥林普山上的神失掉了庄严和诗意，——他们比之多神教的和基督教的神话更加荒谬。他们的不合理的和矛盾的实质是引人注目的。

资产阶级的世俗的牧师——哲学家、道德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用自己的谬误、自己的虚伪和自己的欺骗行为起誓说进步神引导人类发展和完善，又说进步神的影响在具有资本主义文明的民族中间表现得最强而有力。然而在进步神统治的一切民族中

间却可看到人类的最可怕的退化现象。而这个意见不是某些心怀恶意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说的，而是资产阶级时代的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化学家尤·李比希^①说的。在实行兵役制的一切欧洲国家里，成年人的平均身量都降低了，他们一般不能服兵役。在1789年革命之前法国步兵的最低身量达到一六五厘米，到1818年（3月10日法律）就降低到一五七厘米，而按1832年3月21日的法律则只有一五六厘米。大部分的应征者由于身材过矮或由于其它生理缺陷的结果一般都被认为不适于服兵役。在萨克森，服兵役的身量在1780年要求达到一七八厘米；现在降低为一五五厘米，而在普鲁士则降为一五七厘米。从1862年5月9日《巴伐利亚报》公布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普鲁士十年中平均每一千个应召者就有七百一十七人不适于服役，其中三百一十八人是由于身高不够，三百九十九人则由于各种生理的缺陷。1858年，在柏林不能征足预备军所需要的名额，——不足一百五十六人^②。李比希关于文明国家里人类退化的这种见解，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达尔文就写道：“贝图医生不久前证明，由于居住城市和某种职业而引起大不列颠的居民身材变矮；这个变矮是遗传的，在美利坚合众国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此外，贝图医生还指出，只有当人种达到最高的身材的时候，它才会达到自己精力和道德力量的最高阶段”^③。进步神引导具有资本主义文明的民族走向生理的退化和道德的败坏。

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对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三个女神充满了如此之高的热爱，以致他们甚至把她们的美好的名字也刻在禁闭室和苦役监狱里。他们以此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平等和博爱同在监狱里一样多。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苦役监

① 尤斯图斯·李比希(1803—1873)——德国著名的化学家。——编者注

② 尤·李比希《化学应用于农业和生理学》1862年版。——拉法格注

③ 达尔文《人的起源》第1卷。——拉法格注

狱：全国的广大群众，不分年龄和性别都关进工场去并且命定承担每天十至十二小时的繁重的劳动，而得到的是不足以糊口的工资。当天主教的上帝还占统治而共和主义的三位一体的神还没有孕育和降生的时候，就是说在1789年前，那时工人们在星期日和节日（其数目有三十八天）享有完全的自由；他们一年有九十天从自己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就是说每四天有一天。但是自从资产阶级的三位女神代替了日历上的圣徒之时起，企业主，不论他是自由思想者也罢，是天主教徒也罢，都取消了节日，强迫自己的工人在星期日工作和吃得更坏，后者的降低的身量就是证明^①。

祖国女神有着妓女的反常的嗜好，——她只同那些打她、抢她和背叛她的人拥抱并把自己的抚爱给予他们。甘必大之流，这些伟大的爱国的政客，把所谓荣誉军团勋章挂到俾斯麦的财政顾问布莱希勒德的胸前。这个亚伯兰的好儿子当讨论赔款问题时向这个无情的胜利者说：“要是你心肠硬一点，要求法国拿出一百亿的钱，——她将会因如此便宜而感到幸运”。这些爱国的金融家输出法国的积蓄和用这些资金来装备在军事和工业方面同法国竞争的国家。这些爱国的工业家从德国、比利时、奥地利订购加工过的材料来破坏民族的生产。这些政治和道德科学学院和经济学家协会的爱国者设法把中国的苦力输入法国，为的是让自己法国的同胞挨饿和降低他们的工资。

正义女神允许和批准企业主抢劫工人阶级，这种抢劫是在利润、利息、地租的名义之下进行的。

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也象以前的耶稣和贞女马利亚一样，曾经服务于和现在还在服务于欺骗人民的勾当，它已开始过时了，而

^① 德-梅勒和卡拉先生重新让基督教社会主义出笼。假如他们不想让他们的教会的社会主义被认为是简单的欺骗，他们就应当首先迫使自己的天主教徒朋友、一切谢加和其他伪君子在自己的工场里给工人恢复星期日和节日的休息。——拉法格注

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则给它以最后的打击。

但是经济学家对我们说，政治经济学的自然规律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观察所发现并被日常经验检查过的真正的规律。这是永恒的和不可动摇的规律。正如不久前的《时报》所写：“社会主义者，很象锉上的蛇，毫无成果地要想磨损锉上的所有锉齿”。所有的博利约和库尔塞尔-塞纳伊，当用给青蛙剥皮的活体解剖家的不动声色的镇静来观察民众的灾难时，他们就穿上了信仰这些自然规律的不可动摇性的法衣。受了这种宗教信仰的鼓励，库尔塞尔-塞纳伊先生本月12日在政治和道德科学学院宣称：“假定事情的确如此，在现有的制度之下贫者应当变得更贫，而富者变得更富。但是从科学的观点，从绝对的、普遍的观点来看，这能证明什么？什么也不能证明。”听一听经济学家先生们说的吧：工人应当顺从地忍受自己的灾难和饿死，而眼巴巴地看着那些他们独力创造的财富。政治经济学的自然规律就是这么下命令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自然的规律是不是果真象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永恒的和不可动摇的。最永恒和最不可动摇的经济规律之一是竞争，这是一切进步、一切经济发展的泉源。但是竞争本身打败自己，因为工业只有靠集中才能发展。现代生产的大企业——矿山、纺织厂、建筑企业、铁路、信贷机关等等，这都是由逐渐消灭成千的生产者的竞争而形成起来的巨大的垄断组织。某些工业部门，例如铸造货币或运送信件，已经废止私人竞争而由国家垄断。为什么勒卢阿-博利约先生不要求让运送信件和铸造货币不碰到偶然事故和竞争的欺诈行为？简单说来就因为资本家过份关心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对他们的自然规律的不可动摇性的信仰是一种有适应性的信仰：刚刚提到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就允许他们厚颜无耻地要求消灭一切竞争的国家干涉。

另一条规律同样也是最不可动摇和最永恒的政治经济学的许

多规律之一，这就是供给和需求的规律。它规定商品的价格，而许多经济学家甚至断言它创造商品的价值；总之，这是推动一切运动的规律。然而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繁荣的社会，其中并不存在这条规律。例如在中世纪，商品价格不是由供给与需求的规律，而是由行会的首领决定的；固然，在经济学家看来，中世纪是处在健全的理性——普留多姆^①的健全的理性之外的时代。但是甚至在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难道供给与需求的规律的作用没有由于侵占的事实而暂时中止过吗？大约在一年以前投机家成功地把法国的煤油抓在自己的手里，——正是他们，而不是供给与需求的规律对这种商品的价格起调节作用；路特希尔德公司握有庞大的起作用的水银工厂，它随心所欲地规定这种金属的价格。难道运送信件的价格是由供给与需求来调节吗？假定由于革命的结果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并使生产资料（机器、土地、银行等等）国有化，供给与需要的规律就立即停止存在，因为产品将不是按照需求的购买手段，而是按照产品的需求和丰富情况进行分配。

断言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正象天文学的规律一样是永恒的和不可动摇的，等于断言经济环境的进化正象星际世界的进化一样缓慢和不明显，等于支持断言我们的裤子和我们的背心的样式是永恒的和不变的那种非常可笑的意见。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和我们的服装的样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随着生产和交换方式的改革而变化。

还有另外一种理论，它也想解释历史事件。它得到人类学家和博学的自然科学家的支持，虽然它也是从凯撒那里起源的，我们说的是种族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赋有特殊品质的特定的人命中注定要布满整个大地和排挤所有其他的民族。可惜的是这个

^① 约瑟夫·普留多姆是法国十九世纪的讽刺画家昂利·蒙尼埃所描绘的一个目光短浅的小资产者的形象。——编者注

理论的发明者们关于这一人种的选择问题彼此之间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每一理论家都认为自己的种族应当当选。因此被宣布为最高人种的时而是斯拉夫人种，时而是日耳曼人种，时而是拉丁人种，时而是蒙古人种。但是力图取代已变得过份狭隘的祖国概念的种族理论，不过是翻新的古董，——就是那失去了自己的朴素的诗意的圣经教义。

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从用上帝的干涉来解释历史开始，不知不觉地象你们看到的那样，带着自己的种族理论又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上去。因为假如不在人类之外和人类之上安设一个上帝，那末另外还有谁能把那些保证种族优越的特点赠予最高的人种呢？

历史哲学在恶性循环里兜圈子，不能找到出路。

如果说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不能发现支配社会进化的规律，那末这是因为他们徘徊在唯心主义的幻想的烟雾弥漫的黑暗中。他们轻视研究人和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他们忽视由这些条件所产生的欲望、需要和利益，他们认为人高于物质条件和认为人应该从自身或从超自然的上帝的身上去找寻自己的行动的原因。按照最后的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者黑格尔的看法，观念在自己与自己对立中和头脚倒置中发展，在发展时就产生出自然的和社会的现象。

假如研究物质条件的经济学家也表现出同样的无能为力，这是因为他们研究经济现象时使用了唯心主义者使用的同样的方法。经济现象和这些现象的规律在他们看来是永恒不变的。他们害怕研究经济现象对人群的影响和人群对这些现象的发展的反作用。他们认为或者假装认为，正如人不能对行星的运动发生影响一样，人也不能对经济现象的发展发生任何影响。

经济现象和经济力量不是不变的。它们是在进化中，而且因为它们是人所创造的东西，它们的变革就比自然现象的变化来得

快，而人只有当他理解它们向什么方向发展，它们的影响如何和后果如何的时候才不再成为它们的玩偶。这时候他就能控制它们和迫使它们为自己的需要服务。

人为自己征服自然。闪电的破坏性的电成为我们的奴仆，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它，——它传达运动和思想，照明我们的夜晚和煮熟我们的汤。

机械的生产使人的生产力增加百倍而且它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的多产的母亲，可是迄今为止对于生产者阶级都只是灾难。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工人阶级的状况都没有这么悲惨和不稳定，而官方的政治经济学的博利约先生们一点也看不到并且否认这点。以前停留在家庭炉灶旁边的男女和儿童的苦役劳动从来没有这么长久和这么累人。然而工作的机器却在减少人的劳动，如英国人所说，它是节约劳动的机器。

经济学家先生们向工人说：低头，驯服地承受自己的命运，因为正象耶稣所说，大地上总是有穷人的，——即使在大地上铺满财富的时候也是如此。

经济学家于是就滑到唯灵论者的愚弄人的宿命论里去，——滑到自我克制和卑躬屈节的宿命论里去。

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使人脱离唯灵论者的宿命论的麻木状态。它向工人高喊：起来罢，研究毁灭你的经济力量，——它们是人手创造的，正如上帝是人脑创造的一样，——你可以控制它们，假如你愿意，——工作机器，这折磨人的可怕工具、便会变成救世的上帝，他使人从繁重的劳动解放出来，他给人以闲暇时间，好去享受肉体的和精神的快乐。

经济唯物主义号召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暴动。它教导说，无产阶级只有粉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式才能获得解放。人类社会只有用炸毁对它已变得过份狭隘的经济形式的方法才能发

展。人的智慧只有在摧毁使他昏昏欲睡的宗教和哲学体系时才能进步,这些东西以前曾经是一种指南,而现在则变为反动和压制的手段。

自从人类走出共产主义的形式,走出这个人类社会的第一只摇篮之时起,人类社会曾在生产方式各不相同的三个经济环境中成长,也就是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中成长。

这些经济环境的生产方式创造了人们的对立的利益并且把他们分为敌对的阶级。人类社会的历史只是构成它们的阶级的斗争的历史。因此,正如恩格斯非常明白地所讲的那样,“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①。

在全欧洲学者都卷入的关于“构造的统一”的值得纪念的争论时期^②,圣伊雷尔对自己的著名的敌人居维叶(他把生物的创造归功于上帝)说:“你的自然科学只是事实的收集……假如不利用它们,假如不用它们来构成完整的建筑,这些材料能作出什么呢?”当在自然以外去寻找自然现象的原因时,的确不能有别的情形。只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② 指1830年间由法国生物学家圣伊雷尔和居维叶引起的一场争论。圣伊雷尔认为各类动物构造图形彼此相似,故用“构造图形的统一”的理论阐明动物进化的原理。居维叶本是认为生物一经“创造主”创造出来就不再有变化,所以反对圣伊雷尔的观点,攻击“构造图形的统一”的理论。这一争论曾在当时各国生物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编者注

当达尔文恢复了拉马克和圣伊雷尔的伟大学说，并且用大量的事实来使它成为不可驳倒的和天才的发现时，唯心主义才从自然史中被驱逐出来，于是自然科学，如圣伊雷尔所预见，就成为“普遍的和哲学的科学”。而它的哲学则推翻全部形而上学的体系。

马克思把环境论引进人类的历史。但是请你不要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唯物主义是近年来那些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达尔文主义者所大力倡导的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庸俗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的作法之一。不是的，马克思是这个学说的始祖。当环境论从1832年开始进入沉睡时，马克思在1847年用法文发表的《哲学的贫困》里表述了自己的阶级斗争的学说。在下一年，即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叙述了社会变革受制于经济环境变革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唯物主义粉碎了历史唯心主义及其愚弄人们的宿命论，创造了历史哲学并训练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作出打开通向新世界——自由的劳动世界的大门的经济革命。

二 自然环境：达尔文的理论

1

一切统治阶级都凭借肉体的和精神的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宗教是迫使被压迫的阶级屈服于羁绊之下的主要精神力量之一。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是一个从属的阶级，它进行斗争以反对得到僧侣支持的贵族阶级，它当时是伏尔泰式的而且甚至向无神论献媚。但是一当它取得政权，它立即就倒戈相向并且急急忙忙重新回到自己祖先的宗教上来；现在它已不再害怕宗教的欺骗，而力图利用它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它用命令来恢复过去曾经也是

用命令废除了上帝，它重新修建被它推翻的祭坛并供养过去曾被自己赶走和迫害的牧师。牧师是最善于逢迎巴结的奴仆。因此，工业企业的所有主陷入最低卑的伪善行为，而天主教的和新教的牧师则用最坏的毒物去毒化工人的思想，是没有什么奇怪的。牧师为那供给他钱的人服务，他把贝朗热的俏皮的叠句诗歌选作自己的座右铭：

不要半途而废地跳舞，
要装腔作势，我的朋友，
为一切人跳舞！

可是基督教的信仰失去了自己先前的大部分影响。为了巩固它和帮助它完成从精神上奴役群众的事业，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想出了新的神：进步、劳动、自由、祖国等等；经济学家发明了自己的永恒的经济规律，把同样起麻醉作用的经济宿命论和麻醉的宗教宿命论结合起来。牧师兼经济学家的马尔萨斯制定了自己的人口规律并宣称说，既然全能的上帝没有为所有的人储备足够的食粮，这就意味着一部分人应当饿死，而另一部分人则因消化不良而胀死。

但是资产阶级发现这个宗教的三位一体（基督教的宗教、自由的宗教和经济的宗教）对于雇佣工人阶级的精神奴役是不够的；它还试图根据科学理论来巩固自己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统治。

不学无术和粗暴的教会大发雷霆诅咒自然科学这些魔鬼的产物，把学者看作巫师和地狱的同谋者放在火堆上烧死。资产阶级虽然同样也是不学无术的，但是更狡猾，知道利用它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它迫使它们为自己效劳。自然科学征服了自然的力量并使它们为资产阶级服务。不久之前发现的两种力量——水汽压和电，——属于使它繁荣的最强大的因素之列。资产阶级已不再烧死学者，而是剥削他们。在大工业企业和大农业企业中，化学家、

工程师和农艺师同普通的无产阶级一样，为资产阶级的繁荣致富而工作。但是它还希望自然科学作另外的服务，它力图把自然科学的最有独创性的理论变成精神压迫的手段。资产阶级想利用一切精神力量来把无产阶级永远钉在它的贫穷生活上。

查理·达尔文，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和最深邃的思想家之一，把拉马克和圣伊雷尔的学说从长期睡眠中唤醒，并在其中注入新的生命，给它带来胜利，——查理·达尔文试图证明社会的不平等是自然界的不能消除的事实。第二流的和末流的学者，他们靠天才人物的观念培养起来正象寄生虫靠狮子的皮培养起来一样，亦步亦趋地追随着他的足迹。他们从自己的脑子里非常勉强地想出一个证据，认为达尔文的理论是对现代社会主义的最致命的驳斥。他们说，在生存竞争中，胜利总是归于最有才能的人，最适合的人。人世间的快乐理应有产阶级中那些毫无用处的游手好闲者的命中注定之事。高踞国家枢要的应当是象梯也尔、麦克-马洪、拿破仑第三这类的非常人物。社会的财富应当归属于各种各样的崩图^①和交易所的奸商的继承的和获得的诚实；铁路、矿山、工厂的股息应当流入游手好闲的股东的腰包。但是贫困和体力、脑力的退化却应当是生产者的劳动、精力和脑力的报酬。

达尔文主义的海克尔辈从博得资本家欢心的愿望出发决心把科学降低到宗教的水平，他们只是证明了社会主义者本来已经知道了的事情，这就是说，在奴颜婢膝方面学者并不比牧师落后，当上世纪的革命者砍断拉瓦锡——现代化学之父而同时又是危害革命的金融投机生意的同谋者——的头的时候，他们是做对了^②。法

① 保尔·欧仁·崩图(1820—1904)——法国金融家和企业家，巴黎股份银行联合银行的创建人。——编者注

② 拉瓦锡(1743—1794)——法国著名化学家。由于他加入“专卖公司”，剥削人民，并与外国干涉者有来往，被革命法庭处死。——编者注

国的、德国的和英国的达尔文主义者想把科学理论变成从精神上奴役群众的手段而没有成功。科学无论在过去和将来总是革命的；它将根绝有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摇摇欲坠的统治而广泛地散播的偏见。人们力图借以从科学上为社会不平等辩护的达尔文学说，事实上却以新的论据武装着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去号召被压迫的阶级起来暴动反对野蛮的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那些播种财富的人反而只获得贫穷，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一切社会的财产都送给最不适合的人，他们忽视、歪曲和蹂躏有机进化的规律。

既然达尔文主义者担负起弗雷佩尔^①在宗教中、甘必大在自由主义政策中和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并且既然他们宣称自然界的规律也象上帝的规律一样注定工人要遭受永久的社会的屈辱，那末我就不得不在我的关于社会经济的演说中对自然科学家先生们施以批评，正如在第一部分演说中我批判地分析了唯心主义者的历史观点和经济观点一样。但是我首先应当概述达尔文学说的优点和缺点。

2

用想象中的神的干涉来解释植物和动物的起源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对于想望天国的极谦卑的人是十分容易懂的。事实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神意有远见地创造了植物给动物吃，而创造动物又是为了给人吃。可是有些事实却同这种可爱的学说相反：动物常常因吃了植物的果实而中毒，而狮子把绵羊和牧羊人一并吃下去的事发生了，但是这是不值得重视的细微末节。当地质学从地层下发掘出来已死去的动物的骨骼和遗迹，从中可以看出

^① 弗雷佩尔(1827—1891)——法国天主教主教，从1881年起是议会中牧师派的首领。——编者注

现在存在着的动物种的粗略轮廓时，这就给一般公认的概念带来了某些混乱。那些承认“每一现存的种都是神灵的具有形体的思想”的学者例如大自然科学家阿加西斯^①宣布说，翼手龙以及其他古生动物都是“先在形成的类型”。解剖学家欧文^②说，原型观念远在那些可以充当它的模范表现的动物种出现之前就以各种不同的形态体现在我们的行星之上^③。阿加西斯的先在原型和欧文的原型观念，在达到现代动物的完善状况之前体现在彼此交替的和不完善的形态里，实质上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十八世纪的粗糙的和朴素的观点的大吹大擂的旧调重弹而已。当时人们说，上帝预先塑造了动物的形态，而后在其中注入生命；古生动物是上帝丢弃的和没有赋予生气的失败的蓝图。因此古生动物证明全能的造物者的技拙。

神学的创造论的荒诞不经，随着它应用的范围的扩大而变得愈益滑稽可笑。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④认为自然界里到处有上帝的手指，他发现甜瓜和南瓜的棱本身就包含着神灵的某种思想：它们告诉家长如何在自己的儿女之间分甜瓜，而南瓜的更多的棱告诉他如何同邻人共享南瓜。这个善良的上帝是多么热爱人类呵！他教导说需要在家里吃多汁的甜瓜，而同时又慷慨地把一片一片的南瓜分给朋友。

科学的胜利使创造论的阵地愈益困难。在中世纪，神学家议论亚当有没有肚脐，正如我们的经济学家议论经济利益的和谐一

① 阿加西斯(1807—1873)——瑞士自然科学家，宣扬唯心主义灾变论和神创造世界的思想，是反对达尔文学说的人。——编者注

② 理查·欧文(1804—1892)——英国比较解剖学家、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编者注

③ 欧文《翼的本质》1849年版。——拉法格注

④ 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卢骚的信徒。——编者注

样地详尽和严肃。一部分人说，上帝不会造出什么不需要的东西；但是肚脐对亚当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不是妇女生的。因此，他没有肚脐。另一部分人反对说，上帝不会造出什么不完全的东西，但是亚当没有肚脐就不完全；因此，他有肚脐。我们的好开玩笑的拉伯雷^① 迫使自己的醉鬼争论喝酒的概念先出现，还是想喝酒的愿望先出现？神学家同我们的经济学家一样有很多的闲暇去进行无谓的口角，假如他们知道了解剖学上发现人体中有这么多无用的器官，他们就会大吃一惊；关于这些器官的争论就会无休无止地吵下去。

若·圣伊雷尔在自己关于鸵鸟翅膀的论文中说：“这些锁骨的萎缩器官并没有消失，因为自然界任何时候都不作迅速的飞跃，而常常留下器官的痕迹，甚至当它成为完全多余的时候，只要这个器官在同科的另外的种的身上曾起过重要作用的话。例如在食火鸡的两侧的皮下可以找出翅膀的痕迹；在人的内眼角可以看到一块粗皮，它被认为是许多四足类和鸟类都有的眨眼的薄膜的萎缩器官”。有些器官在人身上由于它们无用而萎缩，但在动物身上却因练习而发展，这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人是这些动物的后代，他不善于或不能把动物的遗产完整地保存下来。

不久，另一种新科学，胚胎学，揭露了更加惊奇的事实。唯灵论者赋予尾部的附属物以巨大的意义；照他们的意见，尾巴是把人从其余动物区别开来的器官，在他们看来人身上缺尾巴是人的优越性的外部标志。全靠尾巴来决定的可怜的优越性！有一次他们为人来源于上帝的如此宝贵的证据感到难受的恐怖；某些旅行家说，他们在非洲的腹地遇到带有这个雅致的和有用的附属物的黑人。可是以后弄清楚这只是一种装饰，上面提到的黑人把它带

^① 拉伯雷（1494—1553）——法国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巨人传》。在他的作品中对黑暗的封建势力和教会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抨击。——编者注

在背后，象我们的美女带着撑腰架一样。而且唯灵论者也不必太高兴，——胚胎学证明假如人没有尾巴，那末只是由于失掉了尾巴——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母腹里。实际上，在人的胚胎上尾椎骨是自由地下垂的，象真的尾巴一样。人体上除了某些部分之外没有毛也被认为是人的特征的标志，但是现在知道人的胚胎在六个月以前是长满了毛的。现在没有人否认人也象猿猴或狗一样是从卵中生出来的，而且在自己的胎内生活与其他的动物种很相似，他也经过动物的发展阶段，只是形态更完整而已。

人的发展也象一切其他的动物一样，显然是那些在生物的序列上先行于他的动物的发展阶段的简单的再现；或者把它归结为：低级的动物种只是高级物种的发展阶段^①，正象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只是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已。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天空的壮丽和自然界的美丽使上帝的光荣愈来愈暗淡；但是仍不缺乏证明他的万能的怪物。曾经是无神论者的沙多勃利昂^②在自己的《基督教的真谛》里勇敢地写道：“怪胎正是无神论者所讲的引起宇宙产生所必要的那些意外事故的规律的例子。上帝容许它们是为了向我们指出，要是没有他，人将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圣伊雷尔从上帝身上夺去他的万能的这个证据，他指出说怪胎不是超出自然规律范围之外的什么东西，在怪胎的机体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变形的不完全，由于变形的结果，它本来应当过渡到自己的正常的类型，怪胎只是停止发展的类型。

当胚胎学揭露了动物的进化过程的时候，对发达的机体的研

^① 谢尔在自己的《脑的比较解剖学》里说“鱼就自己的许多器官来看是较发达的动物的始终存在的胚胎”。——拉法格注

^② 沙多勃利昂（1768—1848）——法国作家，在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积极参与保王党行列。他的《基督教的真谛》是一部反对十八世纪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著作。——编者注

究表明,这一个或那一个器官不论采取什么形态,它总是由同样的一些因素组成的,虽然有时这些因素变得不能辨认。例如螯虾的上层的甲壳是它的骨骼,它的骨骼是长在外面,而不是长在身体内部。母袋鼠的袋是皮的一层很深的皱折,象的长鼻子是鼻孔的过度延长的结果,犀牛的角是长在一起的毛发积聚起来的。亚里士多德就已注意到“羽毛对于鸟来说,正如鳞片对于鱼一样,因而可以拿羽毛同鳞片相比,同样也可以拿动物的骨头和鱼的骨头相比,拿指甲和角,手和河虾的螯相比。因此构成个体的各部分既是相同的,又是有差别的”^①。

所有这些新的事实都推翻了创造论并产生出新的观念,奥肯^②把它概括为:“人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发展过程的结果。”

3

上帝的假设既然被推翻,为了解释生命的现象就必须诉诸物质力量的作用,必须把植物和动物的产生及其变化归因于象圣伊雷尔所说的**环绕世界**的宇宙环境的作用。从上帝这个造物主的观念出发可以断然解释一切,而无需过分绞尽脑汁: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用自己的血去喂跳蚤和臭虫,工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寄生虫提供世俗的福利,房客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带来房租,而房东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把房租放进口袋,如此等等等等。但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废除这些方便的和有说服力的解释。可是,在奴颜婢膝方面不亚于僧侣的现代自然科学家,却失掉了那种使信徒如此漠不关心地沿着糊涂的道路行进的极美妙的愚昧无知;他们不得不仔细寻找有机体进化的基本的自然的因素,但又并不希望完全理解一切现象。查理·达尔文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这些因素中

^① 亚里士多德《动物史》。——拉法格注

^② 奥肯(1779—1851)——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编者注

的某些因素并指出它们在物种形成中的作用。

达尔文有幸生在畜牧业的典型的国家。他发觉家畜经过多次的变化，这些变化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由养畜家人工地加以巩固。赫胥黎举了以下的典型例子。马萨诸塞州的绵羊很会跳；没有一个篱笆它们跳不过去。农场主毫无办法，不知道如何才能圈住它们。有一次，一头母绵羊生了一头短腿的绵羊。羊群的主人自言自语说：现在我知道如何同我的绵羊的爱跳的性情作斗争。他细心地抚育短腿的绵羊，并利用它们作为配种的公羊。经过几年，所有他的羊群都变成短腿的绵羊，失去了自己的祖先的跳跃的能力。他的邻人效法他的先例，于是现在在美洲有短腿的绵羊的品种，正象我们这里有短尾巴的狗的品种一样。

这样的现象在野兽中也能看到。母狼和母家兔的幼兽虽然很相似，但是完全不一样，它们彼此之间有相当显著的区别。最贪食的，就是吃妈妈的奶比别的吃得久的，成长得较快并且较快学会躲避危险和为自己找获食物。它有更大的可能性达到成熟的年龄和生产后代，并且也有更大的可能遗传自己的贪食，保证后代也有自己的优越性。野生的公火鸡很会走路，母火鸡带着它们走很远的路。没有力量作这种旅行的小鸡雏便会落后和死掉，而年轻力壮的公火鸡有坚强的肌肉，忍受得了紧张，并把自己的优点传给后代。在自然界里既没有道德，也没有善心，也没有理智，——它的盲目的力量无情地消灭弱者而把生命只留给强者。

使动物比它的敌手优越的这一个或另一个器官的最不明显的变化保留了下来，并且一代传给一代，愈来愈加强。作为进攻武器的狮子的利爪和象盾牌一样保护它的胸部的多毛的鬃，其起源都可以这样来说明。动物获得它们在其中生活的那些对象的颜色；变色蜥蜴是绿色的，象树叶一样，虱子是灰白色的，象头发下面的皮肤一样。颜色的这种相似保护它们躲避敌人。假如雌鸟也象雄

鸟一样有着这样华丽的羽毛，那末当它们不得不停留不动孵小鸟的时候就很容易成为鸟类强盗的俘获物，如此等等。

因此，我们看到在野生动物中存在着**自然选择**：在生存竞争中最有用的、最能适应于自己的自然环境的获得胜利。自然选择和**人工的**，即由人所引起的选择的**不同之点**是在于：人选出和发展动物的这一个或另一个特性时，他注意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且甚至常常牺牲动物本身；例如由家养小猪喂肥而生出的油脂对它们是有害的。而自然选择只保留对动物有益的特性。自然的力量是非理性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的作用的结果却是合理的。

可是在自然界也有合理的力量在起作用：凡是哪里有选择的位置，那里就应当作出决定，必然会有意识的活动。在草地上和花坛上飞来飞去的蝴蝶在落下之前先要选择花朵，我们的幸运是它们也象我们一样爱颜色，因为正是它们保留了和改善了花的鲜明的色彩。事实上，当它们从这花飞到那花时就分送结实的花粉，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最鲜明的花朵最受它们光顾。在鸟类中间美的感觉也是非常发达的。雄鸟服侍雌鸟，在它面前昂首阔步并且炫耀自己的漂亮的羽毛。猿猴，这些动物界中人类最接近的祖先，把自己的用采色花圈装饰起来的臀部在自己所钟情的雌猴面前炫耀。库辛先生，这就是美——这个上帝的高尚的特性——的所在！

假如植物和动物不具有比一切宗教的秘密更神秘的某一种性能——遗传的性能，它们就不能发展，正是这种遗传性能使它们得以把它们所获得的特质传给后代。一切有机体都是自己祖先的特质的蓄電池，——它从它们那里取得、保留和继承甚至它们已经不使用了的这样一些器官。

自然的和性的选择，达尔文的这个天才的发现，不能提供解释一切生命现象的钥匙。其中有许多就无法用它作解释，而达尔文就是第一个准备承认这一点的。我只举一个例子：鸚鵡的非常软

的发音器官无论如何不能就其自然状态加以利用；它的惊人的能力只是当鸟进入人类社会之时才显露出来。

为了理解甚至是某些有机生命现象的最一般的特点，也必须研究器官平衡的规律，圣伊雷尔称之为器官从属的规律，而居维叶则概括为：“每一有机体都形成统一的、完整的和与外界隔绝的体系，它的各部是彼此适应的而以自己的协同动作产生一个共同的动作。如果不是同时改变其余的部分，则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改变”^①。例如在引起牙齿运动的颞和肌肉上，在牙齿依托的颅骨上，在颈和腿的骨头和肌肉上，在动物吃东西的方法上，因而在它的肠子的长度和形式上，总而言之，在它的身体的所有部分若不引起或大或少深刻的变化，动物的牙齿的形式便不能变化。这些器官的形成象鸚鵡的声带一样很可能是它的爪、翅膀和其它的器官变形的结果，这些器官之所以必须改变，是为了适应外界的条件。

假如所有的有机体形成一个体系，其中各部分是如此紧密地彼此联结在一起，若不触动所有其余的部分，则任何一部分也不能改变，那末宇宙环境同它的动物群和植物群也形成一个庞大的、无穷的体系，而且其中的各部分也同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若不影响在宇宙环境中生活的动物和植物，宇宙环境就不能改变，反之，若不影响自己的宇宙环境，动物和植物便不能改变。例如森林对地区的温度，对它所得到的水分的数量和对它的植物土壤的形成发生一定的影响。达尔文注意到由最微小的生物和最平凡的原因所引起的后果。吃土的蛆制造黑土并使它暴露在外面，同时把掩盖它的小石头埋藏在自己的线状的粪便之下。乡下老姑娘对母猫的爱间接地对空气的湿度发生影响，因为母猫要吃掉田野的老鼠，

^① 居维叶《论地球表面的变革》。——拉法格注

使老鼠不能破坏蜜蜂和胡蜂的蜂房，让胡蜂和蜜蜂去传播花粉因而促成植物的结果和繁殖。因此，假如周围环境决定自己的植物群和动物群，那末，反过来，植物和动物又再造出赋予它们生命的宇宙环境。正是在有生物对自然环境发生影响的这些事实面前，经济学家可以大大方方地断言说，人们任何时候也不能改变完全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经济环境的规律。

处于同一环境中的植物和动物，由于相邻的关系彼此发生影响，正如同一体各部分彼此相互影响一样。康德已经注意到森林里的树木不象种植在开阔的田野里的因而不能挡风的树木那样生得矮小和弯曲。森林里的树木彼此互相保护，整齐有序地向上生长去寻找空气和阳光。植物学家涅格利发现成群生长的植物比其余的更容易改变。他说：“某些阿尔卑斯的植物彼此变形，而且呈现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特殊的社会类型，它们在不同的丛中，从而在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这无可争论地证明它们的形态改变是从它们的结合之时开始的。”

有机体彼此之间的交互影响在动物中比在植物中更强；它改变它们的器官并从它们身上引起反自然的和直到现在尚不为人所知的心理上的特性。人所共知，动物中的母爱是如此强烈。假如雄的丢掉自己的幼仔，象有产者丢掉自己的私生子一样，假如它们有时甚至吞掉它们（强奸自己的工厂女奴的工厂主以剥削她们感到满足），那末雌的相反地却保护自己的幼仔，关心它们，而昆虫的雌性甚至拿自己的身体去喂它们。但是蜜蜂的雌性，作为蜂房之母，却亲自杀死自己的女儿，为的是不要引起蜂房中的紊乱。它们牺牲自己的母性的感情是为了集体的安宁。在相同的感情的影响之下未婚就当母亲的姑娘也杀死儿女，她们不想扰乱人心和引起自己的朋友和熟人的道德上的愤懑。

社会的联系压制甚至扼杀为了保护生命比母性爱更需要的其

他的感情，——这就是个人的利己主义，它在动物中间，象在最文明的有产者心中一样，得到如此疯狂的发展。在猿猴、象、水牛中间，——在一切群居的动物中间，最强的雄性常常奔赴有危险出现的地点，并且牺牲自己去保护幼仔、雌性和集体中所有较弱的成员。

你们可以看到，在自然界中对生命的创造和发展起过作用和正在起作用的力量是很多、很不相同的。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这里把它们完全都列举出来，正如自然科学家不认为自己能把所有这些力量都发现出来一样。但是当这些先生们丢掉自己的科学方法而退化为社会学家（这名称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对他们倒很适合，——因而它也是够拙劣的）时，他们忽视在自然界里起作用的各种各样的力量，而只保留着一个竞争，生存竞争。他们阉割自己的科学，为的是使它成为替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武器。

自然科学家所宣传的生存竞争只是经济界所发生的事情在他们头脑里的反映：它只是把经济学家所崇拜的工业的和商业的竞争移到植物界和动物界。至少达尔文是意识到这点的：在他的《物种起源》里他公开承认关于自然选择的思想只是在读过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著作之后才在他的脑子里产生出来。当把自己的生存竞争搬到社会科学中去时，达尔文主义者，自以为是这样的机灵鬼，只是把他们所借用来的东西交还回去，并用自己的方式复述经济学家的学说；他们没有料想到他们的建立在生活竞争事实上的物种起源的新理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的辉煌的证实，因为正是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教导说，宗教的和哲学的体系植根于经济的底土里。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达尔文主义恰恰产生在英国，在这个国家里，经济竞争达到了自己的最高度的发展，它在这个竞争占统治的国家里获得这样的胜利，并且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他们借助这种工具来为社会的平等辩护和假自然的名

义使工人注定遭受贫困和退化。

4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声名狼藉的生存竞争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或从社会的观点看来究竟有什么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靠它的帮助不能解释许许多多的现象（鸚鵡的声音器官，反母性的和反利己主义的感情等等）。但是，使最适者能继续生活的生存竞争或许常常是机体的进步的原因罢？胜利归属于最能适应周围环境的动物，这是无可争论的，但是最能适应的动物是否常常又同时是最有才能的、最发达的呢？是否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就是说恰恰是那种不能适应于恶劣的生活条件的精细地组织起来的生物总是被战胜和死掉呢？达尔文指出了这种情况。雷·朗凯斯特^①彻底地阐明了它的意义。他写道：“自然选择常常在减少它们的身量方面影响这一种或另一种动物，这是毋庸置疑的。既然某些动物的小身量有助于它们的延续生命，因此它们中有许多就缩小到显微镜下的尺寸。但是这种缩小达到极限时就会引起某些最重要的器官的消失。很小的动物的需要同大动物的需要比起来是有限的。心脏和血管、鳃和肾脏、甚至腿和肌肉常常被较大品种的缩小了的和退化了的后代丧失掉。”^②雷·朗凯斯特举出蜥蜴和多苔藓虫硬体等等作为这种退化的例证。由此可见，甚至在动物界里生存竞争并不总是导致进步，有时反而是衰颓的原因。

让我们来看看它在人类社会里的作用又是怎样的。

野生动物在个体上从它所获得的特性得到好处。关于文明化了的人能不能这样说呢？南非洲的牡绵羊获得在自己的尾部积蓄

① 雷·朗凯斯特(1847—1929)——英国形态学家。——编者注

② 雷·朗凯斯特《退化：达尔文主义中的一章》1880年版。——拉法格注

油脂的能力，霍屯督族^①的女人在自己的乳头积蓄油脂，——两者都是在饥饿时靠这油脂作养料。农人生产的粮食比他一年中所能吃掉的多，但是既然他不能把粮食的多余部分储存在自己的皮肤之下，因此他就不能在饥饿时享用它。既然蜜蜂要交出自己的蜜，农人也不得不把自己的粮食交给偷窃他的地主和其余的强盗。

利齿和铁爪对于狮子来说是劳动的工具，就是为自己获得食料的手段。狡猾是狐狸劳动的工具。但是既然这些工具成为它们身体的组成部分，那末就不会被其他动物用来转而反对它们自己。相反地，人类制造的武器就不是他们的不可分离的部分。他们的脑子的思想可以同脑子分开而物质化在书里，在机械发明里，在化学发现里等等。人的武器和思想可以为资本家据为己有，后者把它们用来反对它们本身的创造者。发明危害着发明家，但是使工业家和资本家发财致富，他们除了发明偷窃发明家的艺术之外什么也没有发明。铁路给那些日夜辛劳的修路工人很微薄的工资，但带给股东优厚的红利，股东的全部劳动可以归结为收利息。

因此，达尔文主义者先生们所宣传的生存竞争不能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人同动物和植物比起来是生活在另一种条件之下。

达尔文成功地把一种经济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搬进自己的科学。但是当达尔文主义者回过来把自己的关于最适者生存的学说硬拉进社会科学时，却遭到惨败。他们对社会科学的了解，正象樵夫对植物学的了解一样。人是动物，对此我无异议。建立在经济竞争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兽性的社会，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是这还不足以证明生存竞争在人类中间起的作用同在公火鸡和牡蛎中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① 霍屯督是西南非洲的民族之一。——编者注

在人类社会里，自从他们走出原始共产主义的范围之时起，生存竞争就体现为双重的形式：个别的人之间斗争的个人形式和阶级斗争的集体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功绩之一就在于：他们从1847年起就对人类的生存竞争的这两种形式进行详细的分析。

三 人为的环境：阶级斗争的理论

1

人生活在双重的环境里：在宇宙的环境或自然的环境里和在经济的或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人为的环境里。这两种环境的共同的作用和反作用决定人和人类社会的进化。

当人仍旧是一种有机生物，以其某些性能和习惯同其他动物刚刚分开来的时候，可以把他看作是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力量的直接产物。

史前时期的人类，石器时代的人类，如我们在比较大洋洲、美洲和非洲现存的野蛮部落而得知的情形一样，他们只是感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其实，他们完完全全生活在自然里，他们赤身露体来来去去，在寒冷的地区他们有时也在脖子上系块兽皮，或者在前面或者在后面，视风向而定。他们不会使用金属，几乎不知道用火；他们用树枝为自己构筑住宅，象黑猩猩一样；在他们身边，象在猿猴身边一样，除了石头和木棍之外没有其他的工具和武器；他们还没有学会制作瓦罐来做饭。他们的语言是如此发育不完全，以致其中没有动词“是”，也没有象“树”、“花”、“热”等这样一些类概念的标志。他们的智力的发展是处于如此低的阶段，以致他们不会计算三或四以上的数字。在解释这些原始人种的形成上，自然科学家可以只限于对自然力量的作用的考察，象他们在解释其它

动物种的形成时所做那样。生活的竞争，生存竞争，象我们在动物中所看到的，也是原始人类的生活规律。为了捕获野兽，为了夺回和带走雌的，他们施展自己的手和脚的弹力和力量，他们用牙齿和指甲撕裂自己的敌人；最强的、最机灵的和最能干的成为胜利者。

但是这种动物的生存竞争还在史前时期就改变了样式和获得新的特点。从人们学会冶制金属之时起，从进入青铜时代起，人们在自己的战斗中不再只是使用自然的武器；这时他们有了人造的武器，因而胜利常常不属于较强者，而属于有最好的武装者。因此，许多人类学者认为，生活在欧洲的石器时代的人们曾被来自东方和知道使用青铜的其他人种所消灭和排挤掉，是确实无疑的。为了证实这个观点，他们指出不论在哪里——在爱尔兰、在苏格兰、在挪威、在德国等等——遇到的青铜的剑，不仅相似，而且基本上完全一样；可以设想它们是同一个工匠铸造的。它们的唯一的差别是在上面雕刻的装饰；在丹麦所发现的青铜剑装饰的是螺旋纹，在南方发现的是直线纹和圆圈纹。所有这些剑都装了不大的柄，由此可以想见，持有这些剑并且战胜了石器时代的人们的那些人，手是很小的。

在史前时期发生过的事情在我们的时代还在重复。当某个斯坦利、布拉柴^①或任何其他一个文明的强盗去与刚果黑人作斗争时，胜利的不是两个敌人中较强、较机灵和较勇敢的一个，而是左轮手枪和火药。在工业的战场上情况也是一样的。当手摇织工和大企业的织工为市场而进行争夺战时，胜利不是属于精力较旺盛的、较爱劳动的和手较巧的工人，而是属于机械车床和蒸汽的动力。因此，在人类的社会里发生的情形和在动物中不一样：为人们

^① 斯坦利(1841—1904)——英国人；布拉柴(1852—1905)——法国人。两人都是以“探险”为名到非洲去的殖民主义者。——编者注

保证胜利与其靠他们的自然性能，不如靠他们的劳动工具和他们的武器。可以说，为生存和进步的真正斗争不是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在他们的人造的器官之间进行。带着植物和动物之间竞争的特点的这种工具和武装的竞争因而就成为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这样惊人发展的原因。

当两个用同样高度技术设备装置起来的工厂彼此为市场进行斗争时，它们利用自己的工人来搏斗。它们争先恐后地降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日；它们用女工和童工来代替男工，用简单的粗工来代替熟练的工人。主人们为生存的这个斗争既没有提高两个竞争者的肉体的质量，也没有提高他们的精神质量，而只是引起工人阶级的肉体的衰颓和精神的与道德的堕落。

出自动物界的在人们中间的生存竞争因此带有另外的特点和引起植物和动物中的斗争所没有的另外的后果；因此谁想弄清人类的进化，就应当分析人们所经过的人为环境及其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双重环境，自然的和人为的环境，不是不动的，不是常常平衡的，它是经常变动的。

地球形成的历史告诉我们，自然环境是在进化中。依据这个宇宙进化的事实，圣伊雷尔发挥了自己的物种形成的理论；例如，对爬行动物之转化为鸟类，他是用大气的化学变化来解释的，因为大气中充满氧气使温血动物的生存有可能。但是宇宙环境的进化是缓慢的，要出现一种重大的改变就需要几千年，因此动物种和植物种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没有变动的，因为给予它们生命的条件变化是不显著的。反之，人为的环境进化却很快，因此人的历史同动物的历史比起来则表现为这样剧烈的和多样的运动。各种不同的人种之间的巨大的差异，可以用人们在其中实现着进化的那人为环境的差别来解释。巴黎人在自己的智力发展上同火地岛土人的

差别之大远远超过各种狗和猿猴彼此之间的差别。

2

人不是为自己创造特殊的人为环境的唯一的动物。某些动物种(海狸、蜜蜂、蚂蚁等)也为自己创造人为的环境,这使它们有可能达到为其他种所不知道的那样的发展程度。

伟大的古代的医生切尔斯^①在一千八百年前写道:“假如人们以为自己同动物的区别是在于他们会建筑城市,颁布法律和设立政府,那末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蚂蚁和蜜蜂也会做这些事情:在它们中间也有自己的王,它们保护它和为它服务,也有自己的战争,自己的胜利,自己对战败者的惩治,它们也有城市和郊区,严格规定了的劳动时间。它们杀死和追捕昆虫……假如某人能够从天上看地上,他会看出人的事情与蜜蜂和蚂蚁的事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在切尔斯之后曾有过许多耐心的研究者,研究这些小动物的习惯。

蚂蚁窝是自然的真正奇迹之一。福莱尔^②说:“它们的显著特点是在于缺乏不变的形态——即每种的特殊形态——,象我们在胡蜂房和蜜蜂房中所看到的情形那样。蚂蚁懂得使自己的建筑适应于环境和因地制宜使用地形条件。”它们筑墙和竖柱,架梁和铺板,一层之上又盖一层,曾经发现有的蚂蚁窝数达四十层。在塞内加尔如此众多的白蚁巢穴高出地面达三米到六米,而且建筑得这么牢固,可以承受一个成年人甚至一条水牛的重量。它们通过三十厘米宽的地下通道与外界发生联系。人们的建筑同这些小昆虫所修建的东西比起来又算得什么呢?假如我们拿这些建筑的高度和宽度同它们的建筑者的身量比一比,人的手所做出来的事情在

^① 切尔斯是一世纪时古罗马的学者,写过关于医学的著作。——编者注

^② 福莱尔(1848—1931)——瑞士昆虫学家。——编者注

我们看来是滑稽可笑的。金字塔如果按照这样的规模修建起来，应当有一千米高。然而人类建筑中最高的古迹希奥普士^①的金字塔只有一百四十六米高，斯特拉斯堡教堂只有一百四十二米高，圣雅克塔只有五十八米高。

在蚁窝里有粮仓，其中储存着由群体收集来的谷物。蚂蚁去掉谷物的皮并把它丢出去。还没有发现它们如何防止谷物发芽的秘密方法；当谷物发芽的时候，它们懂得及时加以制止。在阴凉的地窖里它们保藏着剁碎的树叶，供给它们非常喜爱的小小的蘑菇。有的人甚至断言说在得克萨斯有一种特别的从事农业的蚂蚁，善于耕地和种地；但是这个事实还没有得到科学上的证实。

谁会想到蚂蚁也从事畜牧业？——千贝尔扬声说。真有这样的事，蚂蚁从事畜牧业。它们繁殖供给它们甜的分泌物的蚜虫群，它们的这些母牛越多，蚁窝里的福利状况就越高。它们在树干上构筑小仓库来存放草虱子；它们在地下和在根下构筑另外的小仓库。搬家的时候它们就带着一起走。秋天它们收集它们的卵子并且细心留意着幼虫的出现，阿杜邦看见过一种蚂蚁会利用芽虫来作耕畜；它们强迫芽虫在排成两排的监视者之间拖运剁碎的树叶，而在完成这件工作之后又把它们关进蚁窝里去。

在原始的人类社会里只作了胆小的最初几步的劳动分工，在蚂蚁中已发展到非常之高，并且在同一蚁窝的居民中造成了这么大的差别，以致人们可以把它们认作不同的种的代表。再生产的职能由几个雄的和—一个雌的来担负。人们想在动物中找出自己特有的社会组织，就称这个雌的为女王，然而事实上她根本没有什么君权的属性。无性的蚂蚁关心着她，喂养她，但是同时又机警地监视着她并且常常逮捕她，这些无性的蚂蚁是蚂蚁中的主要群众并

^① 公元三千年前埃及的法老。——编者注

分为战士和工作者。

在蚁窝中统治着的是最严格的共产主义。这里面的劳动是自由的。蚂蚁带着一种永不衰歇的热情进行劳动。所罗门拿它们作榜样来教育自己属下的犹太人。“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①在蚁窝中一切都属于大家。在蚂蚁中共产主义的感情发展到这样的高度，甚至已经采获到手的口粮在某时期内都归整个社会支配。蚂蚁的消化管道分为两部分：其中的一部分，前面部分，好象是整个蚁群的小仓库，——拉长的食道形成象嗉囊样的东西，其中存放大量的液体食物。在需要时蚂蚁就把这液体吐出来供给年轻的伙伴、幼虫以及不懂得为自己获得饲料的雄蚁吃。在某些澳大利亚种身上这个特性被利用来把一定数量的蚂蚁变成真正的储藏的盆：把它们填满液体食物，使它们必须保存好，而在需要时又要它们吐出来。

秩序和和谐不仅统治着蚁窝的内部。有时也同其他的蚁窝建立和平的对外关系，虽然一般说来它们之间经常进行剧烈的战争。福莱尔在日内瓦郊区的一块平原上曾看到一个蚂蚁部落，由一百多个群组成，过着完全和平的生活。在北美洲的某一地点库克曾发现一千六百到一千七百余个圆锥形的蚁窝，高达二到五英尺。所有它们的居民都处在最亲密的关系中，任何时候都不互相攻击，而团结起来防御外敌（蜘蛛，蛇等等），并在建筑和修理住宅时彼此互相帮助。这是蚁窝的联盟。

以上所举的事实（我还能举出许多其他的例证）证明智力发展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以致达尔文完全有权说：“蚂蚁的脑子是有机物质的最令人惊奇的部分之一，甚至比人脑更令人惊奇。”

^① 《旧约全书》，《箴言》第6章第6、7、8节。——拉法格注

智力发展的这种罕见的高度水平，自然不能用达尔文主义者先生们的生存竞争来解释，而应当用蚂蚁所创造的人为环境的防护作用和教育作用来说明，这环境消灭蚂蚁内部的一切斗争、一切个人的竞争和只留下整个群体同周围世界的集体斗争。

3

最新的历史研究证明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在其中形成的第一种经济形式。即使现在在亚洲、在大洋洲、在非洲甚至在欧洲还有一些民族除了对自己的小房屋及其附属的小园地的所有权之外，不知私人的土地所有权为何物。一切其余的土地都归整个公社集体所有；可耕的地段在各个家庭之间，有的一年重分一次，有的三年或七年重分一次，视地方习惯而不同；森林和牧场是不可分的财产。财产的这种集体形式所引起的这种社会的和家庭的组织，我们在建立在第一种所有权之上的任何别的社会里是碰不到的。在实行集体所有的民族当中，尽管有种族和气候条件的差别，我们却可以找出同样的恶德、贪欲、美德以及相似的习惯和思想方法：人为的环境消灭着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多样性。例如盗窃，这是生活在私有制条件下的文明的有产者的最主要的美德，而在原始公社中间是人们所不知道的。这些公社的一切成员都从事生产劳动；他们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强迫别人为自己劳动，并且也不从他手上去抢夺他所制造的一部分产品。大家都自愿彼此帮助，并不考虑有没有报酬。在俄国，在印度，我们看到当某个农民的家庭来不及收割自己的地段上的庄稼的时候，其余的家庭就跑来帮助它，除了共同喝酒之外，不再期望另外的酬金。在这些原始的公社里不存在什么法律；他们不知道我们所称为法庭、权利和义务的这些东西。他们只服从习惯和传统，习惯的破坏者所受到的唯一的惩罚是社会的谴责；在某些印度的公社里犯罪者有时被罚自费负担供

给一定数量的饮料，然后由全村人一起喝掉^①。

无需靠所谓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的任何一种惩罚制度（警察、审判官、刑法典等）的帮助，在原始的社会里存在着稳固的秩序和完全的和谐。虽然，事实上，他们也象蚂蚁群一样彼此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中。一切外来者在他们看来都是敌人。这种思想趋向主要表现在拉丁字 *hostis* 上面，它同时指**敌人**和**异乡人**（法文 *hôte*——客人和 *hostilité*——敌意，都是由拉丁文的 *hostis* 而来）。

只是因为原始人类社会是在压制一切个人的利己主义、一切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的人为环境中发展起来，所以人才能超出动物的状态。

只是当财产的集体形式开始瓦解和社会分裂为有敌对利益的各个阶级的时候，人类社会内部的斗争才发生。但是在社会内部的生存竞争任何时候也不采取在动物界和植物界所观察到的那种形式，而主要之点是它任何时候也不导致那里发生的同样的结果。

在蚁窝中为了执行维持蚁群生活所必需的职能，蚂蚁就分为等级、分为阶级：再生产者阶级（雌的和雄的）和无性别的阶级，后者又再分为战士阶级和工人阶级。一切工作的执行都落在后者身上；而其余的阶级则只是必须关心蚁群的再生产和保卫它。在蚁窝中存在着这些不同的阶级对它是非常有利的。同一公社的成员这样分为不同的阶级或等级，我们在人类社会里也能找出：不再关心自己的食物的阶级常常一开始就执行某种对公社的生活所必需的有益的职务，公社则供给他们生活资料。在音节文字发明以前

^① 英国著名的法学家乔治·梅恩先生写道：“最古老的酋长会议从来也不指示什么东西，——它们简单地解释说自古以来就实行某一种秩序——就字面的法学意义而言在那里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在印度的公社里一个人遭到暴力时，他并不抱怨个人的受辱，而是抱怨整个小小的社会秩序的被破坏。更奇怪的是习惯法不知道惩罚的措施。在那个几乎不可思议的场合，假如某人拒绝服从会议的决定，对他的唯一的无疑的惩罚只是一般的谴责。”（《东方和西方的农村公社》1871年版）——拉法格注

的时代，在犹太人、印度人、埃及人、高卢人等的神权政治里，僧侣是传统和积累起来的知识的保存者。他们管理社会的财产和执行对工作的总的监督。欧洲和亚洲的封建贵族的秩序起初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农民私有者服从于封建领主的政权并且有义务向他以实物或徭役缴纳租税，以换得庇护和防御周围许许多多敌人的侵犯。领主必须要有坚固的城堡，农民当受到攻击时，可以在这里面掩护自己的家畜和收获物；此外，领主还必须维持一定数量的武装人员来保护自己的城堡免受攻击。恩格斯非常正确地看出，“分工的规律就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基础”^①。

可是摆脱了劳动的高等阶级往往滥用自己的特权地位，而这种滥用愈来愈成为有害的和不能忍受的，以致他们过去曾经担任过的有益的职能由于产生它们的社会环境的改变而逐渐失掉自己的意义。他们都诉诸暴力和抢掠、狡诈和欺骗，为的是靠损害劳动阶级来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和把社会的指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在自己产生时是有益的和有良好作用的高等阶级往往最终成为有害的和压迫的阶级。

高等阶级把对其余人口的统治权夺取到手之后，他们又凭借巧妙地组织起来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暴力来保持这个统治权。在以前的演讲中我曾指出，当资产阶级同贵族斗争的时候，它曾经是伏尔泰的信徒，一旦政权落入他们之手，就立即沉溺于假仁假义的行为里去；我也曾指出，资产阶级怎样发明了具有新的神——进步、自由、劳动、政治经济学的自然规律等等——的自由的宗教，和他们怎样最后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权威来使劳动阶级的社会屈辱地位合法化。贵族阶级在当年曾完成了这样的一些进化：虽然有过教皇与皇帝之间、诸侯与主教之间、城堡与教会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但是归根结底他们却联合起来共同地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压迫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3页。——编者注

城乡劳动者。随着统治阶级的毫无用处日益成为明显的事实，被压迫阶级日益强烈地和明白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从统治阶级方面来的赤裸裸的肉体上的暴力（军队、警察、审判官、刑法典等等）不断增长起来。下层阶级只有当它消灭统治阶级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暴力，当它在开始手拿武器的斗争之前就进行一场预备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的时候，才能达到自己的解放。

为了对付被压迫阶级的要求和武装起义，统治阶级形成统一战线，尽管有使他们分裂的内部矛盾。在1848年和1871年，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的一切政党为了共同镇压人民的起义而形成临时的联合。但是统治阶级政党的斗争是纯粹表面的现象，非常微弱地反映着那种充满它内部的不停的斗争。事实上，如马克思所说：“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面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①。

工业的和商业的竞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的教条，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宣战。这个战争不可避免要引起对战败者的剥夺，把他们排挤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去，并且引起社会财富集中到数目很少的人的手里。结果，在资产阶级所积累的财富增长的同时，资产阶级本身的数目却不断减少而愈来愈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贵族阶级经历过相同的阶段。封建诸侯的不断的战争导致他们的互相残杀。失败者的土地和军事力量增加了胜利者的军队和财产。贵族阶级由于这样不断地失去成员，最后已经稀少到不费力气就可以推翻它的统治的程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5页。——编者注

动物中的生存竞争促使个体的质的提高和种的改善，而在人类社会里生存竞争却不能改善个别的人，反而会毁灭统治阶级的队伍和准备它的消灭。

随着脱离劳动的阶级人数减少和转变为寄生者和压迫者阶级，被压迫的阶级不断增长，并吸取对社会进行经济指导和政治指导所必需的一切精神力量；两个阶级之间的对抗日益增强并由内战的爆发而公开破裂。这对抗在中世纪产生农民战争和城市的暴动，为封建阶级的垮台作准备。它在我们的时代则产生经常破坏经济生活过程的罢工和动摇政治秩序的工人暴动。带有极端残酷和恐怖的内战标志着阶级矛盾的最高峰；国家政权的夺取成为解放被压迫的、革命的阶级所必需的条件。

国家成为堡垒，在那里躲藏着由于自己的成员的人数减少和完全的萎靡不振(*imbécillité*)^①而不能自卫的统治阶级。

国家变为施行精神强制和肉体强制的机构，统治阶级需要用它来保持自己的统治和把劳动群众控制在现存的生产方式所需要的从属的(奴隶制的、农奴制的、雇佣劳动的)条件之下。当社会分裂为敌对的阶级的时候，就是说当还需要控制某一阶级的时候，国家的存在是必需的，这种必要性既不能为自由贸易的圣水，也不会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咒语所消灭。被压迫的阶级现在是革命的阶级，应当掌握国家机器，按照自己斗争的需要改造它并且把它的全部力量转向对付敌对阶级。

在前一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这个阶级只是在夺取了国家机器，改造它和利用它的全部力量来镇压贵族和僧侣的反抗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解放。但是就在这时候，尽管资产阶

^① 我在这里是按照最初的拉丁文的意义使用 *imbécillité* 这词。Imbecilitas 在拉丁文中意指缺乏战斗力。丧失军人的英勇是接近死亡的阶级的最准确的标志之一。
——拉法格注

级侈言什么平等和博爱，它毕竟是剥削劳动群众的阶级，因此它不能消灭国家，相反地，它使国家更加强化，而从它取得政权之初期，它就利用国家来镇压人民暴动。国家政权只有那个消灭阶级的阶级才能消灭。而阶级只有当经济利益的矛盾解决了的时候，当产生这些矛盾的私有财产转变为全民的或公有的财产的时候，才能消灭。

恩格斯写道：“当不再有需要加以压迫的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生产无政府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都被消除了的时候，镇压的必要性就消失了，国家也就不需要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对人的统治将让位给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自由的社会不会容忍在自己和自己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国家。”^①

我们看到前此的一切人类社会都划分为阶级。这种划分是社会生产不很发展的命定的后果。凡是在社会劳动只能提供勉强超过社会全体的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产品数量的地方，因此在那里劳动吞没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时间，在那里阶级的划分是必不可免的。与那个主要依劳动为生的大多数一起同时形成一个少数，他们解除了直接的生产劳动和从事于关涉全社会的事务；对劳动过程的总的监督，行政管理，防卫工作，法庭活动，科学和艺术的创造等等。

但是由于机器生产的非常的发展，这种阶级的划分，在那个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是依社会的和科学的方法来调节的社会里将不复需要了。“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2页，引文与《全集》译文有出入。——编者注

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①(恩格斯)

选自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王子野译)

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39—78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4页。——编者注

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 保·勒卢阿-博利约的批判*

(1884年9月)

保·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在他的关于集体主义^①的著作中,曾辟出一个部分专门论述“当代社会主义大作家”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页)。他说:“马克思关于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理论,必须从理论的角度认真加以研究,因为集体主义的全部学说就是以这一理论观点为基础的。”(第252页)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所批判的其余作家都不是理论家;谢夫莱是一位慈善家,一位品格高尚的人;被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误称为“马克思的对手”的拉萨尔,是一位无与伦比的鼓动家^②;至于艾·德·拉弗勒先生,尽管在毛勒及其学生亨·萨·梅恩的著作问世之后发表了《财产及其原始形

* 本文首次发表于1884年9月的《经济学家杂志》。——编者注

① 保·勒卢阿-博利约《集体主义。新社会主义批判研究》吉约曼公司1884年版。——拉法格注

② 德·拉弗勒先生关于拉萨尔的作用的看法是不错的。“他没有向世界说明任何一个新的真理。他只不过借用了路·勃朗、蒲鲁东、洛贝尔图斯,特别是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并使之庸俗化。”(《现代社会主义》1883年版第49页)。拉萨尔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因为他断言“社会主义的值得赞许的思想就在于组织得到国家贷款的工人生产合作社。卡·马克思和谢夫莱坚决否定了这一论点。”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在第4页上就是这样写的,但这一点并不妨碍他在第249页上宣称:“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各种合作社都应该得到顺利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家或私人慈善事业打算用信贷给予它们支持的时候。”——拉法格注

式》一书，但是在法国，除了贝·马隆之外，谁都不认为他是“集体主义的一名捍卫者”。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位学识渊博的理论家，这一运动吸引了工人大众，引导他们走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的理论，用某些有教养的人的话来说，是“十分拙象、枯燥和难懂的”，但是不管听来多么奇怪，它却被工人阶级理解了，接受了。两半球的社会主义者从他的著作中吸取了行之有效的思想，并在自己的报刊上转载了这一著作的长篇摘录。在纽约的一次大罢工中，罢工委员会曾把《资本论》的一页印了数千份广为散发。这本书被译成俄文和法文；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发表了介绍这本书的内容的文章。

马克思的批判社会主义是当代最伟大的历史现象之一。法兰西学院的这位政治经济学教授不得不对它进行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对它的研究引起人们巨大的兴趣，并有助于经济科学的繁荣和巩固”（第VI页），而且还因为这一社会主义在当前起着巨大的作用和正在为未来做准备。马克思的大西洋两岸的学生们将在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的书中发现《资本论》序言中早已提出的那种“真正科学批评的公正性”。

我要感谢莫利纳里先生，因为他使我有机会在《经济学家杂志》上批评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的书；毫无疑问，凡是忠于科学并珍视自由交换意见的人都会赞同我们这一行动。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和那些借口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者是满口粗鲁之言的无知者而拒不加以研究的人不同，他承认，马克思和拉萨尔“拥有强大的武器，并善于巧妙地运用这一武器，他们论证细腻，精通历史，对现代工艺情况了如指掌，文体简洁而优雅，形象丰富，能言善辩，讽刺尖刻，这一切手段他们都运用自如”（第206页）；不过他们都是诡辩家，妄图“以矫揉造作的体系迷惑世人，而这些

体系在缺乏洞察力的人们看来似乎就是科学”（第 V 页）。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是怎样批驳这些仅仅貌似科学的体系的。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的第一点异议是：“马克思在批判现存经济制度方面虽然十分尖锐、十分挑剔而又无情，但是他并没有十分内行地提出一种可以而且应当代替现存经济制度的社会制度。”（第 4 页）“……马克思否认他的全部智慧仅限于接二连三的否定；否认他在处理新世界建设问题方面想像力已经枯竭。”（第 315 页）他在注释中补充说道：“也许蒲鲁东评述路易·勃朗的下述这段话可用到他的身上：至于说到这本书的哲学价值，也许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这样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在每一页上都用大写字母拚出这样一句话：我抗议！”

马克思不去追求新世界的幻想的体系，而是坚持对现实进行积极的批判，对他的这种做法讲求科学的人该不该痛加谴责呢？珍视科学的人，即不是珍视科学的外表而是珍视科学的实质的人，能不能要求解剖学家和生物学家不去运用手中的解剖刀研究无意识的自然所创造的动物，而去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新的幻想的有机体呢？

在法国革命遭到惨败以后（按照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预言，这场革命应该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在伴随机械工艺的产生而同时出现的民众的贫困面前，前半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们由于已被种种事件弄得不知所措，并且也不可能在尚未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现象中识别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因此只能咒骂和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现存社会，并勉强地去虚构“新世界”。当时，理想的体系一个接着一个地设计出来，有圣西门的，罗伯特·欧文的，傅立叶的，极其稀奇古怪但又闪耀着天才猜想的各种方案。后半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不能步前人之后尘。落到他们

肩上的任务不再是虚构，而是批判，因为社会主义已经进到自身发展的科学阶段。资本主义体系达到充分发展后，便强烈地表现出自身的经济特征和社会对抗性，同时使人们有可能预见它的最终改造。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现在要做的不是去杜撰这样一条改造的道路，而是要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中发现这条道路。没有一个学者能象卡尔·马克思那样，对经济现象做出如此详尽、如此细致、如此透彻的分析。

在经济科学中，人们从来没有采用过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方法。马克思不是研究静止状态的现象，而是研究运动状态的现象。任何现象（奴隶制、分工、货币利息等等）都不是孤立的、独自产生的、自我始终同一的和永恒的因素。恰恰相反，它有自身的生命，即它有产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一个现象由于在周围各种现象的作用和影响下会发生各种内在的过程，它就会不可抗拒地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变化。肤浅的读者会以为马克思的体系不过是“虚构定理”即互相连结的逻辑推断的某种序列，其实，这一体系无非是现象本身发展的历史。^①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认为，资本不受现象的一般规律支配。他声称，资本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每门科学在自身发展的初期，都会把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看作是自然发生的和自我始终同一的东西。在康德和拉普拉斯以前，地球和天体被看作是静止不动的；在拉马克、圣伊雷尔和达尔文以前，植物和动物被看作是不变的；在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以前，正义、自由、道德等等被认定为“不可变动的原则”；在毛勒的考察以前，法学家和许多哲

^① 克利夫·莱斯利先生曾抱怨“马克思的抽象法的数学偏好”。无疑，这是由于共产主义思想家是数学的准确性和精确性从事写作的。马克思研究数学是为了休息，摆脱一下自己的日常工作。马克思身后曾留下一部关于微积分的手稿，这一手稿将发表在他的全集中。——拉法格注

学家以及经济学家认为，土地私有制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存在，并且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制度，虽然实际上它不过是土地所有制的进化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资本不是万古不变的事实，而是不久前才发生的暂时的现象。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断言，野蛮人的石斧和鲁滨逊的手推车都是资本，正象挖土工人的铁铲和农民手工业者的织机也是资本一样。然而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就暴露了他的迟钝的观察力。虽然这些工具都是劳动产品，并能提高它们的拥有者的劳动生产率，然而它们只不过是劳动工具，生产资料。不过，农民一旦不再在冬天为自己的家庭织布缝衣，而是雇用织工用自己的织机进行劳动，只要不再将自己的织物用于家庭的日常生活，而是把它们出卖给商人，他这样一来也就把自己的织机变成了资本，也就是说，他的织机被他用来剥削雇佣劳动和制造商品。资本的存在要以商品流通的存在为前提。马克思说道：“资本只是在商品生产和贸易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才出现的。两大陆的贸易和市场的建立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史。”^①

某种东西最初仅仅是劳动工具，只是从一定时候起才成为资本，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这两者的差别其实是很简单的，但又是很重要的。这一差别表明，劳动工具所具有的资本形式并不是从史前时期就已存在并将存在到世界末日的必然的社会形式，恰恰相反，这种形式就象奴隶制、家庭生产和个人占有土地等等一样，只不过是生产和交换手段发展的暂时形式。这种差别是重要的，然而也是崭新的发现；应当承认，马克思有一个顽固的缺点，这就是他在他的著作中总是阐述大量新的思想和进行十分细腻的分析，而使他的著作过于庞杂；这些内容过于丰富了，以致使读者难

^①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29页。——编者注

于消化和应付不了，因为这些读者习惯于老生常谈，无休止的重复，不能集中精力跟着马克思的思路前进，所以他们认为这些内容是不可理解的。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所以，要了解资本发展的过程，就不能不分析商品流通的过程。马克思在这方面进行了独创的研究。正象我们亲眼看到的，商品流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的形式，也就是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即为买而卖。“这是政治经济学所考察的唯一形式。”第二种形式是第一种形式的逆转形式，也就是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为货币，即为卖而买。交换者购买商品不是为了消费，而是要高于其原来的所值出售，也就是在出售时得到利润。**剩余价值**就是这样形成的。^①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说道：“马克思的分析不乏风趣和机智之语。它具有惊人的想象力。当然，他不是所有的方面都是确切的。首先可以提出异议的是，资本发展的这种过程只见于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某些类别；这个过程不适用于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 卡尔·马克思根本没有弄清楚，货币只靠自身的单纯流通，就可以自行生产。他没有花功夫去这样做。”（第 258 页）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读书读得太不仔细了。马克思的分析指出，“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资本论》第 69 页）^②，因此，“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不能靠自身的流通来“增加资本”。试把一公担黑麦从芝加哥“流通”到伦敦、巴黎、纽约，然后再运回芝加哥，这要经过几十个商人和投机家的手，然而这一公担黑麦在返回芝加哥之后其价值丝毫没有提高。剩余价值只是表现在流通领域中，它是在生产领域（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中形成的。工业家一方面

① 在这里我只能指出这一学说的最基本的东西，读者可参阅马克思的《资本论》或达尔文的卓越的著作，后者现在已译成法文和西班牙文。——拉法格注

②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第一卷翻译）第 147 页。——编者注

购买机器和原料，即已经实现了的劳动，**死劳动**，另一方面购买工人人手，即雇佣工人的劳动力，**活劳动**，而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使它们结合起来并在出卖这种混合的产物时得到高于原来购买它们的组成部分时所付出的价钱。

如果为了生产某种产品并把它转让给消费者，要在机器、原料和工资上花费十法郎，然而却按十二、十四或二十法郎出售，那么，代表不同“资本类别”的资本家会共同分享这笔剩余价值，但不是平均分配。从事金融业的银行家可能得的最多；也可能商人利用特殊机会，按十或八法郎向工厂主购买，并按十五法郎卖给消费者，在这种场合，商人便把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装进自己的腰包，并兄弟般地使工厂主陷于破产；最后，也可能小店主不善于预测顾客的消费，使店铺堆满了商品，最终不得不亏本出售，招致破产。但是，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家之间不管是按照公平的原则，还是按照命运女神的任性要求——这是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的两位女神——进行分配，它终究是属于资本的。因此，勒卢阿-博利约关于“破产的商人和银行家……”，关于“马克思所忽视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的服务”的见解（第 258 和 260 页），并没有削弱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下述事实的意义：商品生产和运输花费了十法郎，然而商品是按十二、十四或二十法郎出售，也就是说带来了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是谁生产的呢？是**死劳动**（机器、原材料）还是**活劳动**（雇佣工人的劳动力）？

在着手探讨商品流通和剩余价值的形成之前，首先应当考察一下商品是怎样用货币这个普遍的社会尺度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的，然后再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同数量和不同效用的商品有时是怎样用同一货币量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的；总之，任何一个自认为是信

仰科学的人都必须从研究一切商品的可比要素，从研究价值及其属性和成分开始。卡尔·马克思正是这样做的，而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以轻慢的口气指出：“卡尔·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的第一部分用来研究商品和货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我们不准备停留在这个第一部分上，因为它不包含有任何重要内容。”（第252页）可是他在第31页上又写道：“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别在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的全部论据都是建筑在这个差别之上的”。而在第353页上他说：“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一切批判，都是建筑在他所炮制的完全虚构的价值定义之上的。”因此，为了驳倒“马克思的成堆的诡辩”，必须捣毁他的基地，即摧毁对价值的分析。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用“虚构的”这一美称来评定价值定义时，击中的不是马克思，而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而且他不能推说自己无知，因为曾经有一位经济学家，即德·拉弗勒先生就曾警告过他：“马克思是在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德·特拉西、巴师夏及其一大群追随者所确立的原则之上建立自己的体系的……那些认为劳动是价值和财产的源泉的经济学家只能同意马克思的论据”，这就是：**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量，即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德·拉弗勒先生接着说：“如果这些前提可以成立，马克思也就以无法反驳的逻辑（他在另一个地方使用了“钢铁般的逻辑”这一说法）向我们证明，资本是掠夺的产物”^①，就是说它无非是**无酬劳动**。但是，适用于政治经济学古典作家的各项原理的这一美称，即“虚构的”这一形容词，对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来说却失去了通常的蔑视的意义，因为他最终仍然采纳了马克思的“虚构的”定义。他写道：“社会（马克思已懂得这一点）是依据大多数生产者的物品所包含的社会劳

^① 艾·德·拉弗勒《现代社会主义》第26、27页。——拉法格注

动而按平均的、通常的成本支付这些物品的。”(第279页)这不够精确,因而也不够清楚。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推翻了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的批判。

但是,勒卢阿-博利约并不想成为他自己所说的那种见解的俘虏。事实上,他在第369页上声称:“卡尔·马克思所提出的狭义的价值定义正是集体主义的主要错误。生产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价值的实体……当我们试图把这个臆造的规律用于两种不同的物品……两种不同的手艺人时……马克思的公式(当我们考察特定种类的产品如农产品时,这个公式就已经是不正确的了)便完全失去了意义。人类职业的多样性是文明所需要的,这种多样性是根本不能塞到这个简单的规律之中的。”约夫曾大声喊道:“假如我的对手也写出了一本书,那多好啊!”(第31章第35页)他说得多么正确。

我应该在这里结束我的回答,并等待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在自己的两种相反的见解中任选一种;但是因为第二种见解发表在书中已不再研究马克思的那一部分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老生常谈,而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正是利用这一论据来驳斥谢夫莱的,不过他认为要用这一论据来反驳剩余价值理论则不够有力。我们接着往下分析。

雇佣工人的劳动力这种商品同一顶帽子、一袋肥田粉或一粒珍贵的珍珠之类商品完全一样;它是“依据大多数生产者的物品所包含的社会劳动而按平均成本”支付的。例如,如果说要使巴黎的珠宝匠再现他们的精湛手艺,就得让他们穿着入时,饮食讲究,过着愉快的生活,那么,他们的劳动力的价格就必须高于帮工的劳动力的价格,比如说波尔多的装卸工的劳动力的价格,因为这些工人只凭一瓶劣酒、一块面包和一点蒜泥就可以恢复他们的体力^①。但是,人类的需要是有弹性的,可以逐渐降低到不可思议的低水平

上；另一方面，资本始终力求节约生产费用，它会极其认真地采用一切办法把雇佣劳动者（不管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的需要削减到最低程度。过去，教育是劳动力价格的一个系数；现在，学士、化学家、工程师、农艺师和医师等等已经成堆地涌现出来，资本使他们相互对立，迫使他们把自己的需要减低到每月一百二十至三百法郎这一限度之内，而广大雇佣劳动者则不得不忍受极端可怕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甚至野蛮人如果濒于他们这种地位也会对这样的条件报以自杀或暴动。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断言，劳动力的价格不像其他商品那样是由“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决定的，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包含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推翻了他自己的原来的价值定义。不是马克思，正是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自己“并不理解承认上述这一点的重要性”（第 264 页）。

总之，我们已经弄明白，一切商品（钻石、胡萝卜、骡马、化学家、裤子、农艺师、电动机等等）都是“依据物品所包含的社会劳动”支付的。但是利润哪里去了？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哪里去了？让我们举例说明。资本家为了缝制两件上衣，共花费十四法郎，其中十法郎用于购买呢绒，五十生丁用于缝纫机损耗和煤气等等，五十生丁用于其他开支，三法郎用于支付十二小时的劳动力的工资。如果他以十四法郎卖掉这两件上衣，那他就一无所得。他会以十七法郎卖掉这两件上衣。所有的资本家都会这样做；他们预付机器、原材料等（死劳动），其数额为 S （马克思称之为**不变资本**），预付工资（活劳动），其数额为 s （马克思称之为**可变资本**），而活劳动和死劳动结合后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按照 $S + s$ ，而是按照 $S + s + s'$ 出

① 政治经济学协会在 1880 年 5 月 5 日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了在加利福尼亚做工的华人问题。会上查明，由于需要极低，完全不喝酒，只靠一点点大米和茶叶糊口，华人劳动力价格低廉，这使得黄种苦力较之白种和黑种无产阶级占有优势（见《经济学家杂志》1880 年 5 月号）。——拉法格注

售。谁给了他们权力和可能使预付资本增加 s' 呢？难道在竞争制度下每个工业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确定商品价格吗？或者，活劳动和死劳动结合后生产出来的新产品事实上也许比该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更大的价值？根据价值定义，每个商品都是按照它所包含的劳动支付的；可见，如果新产品是按照高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来支付的，那就说明其中包含着更多的劳动。

因此，在我们面前又重新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是谁提供了形成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多余劳动？是死劳动还是活劳动？

马克思回答说：是雇佣工人的活劳动提供了产生剩余价值的多余劳动。死劳动只能再生产自身的价值。

马克思指出：“机器不在劳动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由于自然因素的破坏作用而损坏。铁会生锈，木会腐朽，未加工的羊毛会受到虫蛀。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可能的有用性变为现实的有用性。”（《资本论》第79页）^①可见，活劳动在两方面为死劳动服务：第一、它使死劳动从无用的东西变为有用的东西；第二、它使死劳动免遭损坏。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忽视了第一种服务，嘲笑了第二种服务。马克思引用了一个工厂主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一封信：他的纺纱厂拥有八百名工人，每周需要一百五十包棉花；劳动间歇使他一年多花费三千七百五十法郎用于买煤，这是不间断地向工厂供暖和随时发动蒸汽机所必需的，机器的耗损使他花费三万法郎，因为“天气和自然的腐蚀力并不因蒸汽机停止运转就不再发挥作用”（第88页）。^②如果有朝一日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要去指点工程师和实业家们，而这些人竟想否认雇佣工人以自己的劳动为工厂主节约维修费用的事实，并且想支持他的论断，即认为资本家关闭工厂“将毫无损失，

^①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第171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96页注（5）。——编者注

因为工厂不管是关闭或者开工都丝毫改变不了资本家的状况”(第68页)，——如果到了这一天，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爱怎么嘲笑就怎么嘲笑好了！

首先由迪纳尔推行的，尔后由福尔改进的普朗特蓄电池，以化学分解过程的形式而充电；当铅盐重新形成时，电池便复原电能，后者积蓄起来，但至少损失百分之十。一切商品都是人类劳动的蓄电池，它复原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但会有损耗，会漏电。活劳动不管怎样熟练，也不可能从商品中取出其中包含的全部死劳动。例如，为了纺一百磅纱，需要一百一十五磅棉花，而这一百磅纱就代表一百一十五磅棉花的价值。我们记得，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可见，如果机器、原材料等等在生产中只复原其中包含的劳动的一部分，它们就只是使自身价值的一部分得到转移；可见，它们更不能产生剩余价值即超过自身价值的那部分价值了。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大声说道：“这是违反常识的。”于是教授先生严厉申斥马克思，指责他顽固地坚持在价值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就是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曾赞同的结论。他叫喊说：“但是，轻率的或者过于自信的人们，你们要知道，还有你们称之为固定资本的资本，即机器和工人所在的建筑物，也在生产着剩余价值！”(第267页)你们知道它们为什么会生产剩余价值吗？这是因为，“它们只是为此而存在，只是为此目的而被创造出来。如果机器不生产剩余价值，即不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如果建筑物不能使工人在劳动时避开风吹雨打，从而生产出剩余价值，那么怎么会产生出要制造机器的想法呢，谁又会去下功夫制造机器呢？”(第268页)总之，为了孵化小鸡才有孵化器，可是有人却由此得出结论说，正是孵化器产生了活的机体；人为了表达思想才造出钢笔、墨水和纸张，可是有人却由此得出结论说，正是这些东西产生出了蠢

话,并被刊印出来。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说:“机器在使用机器和被准许利用机器的工人所生产的东西上增添了某种东西……鲁滨逊把自己的手推车交给后来人使用,并对他说:让我们分享我的手推车使你的劳动获得的生产率的剩余产物吧”(第266页)。过着田园诗般生活的鲁滨逊的例子是不适用的,因为资本家并没有把自己的机器和建筑物让给雇佣工人使用,他购买工人的劳动力是要承担风险的;他的利益驱使他购置最好的机器,以提高他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雇佣工人同奴隶一样,根本不是自己劳动的产品的主人,他同奴隶一样,并不同任何人分享任何东西。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重复说:“机器的使用价值在于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创造人们称之为利息或利润的利益。”(第267页)鞭子曾被当作提高奴隶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工具,但是鞭子也像机器和建筑物一样并不创造剩余价值,鞭子只不过从人类劳动中吸取剩余价值罢了。汽灯本身不会发光,虽然它从一定量的煤油中吸取了光,而且光度比普通煤油灯要亮。因此,只有活的人类劳动才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源泉,正像光是以燃油为源泉一样;机器和建筑物只不过为吸取剩余价值而服务。这是非常正确的,因此,当人们只能以自身的器官为劳动工具,只能满足自身的个人需要时,他们会杀死战俘,因为对胜利者来说,战俘毫无用处;但是,一旦人们借助劳动工具提高了人的生产率,就会迫使战俘生产出多于维持他们自身生存所必要的东西,于是奴隶制便产生了。正如杰维尔强调指出的,在南方各国,奴隶制形成得最早,因为在那里,人的生活费用和人的生产率之间的差别在老早就表现出来了,而且相差程度很大。^①

^① 加·杰维尔《资本的演变。社会经济学教程》奥利奥尔出版社 1884年版。——拉法格注

不过，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并不认为他自己关于机器、建筑物等等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论点有多大意义。他把这个论点放在一边，甚至把它忘掉了。他在第239页上又去寻找剩余价值的其他源泉。他说：“必须对利润的思想进行分析。利润不是简单的现象；从经济方面来看，它是由不同的因素组成的：首先，它是对这样一种人的合法奖励，这些人创造了资本，而且创造资本仅仅是为了从中取得好处，得到利益，它是管理的工资，也就是对这样一种人的奖励，他们把自己的时间用于照管企业和管理各种事务；此外，它还是对承担和克服风险支出的费用；最后，它是（而且甚至这可能是主要的）对巧妙装备的奖励，这种装备要比本国一般水平的装备先进，可用于实现各种工业和商业目标与计谋。”因此，利润不再是机器和建筑物的合法之子，它是资本家、经理、发明家以及所承担风险的产物。勒卢阿-博利约先生不断地变换讨论的对象。由于我的回答已经够冗长了，所以我在这里只好用数字加以说明，这些数字摘自阿尼什矿井总工程师维尔门先生的报告，这篇报告转载于1878—1879年《煤矿年鉴》第155页。阿尼什矿井自创业以来，投入企业的资本如下：

1773年11月11日到1796年底

……2 200 000法郎

1797年1月1日到1839年3月31日

……2 000 000法郎

1839年4月1日到1855年3月31日

……3 200 000法郎

1855年4月1日到1876年3月31日

……9 000 000法郎

流动资本和储备资本

……4 400 000法郎

“除了（我逐字逐句地引证）由公司成员提供的二百二十万法郎原资本外，其他一千八百六十万法郎来自经营中利润的不断扣除。”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矿工是经营资本的创造者，因为付给经理、工程师和发明家工资之后，还可以从矿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中扣除四百四十万法郎用作后备资本，以弥补可能的损失，并扣除一千四百二十万法郎用于敷设坑道、购买机器和建筑物，以装备企业。如果像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所说的，剩余价值应属于资本的创造者，那么年股息就应在工人之间进行分配，而不是在股票持有者之间进行分配。

但是，勒卢阿-博利约先生不由自主地感到，要求把利润或剩余价值奖给资本的创造者，这是危险的，因此他又急忙放弃自己的观点。他说：“工艺利润的主要因素在于企业主通过成功的计谋和发明使成本低于平均成本，或低于竞争者的成本。”（第279页）因此，一旦竞争使该工业部门的生产条件拉平，利润及其主要因素便消失，于是资本家为了声誉或某种类似的目的，便使资本不停地周转；例如，拥有差不多同样装备和同样技术条件的六家大铁路公司分给自己的股票持有人很少的股息，或者完全不分给。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绕了一个大圈子，没有为我们解决问题，又把我们拖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上来：商品虽然是按照成本，即按照它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出售的，但是在出售时毕竟带来一笔剩余价值，即它是按照高于资本家花费在机器、原材料和工资上的价值出售的。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剩余价值的呢？

马克思是一位有党派的人，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不惜牺牲一切。但是，他首先是一位讲究科学的人：他公正地研究经济现象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决不向社会偏见让步”。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却恰恰相反，他声称：任何“社会理论

都应当以这样三个思想为出发点：公正思想、效用思想和个人自由思想”（第19页）。他大概会要求曾使我们的自然观发生转变的达尔文和自然科学家，要求曾对精神分裂现象和催眠术进行研究的生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用关于天命和自由意志的流行偏见来鼓舞自己；但是这就意味着把他们拖回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方法上去，勒卢阿-博利约先生不仅囿于关于公正、效用和自由的崇高思想，而且一心要替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试图证明剩余价值应当属于资本。事实上，他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比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更加重视。但是，他为什么如此卖劲呢？事实就是如此，要知道，这是最重要的。况且，马克思确凿地证明，只要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还存在，剩余价值就要属于劳动力的购买者，而不属于雇佣工人，正如煤气灯由于采用了先进的喷嘴增大了亮度，但这种亮度属于煤气的购买者，而并不属于煤气公司；马克思又同样确凿地证明，只有当生产资料（土地、机器、工厂、货币资本等等）蜕掉资本的形式，成为社会财产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才会从自身生产率的日益增长中得到好处。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以为，在他的批判的打击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象纸牌搭起的房子一样倒塌了”。他所编辑的《法国经济学家》杂志在7月5日这一期上刊登了他的书问世的消息，并断言“这本书在法国首次对现代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驳斥”。恐怕社会主义的敌人在读了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的《集体主义》后，会痛苦地发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仍旧是难于驳倒的。

译自《拉法格选集》第2卷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
俄文版第471—485页。

（刘焱译 王锡君校）

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 和布洛克先生的批判*

(1884年10月)

编辑先生!

最近一期《经济学家杂志》刊登了三封来信，诚然，这三封信不是对我的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的批判》的回答，但是，同这封信有关。布洛克先生在其中的一封信中警告我说，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有“牙齿和爪子”；现在他正在磨快它们，准备战斗，请允许我回答他的批判性评述。

他说：“不确切的定义是马克思的全部论据的基础。”布洛克和洛里亚认为，马克思虚构定义和应用先验论原则，之后，象开矿一样，从这些定义和原则中开采出一系列逻辑推断。然而情况正好相反，马克思是形形色色的先验论概念的死敌；说实在的，在他的书中没有任何定义；他把炮制定义的工作留给常识问答和小学课本的作者们去完成。请翻开《资本论》吧。他从哪里下笔呢？他从确认众所周知的事实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①马克思把财富的要素商品挑出来，从各方而对它进行观察，翻过来倒过去，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现它的秘密，而这些秘密要比天主教的秘密多得多和复杂得

* 本文首次发表于1884年10月《经济学家杂志》。——编者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页。——编者注

多。在分析商品本身之后，他研究了一个商品同其他商品在交换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然后研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的历史条件；他完全可以把他的书称作“商品的解剖学和历史”。

布洛克写道：“一切经济学家都把资本规定为属于某人或某一集体所有的(物质)生产资料总和。”他对此进行嘲笑。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因为经济学家对“资本”一词的含义是有争议的。麦克库洛赫把这一术语理解为一切积累的价值，而不管它们用于生产，还是用于美化无所事事者的生活。他断言，奢侈品对生产的促进，一点也不比其他物品(例如犁耙)小。让·巴·萨伊只是把非生产消费与之无关的那些价值包括在资本概念之中。罗西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如果一切同消费无关的价值都算是资本，那么根据这一理由，蚂蚁也可以被看作是大资本家了^①。许多经济学家都拒绝把土地和其他自然要素称为资本，所以“矿山、瀑布或瀑布的利用均不应算作资本”^②。另一些经济学家声称，资本是积累的收入。但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说法。他们改变了该词的最初的含义。“按照一般说法，一笔能带来利息的款额就称作资本。”这个非常准确的定义我们在布洛克先生的字典里找到了。马克思接受并总结了人们纳入“资本”一词中的经济含义。关于不劳而获的利润的思想，同内萨斯的衬衣一样，是紧贴在这个词上的。

当代广泛使用的“资本”一词是前不久形成的一个名词；后来才开始从经济含义上使用这个词。拉库内·德·圣帕拉耶曾提到这个词，他主要把它当作形容词，用于说明革命前的某些税收；作为名词，被用来表示房产的某些部分和衣服^③。在1728年出版的

① 见科克林的《资本》一文，载于《政治经济学词典》。——拉法格注

② 莫·布洛克《通用政治词典》。——拉法格注

③ 拉库内·德·圣帕拉耶《古法语词典——从法语的起源到路易十四时代》。
——拉法格注

里什莱辞典中，这个词被当作形容词来引用；它作为名词只用于两三个场合。1771年出版的特雷乌辞典，也持这样的观点。只是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我们才第一次发现“资本”一词的经济含义。“一笔不依利息为转移而应予偿还的钱就叫作资本。该词也可理解为商业公司的资财。”韦氏大辞典给“资本”一词下的定义如下：“资本是商业和制造业中所使用的股本。”我们在十八世纪的任何一本辞典中也找不到“资本家”一词。据李特列^①说，米拉波是第一个使用资本家这个词的著作家。词源及其含义表明，或者同许多经济学家断定史前就已存在这个东西的说法相反，从前并不存在这个东西，或者人们从前没有能力创造这一词汇。

“资本”一词就其更广泛的经济意义来说可能出于古代奴隶制度的瓦解时期^②；但是，在野蛮人入侵之后，只有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或者随着商业，工业的兴起，它才能够再度出现。只要还保留着家庭生产，这个词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这个词所表示的现象并不存在，至少还没有成为某种普遍的和经常的现象。

只有当生产资料事实上不是由它的所有者使用的时候，它才成为资本。一俟这一现象在某一社会开始占统治地位，这一社会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西欧，这一现象出现在通往印度和美洲的航线被发现之后。宗教革命标志着这样一种经济运动：当罗马教皇，这位陈旧经济体系的宗教代表为反对抽取利息而大发雷霆之际，日内瓦的反教皇的加利文，这位新生经济体系的宗教代表却宣称从所有神学美德的观点来看利息都是合理的。新教由于否认圣

^① 埃米尔·李特列(1801—1881)——法国词汇学家，著有《法语词典》(1863—1873)。——编者注

^② 拉丁语学家把这个词酌译成 *Caput, sors*，意味着一笔用于增长的钱，即贷款和取息的本金。我说得过于详细了，不过词源在许多方面都很重要，因为它证明大众一清二楚地表达了这个词的含义，而比任何学院的感觉都要灵敏得多。——拉法格注

徒及其节日，由于谴责获得救援的权利，由于提出神赐理论等等，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宗教表现。

如果生产资料不变成资本，也就是说，如果生产资料的使用不从它的所有者的手中转移到雇佣工人的手中，那么，这样一种现代社会就不可能产生和发展起来，这个社会拥有股份公司、矿山、铁路、机织品等等，这里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和人烟稀少的乡村之间形成对立，存在着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垄断了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资本家阶级。正象使粘土成型的陶工一样，始于十六世纪的经济革命使人类成型，它强迫人类接受不同种类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不同种类的舆论和管理，不同种类的宗教和艺术。这些革命正是由于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才发动起来^①。马克思坚持了大众深刻地给予“资本”一词的这一含义，他做得很对，因为这个词标志着在人类历史中起着巨大作用的现象。

布洛克先生攻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价值是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难题。谁了解价值的属性和基本特征，谁就掌握了引路的线头，后者可以引导他走出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交换的迷宫。格罗夫^②和他身后的物理学家，只有在迈耶尔博士得出热的机械当量的规律以后，才有可能对一种自然力转换为另一种自然力进行研究。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下述著名结论：**某一商品的价值是由该**

^① 经济学家应当感谢马克思，因为他是指出经济科学的伟大历史作用的第一个思想家。哲学史学家和社会学史学家企图从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运动中去寻找社会变化和革命的原因，而马克思则把全部问题颠倒过来，并尝试指出，人类社会及其管理形式，艺术、宗教和哲学体系，都是在经济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发生变化的。马克思把历史过程置于物质基础之上。——拉法格注

^② 威廉·罗伯特·格罗夫（1811—1896）——英国物理学家和法学家。——编者注

商品所包含的、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我之所以谈起这个“结论”，是因为马克思只是在详尽而耐心地分析商品这一概念之后，在全面研究了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各个先行者之后，才得出这一结论的^①；他的学识异常渊博，这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甚至他的许多敌人也都赞同布洛克先生1872年8月在《经济学家杂志》上所发表的下述看法：“马克思的这部著作（《资本论》）表明，他是一位最卓越的科学分析家。”

布洛克得意洋洋地说：“啊！懂得怎样把拉斐尔和亚里士多德的一小时化为一名裁缝或一名短工的一小时，这是非常有用的。”但是，何必重复基督的奇迹和使亚里士多德与拉斐尔复活呢？这两个人把关于辉煌的希腊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回忆带进了坟墓。在使他们遭受资本主义制度的折磨之前，布洛克先生应当先给他们数万法郎利息，或者至少向他们保证，画商和出版商愿意为他们的作品支付一笔价钱，这笔价钱是这些商人为X先生的轻佻的画或Y先生的下流剽窃作品而付出的价钱的十分之一或者甚至二十分之一^②。否则，这些无与伦比的天才就有陷入米莱所遇到的那种贫困或者象费尔巴哈那样死于饥饿的危险。

借助于拉斐尔和亚里士多德来进行论证，在当代是十分流行的，但多少有些陈旧了，并且显得有些幼稚；李嘉图早就证明这样进行论证是站不住脚的。“有些商品，其价值完全是由它们的稀缺

^① 马提诺先生用令人信服的引文证明，把巴师夏以及李嘉图和斯密这些人物一起列为古典经济学家，是符合“真实情况”的。我请批评家读读拉弗勒的著作，因为我从来不可能产生这类思想。——拉法格注

^② 德拉克鲁瓦非常大胆地给自己的一幅杰作——《列日主教的被害》规定一千五百法郎的价格。据哥提埃说，这幅作品是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阶段，使“中世纪及其挂钟和歌者从此而告终。”德拉克鲁瓦并没有得到这笔钱。布洛克先生显然不知道，乔祖阿·海耳曼这位剪毛机的发明人恰恰死于贫困，虽然他的发明使欧洲和美洲的纺纱者大发横财。——拉法格注

性决定的。任何劳动都不能增加它们的数量，因此它们的价值不可能由于供应增加而下降。某些珍贵的塑像和画就属于这类商品。它们的价值完全不取决于从前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它们的价值随着那些希望得到它们的人的财富和兴趣而变化。但是在每天上市的商品量中这类商品为数不多。人们希望得到的各种财货的绝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劳动得到。只要我们乐于为此而耗费必要的劳动，它们的数量就可以无止境地增大下去。”接着，为了回答当时的布洛克，他又补充说：“某个人或公司所垄断的产品的价值，将按照罗德戴尔伯爵的规律而发生变化；它们的价值随着供给量的增加而降低，随着购买者的需求的增加而提高；**它们的价格同它们的自然价值不必保持一致。**至于作为出售者竞争对象和数量可以增大的那些物品，其价格归根到底不取决于需求的性质和它们的储备量，而是取决于**生产费用的增大或减少**”^①。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扰拉斐尔和亚里士多德这些光荣的死者吧。让我们来研究一下骡马、哲学和自然科学副博士、工程师、短工、呢料和羊毛等等这样一些商品吧，任何特权都不能使这些商品免于竞争。我们来看一看在任何地方都碰不到拉斐尔和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世界上的情形吧。

资本家来到市场上物色出纳员、化学家、农学家，他为所找到的每一个这样的人每月要付出三百法郎；为了补充夫妇之间的乐趣，他在家庭之外要有一个女人，他每月要支出一千法郎来赡养这个女人；他花在绞尽脑汁为他的报纸炮制材料的作家们身上的钱不算多，每月支出二百法郎到六百法郎；短工、工人、机械师每月从他那里得到九十到二百五十法郎；他为他的仆人购买仆役制服每月要支出一百二十法郎；为女儿过命名日购买鲜花支出五百法郎，

^①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康斯坦西奥翻译）1835年版第1卷第4—5页；第2卷第150页。——拉法格注

等等。一句话，资本家在市场上找到（税率和工资率是预先规定好的）各种各样的商品，而且不需要计算器的帮助，就可以把献身爱情的人的一小时换算成新闻记者的一小时，或者换算成花在养羊剪毛、棉毛混纺、织成呢料并为仆人缝制仆役制服上的许多小时。出纳员的诚实、作家的才能、妇人的爱情——所有这一切竟被看成是同阿魏胶和硫酸之类一样的商品，所有这些如此不同的商品竟由于无意识的社会过程而被化为一个共同的尺度即货币，这不能不认为是十分可耻的。这真是岂有此理，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官方经济学对这种可怕的事实十分厌恶，它非常人道，非常敏感，以致根本不想知道克劳德·贝尔纳、海克尔、肖莱马这样的人物竟象典狱吏那样受雇于人，不想知道知识和女人的羞耻竟象海鸟粪和小萝卜一样是买卖的对象。这样假装正经同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资本主义社会所提出的问题可归结如下：不同性质、不同数量和不同属性的商品（如化学家、短工的筋力、铁、鞋、菜豆、金银等等）按照不同的比例相互交换；为了方便和简化交换，这些商品用金子即按照共同协议被采用为共同尺度的一种商品来表示自身的价值，所有的商品都同这个享有特权的商品相交换，有的换半克金，有的换二、三、四克金。彼此完全不同的物品怎样才能相互交换并化为一个共同尺度呢？“了解这一简化过程如何发生，这是十分重要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布洛克先生的意见。

所有商品，不管它们如何不同，都有一个共同属性，即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品。

如果六百升黑麦、三吨铁、一只宝石戒指和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十个工作日可以交换同一货币额，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商品在各自不同的外壳下隐藏着某种使它们相等的东西的一定量。这种东西只能是商品共有的要素，这就是商品中包含的人

类劳动，即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但是，人类劳动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一样的。关于这一点，布洛克先生曾完全正确地指出过；由此便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宝石戒指中所包含的复杂劳动（熟练劳动）只是六百升黑麦中所包含的那种简单劳动自乘多倍的产物。马克思说：“经验证明，这种（复杂劳动）简化（成简单劳动）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①布洛克先生大概没有读过这一页，所以他写道：“在马克思看来，一小时劳动就值一小时劳动。”

我们看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使问题得到解决。

接着，布洛克先生转而研究剩余价值理论；题目虽然换了，然而他仍然忠于自己的批判方法。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他说马克思把不可靠的定义当作自己的论证的根据；现在布洛克先生声明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假定的基础之上。这一理论将“象用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下去，为此“只须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这一切无非是个假定，因而这里没有任何现实的东西……作者总是这样去议论，似乎来自假说的抽象，即自乘的乌有会反映现实”。

马克思的假定指的是什么呢？他假定，每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力（筋力和脑力）用于生产的人，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通常达十、十二、十四小时的劳动中，不仅创造了同维持他本人的生命所必需的那一部分商品的价值相等的价值，而且还在这以外创造了他本人或资本家能够用于储备即“储蓄”的东西。这个假定是如此可笑，甚至在所有的经济学家那里都出现过。不过，马克思，这位抽象领域的大师，并不满足于这种假定，他把商品和劳动分成两个部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8页。——编者注

即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然后，开始玩弄所得出的这些概念，他耍了不少“辩证法的把戏”，并得出如下结论。

资本家根据再生产雇佣工人本身所需的花费而向劳动力支付四个、五个或十个法郎；资本家在自己的工厂中在长达十或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内充分使用这个劳动力；按照所有权，工人属于资本家，他从使用工人的过程中得到的全部好处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在长达十或十二小时内将自己的生命力用于生产的人，不但生产了维持自己的生命所必需的商品的价值，还生产了多于这一价值的某种东西，所以，在工作日的前一半，工人创造的是等于他的工资的价值，而在工作日的后一半，创造的是新价值，这部分新价值按照权利属于劳动力的购买者，因为他已按照劳动力的真正价值，即按照劳动力的生产费用的价格进行了支付。可见，马克思借助于辩证法的把戏成功地阐明了人所共知的事实：资本家渴望用尽可能少的工资维持尽可能长的工作日。实际上，工资越低，工作日越长，雇佣工人用于再生产自己的工资的时间就越短，用于创造剩余价值的时间就越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彻底揭露了关于工人懒惰和不守纪律的满口仁义道德的胡说八道的真相，其实这些东西在那些不参加劳动但十分富有的人那里倒是常有所闻。如果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量不是这样直接取决于工资额和工作日的长度，那么，应用到民众身上的以这种美德为特征的道德（其他道德一般来说绝不是美德）就决不会被想出来。

似乎在自然和社会生活的现象中着了魔，这些现象竟处于不断运动之中，它们在发展中有时竟采取极其意外的和令人震惊的形式。为了追踪它们的所有变动、转化、逐渐的和突然的变形，研究这些形式的批评家必须学会作一套十分复杂的智力体操，以致只根据表面特征去进行判断的人还会以为这样的批评家是一些杂技演员呢。

例如，数学家列出二元方程式的公式： $x = \pm \sqrt{m}$ 和 $x^2 + px + q = 0$ 。而凡夫俗子立即大声疾呼：要知道，指望同一正数既等于正数又等于负数，这是违背常识的；把零同正数等量齐观，这是在变戏法！这一切都是“来自假说的抽象，即自乘的乌有”。接着，物理学家向他显示了令人眩目的闪光。这已经不是建筑在假说之上的抽象了。这就是电，这个电无非是经过变形的蒸汽机的运动，而这种运动又无非是成吨的煤炭中包含的热能，至于这种热能……够了！这样，你说不定会向我证实：“马是浑身长毛的反刍动物。”胚胎学家谢尔回答说：“我还要告诉你，我在我的《脑的比较解剖学》中断定，鱼是较发达的动物的始终存在的胚胎”。圣伊雷尔赞成他的说法并指出：“在我们看来，畸形人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生物；然而恰恰相反，他们是高度自然的生物，是在自身发展中停顿下来的生物。”在圣伊雷尔之后，罗宾和生物组织学家指出：癌这一人体中的恶瘤，是由完全正常的因素形成的，这些因素由于营养太好而过于肥大。——是啊，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在科学领域中玩弄把戏已达到闻所未闻的地步，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正直的凡夫俗子只要把鼻子伸到这个领域中来，就会感到无所适从。我们要迫使谢尔、圣伊雷尔和科学中的所有这些杂技演员免开尊口，我们要听一听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的声音，因为任何人都不会把他当成玩弄辩证法的杂技演员。“竞争并非总是导致商品降价和改进质量，并非在自身发展的一切阶段上都是如此。竞争在自身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商品质量下降和涨价。”^① 凡夫俗子喊道：Tu quo que, Brute!（愿来你也在内，布鲁土斯！）这位凡夫俗子每遇到他一生中的庄严时刻就说起拉丁文来。永别了，政治经济学，既然竞争同时是善又是恶！闪闪发光的金币变成了臭不可

① 《法国经济学家》1884年10月18日。——拉法格注

闻的破烂货。这是什么样的魔法！可怜的凡夫俗子啊！

现在我来作最后的批判性评述。布洛克说，如果期望改造社会秩序的马克思竟没有着手建立理想的社会，那么这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完全正确：马克思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他只限于寻找和发现社会运动的原因，在现存的东西中揭示未来，并指出：要使资本主义世界得以分娩，必须实行剖腹产。十九世纪的社会秩序同十八世纪的社会秩序一样，在腹中孕育着新的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生产的集体占有方式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①。产品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用力学的语言来说是以位能的形式存在的，要使它们实际存在，就必须打碎束缚它们和使它们无法发挥出来的资本主义形式。难道卢梭、狄德罗、魁奈、加利阿尼、杜尔哥这样一些人物，日益逼近的革命的这些天才先驱者竟会花时间去从事炮制理想社会制度计划这种无益的事情吗？他们分析并抨击了旧秩序，有人是为了感情，有人是为了纯粹理性，有人是为了经济原则。而当暴风雨来临时，革命者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打碎了束缚受尽苦难的世界的封建枷锁；他们废除了王族特权（王室金库票据），而正是这些特权使国库枯竭，使国家信贷即公共信贷的基础发生动摇（暂时中止支付利息），等等；他们消灭了压制工商业的行会特权；他们取缔了阻碍农业进步的农民特权（公共牧场、封建租赁形式、公共地产）；他们废除了使工农产品流通不畅的各种主人、各种等级以及各省市的特权。十八世纪的人们只是由于成为理论和实践上的可怕的破坏者，他们才把人类引向一条新的、从未经历过的道路。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们不必迷恋乌托邦；他们应当分析和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深刻体验现在和过

^① 法国工人党纲领中的这句具有代表性的话属于马克思。——拉法格注

去，以便创造未来，而一旦时机成熟，就应当坚决进行冲击。1884年的德国选举正在证明，并且1885年的法国选举将要证明：在欧洲，人们是有能力的。但是，正如工人党的纲领所断言的那样，如果人们（精神因素）准备好了，那么物质世界（物质因素）同样也就准备好了，因为人无非是一种合力。政治经济学如果不能象天文学解释和预见涨落潮那样来解释和预见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证明这种运动的必然性，那么它就差不多成了集邮一类的无害的事业。

译自《拉法格选集》第2卷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
俄文版第486—496页。

（刘焱译 王锡君校）

资本的宗教*

(1886年2—7月)

伦敦会议

社会主义的发展在欧美的有产阶级中间引起一片恐慌。几个月前,文明世界各国的代表在伦敦聚会,以便找到制止危险的社会主义思潮入侵的最有效办法。在英国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中有索耳斯贝里勋爵①、张伯伦②、赛米尔·摩里③、伦道夫·邱吉尔勋爵④、赫伯特·斯宾塞⑤、曼宁红衣主教⑥。俾斯麦公爵因烧酒危机无法脱身,故派其心腹顾问犹太血统的布莱希勒德⑦出席。万德比尔特⑧、路特希尔德、古耳德⑨、苏培兰⑩、克虜伯、多耳富

* 这一著作从1886年2月27日起到7月17日止陆续刊登在《社会主义者报》上,1887年汇编成小册子出版。——编者注

① 1881年为英国保守党领袖,从1885年起任首相。——编者注

② 1873—1875年曾任英国伯明翰市长,1880年当选为自由党的议员,并参加内阁。1886年退出该党,后来又与保守党人日益接近,积极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编者注

③ 英国激进自由党的领袖之一。——编者注

④ 英国保守党领袖之一。——编者注

⑤ 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实证论者。——编者注

⑥ 英国天主教的高级神职人员。曾任威斯敏斯特的大主教。——编者注

⑦ 德国银行家。——编者注

⑧ 美国的铁路大王。——编者注

⑨ 美国金融家,主要从事铁路股票交易。——编者注

⑩ 法国金融家,波拿巴派议员。——编者注

斯^①、迪茨-莫南、施奈德等这些欧美大陆的工业巨头和金融巨头，或者亲自参加，或者派自己的亲信作代表。从来没有看见过不同国籍和不同政见的人之间会如此亲密融洽。保尔·贝尔特^②同弗雷佩尔主教^③并肩坐在一起；格莱斯顿^④和帕涅尔^⑤握手致意；克列孟梭和费里交谈；毛奇^⑥同戴鲁累德^⑦和兰克^⑧亲切地讨论德国和法国之间重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共同的事业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使他们暂时撇开了个人恩怨、政治分歧以及爱国主义的嫉妒心。

罗马教皇的特使第一个发言：

“管理众人需要交替运用粗暴的手段和精神的力量。宗教过去曾是一种支配人们思想的神奇力量。它要工人学会逆来顺受，提倡为了拯救灵魂而放弃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教人们忍受人间的苦难以期待天堂里的欢乐……但是，社会主义这个当代的恶神竟取代了穷苦人心中的信仰。它向他们宣扬：不应把获得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世界上，社会主义将建立人间天堂。它向工人大声疾呼：‘你们遭人掠夺。快起来反抗！’它唆使一向顺从听话的工人群众去参加总暴动，摧毁文明社会，消灭特权阶级，破坏家庭，把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毁坏艺术和宗教，使世界退回到野蛮的蒙昧时代……怎样才能击败这个文明和进步的敌人呢？用什么武器来对付社会主义呢？俾斯麦公爵——欧洲的主宰，曾战胜过丹麦、奥

① 米卢兹的工业家。——编者注

② 博物学家，主要在教育界从事政治活动，以反教权主义著称。——编者注

③ 昂热的主教，保皇派议员，神学院的创办人。——编者注

④ 英国自由党人，曾任首相。——编者注

⑤ 爱尔兰民族主义领导人。——编者注

⑥ 1370年—1871年间统率普鲁士军队的元帅。——编者注

⑦ 法国民族主义领导人。——编者注

⑧ 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70年，在甘必大手下任保安总局局长。他在议会批准和约时辞去议员的职务。——编者注

地利和法国的纳乌霍多诺沙尔——反倒被一些笨拙的社会主义者打败。法国保守派在1848年到1877年间大肆屠杀社会主义者，比在圣巴托罗缪之夜屠杀异教徒的巴黎天主教徒更为厉害。然而，社会主义就在这块被大屠杀的鲜血浇灌过的土地上发芽生长。越是屠杀，社会主义越是茁壮地成长。这头怪物经受住了暴力摧残的考验。怎么办呢？”

参加会议的学者和哲学家——保尔·贝尔特、海克尔^①、赫伯特·斯宾塞——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发言，建议用科学来制服社会主义。

弗雷佩尔主教耸耸肩膀说：“你们那个该死的科学为共产主义者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

斯宾塞反驳道：“您不理解我们所宣传的自然哲学。我们科学的进化论证明了，工人必然在社会中处于最低下的地位，就象物体必然会坠落一样，这是在自然界内在的和一成不变的规律支配下必然的结果。我们证明了，上层特权阶级是最有才干、最合适的阶级，他们不断地日臻完善，最终必将形成一个崭新的人种，他们与靠鞭子管教的、牲畜一般的下层阶级毫无相似之处。”^②

德·普雷桑塞^③打断斯宾塞说：

“看在上帝的面，可千万不要在工人群众中间传播你们的进化论，否则，这个鼓动人民起来造反的理论会使他们发狂，使他们感到绝望。进化论的学者先生们，你们太自信了。你们怎么可以

① 德国进化论博物学家。——编者注

② 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能简要地摘录这些科学界、宗教界、哲学界、金融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在会上发表的精彩演说。我们向读者推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未来的奴隶制度》，刊登在《现代评论》4月号上。作者斯宾塞宣称，管理下层阶级的办法是单人禁闭室和皮鞭。共产主义就是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所预言的未来的奴隶制度。——拉法格注

③ 新教派议员，主张建立一个自由派共和国。——编者注

认定，你们那套干巴巴的科学能够与具有奇妙的诱惑力的社会主义，与财产公有制，与社会主义者用来引诱工人的自由发展才能相匹敌呢？假如我们想保留特权阶级，想继续靠工人养活，我们就必须用关于另一个世界的种种神话故事来安抚畜牲一般的人民群众。基督教曾在这方面起了十分出色的作用。但是，主张思想自由的先生们，你们使宗教的威信扫地。”

保尔·贝尔特粗暴地打断他的话：

“您说得完全正确：宗教已经失去昔日的威望。宗教的地盘日益缩小。假如我们这些遭到你们大肆攻击的自由思想家不在暗中支持你们——为了欺骗那些傻瓜蛋，我们在表面上装出反对你们的样子——，假如我们每年在表决预算时，不赞成拨给教会经费，那么，包括您本人在内的所有圣殿里的教徒——无论是天主教、基督教，还是犹太教——统统都将饿死。只要停发你们的俸禄，宗教便会自动消亡……但是，正因为我是一个自由思想家，正因为我既不信神也不信鬼，正因为我只相信我自己，只相信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所能得到的快感，所以我才承认宗教的必要性。如同您说的那样，宗教是用来愚弄畜牲一般的被剥削者的工具。必须使工人们相信：贫困实际上是块金子，用它可以买得天国里的幸福，上帝之所以赐予他们贫穷，那是为了让他们死后进入天堂。在别人看来，我是非常信仰宗教的。不过，不管我是多么虔诚，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一只鸽子与一位处女结合——无论从生理学角度还是从道德角度来看，这种结合都是极其荒诞无稽的——，生下一头小羊羔，尔后又变成一个阉割过的犹太人。”^①

自以为在捍卫语言纯洁性的梅纳尔-多里昂^②补充说：“你们

^① 1854年，罗马教皇正式确定了圣母贞洁受孕这一信条。——编者注

^② 曾经是蒲鲁东的合作者，后来，放弃政治，改为从事诗歌和历史的研究。崇拜古希腊文化。——编者注

的宗教不符合文法的规则。同一个上帝竟可用三个人称，这势必造成语言上的混乱：用动词复数第一人称的词尾说：‘我想，我擤鼻涕，我擦屁股’，这简直是胡闹！”

曼宁红衣主教细声细气地插话：“先生们，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讨论天主教的教义，而是为了讨论社会的祸害。你们满可以照搬伏尔泰的话来嘲弄宗教，但是你们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宗教是对下层阶级的欲望和感情的最好的道德制约力。”

实证论大师皮埃尔·拉菲特^①用教训的口吻说：“人是笃信宗教的动物。在奥古斯特·孔德的宗教里，既没有鸽子，也没有羊羔。虽然我们的上帝既不披羽毛，也不披兽毛，但这毕竟是位得到实证的上帝。”

赫胥黎^②反驳说：“你们所谓的人类的上帝比满头金发的耶稣更不真实。本世纪的宗教是威胁社会的一种危险。请你们问问正在微笑地听我们讲话的吉尔斯^③先生，俄国的或美国的新教派是不是已经沾染上了共产主义。我承认宗教的必要性，同时，我也应该承认，基督教虽然对巴布亚人和澳洲的土著仍是十分有用的，但是对欧洲人来说，它已经多少有点过时了。如果我们需要创立一个新的宗教，那么，我们应该努力使它不是天主教的翻版，并且不带任何社会主义的痕迹。”

马雷兴致勃勃地插话：“我们为什么不用自由派的德行代替神学的德行，不用自由、平等、博爱代替信仰、希望、仁爱呢？”

“还要加上祖国”。——戴鲁莱德补充道。

吉尔斯紧接着说：“自由派的德行是当代最美妙的宗教发现。它们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一句话，在所有用它们开导群众的

① 奥古斯特·孔德的遗嘱执行人，实证论学会主席。——编者注

② 英国生理学家，达尔文进化论者。——编者注

③ 从1882年起担任俄国外交大臣。——编者注

地方，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总有一天，俄国也会这么做的。西欧各国的先生们，你们教我们如何在自由的名义下进行压迫，在平等的名义下进行剥削，在博爱的名义下进行屠杀，你们是我们的老师。但是，光靠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德行，还不能够创立宗教。这充其量不过是半个神。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神。”

“唯一能够适应当代需要的宗教是资本的宗教，”赫赫有名的英国统计学家吉芬铿锵有力地宣布。“资本是真正的上帝。它无所不在，以各种形式出现：亮铮铮的金子，臭气熏天的粪便，成群的绵羊，一车车咖啡，堆积如山的圣经，一幅幅诲淫的版画，庞大的机器，英国式的带风帽的斗蓬等等。资本是孺幼皆知的、摸得着看得见的上帝。我们的每个感官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它是唯一没有同无神论者发生冲突的上帝。所罗门虽然认为万事皆空，但对它仍崇拜得五体投地；叔本华^①虽然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心灰意懒，但是在它的身上却发现了一种巨大的魅力；哈特曼^②——一位不自觉的哲学家——也心甘情愿地成了它的崇拜者。其他一切信仰仅是嘴上说说而已的空话，而对资本的信仰却在人们心灵深处占据着统治地位。”

布莱希勒德、路特希尔德、万德比尔特以及所有黄色国际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拍手叫好：

“吉芬先生说得对极了。资本就是上帝，唯一活生生的上帝！”

当犹太教徒的热情平息下来以后，吉芬继续往下说：

“对一部分人来说，资本这个上帝的出现是可怕的；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它却象年轻的母亲一样温柔。当它旋风般地袭击某一地方时，把当地的人、牲畜、财物一扫而光。当欧洲的资本席卷埃及时，它把当地的佃农，连同他们的犍牛、大车、铁镐一起，通通赶

^①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鼓吹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编者注

^② 德国哲学家，反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编者注

往苏伊士地峡，强迫他们拼命干活，让他们在毒日下烤晒，遭受高烧、饥饿和口渴的折磨：运河两岸埋葬了三万人的尸骨。资本把成千上万自由、快活、身强力壮的年青人关进工厂、纺织厂和矿井，象一座熊熊燃烧的锅炉把他们吞噬，把他的血和肉与煤炭、纱锭、机器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把他们旺盛的精力注入毫无生命的物质中去。当它把他们释放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变得形容枯槁，疲惫不堪，未老先衰了，他们身上只剩下一副遭受贫血、坏血病、肺结核折磨的、毫无用处的骨头架子。人虽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能虚构出种种妖魔鬼怪，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竟会出现如此凶残、如此狰狞可怕、如此作恶多端的恶神。但是，这位上帝却对自己的选民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资本的宠儿对人间的种种享乐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于是，资本强迫工人绞尽脑汁，发明供他们寻欢作乐的新玩意儿；为他们烹调各种珍饈佳肴，用以刺激已经吃得过饱的食欲；它用纯洁的少女来刺激他们已经衰竭的性欲；它使世间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统统归他们所有。”

参加会议的代表深为这种求实的精神所感动，他们跺着脚，大声嚷道：

“资本就是上帝！”

“资本没有国家、疆界、肤色、种族、年龄、性别之分，它是国际性的上帝。全世界的上帝。它强迫人类世代代服从它的法律！”

教皇的特使万分激动地高喊：“让我们把从前的宗教从地球上统统消灭掉，让我们忘记民族之间的仇恨和宗教之间的纷争，让我们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地制定新的宗教教义，即资本的宗教教义。”

伦敦会议将象制定天主教教义的极其重要的主教会议一样被载入史册。它一共开了两个星期，从会议代表中选出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整理会议记录、归纳代表的发言和意见，并使之理论化。

我们将在下面公布这个委员会的一些文件。

劳动者的教义问答

问：“你叫什么？”

答：“雇佣工人。”

问：“你的父母是谁？”

答：“我的父亲是雇佣工人，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也都是雇佣工人。曾祖父的父亲是农奴和奴隶。我的母亲名叫贫困。”

问：“你从哪儿来和到哪儿去？”

答：“我从贫穷中来到赤贫中去，途中经过医院，在那里，专替资本的宠儿治病的医生把我的身体当作新药的试验品和研究的对象。”

问：“你在哪里出生？”

答：“在我父亲和他的伙伴一起搭的一所破房子的阁楼里。”

问：“你信什么教？”

答：“资本的宗教。”

问：“资本的宗教给你规定什么义务？”

答：“两个基本义务：放弃权利的义务和劳动的义务。”

我的宗教要求我放弃对土地——我们共同的母亲——的所有权。放弃富饶、肥沃的土地所有权，放弃在光和热的作用下供万物生长的土地的所有权；它要求我放弃我用双手和大脑创造出来的劳动果实的所有权；它要求我放弃我的人身所有权。当我一旦跨进工厂的门槛，我就不再属于我自己，我成了归老板所有的一件物品。

我的宗教要求我从幼小的童年起一直劳动到老死。在毒日下或在瓦斯灯下劳动，日以继夜地劳动，在地面上，在地底下，在海洋

上,在任何地方,都时刻不停地干活。”

问:“它还给你规定别的什么义务吗?”

答:“是的。长年吃斋,过清苦的、半饥半饱的生活,限制肉体和精神上的一切欲望。”

问:“它是否禁止你吃什么东西?”

答:“它禁止我品尝野味、家禽,以及一等、二等和三等的牛肉;禁止我吃鲑鱼、螯虾和其他鲜美的鱼类,禁止我喝上等好酒、白兰地和刚从母牛的乳房里挤出来的新鲜牛奶。”

问:“它允许你吃什么食物?”

答:“面包、土豆、豆角、鳕鱼、烟熏鲱鱼、屠宰场的下水、母牛肉、马肉、骡肉、猪杂碎。为了让我很快恢复消耗的体力,它允许我喝掺水的酒、用土豆做的白酒和用甜菜做的烈性烧酒。”

问:“它要求你在对待你自己方面履行什么义务?”

答:“节衣缩食;栖身在病虫害肆虐、肮脏不堪的地方;穿破旧的、打满补丁的衣服,而且一直要穿到这些衣服变成碎布条为止;没有袜子,只穿一双灌满冰冷泥水的破鞋。”

问:“在对待你的家庭方面,你的义务又是什么呢?”

答:“禁止我的妻子和女儿梳妆打扮;让她们穿最普通的衣服,只要能遮羞就行了;使她们养成习惯,冬天穿单布衫也不会冻得发抖,夏天住低矮闷热的阁楼也不会中暑晕倒;向我的儿子灌输劳动的神圣原则,使他们从小就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而不要成为社会的负担;教会他们空着肚子、摸黑上床睡觉,让他们习惯于贫困的生活,因为这是他们命中注定的。”

问:“在对待社会方面,你的宗教给你规定什么义务?”

答:“先靠我的劳动,后靠我的积蓄,来增加社会的财富。”

问:“它要求你怎样支配你的积蓄?”

答:“或者存入国家储蓄银行,以使用来弥补财政赤字①;或者

交给金融界的慈善家们所经办的银行，好让它们贷款给我们的主人。”

问：“它是否允许你动用自己的存款？”

答：“尽可能少动用。它要求我们在国家拒绝偿还我们的存款时不要坚持^②，当金融界中的慈善家赶在我们提出要求之前宣布我们的储蓄已经荡然无存时，我们也不应该抱怨。”

问：“你有政治权利吗？”

答：“资本给我一项无害的消遣的权利，即选举那些专门制定法律来处罚我们的立法议员；不过，它禁止我们过问政治和倾听社会主义者的声音。”

问：“为什么？”

答：“因为政治是老板的特权，因为社会主义者是抢劫我们钱财和欺骗我们的恶棍。社会主义者告诉我们，不劳动者不得食；一切都属于雇佣工人，因为一切都是他们生产出来的；老板是寄生虫，应当消灭。资本的神圣宗教却告诉我们相反的东西：富人的挥霍浪费为我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使我们得以养家糊口；富人养活了穷人；如果没有富人，穷人就会饿死。它还教导我们头脑不要过于简单，不要以为，我们的妻儿配穿她们自己织的绸缎锦罗，其实，她们只想穿廉价的粗布衣服；不要以为，我们也能够喝天然的美酒和吃大块的牛排，其实，我们的肠胃已经习惯于掺假的饮料和变质的

① 这里指的是法国的情况，但是教义问答的编者似乎希望其他国家也发生类似的事情。国家储蓄银行把储户的存款用来偿还其十二亿法郎的债务。正如教义问答中所说的那样，国家储蓄银行每年之所以入不敷出，这是因为它要弥补财政赤字。博利约指出这种情况的危险性，一旦所有的储户都要求取走他们的存款，国家就会破产。我想要说明教义问答的国际性：它不分国家和种族，对所有的无产者都规定了义务和权利。——拉法格注

② 1848年，已发生过这种事情。问答的编者预见到今后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故希望有积蓄的工人对此有所准备。——拉法格注

食物。”

问：“你的上帝是谁？”

答：“资本。”

问：“它是永恒的吗？”

答：“最有学问的祭司和官方的经济学家们断言，我们的上帝从有世界之日起就已存在。但是，因为它那时候还年幼，所以丘必特、耶和华、耶稣以及其他冒牌的神窃取了它的地位，假冒它的名义，主宰世界。大约从公元 1500 年起，它已长大，它的体力不断壮大。如今，它统治着全世界。”

问：“你的上帝是万能的吗？”

答：“是的。有了它，就有地球上的一切荣华富贵。当它厌恶某个家庭或某个民族时，贫困和苦难就会降临到这个家庭或这个民族的头上。资本这位上帝的力量随着它的身躯日益高大而变得越来越强大。它每天都在征服新的国家，每天都在扩大雇佣工人的队伍，让他们把自己的整个一生全部用于增强它的体质。”

问：“谁是资本这位上帝的选民？”

答：“老板、资本家、食利者。”

问：“你的上帝——资本给你什么报酬？”

答：“总是不断地分配给我工作，分配给我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工作！”

问：“这是给你的唯一报酬吗？”

答：“不。上帝准许我们用眼睛去欣赏摆在橱窗里的各种美味食品，以此充饥解馋。这些食品是专供上帝的选民和神父祭司享用的，永远没有我们的份。仁慈的上帝还允许我们望着穿在它的选民和神父祭司身上的暖和的厚皮毛大衣，使我们已经冻僵的四肢转暖。他还让我们看到这种赏心悦目的场面：容光焕发、脑满肠肥、挺胸凸肚的资本家和食利者，在一大群穿制服的奴仆和油头粉

面的妓女的簇拥下，坐着轻便马车在林荫大道和广场上兜风。虽然我们不能象上帝的选民那样享受这些美好的东西，但是，它们都是我们用双手和头脑创造出来的；想到这一点，我们便感到十分自豪。”

问：“上帝的选民不是你的同类吗？”

答：“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不过，资本家是从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

问：“他们凭什么获得这样的地位？”

答：“不凭什么。上帝偏偏宠爱那些不值得它宠爱的人；这恰恰证明，上帝是万能的。”

问：“这么说，资本是不公正的罗？”

答：“资本是公正的化身。但是，他的公正超过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假如资本不得不宠爱那些值得它宠爱的人，这就意味着它是不自由的，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当资本能够从一大堆无能者、懒汉和寄生虫中间挑选出自己的选民时，才能证明它是万能的。”

问：“你的上帝是怎么惩罚你的？”

答：“让我失业。一旦失业，就等于被逐出教门；我再也得不到肉、酒和柴火，全家都将饿死。”

问：“犯了什么过错，才会被开除，遭到失业呢？”

答：“什么过错也没有。资本随意让人失业。我们的理解力太差，弄不清其中的原因。”

问：“你的祷文是什么？”

答：“我不用语言做祷告。劳动就是我的祷告。一切口头上的祷告都会妨碍我用劳动做祷告，而劳动是唯一合乎上帝胃口的，唯一有用的，唯一使资本有利可图的，唯一能创造剩余价值的祷告。”

问：“你在哪儿做祷告？”

答：“随便什么地方：在水上，在地上或地底下，在田野和矿山，在工场和店铺里。

为了让我们的祷告能得到上帝的赏识，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意志、自由和尊严拱手奉献给资本。

一听到钟声和汽笛声，我们必须赶去祷告；在祷告时，我们必须象机器一样，挥动我们的手脚，喘气和流汗，使浑身肌肉高度紧张，使神经疲惫不堪。

我们必须低声下气，俯首贴耳，忍受老板和工头的打骂，因为他们总是对的，即使我们感到他们不对时，他们也同样有理。

当老板克扣我们的工资，延长我们的劳动时间时，我们必须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都是为了我们好。当老板和工头调戏我们的妻子和女儿时，我们应当感到荣幸，因为我们的上帝——资本，使他们对雇佣工人握有生杀大权，他们当然也有权霸占他们的女工。

我们不应当有半句怨言，不应当让怒火在胸中燃烧，不应当举行罢工，不应当起来造反，我们应当忍受一切痛苦：吃别人啃过的面包，喝浑浊的污水。因为资本用大炮、刺刀、监狱、苦役、断头台和行刑队来武装我们的老板，以便对付我们的任何轻举妄动。”

问：“你在死后会得到好的报应吗？”

答：“是的，我将得到很好的报应。在我死后，资本会让我得到安宁和休息。我将不再挨饿受冻，不用再为今天和明天的一块面包而操心。我将在坟墓里长眠。”

妓女的训诫

交给我的手稿是不完整的，缺前面三页，其内容大概是向资本这位上帝——可鄙者的保护人——的祈祷。由于我给自己规定的

任务仅仅是转抄原文，所以我不能擅自补写残缺的那一部分。

根据手稿边页上的注解判断，训诫的作者，即教皇的使节，曾得到威尔士亲王、崩讷和普野-克尔蒂约这两位大名鼎鼎的纺织业巨头以及名妓柯拉·蓓尔^①（许多世界名流都是她的主顾）的合作。

保尔·拉法格

……在贫乏的理智的微光指引下，行进在生活的茫茫黑夜里的那些人，常常嘲笑和辱骂妓女。他们肆无忌惮地把妓女钉在他们道德的耻辱柱上，用冠冕堂皇的贞节来鞭笞她，把满腔的怨恨和愤怒全部发泄在她的身上。妓女是邪恶的奴仆，是恶贯满盈的罪魁祸首；她象诱人堕落的陷井，勾引风华正茂的青年，玷污白发苍苍的老头；她夺走别人的丈夫，拆散夫妻，用那张贪婪无耻的嘴吞噬人家的声誉和财产。

啊，我的姐妹们！野兽般的狂怒和卑劣的嫉妒心象一盆又脏又臭的污水把妓女的崇高形象弄得污秽不堪。但是，就在差不多一千九百年前，最后一位假冒的上帝，即拿撒勒的耶稣，把马利亚-马德莱娜从人间耻辱的深渊中解救出来，让她和众神一起生活在光辉灿烂的天堂里。

在真正的上帝到来之前，即在资本到来之前，为抢夺地盘而互相斗争的形形色色的宗教，曾先后在人们的头脑里占据统治地位的各种上帝，它们都把已婚的女子幽禁在高墙深院里，只许娼妓品尝科学和自由之树的果实。伟大的巴比伦女神米利塔-阿纳伊塔，这位“灵巧的女妖”和“迷人的荡妇”竟要求自己的信徒去卖淫，并引以为荣。当佛陀，人的上帝，到维萨利时，曾去神圣的妓院借宿。

^① 当过拿破仑亲王（外号“普隆-普隆”）的情妇，死于1886年7月8日——编者注

身披袈裟的僧侣和衣冠楚楚的市政官员则在门前列队迎候。甚至连脸色阴沉的耶和华也曾把妓女接到寺院里去住。^①

原始社会的人从他们的信仰中得到启示，把妓女奉为神明；在他们看来，妓女象征着永恒的自然界所具有的力量。这种力量既能创造一切，又能破坏一切。

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的神父从妓女那里寻找灵感，编造出许多神话故事，来哄骗幼稚的人类。当教皇召集各国的主教和教士开会讨论教义时，整个基督世界的妓女，受上帝的委派，纷纷麇集在开会的地点。她们在自己的裙褶里带来了圣灵，使教会圣师们个个变得心明眼亮。基督教的上帝让威严的淫妇泰奥多拉拥有很大的权力；她有权任命和废黜永无谬误的教皇。

我们的上帝——资本赋予妓女更高的地位。她现在指挥的已不是老态龙钟的教皇，而是成千上万掌握各种手艺和技能的年轻力壮的工人；他们织布，绣花，缝衣，做木工活，打铁，冶炼贵重金属，研磨钻石，在海底采捞珊瑚和珍珠，在严寒的冬天培育春天的花朵和秋天的果实，建造宫殿，装饰墙壁，绘画，雕刻大理石像，编写剧本和小说，创作歌剧，唱歌，跳舞，演戏——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供她消遣和满足她一时的爱好。即便是塞米拉米达^②和克娄巴特拉^③这样一些权力很大的女王也从未拥有一支如此庞大的能工巧匠的队伍，来专门替她们服务。

妓女是资本主义文明世界的点缀。假如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没有这样的装饰品，那么，这个本来就十分沉闷和忧郁的世界便会

① 教皇的使节指的是《旧约》中的一句话：“又拆毁耶和华殿里婬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舍拉织帐子的屋子”（《列王纪下》，XXIII，7）。在米利塔寺院里巴比伦的荡妇也有类似的小教堂，她们在那里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拉法格注

② 传说中的亚述女王，有名的“空中花园”据说是她修造的。——编者注

③ 公元前69—30年著名的埃及女王。——编者注

失去其最后剩下的一点欢乐；首饰、珠宝、高级衣料便会变成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物；昂贵的奢侈品和精湛的艺术便会变得平淡无奇；人类的一半劳动便会失去其价值。只要存在买卖交易，只要资本统治着人类，并由它决定善与恶的报应，爱情就是最昂贵的商品，妓女的那两片涂着口红的嘴唇就象一杯沁人心腑的清凉饮料，足以使资本的选民陶醉。

假如理性没有愚弄人类，假如信仰打开了他们的心扉，他们便会懂得，供有财有势的人纵欲的妓女是资本这位上帝左右人民和改造社会的动力之一。

在黑暗的中世纪，我们的上帝，资本，象一个在母腹里轻轻蠕动的胎儿，正在经济活动中不知不觉地成长。当时，还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到他的诞生，还没有一个人因知道新的上帝即将降临而欣喜若狂。然而，资本已经开始支配人类的行动。在它的煽动下，基督教的教徒们做出了疯狂的举动；他们犹如蚂蚁一般，成群结队地涌向亚洲。那个时候，占据统治地位的粗鲁的封建领主象躲在硬壳里的螯虾一样，生活在戒备森严的城堡里；他们吃大块的肥肉，喝烈性烧酒；他们的唯一娱乐是弄枪舞刀，他们的唯一奢侈品是锋利无比的刀剑。为了推动这些头脑比铅块还要迟钝的野蛮人，我们的上帝不得不下降到他们的理解水平，建议他们组织十字军，远征巴勒斯坦，去夺回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墓石。上帝把他们带到东方妓女的脚下，让他们沉醉在奢侈和享受之中，在他们的心中点燃起神圣的热情，即对金子的热爱。在他们重新回到自己那座只能听见猫头鹰凄凉叫声的阴森森的城堡之后，他们依然十分怀念黄澄澄的金子、五彩缤纷的节日、阿拉伯的香水和妩媚动人的妓女。他们开始厌恶家里的那些只会纺纱织布、只知道生儿育女的笨拙粗野的婆娘，他们对自己的野蛮和不文明感到羞愧。于是，他们象为快要出世的孩子准备摇篮的年青母亲一样，在地中海沿岸建设

城市，在欧洲兴建宫殿，准备迎接资本这位上帝的降临。

老实告诉你们，上帝钟爱妓女，胜过金融家喜爱证券股票。妓女是上帝最宠爱和最顺从的女儿，妓女用来做交易的东西是非物质的，既无法过秤也无法丈量，不受神圣的交换原则所支配：她出卖爱情，就象杂货铺的老板出卖肥皂和蜡烛一样。不过，她在出卖爱情的同时，也出卖了自己。她使自己的性器官具有一定的价值。因此，她的性器官具有资本这位上帝的属性，成为上帝的一部分，成了资本。妓女是上帝的体现。

啊，诗人、戏剧家、小说家，你们比在草地上打滚的牛犊还要天真，你们辱骂妓女，这是因为妓女在出卖自己肉体的时候只收现金；你们用污秽不堪的语言诋毁她，这是因为她高价出售自己的抚爱。难道你们想贬低她那已经成为上帝一部分的肉体吗？难道你们要她变得比路边的小石子更不值钱吗？你们这些道德家，你们自己是罪恶的温床，你们却指责妓女不要一颗充满爱情的炽热的心而宁可要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币。迟钝的哲学家，你们也把妓女比作嗜血成性的兀鹰吗？你们都是吝啬鬼，难道因为妓女的身体是可以用钱买到的，所以就激不起你们的情欲吗？人们不是也用钱买面包来填饱肚皮，用钱买酒来寻欢作乐的吗？议员的良心、牧师的祈祷、士兵的勇敢、工程师的知识、出纳员的诚实不是一样可以用钱买得来的吗？

资本这位上帝咒骂为了几个法郎或几个苏便把身子出卖给工人和士兵的下等妓女。它比瘟疫还要厉害，百般折磨这些使穷人尝到一点乐趣的畜生一般的贱货，摧残这些蝙蝠似的“爱神”的肉体，听凭专靠娼妇养活的无赖毒打和掠夺她们，让警察象查禁集市上的臭肉那样，对她们进行检查。

但是，高等妓女却深受资本这位上帝的宠爱。她们把你们的那套道德和滑稽可笑的演说当作耳边风：你们的规劝就象即将被

宰的白鹅在拔毛时发出的叫喊一样，根本没人理睬。她们的心冷似北极的冰山，不管多么炽热的爱情都不能使之消融。如果她们象“茶花女”那样，为了爱情而不是为了金钱便委身于男人，那么，她们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不幸。上帝决不会去保护痴情的妓女。当她们心爱的情人怀着无限惆怅的心情离去之后，尽管她们心还在跳动，尽管她们身上的感官还有感觉，但是，后来的嫖客从她们那里获得的已不再是一件新鲜的商品，而只是一具毫无生气的、发烫的躯壳。

妓女应该采取冷漠的态度，任何时候都不能感情用事，这是她保护自己的办法，这可以使她白瓷一般的肉体不至于被那些嫖客的滚烫的嘴唇弄坏，以便永远保持其鲜艳的丰采。嫖客之所以能获得爱情的那种快感，这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冲动，而妓女的百般温柔和疯狂拥抱只是为了敷衍他们。因为妓女在同男人热烈地接吻时，必须头脑清醒，一刻也不能忘记她所应该得到的那一份钱。她应该从前来买她肉体的顾客那里骗取尽可能多的金钱，迫使这些寻欢作乐的嫖客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正因为妓女所出卖的爱情是虚假的，实际上这种商品并不存在，所以资本——对这位上帝来说，偷盗和欺诈是主要的德行——才对妓女关怀备至。

正在听我讲话的妇女们，我向你们揭开了一个秘密，即为什么妓女总是象大理石那样冷漠的原因。妓女邀请整个资本的选民阶级参加她举行的“宴会”，用自己的肉体招待他们，并对他们说：“请随便拿，请随便吃，请随便喝！这就是我的肉，这就是我的血。”

上流社会的人仅在口头上对忠贞的妻子和贤惠的主妇倍加赞扬，而在行动上却千方百计地回避她们，让她们在家里守着空房。这些贤妻良母则一心想使她们的丈夫与其他人断绝一切来往，并在他们的心里点起嫉妒之火。其实，这种感情是反社会的，只会使男人变得烦躁不安，因为它要把男人囚禁在家庭的小圈子里，囚禁

在只顾自己家庭的利己主义的围墙里面。与此相反，妓女却把男人从家庭和感情的羁绊之下解放出来。

金钱在人们之间制造隔阂，而妓女却使他们互相变得亲近起来。利益使人们四分五裂，而妓女的卧室则使他们亲如手足；一项不成文的、极为深刻的和不可更改的秘密条文把他们连结在一起；他们共享同一个妓女的肉体，就象在同一个祭坛上进圣餐一样。

爱情是一种野蛮的和粗暴的激情，它能使人神魂颠倒，使人忘却一切，甚至抛弃自己的利益。妓女则用浅薄的、庸俗不堪的和极其轻浮的淫荡来代替爱情，这种淫乱就象矿泉水一样，虽起泡沫，但决不会让人喝醉。

妓女是资本这位上帝恩赐的礼物。她教会上帝的选民如何过荒淫无度的生活。当他们象讨厌绵绵秋雨那样讨厌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他们可以从妓女那里找到慰藉；当他们年老力衰、满脸皱纹的时候，当他们的眼睛失去光泽，四肢麻木不灵，气喘吁吁的时候，当他们的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遭到女人厌恶的时候，妓女可以减轻他们心头上的悲哀；在她冷冰冰的、但从不拒绝任何人的肉体上，他们可以用高价获得短暂的欢乐。

妓女比酿酒的酵母菌更加厉害，她能使数以百万计的财富象跳疯狂的华尔兹舞一般，以令人眩目的速度迅速运转起来。矿山、工厂、银行、国家发行的债券、葡萄园和耕地象流水一样，通通落入她的那双白皙细嫩的手里，然后，通过指头缝，再注入各个工商业渠道。整天围着她转的奴仆、商人、高利贷者简直比腐尸上的蛆虫还要多。他们敞着深得见不到底的口袋，检拾她在挽起裙子时雨点般洒落下来的金币。妓女是自我牺牲的楷模：她使自己的情夫破产，而让仆人和她的供应者大发横财。

要不是妓女强迫工匠和企业家挖空心思不断翻新花样，发明新鲜玩意儿，这些人就会成为饱食终日、碌碌无为的庸人。因为妓

女总是渴望完美的东西，一件东西刚拿到手，就立即对它感到腻味了。

机器虽然减轻了人的劳动，但使工人变得无活可干，到处闲荡，它是一切邪恶的根源。妓女则使挥霍浪费上升为一项社会职能。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她不断提出新的奢望和要求，从而为该死的无产阶级提供了劳动就业的机会，而劳动正是一切美德的泉源。

妓女鲸吞和挥霍大量的财富，就象出征的士兵那样肆意糟蹋和毁坏一切。正因为如此，她得到了工厂主和商店老板的青睐。她是工商业的保护神，使它生气勃勃，充满活力。

资本的宗教道德比过去一切虚假的宗教道德更为纯洁、高尚。它并不宣扬什么人人平等；只有极少数人才配享受资本的恩惠。男子已不再象在原始时代那样互相平等。妓女不应当被粗野愚妄之辈的接吻玷污，因为资本只允许自己的选民享用自然界的稀世珍宝和艺术精品。

上帝庇荫下的妓女是专供富豪和显贵们娱乐的。如果说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揭开了社会伪善的帷幕，接触到了人身上最卑污下贱的东西，但她的生活却是十分奢侈的，天天就象过节一样。受人尊敬的贵族和资产者认为，如果他们能把“属于大家的夫人”变成“只属于某一个人的夫人”，他们将感到不胜荣幸。因此，有的妓女最终用合乎情理的结婚来结束其荒淫无度的生活。当妓女处在黄金时代，资本家纷纷拜倒在她的脚下，向她求爱，而她却做出一副倨傲的样子，加以拒绝，并肆意挥霍他们的财产；艺术家和文学家终日围着她转，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当她步入老年的时候，体力已经不行，而且身体发胖，她只好宣布停业，闲居在家，于是，那些神情严肃的男人和一本正经的女人纷至沓来，向她大献殷勤，关怀备至，为的是分享她靠卖淫得来的财产。

上帝对妓女十分仁慈。有些妓女，由于大自然缺乏先见之明，

天生没有漂亮的外表和聪明的头脑，上帝便使她们具有某种风度，某种刺激性和诱惑力，以及一副狠毒的心肠；而她们正是凭借这些东西去勾引和征服出类拔萃的资本的宠儿。

上帝帮助妓女克服女性的弱点。象继母一样凶狠的大自然强迫女人承担传种接代的繁重劳动。然而只有情妇和妻子才会尝到分娩时的剧痛。上帝大发慈悲，不让妓女怀孕，免去她生育之苦，并可防止她的体形变丑。上帝使妓女失去生殖能力，这可是许多人所羡慕的。犯有通奸罪的情妇和妻子应当虔诚地向圣母马利亚祈祷：“啊，白璧无瑕的贞女，你没有罪过而怀孕，让我犯罪但又不怀孕吧！”妓女属于第三性，她把人类繁殖的苦差使让给了普通妇女。^①

妓女是偶然地从社会的低层中招募来的。看到这些出身低微的人今天居然在上流社会中占据如此显赫的地位，怎么不叫人感到羞耻和痛心呢？

正在听我讲话的妇女们，你们属于上层阶级；你们应该记得，旧贵族曾指责路易十五不该从小市民阶层中挑选妃子。你们应该享受为资本的选民提供妓女的权利和荣誉，这是你们宝贵的特权之一。你们中间的许多人，由于厌恶做妻子的义务，已经象妓女那样在出卖自己的肉体。不过，她们在做这种性的买卖时，还比较胆怯，总想遮遮盖盖。你们应该学习古罗马贵妇人的榜样，她们在行政官那里登记注册后，便公开以卖淫为职业。应当摆脱、摒弃、砸碎那些只适用于奴隶的、过时的和愚蠢的偏见。资本这位上帝给世界带来了新的道德观念；它宣布人类自由的信条。要知道，人们只有在有权出卖自己的时候，才能获得自由。你们只有在出卖自

^① 训诫的作者从奥古斯特·孔德的思想中得到启发。实证论的创始人预言，更为高级的、不会怀孕和生育的妇女必将产生。妓女实现了资产阶级哲学家的理想。——拉法格注

己肉体的时候，才能摆脱家庭的束缚。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什么劳动比妓女的劳动更体面的了。请看看女工的劳动，再看看妓女的劳动吧！漫长和单调的一天结束时，被人瞧不起的女工，面色苍白，累得直不起腰，干瘦的手里拿着一点微薄的工资，只够勉强糊口。满面春风的妓女却象年轻快活的女神一样，从床上或沙发上站起来，梳理一下洒满香水的头发，漫不经心地数着金币或银行钞票。她的劳动没有在她的身上留下任何疲倦和污秽的痕迹，她漱漱口，擦擦嘴唇，笑着说：“请下一个进来。”

专门拾人牙慧的哲学家总是喜欢唠叨不休地重复早已老掉牙的古代道德戒律，就请这些哲学家讲讲什么劳动，女工的劳动还是妓女的劳动，更能博得资本这位上帝的欢心？

资本对商品的喜爱程度是根据商品出售时的价格高低而定的。因此，虚伪的道德学家们，请你们在各行各业中找一找，看哪一种劳动——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能得到象性的劳动那样高的报酬。知识渊博的学者，勇敢善战的士兵，才华横溢的作家，技术娴熟的工人，他们什么时候得到过象柯拉·蓓尔用亲吻换来的那样丰厚报酬？

妓女的劳动是神圣的劳动，资本这位上帝给它的报酬比其他任何劳动都高。

亲爱的姐妹们，请注意听我说，请注意听，上帝通过我的口在讲话：

假如你已被上帝抛弃，不再厌恶女工所从事的、摧残身心健康的繁重劳动，你就不要去卖淫；

假如你一心追求关在小家庭圈子里、整天为琐碎的家务事操心的家庭主妇的那种单调无味的生活，你就不要去卖淫；

假如你甘愿一个人守着空房，听任丈夫乱花乱用你的嫁妆在

外与妓女寻欢作乐，你就不要去卖淫；

但是，假如你向往自由、荣誉和人间的幸福，你就应该去当妓女；

假如你内心充满自豪感，不愿忍受女工们的下贱劳动和家庭主妇的沉闷生活，你就应该去当妓女；

假如你想成为盛大欢宴上的皇后，你就应该去当妓女；

这就是我所想给你们的恩赐。阿门！

照抄不误。

保尔·拉法格

《传道书^①》或资本家的圣书

此书经好几位资本家传阅，他们在阅读过程中，加了批注。现抄录其中的一部分。

“无容置疑，英明的主所作的这些训示必将遭到愚妄的雇佣工人的曲解。我认为，应当把它们翻译成世界语或其他任何一种神圣的语言。”

茹尔·西蒙

“应当效仿禁止教外人士阅读旧约传道书的犹太学者，把《资本家的圣书》只传授给拥有一百万家产的教内人士”。

布莱希勒德

“一百万法郎或马克在我看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目，我建议改为一百万美元。”

杰伊·古耳德

① 指旧约传道书。1881年由欧内斯特·勒南译成法文。该书的中心意思是说，上帝是万能的，对他必须完全信赖。——编者注

一 资本这位上帝的本性

1. 默诵你的上帝——资本所说的话。

2. 我是吃人的上帝。我坐在工场里大口吞噬雇佣工人。我把工人孱弱的生命变成神奇的资本。我深奥莫测；我之所以能永恒地存在，那是靠会变质腐败的人肉；我之所以是万能的，那是因为人是虚弱的。资本的惯性力来自工人的活力。

3. 最最基本的原则：一切生产均从我开始；一切交换均以我为终点。

4. 我是活生生的、无所不在的上帝；铁路、高炉、小麦、轮船、葡萄园、金银币——这一切都是无孔不入的资本的组成部分。

5. 我是文明世界中无与伦比的灵魂，具有变化无穷的外形。我生活在一切买卖交易之中，活动在每一件商品里，任何商品都不能在我那活生生的统一体之外存在。

6. 我不断增长，象一条看不见的长河，无声无息地注入物质之中。我分成无数细小的部分，牢牢地依附在每一件商品的特殊形式里，不知疲倦地从一种商品转到另一种商品；今天是面包和肉，明天是生产者的劳动力，后天又是铁块、一匹白布、一部戏剧作品、一公担油脂和一口袋肥料。资本的流转从不停止。我的实体永远不会消亡，只有形式才会消亡，它是有限度的、暂时的。

8. 人们能看见、触摸、感觉到和尝到我的躯体。但我的灵魂则比以太更难以捉摸，是人的感官所无法感觉到的。我的灵魂是信贷，它不需要以什么形态来表现。

9. 我的灵魂比著名的化学家伯塞利于斯^①和热拉尔^②更有本

① 瑞典化学家，死于1848年。他对现代化学做出重大贡献：分设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建立化学符号，绘制化学当量转换表等等。——编者注

② 法国化学家(1816—1856)。——编者注

事，它能把广阔的田野、巨大的机器、沉重的金属和成群的牛羊变成一张张股票。在交易所——我神圣的庙堂里，运河、高炉、矿山和工厂变得比充满气的皮球更轻巧，从一个人的手里跳到另一个人手里。

10. 只要是在银行统治的国家里，如果没有我，一切活动都将停止。我使劳动变得丰富多采，我使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力量驯服地为人类服务，我把知识宝库的钥匙交给人类。

11. 我把社会罩在工业和商业的金网里。

12. 没有资本的人赤身裸体地在生活中徘徊，处在用各种刑具武装起来的凶狠的敌人包围之中。

13. 假如没有资本的人象公牛一样健壮，他将担负更重的担子；假如他象蚂蚁一样勤劳，他将加倍地干活；假如他象驴子一样从不挑食，他的口粮将被减少。

14. 如果没有资本，科学、道德和劳动会是什么样子呢？——空虚和精神颓废。

15. 没有资本赐予的恩典，科学将把人类引上疯狂的道路；劳动和道德将把人类推入苦难的深渊。

16. 无论科学、道德或劳动，都不能满足人在精神方面的要求，只有我，资本，才能满足人的如饥似渴的欲望。

17. 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拿出或收回资本，不受任何约束。我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都在我的统治之下。

二 资本的选民

1. 人只是一堆污秽不堪的脏物，他赤条条地象一条蛆虫来到世界上。以后，又象一具僵硬的木偶被封在盒子里，埋入地下，慢慢腐烂，变成肥田的肥料。

2. 然而，我，资本，是世界上最崇高、最圣洁的。我却偏偏挑选这个臭皮囊作为我的替身。

3. 牡蛎和蜗牛的价值是由它们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资本家之所以重要，那只是因为他是我的选民。他的价值大小取决于他所代表的资本大小。

4. 我能使恶棍发财致富，不管他多么卑鄙下流；我能使正人君子变成穷光蛋，不管他的行为多么端正。任何人只要合我的心意，就能成为我的选民。

5. 我在选择资本家时，既不考虑他是否聪明、诚实，也不考虑他是否年轻、美貌。他的愚妄、卑劣、丑陋和衰老恰恰证明我的力量。

6. 正因为资本家是我挑中的选民，所以他就是一切美德、一切美好的东西和一切聪明才智的化身。人们把它的无知当作机灵的表现，认为他的才干不该用在繁琐的科学上面；诗人在他的身上汲取灵感；艺术家把他的意见视为“圣旨”；妇女认定他是最理想的唐·璜；哲学家把他的秽行劣迹捧为最高尚的美德；经济学家发现，他的好逸恶劳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7. 一大群雇佣工人替资本家干活，而资本家则用自己的肠胃和下身劳动，他大吃大喝，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

8. 资本家既不动手也不动脑子。

9. 他有一批象牲畜一般的男女替他耕地、炼铁、织布。他手下有一批经理和工头替他管理车间，有一批学者替他思考问题。资本家只从事拉屎撒尿的劳动，他把吃喝到肚子里的东西变成粪肥。

10. 我让我的选民沉醉在一种永恒的幸福之中。因为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吃、喝、玩、乐更美好、更实在呢？其余一切均是虚假的，只会使人精神颓废。

11. 我尽可能地减轻和消除选民的一切烦恼和痛苦，让他轻松

愉快、无忧无虑地生活。

12. 视觉有自己的器官；同样，嗅觉、触觉、味觉、听觉和性欲也都有自己的器官。我从不拒绝选民的眼睛、嘴巴以及其他器官的欲望。

13. 美德有其两重性：对资本家来说，满足自己的欲望就是美德；而对工人来说，抑制自己的欲望就是美德。

14. 资本家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世界上的一切占为己有，因为他是世界的主宰。当他对妇女感到厌倦时，他可以用贞洁的少女来刺激自己的性欲。

15. 资本家就是法律。立法者根据他的需要制定法律，哲学家使道德符合他的习性。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正确的和美好的。一切侵犯他利益的行为都是犯罪，必须受到惩罚。

16. 我让我的选民享受工人们所不能享受的世界上唯一的幸福。获取利润就是最大的快乐。对于我的选民来说，只要能谋取利润，哪怕丧失妻子、母亲、孩子、爱犬和荣誉，也在所不惜。但是不能获得利润则是资本家无法忍受的最大痛苦。

三 资本家的义务

(一)

1. 应召而来的人很多，但只有少数人被选中。我的选民的人数在一天比一天减少。

2. 我把自己交给资本家，让他们去分配。每个选民获得整个资本的一部分。只有在扩大资本、产生新的资本的时候，他才会感到其乐无穷。谁不遵循资本的法则，谁就会丧失资本。

3. 我选资本家是为了让他去榨取剩余价值。他的任务是积累利润。

4. 为了能自由自在地获取暴利，资本家切断了友谊和爱情的

纽带。对于他来说，哪里有钱可赚，那里就没有什么朋友、兄弟、母亲、妻子、儿女可言。

5. 不同于一般凡人，他凌驾于国家和政党之上。不管他是俄国人还是波兰人，法国人还是普鲁士人，英国人还是爱尔兰人，白种人还是黑种人，他首先是剥削者。对于他来说，做一个保皇派或共和派，保守党人或激进党人，天主教徒或自由思想者，这些都是次要的。金子有其自己的色彩。在它的面前，资本家的一切信念就不带任何色彩。

6. 资本家以同样冷漠的态度，把沾满鲜血、泪水和污泥的金钱装入自己的腰包。

7. 他决不愿成为庸俗的偏见的牺牲品。他开设工厂，决不是为了生产高质量的商品，而是为了制造能够给他带来巨额利润的商品。他组织金融团体，决不是为了分配红利，而是为了攫取股东们的资本。小资本从属于大资本，在大资本上面还有更大的资本，后者每时每刻都在寻找吞噬小资本的机会，这就是资本的法则。

8. 我在把人提升为资本家的同时，也将自己主宰一切的权力分一部分给他。

9. 资本家应该宣布：我就是社会；我的兴趣和爱好就是道德；我的利益就是法律。

10. 只要有一个资本家的利益受到损失，整个社会都会因此而蒙受苦难，因为若不能扩大资本，这是无法对付的巨大灾难。

11. 资本家让别人生产，而自己却不从事生产，他让别人劳动，而自己从不劳动。他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否则他将无法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积累利润。

12. 资本家决不想成为空踩转轮的松鼠，出力不少，但一无所获。

13. 他对关于天国里的上帝的荣耀的神话故事不感兴趣；他不

想弄清楚蝉究竟是靠翅膀还是靠背部发音的；他也不想知道蚂蚁是不是“资本家”^①。

14. 他不想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他只关心一件事：要它们给他带来利润。

15. 他听任那些官方经济学的卫道士去大谈什么单本位制和复本位制，他只知捞钱，金币也好，银币也好，他统统都要。

16. 他让专门的学者去研究种种自然现象，让发明家去探索把大自然的力量运用于工业生产的可能性。但是，一旦某项发明或研究成果变得有利可图时，他立即把它占为己有。

17. 他不愿花费脑筋去思考美和善的同一性和统一性，但是他很欣赏样子难看而味道鲜美的块菰。

18. 他对宣扬永恒真理的演说拍手叫好，但他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种种欺骗的手段赚钱。

19. 他不想揣测美德、良心和爱情的实质是什么，但他却热衷于拿它们做交易。

20. 他不愿探讨自由本身好不好，但他却剥夺了工人的一切自由，留给他们的只是名存实亡的自由。

21. 他无意参加关于权利是否高于实力的讨论，但是他知道，他享有一切权利，因为他拥有资本。

22. 无论对普选法，还是对有资格限制的选举法，他都不表示赞成或反对。他利用这二者：收买参加有资格选举的选举人和欺骗参加普选的选举人。如果一定要他作出抉择的话，他就会赞成普选，因为它比较经济合算；假如实行有资格限制的选举，他就不得不同时收买选举人和当选人，而在实行普选时，他只要收买当选

^① 《资本家的圣书》的作者在这里显然是指那些饶舌而又无聊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资本在人之前就已存在了，因为蚂蚁贮存食物如同资本家积累资本一样。——拉法格注

人就够了。

23. 他从不卷入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无谓争论，他从商业和工业的需要出发，有时赞成自由贸易，有时赞成保护关税。

24. 他没有任何原则，甚至连不讲原则这一条原则也没有。

(二)

25. 资本家是我手中的一根钢鞭，我用它鞭笞成群不听话的雇佣工人。

26. 人类的一切情感在资本家的心中已经泯灭，他没有一点怜悯心。他对待自己的同类比对待牲畜更加残忍。男人、女人和儿童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创造利润的机器而已。他的心肠比石头还要硬，他对工人的疾苦熟视无睹，对他们的痛苦呻吟充耳不闻。

27. 如同一架渐渐把甜菜渣完全压碎挤干的榨糖机，资本家把工人的血肉和神经榨干，以便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他把工人的每一滴汗水变成资本。当工人被他完全榨干，已经精疲力竭，无力继续进行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他就把他们当作厨房的垃圾扔到大街上。

28. 如果哪个资本家怜惜工人，那就是背叛我，也是背叛他自己。

29. 资本家使男人、女人和儿童商品化；这样一来，那些没有油料，没有羊毛，没有商品的人起码可以出卖他们的体力、才智和良心。在变成资本之前，人首先应该成为商品。

30. 我是资本，宇宙万物的主宰，资本家是我的代表；在他的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大家都受他的剥削。出卖体力的劳工、出卖知识的工程师、出卖诚实的出纳员、出卖良心的议员、出卖肉体的妓女——所有的人都是供资本家剥削的雇佣者。

31. 他使工人日臻完善：他迫使他们靠粗茶淡饭来恢复体力，

以最低的价格出卖其劳动力；他要求他们过隐士一般的禁欲生活，具有驴子的耐心和黄牛的埋头苦干的精神。

32. 雇佣工人归资本家所有。他们是他的役畜、财产和物品。在分不清什么时候太阳升起、什么时候夜幕降临的工场里，资本家让成百双警觉的眼睛监视着工人，防止他们因为说一句话或做一个动作而影响干活。

33. 工人的时间就是金钱，他们浪费一分钟时间就等于盗窃资本家的钱财。

34. 资本家的压迫就象影子一样始终跟随着工人，甚至在他们栖身的窝棚里，也是如此。因为不能让社会主义的书刊和谈话毒害工人的思想，不能让娱乐累垮他们的身体。工人从工场里出来后，应该直接回家，吃罢晚饭，便倒头睡觉，以便在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任劳任怨地为他们的主子干活。

35. 资本家不承认工人的任何权利，甚至连受奴役的权利，即劳动的权利，也不予以承认。

36. 他扼杀工人的聪明才智和技艺，把他们交给不会反抗的机器。

四 神明的箴言

1. 水手生活在惊涛骇浪中，矿工冒着爆炸和崩塌的危险在井下作业，工人在铁制机器的轮子和传动带中间干活。从事劳动的雇佣工人面临着伤残和死亡的威胁，而不劳动的资本家则不会遇到任何危险。

2. 劳动使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很大摧残，但是它并不能使人致富；积累财富不是靠自己劳动，而是靠强迫别人劳动。

3. 劳动创造的财富被用来奖赏懒惰。

4. 不可能从石头里挤出酒来，也不可能从死人的身上榨取利

润：只能靠剥削活人。刽子手每处死一个犯人，就等于从资本家手里夺走一个可供剥削的活人。^①

5. 金钱和一切能够赚钱的东西都没有臭味。

6. 金钱用其数量来掩盖其丑恶的性质。

7. 金钱是有钱人美德的化身。

8. 善行决不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

9. 每晚临睡前，最好能对自己说：“今天我做了一笔好生意”，而不是说：“今天我做了一件好事”。

10. 假如工场主能让工人在二十四小时内干十四个小时的话，那么他这一天就算没有白过。

11. 不要怜惜埋头苦干的好工人或调皮捣蛋的坏工人，因为不管是好马还是劣马，都需要用马刺去刺它，才会快跑。

12. 不结果的树木应该砍下来当柴烧掉。不能再创造利润的工人应该让他挨饿。

13. 工人如果敢于起来反抗，就请他们吃铅弹。

14. 把桑叶变成蚕丝比把工人的劳动变为资本需要更多的时间。

15. 大肆掠夺工人，然后拿出一丁点儿发还给他们，这就是慈善事业。

16. 合作社就是要求工人同心协力地为资本家创造财富。

17. 工人参加管理就是让资本家鲸吞绝大部分劳动果实。

18. 资本家这个自由的狂热信徒，从不施舍，因为施舍剥夺了失业者饿死的自由。

19. 人只不过是一架既生产又消费的机器。资本家一方面要出钱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又要推销产品。

^① 传道书从资本这个角度出发，向我们揭示了维克多·雨果和其他伪善的博爱主义者为什么如此起劲地叫嚷废除死刑的原因。——拉法格注

20. 资本家善讲两种语言：一种用于买，另一种用于卖。

21. 谎言就是资本家的生财之道。

22. 循规蹈矩和忠厚老实是扼杀生意的毒药。

23. 偷所有的人就等于没有偷。

24. 用对自己的忠诚来证明人是可以象狗一样忠心耿耿的。

25. 提防小人，但也不要相信君子。

26. 许诺是好心肠和客气的表示，但是兑现诺言却意味着思想上的软弱无力。

27. 货币上既可以印君主的头像也可以印共和国的徽记，因为它象空中的飞鸟，只属于能够捕捉到它的人。

28. 一百个苏的钱，即使掉在垃圾堆里，也总会被拣起来。

29. 你为一大堆事情烦恼和操心，你力求成为一个诚实的人，你渴望得到知识、地位和荣誉，但这一切都是空的，毫无意义。只有一件东西是必需的：资本，除了资本，还是资本。

30. 青春终究会消逝，美色终究会凋谢，智力终究会衰退。只有金钱才能永葆其美妙之青春。

31. 金钱是资本家的灵魂，是他行动的目的。

32. 老实告诉你们：一个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的人，即使他身上的才能和美德比去市场赶集的驴子所驮的货物还要多，也远不如一个腰包里塞满金币和钞票的富翁来得光荣和体面。

33. 天才、智慧、贞操、诚实和美德之所以存在，那是因为它们可以作为商品出卖。

34. 只有在别人的身上，美德和劳动才是有用的。

35. 对于资本家来说，没有比吃、喝、玩、乐更美好的事情了。这一点是他在整个一生中始终应该信守不渝的。

36. 只要他还活在阳光普照的人间，他就应该尽情地享乐，因为人生中的每一个时刻都只有一次，一去不复返，任何人都不可避

免地要衰老，要进入坟墓。

37. 在墓穴里，日夜伴随你的将不是什么美德，而是一条条蛆虫。

38. 除了用山珍海味来填满肠胃和尽可能地满足身体各个感官的强烈欲望之外，其他一切都是虚假的，都只会造成精神上的颓废。

五 结束语

1. 我是资本，世界的主宰。

2. 我同虚伪、妒忌、吝啬、诽谤、凶杀结伴而行。我拆散家庭，挑起战争。我每到一处，就在那里散布仇恨、绝望、贫困和疾病。

3. 我是冷酷无情的上帝。我喜欢纷争和苦难。我百般折磨工人，我也从不怜惜我的选民资本家。

4. 雇佣工人无法逃出我的手掌。假如他躲进深山，我就在山的另一侧等他；假如他漂洋过海，我就在大海的彼岸等他。工人是我的囚徒，整个地球都是监禁他们的牢房。

5. 我让资本家终日沉湎于荒淫无度的、病态的享乐之中；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阉割我的选民：他们的生理机能和智力正在逐步退化。

6. 我把一切令人向往的东西全部赐给资本家，但同时又使他们失去一切欲望。我在他们的餐桌上摆满美味可口的佳肴，而又夺去他们的食欲；我给他们找来许多年轻、温存的姑娘，而又使他们再也没有性欲的冲动。在他们的眼里，整个世界是多么平淡无奇，枯燥乏味；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厌倦。他们碌碌无为，虚度年华，但是每当他们想到死亡正在临近的时候，他们又害怕得浑身发抖。

7. 只要我高兴，我可以出于人类的智力所无法理解的原因来惩罚我的选民，把他们推入苦难的深渊，让他们同雇佣工人一样过

地狱般的生活。

8. 资本家是我手中的工具，是我用来抽打雇佣工人的皮鞭。我一方面使他们处在社会的最上层，另一方面我又鄙视他们。

9. 我是引导人类并能改变其理性的上帝。

10. 古代的一位诗人曾对资本主义时代作出过这样的预言：“今天，善与恶混杂在一起。但是，将来终有一天，家庭的纽带、正义和美德将不复存在，阿伊德和涅墨西斯^①将回到天上去，邪恶将是无可匹敌的。”^②预言中宣布的时代已经到来：象大海里的巨怪和森林中的猛兽一样，人类正在野蛮地互相厮杀和吞噬。

11. 我对人类的智慧嗤之以鼻。

古代的圣人说：“劳动吧，你将免于饥饿；劳动吧，你的粮仓里将堆满粮食。”

我则说：“劳动吧，饥饿和贫困将是你的忠实伴侣；劳动吧，你将把你的家财全部典当光。”

12. 我是推翻一切君主王朝的上帝。我把那些不可一世的人物置于平等的桎梏之下；我扼杀人类粗卤和自私的个性；我使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结合起来，共同铸造未来社会的共产主义模式。

13. 人类已经赶走天上的梵天、丘必特、耶和华、耶稣和真主，我也将以自杀而告终。

14. 当共产主义成为社会的指导原则时，资本——这位主宰过去和现在的上帝——的统治便告结束。资本不再统治世界，它将服从于它所憎恨的劳动者；人不再拜倒在他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创造出来的东西面前，他将从此站立起来，以主人翁的身份看待周围的大自然。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编者注

② 对资本主义时代的这一预言摘自赫雪得的《劳动与日子》。它比宣布耶稣降临的预言更为真实可信。——拉法格注

15. 资本是最后一位上帝。

资本主义的祷文

一 主日的祈祷

资本，我们的主，您来自我们这个世界，您是万能的。您能改变河道，在崇山峻岭中开凿隧道，把大陆分开，使民族联合。您是商品的创造者和生命的源泉。您向国王和臣民、工厂主和雇佣工人发号施令。愿您的统治遍及地球的每个角落。

请赐给我们大批买主，让他们不分好坏地把我们的商品统统买走。

请赐给我们一贫如洗的工人，让他们服服帖帖地从事一切活动，并满足于最低的工资待遇。

请赐给我们对我们的商品广告深信不疑的傻瓜蛋。

让我们的债务人偿还他们的全部债款^①，让银行贴现我们的证券。让马扎斯监狱的大门永远不要朝我们敞开，让破产与我们无缘。让我们永远赢利。

阿门。

二 信条

我信奉资本，它是物质和精神的主宰。

^① 基督教的《我们在天之父》是乞丐和流浪汉专门为负债累累的穷鬼编写的。它向上帝请求宽容债务，用拉丁文来说就是：“dimite nobis debita nostra”。但是，自从财主和高利贷者信奉基督教以后，教会的神父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债务”一词改为“罪过”和“渎犯”。神学家和大财主德尔图良是一个大债主，他曾就《主日的祈祷》写过一篇文章。他认为，“债务”一词应作“罪过”解释，因为这是基督教所唯一能够宽容的债务。资本的宗教比天主教更进一步，它要求偿还全部债务，因为信贷是资本主义交易的灵魂。——拉法格注

我信奉利润，它是完全合法的资本之子；我信奉信贷，这一圣灵依附于资本，并与资本一起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我信奉金子和银子，它们经过造币厂的铸造，变成合法的货币，在全世界流通，但是由于它们的份量太重，所以后来被贮藏在银行的地下室里，由纸币取而代之。

我信奉五厘的利息，也信奉三厘或四厘的利息；我信奉真正有价值的证券。

我信奉国家发行的公债，它使资本在商业、工业和借贷活动中不承担任何风险。

我信奉个体所有制，它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但它将与世长存。

我信奉贫困，它对提供雇佣工人和产生剩余劳动是完全必要的。

我信奉永恒的雇佣制，它使劳动者不用为财产而操心。

我信奉延长劳动时间，减低工资和在生产中弄虚作假。

我信奉这样的神圣信条：贱买贵卖。与此同时，我信奉官方的政治经济学，它对我们神圣的教会来说是永久不变的原则。

阿门。

三 致 敬

（致敬，贫困！）

向您致敬，贫困！您击败和征服了劳动者，让他们倍受饥饿的煎熬，迫使他们为了一块面包而出卖自己的自由和生命；您扼杀他们的反抗精神，强迫他们和他们的妻儿从事资本主义的苦役劳动。向您致敬，大慈大悲的贫困！

您是贞洁的圣母，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利润；您是威严的女神，赐予我们卑贱的雇佣工人阶级。我们为您祝福。

您大量地产生剩余劳动和利润。求您保佑我们和我们的亲人。

四 金子的赞歌

金子，你是神奇的商品，在你的身上体现了其他一切商品。
金子，你是最基本的商品，其余一切商品最终都要变成你。
你是衡量一切的神。

你是资本这位上帝的最完美和最理想的化身。

你是自然界中最高尚、最美妙的因素。

你从不会霉烂、腐蚀变质和生锈。

金子是永不变质的商品，是绚丽的花朵，皎洁的月亮和灿烂的太阳。你永远是纯洁的。你从万物之母的大地中来，又回到远离阳光的高利贷者的保险柜和银行的地下室中去；你从你的藏身之地，把自己的力量转让给微不足道的一张张薄纸，而它们则使你的价值成倍地增长。

毫无生气的金子能够扭转乾坤；在你灿烂的光辉面前，充满生机的时代卑谦地向你鞠躬致意。

请你降福于你的忠实信徒，他们向你祈求，他们为了占有你，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美德、尊严以及爱妻和亲生儿女们的爱，不惜践踏自己的人格。

* * *

金子，你是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主宰，——请听我们的祈祷。

你是城镇的建造者和国家的破坏者；

你是道德的北斗星；

你是良心的天平秤；

你对国家发号施令，把教皇和国王置于你的束缚之下；请听

我们的祈祷。

你教导学者去伪造科学，说服母亲出卖天真无邪的孩子，迫使自由人接受工厂的奴役；——请听我们的祈祷。

你收买法官的判决和议员的表决，——请听我们的祈祷。

你生出至今尚不为自然界所知的花朵和果实；

你散播邪恶和美德；

你产生艺术和奢侈；——请听我们的祈祷。

你延长懒汉无用的生命，缩短劳动者的寿命，——请听我们的祈祷。

你对摇篮中的资本家微笑，你虐待嗷嗷待哺的无产者，——请听我们的祈祷。

* * *

金子，你是不知疲倦的旅行者，你酷爱欺诈和斤斤计较，——请实现我们的愿望。

你可以代替所有的语言。

你是精明能干的中间人，

你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你是衡量人和物的尺度，——请实现我们的愿望。

你是和平的使者，纠纷的温床，

你是游手好闲和剩余劳动的创造者，

你是美德和堕落的助手，——请实现我们的愿望。

你是能使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的神，——请实现我们的愿望。

你是无数人诅咒和祈求的对象，你受到资本家的崇拜和妓女的宠爱，——请实现我们的愿望。

你是消除病痛的灵丹妙药，——请实现我们的愿望。

你使世界着魔，使人类变得浑浑噩噩；

你把丑陋装扮成美丽，把粗俗装扮成文雅；

你是万物的调和者，你把寡廉鲜耻与美德相提并论；你使小偷和妓女与正人君子为伍；——请实现我们的愿望。

你把属于勇敢者的荣誉给予懦夫；

你把对美丽的称颂用来赞扬丑陋；

你把属于年轻人的爱情赐予白发苍苍的老人；

你是作恶多端的巫婆，——请实现我们的愿望。

你是煽动残杀和暴力的恶魔，——请实现我们的愿望。

你是照亮人生道路的火炬；

你是资本家的领路人、保护者和大救星；——请实现我们的愿望。

* * *

金子，光荣的君主，正义的太阳；

金子，生活的动力和人生的乐趣。

负有盛名的金子，请到我们这里来。

金子，你对资本家亲，对生产者恨，——请到我们这里来。

你是享乐的镜子，

你把劳动果实奉送给寄生虫，——请到我们这里来。

你把那些既不犁地又不种植葡萄、既不耕耘又不收割的人的仓库装满，——请到我们这里来。

你用大鱼大肉喂养那些既不放牧又不出海与风浪搏斗的人，——请到我们这里来。

你代表资本家的力量、知识和智慧，——请到我们这里来。

你是资本家的美德和光荣，是资本家的美和荣誉的化身，——请到我们这里来。

请到我们这里来吧！诱人的金子，我们崇高的理想。你是资本家一切行动、一切思想和一切情感的出发点和归宿。

阿门。

资本家约伯·路特希尔德的哀鸣

资本，我的上帝，我的主，你为什么抛弃我？

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以致你把我从富足的顶峰一下子推入贫困的万丈深渊？

难道我不是按照你的法律生活吗？难道我的行为不正派、不合法吗？

难道因为我过去曾经劳动过，所以就应该责备自己吗？

难道我没有尽情地挥霍和享受吗？难道我没有强迫男子、妇女和儿童不分昼夜地拚命干活吗？难道我付给他们的工资不是使他们难以糊口吗？难道我对工人们的贫穷和绝望曾经动过一丝怜悯之心？

资本，我的上帝，我不管消费者的死活，在商品中掺假；我用广告引诱傻瓜上钩，骗取他们的钱财。

享乐和赚钱是我生活的唯一目标。你曾对我完美无缺的品行和无可挑剔的生活大加赞扬，因而赐予我女人、孩子、马匹和仆人，给我提供一切肉体和精神上的享受。

如今我失去了这一切的一切，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物！

我的竞争对手对我的破产幸灾乐祸；我的朋友与我断绝来往，他们连对我说几句空洞的安慰话或者几句责备的话都不肯。他们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我的情妇坐着用我的钱购置的马车，遇到我连头都不回，扬长而去。

贫困象一堵监狱的高墙把我紧紧地围住，不让我同其他人接触。我孤单一人，在我的周围和内心里是一片黑暗。

我的妻子因无钱购买香粉和胭脂，竟变得奇丑无比。我的儿子从小过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什么事情也不会干，甚至

无法理解我的巨大不幸。他简直是个白痴！我的女儿每想到错失的良缘就泪如泉涌。

可是亲人们的痛苦与我的不幸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想在我曾经以主人的身份发号施令的地方谋个职位，结果被赶出大门。

我现在栖身的地方又脏又臭。我睡的是硬板床，被臭虫一类的虫子咬得无法休息，无法进入能叫人忘记一切的梦乡。

那些一直在贫困和污秽中生活的穷人是多么幸福啊！他们从未尝过高雅和舒适的生活的滋味，他们粗糙的皮肤和愚钝的感觉不会对任何东西产生厌恶。

为什么让我品尝幸福的滋味？难道这只是为了给我留下比输钱更令人伤心的回忆？

主啊！与其让我从一个百万富翁变成一个穷光蛋，还不如让我生下来就是一个穷人。

为了挣一小块面包，我又会做什么呢？

我那双戴惯钻石戒指和拿惯钞票的手根本不会使用工具。我的脑子只会想如何能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会想如何在财富的重荷下得到安逸，只会想如何寻欢作乐，消磨时光，只会想如何摆脱富足所带来的种种烦恼。我对书写信件或加减运算这类伤脑筋的事情一窍不通。

主啊，难道一个对你向来唯命是从的人竟会受到你如此无情的打击？

让我失去别人用辛勤的劳动为我积累起来的财富，这太恶劣、太不公正、太不道德了。

当别的资本家看到我遭受如此巨大的不幸时，他们便会想，你的仁慈原来是变化无常的，你会无缘无故地宠爱某一个人，然后又莫名其妙地把他抛弃。

到那时候，谁会相信你呢？

假如将来的前途是捉摸不定的，假如交易所里稍有风吹草动就能使资本最雄厚的人破产，假如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可靠的，假如今天的百万富翁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一无所有的乞丐，那么，哪一个资本家会再如此大胆、如此冒失地服从你的法律，使自己沦落为一个四肢不勤、只会享受的废物呢？

资本，我的上帝，当人们看到我遭受这样巨大的屈辱时，定会诅咒你的！当人们看到我摔得这么厉害时，就会否定你的力量，拒绝接受你的恩惠！

为了你自己的声誉，请恢复我昔日的地位，请把我从泥坑中解救出来，因为我现在牢骚满腹，内心充满着痛苦和怨恨。

冷酷的、瞎了眼的和愚笨的上帝，请你注意，富人最终会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深渊的边缘；请你注意，他们会拿你来填平这万丈深渊，同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把你消灭。

啊，我犯了多么严重的渎神罪！伟大的上帝，请宽恕我对你的冒犯和不恭！

你主宰一切，你在分给某人财富时，并不考虑他的功绩如何；你在剥夺某人的财富时，也不考虑他的罪恶大小。你完全按照你的意志行事，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你把我摔得头破血流，这是为了我好；你让我经受种种考验，这也是为了我好。

温柔、仁慈的上帝啊！请重新赐福于我：你是正义的化身，我肯定犯了我还不太清楚的某种过失，所以才受到你的惩罚。

主啊！假如你发还我的财产，我发誓，我将更严格地遵守你的法律，更残酷地剥削雇佣工人，更巧妙地欺骗消费者，更狡猾地诈骗傻瓜们的钱财。

我对你就象狗对鞭打它的主人一样顺从。我是你的所有物。

愿你的意志能够实现。

照抄不误。

保尔·拉法格

译自《拉法格选集》1970年巴黎法文版

第192—238页。

(王鹏译)

革命的次日*

(1887年)

美好的法国对进步向来是采取同情态度的。但是这里的一切事情只有通过暴力、经过革命才得以完成。为了阻止东京人占据总统的职位，不得不在巴黎以暴动相威胁^①；为了在各剧院装上电灯，竟需要对二百多人处以火刑。

在其他欧洲大国，资产阶级是逐步地、在不发生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取得政权的，在法国则引起了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次革命。

法国统治阶级是很反动的，只有诉诸武力才能促使他们采取最微不足道的进步措施。从1815年起，在法国就存在贴着形形色色标签的议会制度，但是为了实行某些议会改革，例如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普选权等等，必须诉诸革命。从那时以来，革命以天体运行那样的周期性反复出现。下一次革命的期限很快就将到来。因此，弄清楚社会主义者在革命的次日将做些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是有益的。

1871年，政权落到人民手里，但是那时人民还没有作好取得政权的准备。在革命时期夺取政权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保持政权，尤

* 本文首次发表于《社会主义者报》1887年第113、114、115、116号。——编者注

① 这里所说的东京人指茹尔·费里，因为他参与了侵略越南北部（当时法国人称越南北部为东京）的殖民战争。当茹尔·费里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在巴黎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编者注

其是运用政权，则要困难不知多少倍。

公社在占领巴黎后没有能够采取任何一项真正社会主义的措施；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未能这样做，可以用许多原因来加以解释，但现在不是说明这些原因的时候。

让资产者不要为公社的错误而兴高采烈吧！他们尽可以相信，如果有朝一日事态的发展导致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那时社会主义者将采取激进的、直接的措施，使幸灾乐祸的反动派无法再恢复从前的局势。

一

在革命的次日社会主义者将面临三项巨大的任务：

1. 组织革命政权和采取措施保卫这个政权；
2. 立即满足人民的需要；
3.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奠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革命政党将遇到三个阶级，它们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这些阶级是：大工业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及其附属物——小工商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将在各工业城市中占统治地位，这些工业城市都将成为革命中心并建立联邦，以便把农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并克服在一些商业城市和沿海城市（例如哈佛尔、波尔多、马赛等）中出现的反抗。

在各工业城市中，社会主义者必须夺取地方机构的权力，武装工人并且把他们按照军事方式组织起来；布朗基曾说过，**谁有武器，谁就有面包**。他们将打开监狱的大门，释放那些小偷，而把诸如银行家、资本家、大工业家、大财主这样的大窃贼关进去。不会虐待这些人，但将把他们当作人质，以担保他们本阶级的良好行为。

革命政权将通过简单夺取这样的方式而建立起来，只有当新政权完全掌握局势的时候，社会主义者才会实行真正的普选制，以便使自己的行动得到确认。资产者曾经很久不让穷苦阶级获得选举权，因此，如果在革命政党取得胜利以前剥夺所有原先资本家的选举权，他们不应对此大惊小怪。

在十九世纪，不仅革命口号来源于巴黎，而且巴黎为整个法国进行了革命。革命运动之所以会这样集中，是因为十九世纪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一般的议会危机，伴随着街垒、枪击以及关于伟大的原则、关于自由、正义和其他无稽之谈的浮夸言词。巴黎人是一伙不可救药的轻信者，他们热衷于情节奇异的演出；政治活动家可以为他们安排随便多少这样的演出；但是正当大街上发生激烈的冲突时，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茹尔·法夫尔和茹尔·费里之流从反对派偷偷地爬上了刚刚被推翻的前任们留下的肥缺，而在经济关系方面一切原封不动。

但是，由于即将到来的革命势必是经济革命，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些执政者来代替另一些执政者，它将同时在巴黎以及所有工业中心爆发。一旦建立起地方革命机关以后，这些机关必须通过派遣代表或其他方式建立中央政权。中央政权必须承担义务采取符合革命利益的普遍措施，并且防止组成反动党派。

但是为了使工人群众支持地方和中央的革命政权，为了使革命（即使是遭到失败的革命）留下任何反动派都无法消灭的成果，必须立即满足城乡工人的需要，必须彻底动摇资产阶级制度，必须着手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

二

革命政权只有在得到工人群众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够抵抗反动

派猛烈而又奸诈的进攻，因此，它必须立即采取满足工人们的最迫切需要的措施，把工人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在文明最发达的时代，必须回复到原始时代的社会观，并且承认国家的全体男女公民是一个大家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大家庭中已不再存在长子权；革命政权必须采取措施满足他们的最重大需要，以等待可以对全部产品实行平均分配的時刻的到来。

因此，将在每一个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必须向全体居民提供住房、衣服和粮食。

为此它将颁布法令，宣布所有房屋都是国家财产，对住宅进行登记，把游手好闲的富人迁出他们的私邸，把位置最好的房子分配给有很多孩子的家庭。在有六七层大楼的巴黎和各大城市，它将把下面的几层分给怀孕的妇女，而迫使大腹便便的资本家搬到五层楼和六层楼，让他们爬爬楼梯，以便减少他们身上多余的脂肪。工人们由于贫穷不得不居住的那些有碍健康的破旧小房将加以拆除和烧毁，以改善卫生；为了使这件事情进行得更快些，将用炸药来炸毁它们。要烧毁的不是宫殿，象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而是破旧的小房和茅屋；该是工人阶级搬到他们所建造的宫殿和私邸中去居住的时候了。

革命政权将把诸如“邦马舍”、“卢浮”、“普伦坦”等大商店收归国有。如果这些商店从前的老板胆敢从店里偷走哪怕一个线团，革命政权就要把他们当作窃贼对待。在每一个街区和街道都要成立委员会，负责在工人中间分配这些大商店里的东西，工人们将第一次穿上他们自己制作的用漂亮结实的料子做成的衣服。

在向劳动人民提供住房和衣服之前，必须设法使他们得到食物。革命政权将在各城区开设大的共产主义食堂，那里向居民（不管是懒惰的还是勤劳的）每天提供起码可以吃饱的食品。厨房是公共的，而那些愿意在自己家里吃饭的人可以领取自己的一份，但是

必须鼓励共同进餐的习惯，因为人们在进餐时最容易互相接近。在十八世纪的革命时代，巴黎公社曾组织过这样的聚餐会：在大街中间摆着一张张桌子，每个居民把自己的食物带到这里一起进餐。

为了能够向居民免费提供食品，革命政权将没收粮店、酒库和城堡、旅馆、啤酒店的地窖里所存的酒类以及其他物品，立即安排市镇的粮食分配，并为此同市郊的菜农和小农达成协议。这种分配方式取消既掠夺生产者又掠夺消费者的中间人，从而使农民有可能得到更有利的产品价格。

把农民争取到革命方面来在法国是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大任务之一，必须采取有利于农民的普遍措施，例如取消抵押贷款和各种债务，废除各种赋税和新兵招募等等。必须毫不动摇地设法增加他们的收入，减轻他们的劳动，向他们提供优质的种子和肥料，而农民则用土地上的产品来偿还。

在1848年，为了使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以及临时政府的其他资产者成员有可能建立共和国，工人们“决定饿三个月的肚子以支持他们”。而在期满以后，当工人们要求他们履行自己的诺言时，站住了脚跟并掌握了局势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则用发射霰弹来报答。为了建立社会共和国，革命政权将在开始时使工人们过三个月的舒适生活。

在革命的次日采取这些社会主义措施的政权将是不可战胜的；它会得到广大工人的支持，工人们将为终于找到这样的致力于满足他们需要的政府而感到惊讶和赞叹。

三

超越于个人争吵和派系纠纷之上的伟大思想，即**废除个体所有制**的思想，鼓舞着社会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这些自由放

任主义的所有主原则的不自觉的代表，甚至象布鲁斯和若夫兰这样的可能派，这些资产阶级利益的无耻捍卫者，也受到共同的鼓舞。废除个体所有制的思想不是自发地在人的脑子里产生的，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循序发展的经济现象在思想上的反映。

个体所有制有什么特点？它的特点是，所有主本人经营自己的财产，而不使用雇佣劳动，确实如此，农民作为从头到脚都浸透了所有主本能的人，当他由于年迈无法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就把土地分给自己的儿子，为的是不让雇工来耕种这些土地并进行播种。土地是农民唯一心爱的东西。对于农民来说，放弃自己的土地就象割去他的内脏那样痛苦。尽管如此，农民还是决定分自己的土地。**财产是劳动的成果**这一句法国古老的谚语很好地表达了这一事实。由此可见，真正的所有主（从这个词的古老意义上看）是自己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是自己居住在自己小房里并自己加以修理的房主，是自己买卖自己小店里的商品的小店主，是用自己的锯子斧子干活的木匠。这些所有主占有的一切确实实是属于他们的，因为他们的财产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不是他人劳动的成果，因为他们经营自己的财产，而没有使用雇佣劳动。

但是难道资本主义所有制也具有这些特点？难道矿场、铁路和运河的股票和债券的持有人、成百上千公顷土地的占有者是真的所有主？难道他们曾经什么时候在自己的企业里劳动过或者自己耕种过自己的土地？他们只知道这个财产会给他们带来利息，而作为非所有主的雇佣工人则在属于他们所有的财产中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须修改那句古老的谚语，而这样说：**财产是劳动的成果和对懒惰的奖赏。**

资本家自己不工作，而是利用自己的财产占有他人劳动的成果，从而也就消灭了个体所有制的极重要的特征。

所有主—资本家在属于他所有的财产中是绝对无用的。铁路

的全体股东和债券持有人都可以淹死在芒什海峡或地中海，而欧洲的铁路将同从前一样继续运载乘客和货物。所有主—资本家是无用的，他消费的东西却多得惊人。富人以及为之效劳并满足他的需要和奇想怪念的奴仆和其他人员所吃的一切，是纯粹亏损性的消费，就象把煤放在露天烧掉，而不是把它放在锅炉中燃烧，把得到的热能变成动力。既然资本家是无用的，就应当把他消灭，以便减少社会生产的费用。社会革命必须实现这种节约；它并不消灭财产，象无政府主义者狂妄地要求的那样，而是使之摆脱寄生虫。

在革命后的第一天革命政权将颁布的第一个法令是没收资本主义财产(矿场、纺纱厂、银行、炼铁炉、铁路等等)并把它变为国有财产的法令。

四

象贝·马隆公民和科林的信徒们那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为，国家可以代替所有主—资本家，借助于工会来经营大型的劳动工具(铁路、矿场、炼铁炉、纺纱厂等)，这些工会将变成得到国家贷款的承租人合作社；另一些社会主义者则主张，国家继续在从前的基础上经营大型的劳动工具，但是同时对工人的状况作某些改善，例如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资等等；他们的理想是完善资本主义的生产机构。

我们认为，通过建立革命政权这一事实本身，国家及其所有的机关(邮局、电信局、警察、官吏、军队、国债等等)都将废除。

国家是为了替资本家利益服务以及镇压和奴役无产阶级群众而精巧地建造成的机器。暂时取代国家的革命政权必须破坏资产阶级机器，完全依靠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并奠定新制度的最初基础。

革命政权不应当使国家继续成为邮局和电信局的主人，铸造货币，管理铁路（它已经在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样做），不应当使国家成为棉纺厂的主人、工厂的厂长等等——象拉萨尔所希望的那样，而应当使工人们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和老板，自己的厂长。

革命政权不应当把厂长、劳动规章和工资定额强加给邮递员、电信局和铁路的职工、矿工和翻砂工人，与此相反，这些工人将互相商量，选举出自己的工程师，自己的车间主任，并且在相互之间分配经营所得的收入。我这里谈到收入，只是因为革命的次日必须保持资本主义的劳动报酬，但是我们预料到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工人将不再领取工资和个人收入，而是平均地享用所有的社会财富。在革命的次日，革命政权所代表的民族把劳动工具交给生产者支配；一些专门委员会负责确定各企业承担的负责范围，也就是对向企业提供的效劳的报酬数额，对折旧、修理和改善设备所作的扣除的数额，并确定为了使社会全体成员都得到粮食、住房和衣服必须向社会基金提交的数额。

在革命的次日要完成的工作是大量的，因此不应把革命政权变成纺纱厂或制鞋厂的厂长而增加它的工作，相反，必须加快发展工人群众中所有那些将负责领导社会劳动的机关。具有组织才能的人是有的，因为正是雇佣工人现在领导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必须把他们集合起来，建立负责调整生产和公平地分配产品的委员会。

因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使正义、道德、自由以及许多世纪以来使人类受到愚弄的其他无稽之谈获胜，而是使工作尽可能少一些，智力和体力方面的享受尽可能多一些。而要达到这个真正无愧于人的目的，只有不断改善机械设备，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实行合理的分工，只有使社会的生产和需要互相适应。

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和享受都将是自由的和公共的。在实现这种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必须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还不得不保存货币形式的工资，并且根据向社会提供的效劳以及所作的努力确定工资额。我们认为，工人们将比任何一个国家官吏能够更好地在相互之间分配劳动时间和经营所得的收入。

不过，在这一方面只能表达一些愿望；这种或那种道路和行动方式将由事件的发展来决定，十分可能的是，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各种不同改造方式将根据各种条件不同地配合起来。

在革命的次日人们将渴望娱乐一番。在十八世纪，农民们冲进了城堡和市议会，夺取了各种封建的和甚至资产阶级的文据并加以烧毁。他们大放焰火，在那上面可以看到这样的题词：**废除什一税，彻底停止交纳代役租等等**。必须恢复这些公共庆祝活动。我们必须焚毁国债簿，各种各样的契据、各种道德说教文章和神学书籍，而最主要的是焚毁全部民法典和刑法典，在这部可怕的书，汇集了资产阶级的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卑鄙肮脏行为，我们还必须把法院的建筑物改作猪圈，但是将找不到那么多肮脏和丑恶的动物放到那里去。我们将不是象自由思想者所要求的那样把教堂烧掉，而是把它改成饭馆和跳舞厅；小礼拜堂将改成雅座，人们可以在那里喝酒，每个人可以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娱乐。

在革命的次日必须武装工人，并且按照军事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向他们免费提供住房、食物和衣服，没收资本主义财产并实行国有化。这种半共产主义制度哪怕只实行了一个月，尝试过它的民族就将永远被社会革命争取过来。

译自《拉法格选集》第1卷1925年
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
328—337页。

(李兴桥译)

集体主义——共产主义*

(1888年)

公民马隆写了一些关于自世界存在以来的社会主义历史的大部头著作,他把非常可笑的思想硬加在马克思的头上。

他在1月3日《不妥协派报》上追悼贝魁尔^①的一篇文章中告诉我们说,这位社会主义思想家还在1836年,即“在马克思之前,在拉萨尔和科林之前”就已经提出了“完整的经济集体主义”。这种经济集体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是:“使生产资本……和劳动工具逐步社会化,它们不应当直接由国家来使用,而应当由受国家监督、每年向国家交纳一定金额的协作社来使用。社会化应当从法兰西银行和整个信贷开始,然后过渡到铁路、工厂、运河等等……”

“这样,国家给自己建立起了财政基础,从而能广泛地贷款给按行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和毫无动荡地实现用协作劳动代替雇佣劳动……在新制度下每个工人都能自由地支配自己劳动的报酬。”

这种把工人的工会改变成由国家给以贷款的承租人协作社的做法构成科林的全部集体主义,这可能合乎拉萨尔和甘必大分子的口味,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在德国和法国的学生们对此坚

* 本文首次发表于《社会主义者报》1888年第114号。法文原文无标题。这个标题是《拉法格选集》俄文版编者加的。——编者注

① 康斯坦丁·贝魁尔(1801—1887)——法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编者注

决反对。两年前工人的工会在回答巴黎市参议会的询问时，反对市政当局打算把自己的工程直接承包给这些协作社；同时工人的工会声明，认为自己无法同资本家在不诚实方面进行竞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用工人协作社来代替资本主义公司——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贝魁尔在1836年没有看到这种不可能性还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那时大工业还没有占领全部生产领域。但是在1888年提出这种代替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就等于承认自己在经济学方面无知。

出于策略上的需要，法国社会主义者从比利时借用了**集体主义**这个词。在想出这个词的科林看来，这个词是表示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基础是承包由国家垄断的工程的那些彼此独立和甚至彼此竞争的生产协作社。一句话，这是推广到工人团体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

我在1880年，在被称为“集体主义者机关报”的《平等报》（第二次出版）上阐述了当时在法国还不大为人们所知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并试图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来代替原先的“集体主义”这个词，集体主义只是在《平等报》以后在法国成了共产主义的同义词，现在我利用公民马隆给我提供的机会声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产主义者，而不是贝魁尔和科林那种意义上的集体主义者。

译自《拉法格选集》第1卷1925年
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
326—327页。

（董荣卿译）

议会制和布朗热主义*

(1888年)

议会制是这样一种政府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会有一种幻想,似乎是人民亲自管理国家事务,而实际上真正的权力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甚至不是整个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阶级的某些阶层手中。资产阶级在其统治的初期不懂得,或者说得确切些,感觉不到需要给人民制造自治的幻想。因此,欧洲的所有议会制国家开始时都实行有限制的选举制;在所有的地方,通过议员选举来左右国家政策的权力起初只属于较大的有产者,而后才逐步扩大到不太富裕的公民,直到在某些国家把这种权力从特权变成全体居民的普选权。

* 本文首次发表于《社会民主党人文集》(“劳动解放社”出版,1888年日内瓦版),并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写的以下注释:

“我们请我们的朋友保尔·拉法格在《文集》上阐明自己关于布朗热鼓动的意见,因为它是法国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现象之一。他欣然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但是我们在供俄国读者阅读的刊物上发表他的文章时,认为有必要加以说明。

该文对议会制的抨击决不当成为一种借口,以此推断出我们俄国人没有必要争取议会制度。保尔·拉法格用社会主义观点批判议会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同专制制相比,议会制是社会发展中的一大进步。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只要它保证工人阶级得到哪怕是某种程度上的政治自由,从而使工人阶级能够组织成一个独特的党,这就够了。而这种自由的规模取决于该国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因此,我们社会主义者必须注意,在从专制制向议会制的过渡中要使俄国工人阶级能够捍卫自己最重要的政治利益。当然,议论议论‘夺取政权’的好处、我们村社制度如何‘和谐’,是决不能达到这一点的;同样,现在在我们某些反政府刊物上提出‘暂时’从社会主义者转变为自由派,也是达不到这一点的。”——编者注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财富的数量越大，占有者的人数就越少；权力也是这样：随着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人数的增长和选举产生的执政者人数的增加，实际的权力日益集中，并为越来越少数的一帮人所垄断。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如英国、法国和美国，国家政权掌握在金融家手里，虽然选举权很广泛，而且在其中两个国家中甚至还实行普选制。

选民以拟定纲领为乐事，他们的候选人宣誓要坚定不移地为实现这些纲领而努力，但是当选的候选人已经不属于自己，更不属于选民，他被对金钱的贪欲所吞没，变成了金融家的仆人，金融家们付给他现钱，或者，在议员具有卡托^①的廉洁性时，就赏以金融公司的肥缺。政治活动家可以收买是议会制的特征；政治成了职业，并且有利可图。在共和制的法国和美国以及在君主制的英国，周期地爆发的丑闻可能使天真的人们感到惊奇，但实际上这只是损害议会制度的深刻的本质上的毛病的外部表现。况且，买卖是每个资产者最主要的社会职能，——因此既没有沙糖又没有皮革出售的议员为什么不拿自己的一票做买卖呢？

在专制制的国家里，国家元首的统治是粗暴而又无理性的，他说：“我要”——这个理由就足够了；他既不用适应被统治者的需要，也不用符合被统治者的愿望，但是自称是专制的人民的仆人、人民的命令的执行者的议员们，却必须采取巧妙的手段，以便统治人民而又不破坏他们的幻想。议会制的把戏五花八门：给选民提供无害消遣的投票权和请愿权，充当回避重要和困难问题的最迅速和最可靠手段的议会委员会和议会审查；对种种无谓琐事进行无休止的、毫无意义的辩论，来消磨时间和弄得选民糊里糊涂，等等，

^① 卡托(公元前 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公元前 184 年被选为监察官，相传监察极为严格。——编者注

等等^①。

最复杂和最成功的议会把戏是把议员分成两个相互竞争的党派，彼此交替执政，来轮流掠夺人民和为有产者谋利。这种玩弄议会平衡把戏的制度只有在英国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国会议员们分成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他们的争吵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激起了公众的热情。但是，不管哪个党执政，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利益而对生产者的剥削照样顺利地进行。同时必须指出，历届自由党内阁对爱尔兰采取了最残酷的镇压措施，而保守党人却把工厂法强加于工厂主。

在法国，只是在路易-菲力浦朝代有过这种制度的类似情况。那时，通过激昂慷慨的演说和鼓动，权力轮流地从梯也尔转到基佐、再从基佐转到梯也尔手中，而资产阶级事业的进程丝毫没有变化。在法国，议会的钟摆无法正常地摆动，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政治家们的无能和他们对于权力盲目的、荒诞的酷爱；他们就象溺水的人抓住稻草那样地抱住部长职位不放，而为了保住地位，他们迎合资产阶级的保守本能和反对最无害的新措施。如扩大选举权这种

^① 为了不让无政府主义者有理由以为，我一定同意他们的理论（这种理论归根到底不过是资产阶级陈腐思想的严重夸张而已），我认为有必要作如下说明：

无政府主义者在断定议会制度有缺陷后（做到这一点毫不困难，因为这些缺陷是明摆着的），天真地以为，通过宣传反对普遍投票，利用有魔力的“消灭国家”的公式和其他同样天真的不足道的东西就能结束议会制度。但是消灭议会制并不那么容易；使无政府主义者极其愤怒的议会制诡计，抓住了公众并且使他们不注意对金融家们最有利的事情，从而使金融家能迅速地悄悄地把重大的事情办妥，如租让铁路、津贴各种被宣布为公益事业的企业、殖民地的考察、关税等等。

当一个民族分成各个阶级——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时候，保证有产者阶级的特权和使工人阶级屈从的国家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专制制是军人和贵族阶级的国家形式，议会制是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国家形式。在消灭阶级本身之前要求消灭一切形式的国家是荒谬的。一旦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它必须组织革命政权，并且用专政的手段管理社会，直到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为止，也就是直到完成生产资料（银行、铁路、工厂、矿场、制造厂等等）的国有化为止。——拉法格注

对有产者毫无危险的纯政治的改革，在英国是通过和平途径达到的，而在法国议会中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夺得。

这些革命危及资产阶级本身的存在，因为革命者利用这些革命来坚决要求实行社会改革。有产阶级那时由于担心失去自己的特权而投入了独裁者的怀抱。1848年，六月的日子以后，独裁者是卡芬雅克和路易·拿破仑亲王；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独裁者是梯也尔。因此，同一平衡的制度在法国是在另外的形式下建立的：它从比较完全的议会制的高度落到在某种程度上被议会机关有所减轻的个人统治的地步，以便以后一旦摆脱个人的专权，重新回到纯粹的议会制。但是，在法国的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从符合天意的人物，秩序和社会的救星那里来寻求摆脱社会或政治困难的出路。

继拿破仑第三的个人独裁之后的第三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俾斯麦的参与下通过巴黎的大屠杀登上了舞台；共和制形式成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犯罪活动最合适的形式。共和制的议会没有能力实现任何改革，只会损害财政状况，增加税收，从事残酷掠夺殖民地的远征使国家民穷财尽并用国家力量去为老板们镇压工人罢工服务。

在1848年和1871年，有产阶级从独裁者那里寻找摆脱经济和政治困难的出路；现在，工人、农民和小工商业资产阶级，由于对议会失去了任何希望，为了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而投向个别人物，投向布朗热将军。布朗热主义是一种不自觉的、却又令人不安和可怕的现象，它反映了社会的病态和那些破灭了幻想、对议会共和派的言行丧失了信心的、备受压迫的阶级的不满情绪。

布朗热将军^①还并不危险，但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布朗热主义

^① 若尔日·厄内斯特·让·玛丽·布朗热(1837—1891)——法国将军，政治冒险家，陆军部长(1886—1887)；企图依靠对反德国的复仇主义宣传和政治煽动在法国建立军事专政。——编者注

却是非常危险的：这是社会革命的预兆。

译自《拉法格选集》第1卷 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88—92页。

（董荣卿译）

布朗热主义和国会议员*

(1888年5月1日)

激进派和机会主义派以为他们可以利用反布朗热宣传来掩饰和回避布朗热主义或者说表现为这种形式的国家病，这是一种把头藏在沙土里来拯救自己的鸵鸟政策。但是为什么对这样一个不掌握武装力量的人怕得如此厉害呢？——布朗热是得人心的；战胜蓄奴主义军队的格兰特将军也同样是得人心的，也许是更甚于此；然而美国的共和党人却能让他回去搞金融投机。国会议员们所应害怕的不是布朗热将军，而是投票支持他的选民们……

有人说过，自1815年以来，每二十年就爆发一次革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论断。我们现正接近一个革命危机时期。法国已经让共和派议员们过了十七年的太平日子，但她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报答呢？不健全的财政，连年增加的税收，持续的工商业危机，日益加深和普遍的工人阶级的贫困。我们不是在走向独裁，而是在走向革命，只有在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被打败时，——如果他们会再一次被打败的话，——波拿巴、奥尔良、费里或布朗热的独裁才能成为可能。

* 本文首次发表于1888年5月1日《不妥协派报》。该报还以《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意见》为标题发表了拉法格致《不妥协派报》编辑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罗什弗尔公民：

请你允许一个社会主义者利用《不妥协派报》来发表他对于布朗热危机的意见。亲切地握手致意。

保尔·拉法格”

——编者注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第三和梯也尔只有在革命党失败之后，并作为有产阶级的救世主才能强行独裁。

议员们的才智都用在议会阴谋上了，所以他们看不到议会走廊以外发生的事情。他们天真地以为国家满意了，因为皮埃尔被搞下台了，保尔也被安插到部长的职位上了。如果激进派不是受到蒙蔽的话，如果他们不是由于看到他们议会阴谋被打着布朗热旗号的群众动乱搅乱而勃然大怒的话，他们也会颂扬将军的；因为，正是他向国家提供了一个名字以表达改革的需要，从而为激进派打开了内阁的大门，并迫使已被革命党人击败的费里向弗洛凯让步。

好久以来人们就等待着激进党人处于尴尬境地，现在他们掌权了；如果他们是坚定果断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和机会主义分子搞到一起去了……

激进的改革吗？被无限期地推迟了。——那些为了减轻失业者的贫困，使矿工和各行业工人得以维护自己微薄的工资而不受贪婪的老板侵犯的措施呢？他们还会关心这些事情吗？这是集体主义的，克列孟梭先生可能会说。——缩短工作日的法律呢？这是共产主义的！等等，等等。

既然激进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议员们什么都不想干，既然他们可耻地害怕布朗热这个妖怪，那就让他们把凡尔赛政府从我们手中夺走的武器还给我们吧。当全国武装起来，每个公民都有一枝枪和五十发子弹的时候，那就不必害怕来自国外的入侵，也不必害怕国内的独裁了。

译自法国《思想》杂志 1965 年 4 月号
第 26—27 页。

（彭 光译）

在 1889 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1889年7月14日)

十时,保尔·拉法格公民代表巴黎组织委员会(它的印成的报告已经分发给大家)向各省的和外国的代表表示衷心的欢迎。他特别热烈欢迎德国的代表。他们虽然在本国处境困难,但仍然有很多人到会,为的是证明,在德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之间,没有两国的沙文主义者所竭力煽动的那种愚蠢的仇恨和盲目的争吵。聚集在这个大厅里的欧洲和美洲的代表并不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他们不是在三色国旗或任何其他国旗的标志下联合起来的。他们是在红旗——**国际无产阶级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他们在这个大厅里并不是处在**资本主义的法国**,并不是处在**资产阶级的巴黎**,而只是处在**国际无产阶级、国际社会主义的首都之一**。

资产阶级正在庆祝**自己的革命一百周年**,这个革命曾宣告,它将在人与人之间实现正义、自由和平等,但是结果它只是带来对工人的最残暴、最肆无忌惮的剥削,而没有带来任何改善。资产阶级打倒了贵族,仅仅是为了夺取社会的统治权。它摧毁了**封建的巴士的狱**,仅仅是为了在全国建立资本主义的**劳动巴士的狱**,它在那里迫使无产阶级的儿童、妇女和男人遭受过度劳动的折磨。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聚集在一起这一事实就已经表明,他们要完成不同于1789年革命事业的另一种事业;他们不

向 1789 年的“人权和公民权”顶礼膜拜，这种“人权和公民权”只不过是富人的公民权。上一世纪的革命资产者曾派遣自己的使者到欧洲各地鼓吹：“给人民友谊！向暴君宣战！”在这个大厅里聚集了新思想的传播者。他们多年来向各文明民族的工人们宣传：“你们是兄弟，你们只有一个敌人：私人资本，不管它是普鲁士的，英国的，法国的或者中国的。”尽管遭到资本家阶级的种种经济和政治压迫，他们的不倦宣传已经促成了两半球社会主义者精神上的团结。由民族的和国际的生产力发展和组织作好了准备的社会变革将使欧美各文明民族融合为一个以共同劳动为来源的财富的自由生产者和占有者组成的唯一的民族。

最后，拉法格在一致赞同下宣布代表大会开幕并要求选举主席。有人提名德国国会议员李卜克内西和巴黎市参议员瓦扬。拉法格建议选举他们两人当主席并共同主持第一次会议。“这将是使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的兄弟团结的一个证明。”
(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89年7月14—20日)》1890年纽伦堡德文版第1—2页。

(李兴耕译)

1876 -1890年的法国 社会主义运动

(1890年8月)

1871年5月的流血周已经过去了。那时梯也尔先生向惊魂未定的凡尔赛资产者宣布，“法国社会主义被消灭了”。这个畸形的和可恶的家伙已经不是第一次宣告社会主义的完结了；早在1849年，他在他的论财产的那本书出版后对他的普瓦提埃街的朋友们说，“社会主义的谬论和诡辩已经一劳永逸地被驳倒了”。1871年，梯也尔先生和资产者可以对社会主义的命运抱种种幻想，巴黎的革命刚刚失败，没有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士不是逃走，便是被投入监牢。大批工人不得不离开处于恐怖统治下的城市，以逃避胜利的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公社失败后几个月，人们估计巴黎各个行业缺少的工人达十万。只有一个行业例外：参加斗争的排字工人人数很少，所以印刷厂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空隙，在那里可以保住性命或免于逃跑。流亡者把巴黎工业赖以保持优势的技术知识和精巧手艺带到了异乡；但是，资产者感到自慰的是，枪杀、监禁、放逐和流亡似乎夺走了革命党的一切生命力，而梯也尔可以自夸的不是他消灭了社会主义，而是在一定时期内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在1848年六月起义之后的好多年里，社会主义运动似乎被消灭了。到帝国快垮台时，大约在1866年前后，它才开始恢复生机，但是表现得十分胆怯，甚至幼稚，以致还不能称作社会主义。蒲鲁

东是人们能够回忆起的唯一的 1848 年以前的社会主义者，而他的不能理解现代运动的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理论又成为时髦。一个停顿了一段时间的政治运动不能从它中断的地方继续进行。重新参加这个运动的新人，好象背诵课文的小孩一样，不得不回到运动的开始阶段，再很快地走一遍已经走过的阶段。

如果说 1848 年 6 月之后社会主义需要十八年才从沉默和麻木中苏醒过来，那末它在 1871 年的屠杀、放逐和大批逃亡之后只经过五年的休整就又开始活动了：1876 年在巴黎召开了工人生产合作社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尽管具有反动的性质，但毕竟是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出发点，虽然维也纳国际博览会在选举出席这个博览会的代表时也曾经在工人阶级中掀起过某种程度的运动，而各国政府曾经不得不违背自己意愿容忍了这一运动。资产阶级的国际狂欢活动向来给工人们提供了开始一个运动或使运动变得更加激烈的机会。伦敦国际博览会第一次使英法两国的工人有了接触，他们曾经被一个世纪的偏见和仇恨所分离，而这种仇恨比现在使法国和德国沙文主义者彼此分离的仇恨还要盲目和深刻。法国和德国工人感到惊喜的是，他们发现，同样的贫困、同样的剥削和同样的解放要求把他们联合在一起，他们心里并不存在迫使自己的先辈们总是手持武器的那种民族仇恨。在 1862 年的伦敦国际博览会上出现的国际团结的感情在去年巴黎博览会上表现得非常热烈，其目的就是要把资本主义文明世界的一切民族的工人阶级联合和组织成唯一的一支为劳动解放而斗争的大军。

* * *

1871 年 1 月的选举把保皇派分子塞满了众议院，他们满脑子装的是人们以为早已绝迹并埋葬掉的思想。资产阶级共和派害怕他们再把失败的混乱中宣告成立的共和国压下去；因此，他们开始向曾经是他们的选民和他们能够指望的唯一力量的工人讨好，

以对抗变得日益狂妄和嚣张的保皇主义反动派；他们要求工人聚集在他们周围，以便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反对并战胜那些阻碍进行任何有利于工人的社会改革的保皇派。当时只是巴黎市参议员而后来成为共和国部长的弗洛凯和洛克鲁瓦侈谈起革命和改善工人的处境；1876年的工人代表大会是由激进共和派组织的。这是他们发动一个运动并捞取资本的手段。激进派杂志《改革报》推崇代表大会的思想，而战争时期曾是国防政府成员的克莱米约还出钱送代表从外省到巴黎。这次由资产阶级政客组织和资助的工人代表大会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1876年，凡尔赛反动派还没有结束它的血腥工作，当代表大会开幕时，他们还在枪杀公社的保卫者；白色恐怖笼罩着巴黎；参加过革命运动而又没有流亡的人都躲藏起来，避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对社会主义一无所知的十分年轻的人，就是象夏贝尔那样没有参加斗争但懂得服从，甚至懂得从帝国垮台以来一个跟着一个成立的一切政府那里占到便宜的老奸巨猾的人。那些后来追随布鲁斯的工人代表，为了讨好自己的施主资产者，声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的命运可以通过合作社、互助信贷、人民银行等等得到改善。这次代表大会心甘情愿地体现了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的博爱主义思想；人们在那里除了赞扬他的包治百病的社会药方的奇效之外，没有干别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一开始带有浓厚资产阶级色彩的工人运动中，很快就感觉到有一个使运动脱离这条道路，迫使它放弃博爱主义改良活动而走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的干预。这个人就是**茹尔·盖得**。

盖得刚刚回到他为了逃避五年监禁的判决而不得不离开的法国；他那时遭到这种判决，是因为他在蒙彼利埃出版的他自己的报纸上支持公社。他现在在《人权报》上抨击巴黎代表大会的讨论和

决议。

盖得曾在意大利和瑞士参加过国际的运动并从中接受了最初的社会主义观点。他的理论知识当时是很有限的和不明确的，看一看1877年出版的、由他编辑理论文章的头几期《平等报》就可以相信这一点；但是，他接受了国际的各次代表大会已经表述过的一种思想，这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盖得具有相当敏捷的辩论口才和第一流的演说才能，所以，不久便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是法国新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创建人。

他的宣传热情驱使他走遍法国各地，走遍平原和城镇；他所到之处都挑起关于社会问题的辩论；他在巴黎和许多外省城市接受律师、经济学家、议员和其他头面人物的挑战，出面为集体主义思想辩论；但是他们遭到了惨败，以致于在第一回合论战后就再也不同他辩论了。他所到之处留下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情拥护者；他是一个能使得大多数人改变信仰的宣传家。盖得在巴黎把一些社会主义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多数是外国人，主要是意大利人，俄国人和德国人。最热烈支持他的人当中有一个是受俾斯麦的迫害而流亡到巴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①这个人向盖得介绍了马克思的理论，在此之前马克思的理论在法国是完全不为人所知的，虽然《资本论》已经翻译出版了。盖得在这位外国社会主义者和他所争取到的一些年轻法国人的帮助下创办了《平等报》，这是1849年以来在法国出版的第一家社会主义报纸。

《平等报》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法国是新思想，它反对构成激进资产者和资产者化了的工人的全部社会主义的博爱主义奇谈怪论。它使支持巴黎代表大会的自助合作社方针的“善良的”工人感到恐惧；他们不敢同盖得及其朋友们公开决裂，但是他们开始

^① 指卡尔·希尔施。——编者注

对这种社会主义思想采取沉默的反抗。他们把自己装扮成“有老茧的工人”的唯一真正的代表，仅仅要求进行不推翻社会和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切实可行的改革的“实践家”；他们把盖得及其朋友们（杰维尔、马萨尔、拉比斯基埃尔、马鲁克）看作是抱有不能实现的极端思想的“精神上堕落的资产者”，是手上有老茧的工人不能信任的穿资产者礼服的野心家。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它的使徒茹尔·盖得的活动在一个时期内揭穿了在激进资产者和工人中间进行的欺骗。这是盖得的罪过之一。人们用侮辱和下流无耻的诽谤狠狠地对他进行了报复。盖得懂得在第一次出场时立即赢得人们的重视；他不顾凡尔赛的恐怖统治开始了社会主义宣传，并且创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联合会，它的力量虽然还不足以占支配地位，但是已足以使那些对他的革命活动感到惊惶不安的合作社派工人表示敬畏。这些人仇恨他，把他看作是独裁者，一个用自己的集体主义理论阻挡他们的道路的人。指出盖得遇到那些在激进资产者的保护下召开了法国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人的反抗，是重要的；这有助于理解后来发生的分裂；布鲁斯懂得必须把这些工人集合起来并加强他们，然后引导他们攻击盖得、杰维尔、拉法格和科学社会主义。

《平等报》的宣传带来了成果；一个政党成立了，它的活动可以直接感觉得到，连一家俾斯麦的报纸《柏林通讯》在1878年1月也评论过这一点：“从我们来自法国的混乱消息中，有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楚了，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势力……竭力同德国社会主义报刊保持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头目们无疑把这个事实夸大了一些；但是不可能再否认这个运动，对它保持沉默了”。“有一个事实是细心的观察家所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法国的社会主义宣传从根特代表大会以来进行得很巧妙……公社失败后在巴黎被窒息和受到严格监视的运动近年来不得不偃旗息鼓。但是，大

约六个月来，社会主义者又公开活动起来了。社会主义领袖们在法国象在普鲁士一样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的拥护者塞进市镇参议会，这是值得注意的。”

从前一直在暗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突然公开出现在1878年2月由巴黎代表大会筹备人召集的里昂代表大会上。里昂代表大会有可能成为巴黎代表大会的再版。在头几次会议上，只能听到各种音调的对自由的颂歌；他们说，只要给工人自由，建立工会、合作社和银行，那末在最好的资产者社会里一切就都完满无缺了。工人代表要求自由，只有自由。

但是，以盖得为首的集体主义者的出现给这个和谐的自由演奏会带来了不协调的音响。他们阐述了集体主义理论，由二十名代表组成的少数派投票支持两名巴黎代表提出的下列提案：“鉴于：劳动者只有在享有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经济上的解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劳动者必须成为生产的要素，即原料和劳动工具的占有者；因此，大会要求所有的工人协会共同研究实现土地和劳动工具集体所有制原则的具体方法。”这使自助论者大为恼火。

为了深信集体主义的出现是里昂代表大会的头等事件，人们必须听一听甘必大的报纸《法兰西共和国报》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一位代表竟敢断言，拉布里埃尔曾经给我们描述过的法国农民不比现在的由于革命而得到解放的农民贫困多少，人们为了改善他们的命运，必须坚决废除个人财产，用集体主义制度来代替。土地和劳动工具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财产，只有劳动成果可以归个人所有。这种奇谈遭到多数代表的激烈的谴责和反对……接受集体主义等于倒退，因为它的黄金时代是在社会的童年；这等于仿效印度和俄国的最落后的民族。这种非常反动的公有财产若干时候以来被某些误入歧途者看作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社会药方，它的

拥护者在里昂工人代表大会上同真正的健全的人类理智的代表发生了冲突。”

但是，因为这种健全的人类理智表明自己不足以捍卫关于个人财产的健康学说，所以政府开始迫害《平等报》的传播集体主义理论的“误入歧途者”。它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扰乱他们，但是当它看到吓不倒他们和无法促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宣传时，便决定用罚款和监禁来迫害这个报纸，编辑经常受到这样的惩处。

《平等报》在它的最后一号上说：“我们不久就将重新出现，即使不是更坚决地，却是更强有力地从事我们以前从事过的事业，而人们也许知道，这就是建立或重建法国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因此，我们对我们的读者说：不久再见！”

这个运动正在进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它。尽管《平等报》被查封，盖得和他的一些朋友坐了牢，但是集体主义宣传更加积极地进行。如果说在里昂代表大会上只有二十名代表的少数投票赞成集体主义决议案，那末在第二年（1879年10月）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集体主义理论已经拥有巨大的多数。

马赛代表大会是直到1889年为止在法国举行的所有代表大会中最重要的一次，这表现在与会人数、作出的决议和它对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这些方面。

由于战争、公社、主要是由于从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以来经济的大发展而苏醒过来的法国工人阶级感到有必要表现和证明自己的力量；因此，马赛代表大会吸收了人数众多的代表。一百三十名代表来自七十三个座落在各个工业区的城市。除了1889年的国际代表大会以外，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与会者。

一个运动开始时，法国人总是渴望解决一切问题，制定一种可以指导自己的日常工作的信条。所以，不论马赛代表大会的议程

还是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都是非常繁重的。要研究所有这些问题，本来需要用六个月以上的时间进行连续的和科学的讨论；但是人们在一周的时间内解决了这些问题。在马赛讨论了法国人非常关心的妇女问题、工会、合作社、职业教育、雇佣劳动、职业仲裁法庭、罢工、劳动组织、财产、税收、地租、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无产阶级代表进入代议机关、组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问题。这许多问题的解决，虽然是表面的和肤浅的，采用了蒲鲁东的用语，带有劝善的自由主义色彩，但是显示了一种法国从未有过的精神。有一些决议非常出色，解决问题清楚明确。

马赛代表大会推翻了以前在巴黎和里昂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关于把合作社看成是工人解放的最有效的唯一手段的决议，并且指出：“生产合作社和消费联合会只能对改善少数特权者的状况有一点帮助……绝对不会对无产阶级的解放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因为这种合作社可以作为传播旨在把劳动工具交给工人的集体主义革命思想的宣传手段，所以这个手段还必须加以运用，基于同样的原因，象其他联合形式一样，运用它只是为了达到通过生动的革命鼓动尽快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

关于雇佣劳动问题的决议也写得很清楚：“因为雇佣劳动是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一些人不劳动而占有一切，另一些人劳动而不占有任何东西的结果，因为只有在一切工人占有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的情况下才能消灭雇佣劳动，所以代表大会特作如下决议：工人的目的必须是实行资本（矿山、铁路等等）国有化，把它交给能够使它生产的人即工人来经营。”集体主义在关于财产的决议中得到更有力的强调：

“财产问题是唯一的社会问题。”

“鉴于现存的财产制度同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表现的平等权利相矛盾；

鉴于一些人生产一切，另一些人什么也不生产却掌握着一切财富、一切享受以及一切特权这种现象是不公平的和不人道的；

鉴于这种状况不能靠那些最希望它延续下去的人的善良愿望来改变；

代表大会认为必须争取的目标是土地、劳动工具和原料的公有化。这些东西应当由社会交给一切人使用，但不能转让，然后应当重新归还社会。”

这个决议说明了马赛代表大会的性质。它是由盖得起草，巴黎代表提出的。它遭到一些出席者特别是实证论者代表菲南瑟的坚决反对，但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通过时受到长时间的鼓掌欢迎。

这是第一次把财产国有化写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旗帜上。当人们回忆起在各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大多数法国代表，特别是巴黎的代表总是支持个人财产的时候，其次当人们想到公社的革命家在经济方面表现得非常缩手缩脚的时候，人们对在巴黎失败和“流血周”的大屠杀之后过了八年就在马赛代表大会上出现一个支持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多数会感到惊异。

关于“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的决议招致了资产阶级雇用的文人的嘲弄，他们的头脑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这个必然的最终目的，因此他们把集体主义者当成傻瓜，把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社会说成是兵营。就连激进党的领袖克列孟梭也不能超出这种深刻的和聪明的批评。今天普遍承认，大型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总有一天不可避免地要实现。只是对于立即实现这种国有化还有争议。

社会主义运动是从合作社开始的。不久，那些想要控制和领导这个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进来。合作社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分别代表了两种纯粹资产阶级的但又各不相同的思想；前者代表了改良主义慈善家的思想；后者——只要他们不是奸

细——体现了自由放任主义的代表的思想，无政府主义是这一思想的最极端的逻辑结论。马赛代表大会既反对前者，又反对后者；它一方面宣布自助的合作社不能成为解放工人阶级的手段，另一方面表示坚决支持政治行动，支持社会主义者进入代表机构和“在一切选举中尽可能提出社会主义工人候选人的义务，至少是道义上的义务”。

但是，马赛代表大会也认为，在开展政治斗争之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完全决裂”和组成以“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为名称的一个特殊阶级的政党是必要的。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代表大会制定了社会主义团体联合会的章程草案。这个草案规定，法国分为六个地区：1. 巴黎或中部地区；2. 里昂或东部地区；3. 马赛或南部地区；4. 波尔多或西部地区；5. 利尔或北部地区；6. 阿尔及尔。每个地区都应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和设有单独的机构；所有的地区应统一于一个总执行委员会之下。法国人喜欢制定章程，以便以违反章程为乐事；所以人们在马赛也忙于规定各个团体对地区组织和总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并且顺利地解决了；人们也没有忘记党的机关报，给它起了《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公报》的名称。所有这些漂亮的决议仍然是纸上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党首先必须具有生命，才能谈得到制定章程；但是，首先规定这些准则，是符合热中于订立规章的法国人的精神的。

这些集体主义决议虽然获得大多数人的赞同，但是在代表大会上还有一个非常坚决的反对派。关于财产问题的表决就象引爆了一颗炸弹；少数派大吵大闹地反对巴黎的“宗派主义者”强加给代表大会的决议，它认为这个决议是没有意义的。在此之前曾经支持工人代表大会并发表过它的温和决议的共和派资产阶级报刊突然改变了它的友好的和保护人的态度，公开宣布敌视新的运动。

它急忙把少数派的抗议变成自己的抗议。这个少数派当然代表出色的“健全的人类理智”，这一次又用“永恒的正义”和“财产的神圣性”装扮得更加与众不同。资产阶级报刊鼓励少数派坚持反对立场并促使他们分裂，这导致在下一一次哈佛尔代表大会上完全决裂。

《平等报》在马赛代表大会之后重新出版。第一次的《平等报》的编辑部增添了几位流亡者，其中有保尔·拉法格，他曾是一个热心的撰稿人，几乎所有的理论文章都是他写的，只有少数例外。第二次的《平等报》完成了第一次的工作，它使社会主义宣传具有科学性。^①第二次的《平等报》和稍后出版的《社会主义评论》为在法国传播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和历史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经把他在德国出版的《反杜林论》一书的著名节录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标题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

《平等报》不只是一家理论性报纸，而且还是一家坚定的战斗机关报；它向资产阶级报刊以及克列孟梭和激进派——必须把他们同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工人区别开来——开火。它敢于公开同法国沙文主义对阵。当时法国沙文主义十分嚣张和顽固，以致于人们甚至不敢在一家著名的激进派报纸上刊登一位社会主义议员的反俾斯麦的通讯，因为这是从柏林发来的，他们害怕因此受牵连。这种狭隘的市侩爱国主义遭到沉重的打击；必须承认，无政府主义者在这次反对资产者爱国主义的进军中是同集体主义者站在

^① 人们在上述的决议，特别是在关于财产的决议中还可以看到，集体主义者的头脑中还保留有蒲鲁东主义思想：以正义和平等的名义要求实现社会转变，而不是把这种转变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结果；这种转变却是不能通过关于永恒正义和天然平等的宣言，只能通过对于经济现象的进程的考察来加以促进的。第一次的《平等报》的集体主义者更多地是受感情而不是受经济科学的引导，关于财产的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拉法格注

一起的。甘必大先生及其同伙把这种爱国主义当作升官和以亲爱的祖国为代价发财的政治跳板。

《平等报》坚决要求赦免被判刑的公社社员。杰维尔是推举布朗基作为候选人的发起者之一。从3月18日起，布朗基一直被蛮横地关押在监狱里，虽然他是在参加起义之前，即在他从佩里格前往正在举行起义的巴黎的时候被捕的。不屈不挠的老布朗基在波尔多的当选为公社的被判刑者和被放逐者打开了法国的大门。赦免巴黎起义的参加者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巴黎和外省的工人都主张实行赦免；赦免之前没有节日是一首流行歌曲中的叠句；在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之前，人们希望释放新喀里多尼亚岛上的囚犯。从反动分子那里争得的赦免是人民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对1871年5月的失败的第一次报复；公社的战败者胜利地归来了；居民对第一批从新喀里多尼亚岛归来的囚犯表示了非常热烈的欢迎。

赦免和三月十八日的公社社员的归来引起的激情平息下来之后，又能够重新从事社会主义宣传了。马赛代表大会已经规定了无产阶级奋斗的最终目的；剩下的任务就是给党制定一个它所面临的竞选的纲领。拉法格向盖得提出了这个建议并同马隆取得了联系。马隆很想利用这个机会使人忘记他在国际总委员会同巴枯宁和同盟的资产者的斗争中所采取的立场。制定纲领的主意得到欣然同意，盖得前往伦敦，以便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道确定纲领的措词。纲领是在恩格斯那里起草的；马克思口授了绪论，即“鉴于”的内容，这一部分写得非常精确，言简意赅。“社会主义工人竞选纲领”内容如下：

“鉴于

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

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

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方式：

(1)个体占有方式，这种方式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并且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

(2)集体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这种方式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

鉴于

这种集体占有制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

要建立上述组织，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由向来是欺骗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

法国社会主义工人提出其经济方面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全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并决定以下述最低纲领参加竞选，作为组织和斗争的手段；

一 政治部分

1. 废除一切罢工法、集会法和结社法，特别是反国际工人协会法。——取消把工人阶级同妓女同等看待的工人手册和资产阶级法典中规定劳资不平等或**男女不平等**的一切条文^①；

2. 压缩宗教预算，将“所谓‘永世’产业即属于宗教团体的动产和不动产”归还国家（1871年4月2日公社法令），其中包括这些团体的全部工商企业；

3. 压缩公债；

4. 废除常备军，普遍武装人民；

5. 市镇主管行政机关和警察机构。

^① 加着重号的话是1882年卢昂代表大会补充的。——拉法格注

二 经济部分

1. 规定每周工休一天，或用法律禁止雇主强迫工人每周工作六天以上。——法律规定成年人的工作日以八小时为限。——禁止私营作坊雇佣十四岁以下童工。十四—十八岁青工实行六小时工作制。

2. 工人协会负责保护监督徒工。

3. 由工人统计委员会根据当地食品价格每年规定最低工资额。

4. 在法律上禁止老板以低于法国工人的工资雇佣外籍工人。

5. 男女同工同酬。

6. 对全体儿童进行科学和职业教育，由政府和市镇代表社会负担费用。

7. 由社会负担老人和残废工人的生活费用。

8. 禁止雇主干预工人救济金和类似机构的管理，这些机构完全由工人自行管理。

9. 企业主对不幸事故负责，雇主应根据所雇佣工人数量和该行业工作危险程度向工人基金缴纳保证金。

10. 工人参加制订各个工场的专门规章。取消企业主以罚款和克扣工资方式擅自处罚工人的权力（1871年4月27日公社法令）。

11. 废除一切转让公共财产（银行、铁路、矿山等）的契约，将一切国家工场交给在其中工作的工人经营。

12. 取消一切间接税，将一切直接税改为从三千法郎起征的累进所得税。——取消旁系亲属的财产继承权，直系亲属继承的遗产不得超过二万法郎。”

盖得把这个纲领带回巴黎并着手进行工作，以争取获得通过，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轻的社会主义政党由三种组织松散的不同成分组成：首先是集体主义者，其次是老的合作社会主义者，他们无法逃避盖得及其朋友的影响，但只是勉强地接受了新理论；最后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人数不多，但是非常活跃，而且有惊人的口才（尽管是疯疯癫癫的），对一切事情都能夸夸其谈，对所谈的东西却毫不理解。马隆接受了到他有联系的外省的联合会去贯彻这个纲领的任务。马隆为争取这个纲领得到通过作了许多工作，不过他后来在布鲁斯的影响下背弃了这个纲领。

这个纲领发表在1880年6月30日的《平等报》以及《社会主义评论》上。在这个纲领上署名的有《平等报》和刚刚出版的《无产者报》的编辑部以及库尔贝瓦、格勒诺布尔、圣亚田、蒙吕松、克列索、维埃纳和巴黎的社会主义委员会。同年7月，巴黎中部地区的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纲领；在哈佛尔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也通过了这个纲领。人们终于象可能派的拉比斯基埃尔惊慌失措地所说的那样“一口吞进了共产主义纲领的剑，一直吞到剑柄”。

这个纲领引起了普遍的愤怒。希望能够得到工人的选票而又不肯放弃同激进派的有利可图关系的合作社会主义者和各种追名逐利者，把这个纲领看作是他们施展阴谋的障碍。以今天已转向机会主义的艾米尔·哥提埃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敢公开地和正大光明地攻击它，他们还没有这样的力量；他们同合作社会主义者勾结在一起，声称这个纲领不完全和不够先进，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这个选举纲领只是最低要求，他们宣布说，他们不接受**最低纲领**，而只有**最高纲领**才能够使他们满意，他们非常轻蔑地说这个纲领的捍卫者是“最低纲领主义者”。不幸，集体主义的决议——若夫兰为了挑起人们对它的爱国主义仇恨而称它为伦敦纲领——也引起公社流亡者的反感。巴黎受围攻和进行保卫国家的爱国主义斗争所

引起的激动促使三月十八日起义爆发，它远不是社会主义运动。激起人民在3月18日发怒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因失败而受到凌辱和因法夫尔和梯也尔的叛卖行为而受到极大刺激的爱国主义，共和派由于波尔多议会的保皇派阴谋而产生的一种恐惧感情，最后，对社会和政治改革的不自觉的需要。公社不过是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和浪漫主义的布朗基派和某些参加过国际的运动的工人的政府，不是社会主义思想把这些不同的成分联合起来，而只是失败和自卫的需要把他们集合在一起。

但是，被凡尔赛摧毁的、遭到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讥笑和诽谤的公社，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国际总委员会的支持。因此，公社获得了在它短暂的存在时期内始终不曾具有的社会主义性质。现在，公社的流亡者实际上认为自己是他们一无所知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他们对马赛代表大会的集体主义决议表示惊异，公有制同他们的即兴式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另外，他们生气地看到在法国出现了一批受新思想鼓舞的新人。这些人分享了他们的声誉。集体主义者要建立一个不应由公社战士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并给这个政党提供一个公社战士不曾提出过的纲领，这一狂妄举动超过了他们能够允许的范围。从伦敦和瑞士回来的流亡者决定继续进行政治活动。除了少数人之外，他们都敌视新的社会主义政党和新的集体主义思想。《平等报》不得不向它曾经争取赦免的公社战士开展斗争。蒲鲁东的学生龙格在他的老师死后成为该学派的头目并以反集体主义思想的先驱自居。这个人在一次论战中被盖得彻底打败。被赦免者回来后不久举行的这次公开聚会引起了极大轰动；它使得回国的公社社员清醒地认识到别人赶过了他们，先进的工人为了追随新的社会主义者而离开了他们。一些人拥护甘必大，因为他用高官厚禄来安抚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失望；另一些人转向使用了大量社会主义词藻

的激进派，这些词藻在竞选时期起了很大作用。还有一些人，如浪漫主义者费里克斯·皮阿，从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垃圾箱中拾起一些陈词滥调，猛烈地攻击新的政党。一些公社战士，如德雷尔、革命大诗人鲍狄埃、巴赞等，热烈拥护新的思想。有点惊慌失措的布朗基派表现得比较审慎，只埋头于团结士兵并按照1848年以前建立的秘密团体的计划把他们组织起来的任务。以茹尔德和沙尔·龙格为首的一些被赦免的前公社社员企图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共和同盟”为名称的政党，以便同社会主义工人党相抗衡；这个企图可耻地失败了，可是给激进派，如克列孟梭和马雷帮了一点忙。

1880年发生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一次。1848年的战士曾经认为，因为他们输了一场革命，所以在帝国末期出现的共和主义宣传应当由他们垄断。他们对布朗基派和国际会员非常恼火，因为这些人开始从事一种他们不甚了解的运动；他们指控这些人被帝国、甚至被教皇所收买。人们称他们为1848年的老古董；公社也提供了自己的一批老古董，虽然他们可以辩解说他们的胡子没有象1848年的加尔涅-帕热斯和赖德律-洛兰的胡子那样白。

公社社员的攻击产生了同他们的愿望相反的结果：不但没有损害新的政党，反而加强了它。它的队伍更加团结在纲领的周围。合作社主义者和追名逐利者认为回来的公社社员是选举的危险竞争者，所以急忙以先进思想的战士的姿态出现。后来转向可能派的波拉尔德、戴诺德等人变成了集体主义的热情捍卫者。这个反对被看成共同敌人的公社社员的暂时联盟使集体主义纲领在哈佛尔全国代表大会上取得了多数。

哈佛尔代表大会（1880年11月）具有历史意义，这不仅是因为通过了纲领，而且还因为排除了从前加入社会主义者行列的亲政府的工人成分。

曾经大吵大嚷地反对关于公有制决议的马赛代表大会的少数派企图在内阁和资产者报刊的支持下控制哈佛尔代表大会。领导这个少数派的是两个野心家巴伯雷和利翁内。他们租下了代表大会会场，他们借口审查代表资格证书，把他们不中意的代表排斥在外，当被排斥的代表提出抗议时，巴伯雷和利翁内就以产权的名义（因为会场是他们租的），粗暴地把他们赶出大门。占代表大会多数的五十八名代表因此退出会场，到另一个大厅举行了另外一个代表大会。巴伯雷及其同伙的这种行为如此不正派，以致于巴黎报刊的读者和通讯员都认为分离派是正当的并拥护他们；留在巴伯雷和亲政府的工人的代表大会上的人寥寥无几。

巴伯雷由于自己的效劳而谋得内务部工商局里的一个职位，利翁内谋得了一个议会席位；但是他们想在工人阶级中发起的运动却失败了。他们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之后召开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是在工人阶级以及公众的非常冷淡的情况下举行的。

所谓巴伯雷分子只能是为了加重预算的负担而存在；他们终于担任了公职，从此他们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解决了社会问题，不再从大众的立场上来解决社会问题。1876年巴黎代表大会的一部分合作社主义者就这样完结了；另一部分沦为可能派，他们只不过是变相的巴伯雷而已。

那些已经脱离巴伯雷并创办了《无产者报》（它是《平等报》的微弱回光）的巴黎代表大会的合作社主义者认为保尔·布鲁斯是一个他们需要的人，能使他们联合起来并给他们勇气去摆脱他们再也不能忍受的集体主义者的桎梏。

布鲁斯曾经是盖得在蒙彼利埃编辑的《人权报》的管理人员；当他看到自己的总编辑因支持公社的事业而被判处五年徒刑的时候，他十分害怕，便逃往瑞士。但他刚刚越过边境，就又有了勇气，从一个胆怯的大学生摇身一变为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鼓吹杀死

暴君并指责德国社会主义者对“通过行动的宣传”不屑一顾。当赦免得到准许时，布鲁斯以为可以冒险回巴黎去了。

这时布鲁斯认识到，他由于在编辑室里充当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国王谋杀者而把自己的时间浪费掉了，他必须烧掉炸药用语词典。但是，人们对于他的大吵大嚷的无政府主义还记忆犹新，所以机会主义分子不会立即接受他；他的狡诈的性格告诉他应当绕个弯，一步一步地“进展”。他前往伦敦，被介绍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向他们承认，他已经放弃了无政府主义及其令人厌恶的空话；他同当时一位坚定的集体主义者若夫兰联合在一起。他从伦敦密切注视合作社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之间、《无产者报》编辑部和《平等报》编辑部之间的隐蔽的战争。他制定了一个联合《无产者报》、反对《平等报》和公有制的计划。他早在1878年根特代表大会上就攻击过公有制，虽然他当时正处于他的主张使用炸药的无政府主义时期。无政府主义者虽然用革命词句来打扮自己，其实不过是个人的财产的保护者，这是千真万确的。

布鲁斯回到巴黎后，为了更有效地打击集体主义者，不声不响地钻进了集体主义者行列。因为盖得是运动的灵魂，所以他最仇恨盖得，当他冒充盖得的朋友的时候，他阴险地加剧盖得的出色才能在一些比他逊色的爱虚荣的庸人心中所引起的嫉妒。布鲁斯根本不是知识分子，非常无知，却是一个危险的阴谋家；他有耐心，善于利用卑劣的激情和适应最低下的蠢事。他不愧是巴枯宁的学生，他悉心研究了巴枯宁的革命问答并认真遵照执行。^①他得心应手的武器是中伤，而且是通过别人来进行的。布鲁斯从来不给自

^① 国际总委员会受海牙代表大会的委托发表的巴枯宁的“革命问答”指出，一个革命者“必须采用一切手段利用那些拥有财富、联系、影响和权力的人；他必须笼络他们并掌握他们的肮脏的秘密，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奴隶……我们必须把追名逐利者和自由派掌握在我们手中，掌握他们的秘密”。（1873年总委员会发表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第93页）布鲁斯的得势就在于运用了这些原则，他调查他们每个追随者的过去，只

已带来危害。可惜，没有一个象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去研究和熟悉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和在每个运动的初期、形成阶段、隐蔽斗争时期以不同形式出现的阴谋。

布鲁斯的计划是建立一个政党，他可以通过一个隶属于他的小型总部来领导和利用这个政党，这个政党一旦建立起来，他就立即把它出卖给反动派。这个计划获得了成功。

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清除掉知识分子和诚实的人并摒弃这个纲领。他枉费心机地企图在兰斯代表大会上粉碎这个纲领；但是，他在圣亚田代表大会（1882年）上达到了这个目的。这次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是来自那些不存在的和很小的组织，类似1889年可能派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大会导致了可能派和集体主义者之间的分裂。集体主义者返回卢昂，在那里举行了有二十八个城市的三十三名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

巴黎和里昂的最初两次代表大会的合作社主义者和追名逐利者为了对抗《平等报》而创办了《无产者报》；他们在马赛、哈佛尔和兰斯的代表大会上曾被击败，现在发现自己终于摆脱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现在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通过市镇参议会和内阁各部来谋取官职和津贴，并且在一切方面效法巴伯雷分子，因为他们很羡慕巴伯雷分子的肥缺。——盖得、杰维尔、拉法格及其朋友们首先是宣传家；他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准备人员，把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带到群众中去；如果说他们参加了市镇参议会和议会的竞选，那末他们可以满意地说，他们通过竞选为对法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作了一些有益的贡献。——可能派总是只盯着可以

要发现了一个秘密，便以此把他变成自己的奴隶。他鼓动一些人去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例如，侵吞金钱，如果当事人想要摆脱他的控制，他就把偷窃行为宣扬出去。可能派的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迈耶尔就是因为一年多以前的侵吞行为而被布鲁斯排除掉了。布鲁斯在他自己的党内受到尊敬，但是人们都害怕他，因为他掌握了他们的秘密。——拉法格注

赢得的席位。《无产者报》及其继承者《无产阶级报》和《工人党报》从来没有宣传过社会主义理论；他们为此而作的努力最后取得了成果；新的可能派分子在最近一届的巴黎市参议会中取得了席位，一个可能派分子进入了众议院。

由于赦免而回国的布朗基分子集合在他们的刚刚获释的老领袖的周围。这位老领袖不久之后便逝世了。在他之后，三个人领导这个党，他们每个人有自己的长处：**格朗热**是第一流的组织家；**埃德**是实干家，性情暴躁，总是说干就干，不考虑危险和前景，还有**瓦扬**，他学识渊博，不怕牺牲和为人诚实，经历了一切考验，百折不挠。由于有这三个人，布朗基党很快就在巴黎重建起来。它按照它在1848年以前采用过的老策略组织起来开展活动，而不从事理论宣传，甚至也不允许在集团内部讨论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布朗基主义者看来是多余的；他们只想成为盲目服从命令的士兵。他们是本能的共产主义者并且就其气质来说是革命者，他们热情地参加了近年来的人民运动，他们在革命中同集体主义者一起前进。

这就是在巴黎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三个派别。在外省，充其量把里昂和瓦扬个人有影响的歌尔省除外，布朗基派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可能派曾多次试图控制外省的运动，但都遭到了失败，此后他们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只局限于巴黎。通过《平等报》的宣传而被社会主义争取过来的外省依然忠诚于集体主义思想或毋宁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后者取代了盖得初期所传播的从比利时输入的混乱的集体主义思想。

布朗基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事先达成协议，却同样首先发动一场使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社会主义宣传并转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布朗基派开展废除常备军的宣传，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进行调整工人和小资产者的房租的宣传。后来，社会主义政党的这两

个派别达成了共同行动的协议。可能派不仅不同他们共同行动，而且暗中与之相对抗。

布朗基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积极参加了政治和经济事件所引起的一切人民运动。他们共同要求停止东京^①战争和撤回军队；他们支持失业者，支持处死了当地的奴隶主之一、工程师瓦特兰的德卡兹维耳矿工；支持罢工的挖土工人；他们帮助推翻格雷维和阻止费里当选。与此相反，可能派反对这些运动；他们千方百计地压制在大街上发生的和不具有纯粹议会性质即资产阶级性质的一切运动。在东京战争和卡诺当选总统的时候，他们同机会主义派采取了共同行动，而在挖土工人罢工时，他们同警察采取了共同行动。

除了社会主义运动之外，还有一种纯粹的工人运动。几年以来，它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它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成立了工会；工会由于劳动介绍所的成立而有了后盾；这些工会现在试图联合成一个大的全国性联合会。1886年，它们在里昂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这个会上决定成立全国委员会。可能派企图控制这个运动，并争取把中央组织的驻地迁到巴黎，以达到控制中央组织的目的；为此，他们的大批人参加了这次里昂代表大会；但是，他们被马克思主义者击败了，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了一项决议：为了使可能派的阴谋不能得逞，全国委员会仍然留在外省，而且每年换一个城市。蒙吕松，然后波尔多，一些被马克思主义争取过来的城市，被选为这个委员会的驻在地。

工会运动是社会主义的运动。

马克思主义者联合工会和布朗基派筹备了1889年国际代表大会。欧美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

^① 指越南北部地区。——编者注

仅仅德国就派了八十一名代表。

1888年和1889年在法国发生了一些深深震动现存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大政治事件。工人们本来天真地期望资产阶级共和国能够实行有利于他们的一些政治和社会改革，而资产阶级共和国表明自己是一个大骗局。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保皇派、机会主义派和激进派从1871年起相继掌握政权，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懂得和能够哪怕实行一项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重大改革。工人们感觉到他们的处境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总是不断恶化，因为战后大工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小工业受到了排挤，越来越多的无产者被赶到资本主义的强制劳动营，使他们在那里不得不为了极低微的工资从事长时间的和艰苦的劳动。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和食利者深受经济发展、大公司的竞争和造成数十亿损失的交易所危机之害；巴拿马运河公司的破产吞掉了从小户人家的钱袋掏走的十五亿法郎。普遍的不满是社会的一切劳动阶级陷入穷困状况的结果。但是，没有觉悟的和受苦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不是自己起来捍卫自身的利益，而是期望有一个救星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他们相信布朗热将军是个救星，使他获得了本世纪最令人惊异的和喧嚣一时的声誉。

如果在法国有一个象德国那样的人数众多的和组织很好的社会主义政党，那末形势对它会是很有利的；如果不满分子转到它的方面来，那末它就会成为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而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了大资本家的利益背弃了社会共同利益。但是遗憾的是，社会主义政党的各个派别的分裂和斗争削弱了社会主义，甚至把它降低到无足轻重的地位。

社会主义政党在布朗热危机中表示了明确的立场。它应当既不加入盲目的不满潮流和变成布朗热的党羽，也不同那些由于自己犯下的错误和罪行而使布朗热得以存在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结成

联盟；它应当既不支持布朗热，也不支持周围聚集了一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费里。人们不能在霍乱和鼠疫之间进行选择。巴黎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在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1月27日选举时，提出一位社会主义候选人来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候选人雅克先生以及布朗热将军相对抗。毫无顾忌地支持机会主义派的可能派反对社会主义候选人并竭尽全力为全体资产阶级的候选人雅克效劳。他们的叛卖和丑行从来没有暴露得象这一次这样无耻；他们自己承认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收买了。他们的机关报《工人党报》接受了特别基金的资助，这是公开的秘密。

9月22日议会选举时，布朗基派内部明显地发生了分裂。格朗热、布勒耶等人所领导的一部分人公开投到布朗热阵营里去了，而大部分人仍然忠实于社会主义旗帜并在巴黎提出瓦扬和肖维埃爾作为候选人，他们既反对资产阶级共和派，又反对布朗热派。马克思主义派同这一派布朗基主义者共同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费里同布朗热一样是非常令人厌恶的人物。这项声明得到各省全体社会主义政党的好评。

在1889年议会选举中充满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同布朗热派的斗争。在布朗热派的队伍里，除了没有觉悟的不满分子之外，还有波拿巴派、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他们打算利用布朗热潮流来使他们的候选人当选。城市和乡村的选民完全被这场斗争所吸引，其结果似乎关系到共和国的命运。他们完全不愿听从社会主义；尽管如此，在当选的众议员中有六名是两个月前刚刚闭幕的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是克吕泽烈、博丹、拉希兹、费鲁耳、布瓦埃和提夫里埃（提夫里埃不是代表；他是科芒特里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积极成员之一，这个小组曾派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这六名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再加上里昂代表古久里，在众议院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团，它任命盖得为它的秘书。11月19日，

巴黎社会主义者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庆贺了这个议会党团的建立。虽然社会主义政党的杰出成员瓦扬、盖得、杰维尔没有进入议会，然而也可以说，这个政党现在在法国第一次有了议会领袖。法国社会主义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

译自《新时代》杂志第8年卷(1890)
第8期第337—353页。

(孙 魁 译)

五一节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

(1891年5月)

一 1890年的五一节

去年,当代表法国无产阶级出席1889年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为了在法国组织五一节示威而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心存顾虑并对这一努力是否会成功表示怀疑。这次代表大会刚刚宣布将五一节示威作为劳动世界的口号。的确,要在一周里一个规定的日子组织停工,这个任务是不轻松的;尤其困难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者没有自己的报纸,而且手上掌握的经费向来是很少的,可能派表示反对任何示威并企图破坏为此而进行的工作,而保皇派和布朗热分子通过自己参加示威和试图利用它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来败坏五一节示威的宣传的声誉。

在巴黎以及外省为庆祝五一节而成立的委员会光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开展足够强大的宣传,以影响工人阶级,把它发动起来,使之投入运动。可是,幸运的是,资产阶级报刊和法国的小俾斯麦孔斯坦先生给了它们强有力而又无私的帮助。代表们不曾期望有这样的幸运,而相反,他们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排除任何困难来完成国际代表大会赋予他们的使命。于是,他们勇敢地开始了工作。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宣布用停工来庆祝五一节的计划,资产阶级就惊恐万状。怎么,工人想要把国际休息日强加给它!怎么,工人要

越过陆海边界进行串连，要求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这岂不是真正的造反！这岂不是意味着推翻关于工人必须规规矩矩地服从资本家意志和政治经济学规律的一切资产阶级概念！五一节必定会成为雇佣奴隶用杀人放火来毁灭一切的暴动的日子！

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而首先关心自己的钱柜的资产阶级报刊利用了这种恐惧心理。每家资产阶级报纸都争先发表能够加剧庸人的恐惧的消息，它们夸大与示威有关的小事，把这些小事渲染成了不得的大事。五一节示威的组织者自己并没有对这个行动抱有多大的期望，而这些报纸却把它描绘成必定会使新旧大陆工人为所欲为的可怕的示威。敲响这个警钟的是孔斯坦先生；他假装害怕革命的样子，向全世界宣布，为了消灭暴乱和拯救社会，必须把国家的一切镇压手段都置于武力基础之上。这样一来，资产阶级报刊和政府便成为1890年五一节示威的最积极的组织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瓦解已经达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以致于它所建立的为它服务和保卫它的机构只能给它带来危害和加速它的灭亡。

负责组织这次示威的各委员会很快发现，报刊和政府的宣传已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每天它们都得到令人鼓舞的消息：示威的思想越来越深入工人的心里，它已深入无产阶级的群众并成为工厂和作坊里的话题。五一节的情况远远超出了示威组织者所抱的希望。在他们对运动不抱任何一点希望的那些城市里，参加庆祝的工人之多使他们大为惊异。例如，党员们在塞特城有很大的影响，社会主义者在市参议会里占多数，但是他们不敢号召总停工，而只限于组织晚间集会。5月1日，所有的码头工人举行庆祝活动，以自己的榜样鼓舞了所有的木桶匠放下工作；到中午塞特全城停工，这时党员们是多么惊异和高兴。

1890年五一节示威在法国是很有气势的，它的规模超过了社

会主义者原先的期望。当然，参加庆祝活动的还不是整个工人阶级，但是它的最先进的和最活跃的部分表明，它响应了国际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口号。1890年五一节，以其最有阶级觉悟的精华为代表的欧美工人阶级站立起来了；全世界无产者克服一切民族偏见，打破陆地和海上的边界，彼此携起手来并宣誓为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并肩战斗。

在这一天，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举行了示威。资产阶级报刊所散布的消息和谣言以及政府所采取的镇压措施使它相信，它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的威胁，并象一个勇士那样在危险面前叫喊道：“我们不怕，让我们自己救自己吧！”资本家抢在工人示威的前头：五月一日，巴黎富人区的商店和世袭贵族和金融贵族住宅的百叶窗都上了锁。若不是广场和街道上挤满了工人、警察和士兵，人们还以为自己置身于一座空城。可见，资本家也举行了他们的示威，恐怖的示威。

1890年五一节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场面：全世界无产者在同一个思想下团结起来，被同一个意志所鼓舞，遵从同一个口号，他们为一个共同的、统一的行动面把自己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如果五一节仅仅产生这样的结果，那么它的意义就很了不起；这样国际社会主义者就会取得对坚决镇压工人阶级的任何共同行动的资本家的决定性胜利。

资产阶级采用一切手段打击工人阶级的工会和政治组织。而结果如何呢？无产阶级响应在巴黎国际博览会的喧闹声中几乎不被人察觉的代表大会发出的号召，突然举行世界性的示威并表明，为了要求在各地进行同样的社会改革，它团结一致地反对资本家阶级。1890年5月1日，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映红天际。

二 1891 年五一节

1890年的五一节唤醒了无产阶级广大群众。那些迄今为止任何社会主义宣传都没有给他们留下印象和影响的工人阶层现在感觉到了社会改革的必要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相信了实现这些改革的可能性。工人事业的先驱战士懂得,示威是发动无产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因此,去年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经常举行示威,在即将举行的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应当提出宣布五月一日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固定节日的提案。

法国社会主义者在1890年五一节的胜利的鼓舞下以炽烈的热情着手组织1891年的五一节示威。2月,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和工团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发出了一项号召,张贴在所有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我在这里把它作为对举行示威有决定性影响的历史文件援引如下。

五一节的国际示威 告法国工人书

“同志们!五月一日已经临近了。正如欧洲、美洲和澳洲的所有工人政党在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出的决议所指出的,这一天应当永远成为国际劳动节。我们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表明,世界各地,直到最小的地方,工人们都在准备这次显示国际团结的活动。

这一天,国界实际上将消失;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应当联合的必将联合在一起,应当分裂的必将分裂开来;一方面,一切财富的创造者——无产者出于对解放的共同追求将手挽手地站在一起,尽管有人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企图唆使他们互相残杀;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剥削者将聚集起来,他们由于恐惧和胆怯而联合在一起,徒劳地拚命反对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的并将把他们扫除干净的历史潮流。

法国的工人同志们！在这一天，社会问题的全部严重性将出现在甚至最漠不关心的人面前。面对着对生产者阶级来说是罕见的、空前的贫困根源的现代财富生产过剩，每个人都必须思考并质问自己：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工场、营业所和商店的工人看到，他们的工资在降低，工作时间在延长，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越来越被资本主义的奴役所吞没并被利用来同他们本人进行肮脏的竞争？

为什么小商人一个接一个消失，被企业主的消费合作社和批发商店所挤垮？

为什么被捐税和抵押弄得破产以及受高利贷盘剥的农民私有主越来越丧失自己的土地？他们曾在这些土地上花费了许多心血，将来有那么一天在保护祖国的借口下他们不得不为了现在夺走他们土地的不劳而获者的利益而保卫这些土地。

在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下，无论是在共和制国家，或者是在君主制国家，一切劳动和生产的人都受剥削和压迫。你们在这个事实面前将会认识到，你们遭受不幸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经济制度，在于生产资料和原料为寄生者阶级所垄断而不属于唯一使它们具有价值的人。

你们将会明白，只有消除现存的劳动同所有权的分离现象，情况才会发生变化。到那时你们就会纷纷转向社会主义。当你们同时摆脱妄想恢复僵死的社会制度的反动分子和只会运用自己的政权以谷物、肉类、酒等的关税的形式组织有利于土地高利贷者的新饥饿阴谋的所谓共和主义者的时候，你们的绝大多数就会支持你们的阶级政党即劳动党并同它一起赢得胜利，而这个胜利将保证把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一切生产资料归还给他们，让他们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作为五一节示威的最近目标的法定八小时工作日是走向你们彻底解放的第一步，这种解放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

限制劳动占有者现在得以强加给工人阶级（不分年龄和性别）的劳动量必定会给将要饿死的失业者在作坊里找到位置，必定会尽可能地提高工资，必定会给你们提供你们的精神发展和运用你们作为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权利

所必需的余暇。

工人党全国委员会：西·德雷尔、费鲁耳、茹尔·盖得、保尔·拉法格。

工团联合会全国委员会：阿·德尔克律兹、傅立叶、马奴夫利埃、阿·马丁、沙拉姆比埃。

这个号召书刚一张贴，一些城市里的警察便奉命赶紧把它撕毁。费鲁耳就这种违法行为在议会里对孔斯坦提出质问。这位在庸人当中以聪明机智著称的内务部长理屈词穷，只能说，必须撕掉传单，因为围看传单的人太多，有碍街道交通。费鲁耳反驳说：“张贴传单就是为了让别人看的，你们的违法的粗暴行为只会促使社会主义者的号召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实际上，这个号召书被所有报刊所转载。它们在这一年为社会主义者服务非常卖力，就好象拿了他们支付的佣金一样。各报纸卖力地竞相发表与五一节多少有点关系的消息并刊载许多巴黎和外省的著名社会主义者的访问记。

居住在巴黎的、参加过决定再次组织五一节示威的利尔和加来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认为，计划中的示威可以提供把巴黎社会主义政党的不同派别统一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机会。因此，他们向所有的工团和社会主义团体发出呼吁，建议他们派代表组成一个总委员会，以担负组织示威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者愿意忘掉他们对其他派别的一切指责，一心争取一切革命力量的联合，但是他们的努力失败了。总委员会成为阴谋的策源地：去年反对任何示威的可能派参加委员会只是为了在今年继续破坏示威，至少在巴黎，因为他们在外省毫无影响。

马克思主义者想起了孔斯坦先生在组织1890劳动节方面所给予他们的帮助，他们不打算让他失去再次为他们效力的机会。去年，他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周围布置了大批警察、步兵和骑兵，调动这么大批的军队吓坏了富人的街区。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决定给他一个口实，让他在今年用军事力量占领巴黎的所有街区，从而使

全市资产阶级居民惶恐不安。为此目的，他们向总委员会建议：五月一日上午把巴黎的众议员、市参议员和实业仲裁法庭成员召集到二十个市区的区政府，接见将要前来代表自己的选民要求某些社会改革的代表团。这样一来，孔斯坦先生就会在所有的市区集结军队，其结果，巴黎会陷入极度的紧张和恐慌之中。本来想要安抚资产者的军队的架势只能把资产者吓坏，因为这使他们担心他们的生命和财产要受到威胁，而相反，这在本来应当使之害怕的工人当中引起好奇和愤怒。

常常表现出英雄般的勇敢精神的巴黎工人是本性开朗的人；他们喜欢拿政府开心，更喜欢捉弄警察；对他们来说，示威是一个节日。他们会愉快地参加。他们不反抗警察或骑兵的袭击，而是躲开这些家伙或闪到一边让这些家伙过去，但是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再回到被驱赶的原处，所以武装力量只得不断地重复袭击，以便肃清这些地方。没有什么能够比这种无休止的徒劳无益的工作更使军队疲于奔命了。在要求格雷维总统辞职的时候，人群连续三天聚集在众议院附近搞这种游戏。武装力量的人马被弄得疲惫不堪，以致于再干两天这样的工作就足以使他们不再适宜于服任何现役了。巴黎居民用这种方式创造了街头战的新战术；他们一枪不放就能够使整个军队丧失战斗力。

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派代表到各市区政府的建议使巴黎人有机会演习自己的战略艺术。如果军队在各个市区巡逻，那么甚至最漠不关心的工人也会不放心，他们会大批离开作坊，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会使示威者的人数增加；他们作为普通的旁观者出现，最终会参加示威。所有的工人郊区就会骚动起来，而整个被吸引和卷入运动的人群自然会向众议院——巴黎人民群众的传统会场集中；在协和广场会聚集二、三十万人，这样，示威就会变得声势空前浩大。被禁止举行任何露天集会的巴黎工人就可以用这种办

法赢得在街头示威的权利。

但是，任何资本主义政府都不会自愿地给予无产阶级这种威胁它本身存在的权利。内阁的和官方的报纸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这个建议，而在布朗热危机时期听命于孔斯坦的可能派开始进行阴谋活动，使总委员会拒绝这个建议。但推迟并不等于取消，明年还要再次提出这个建议。

利尔和加来代表大会已经决定，建议各省的社会主义团体和工团派代表到巴黎，同巴黎代表共同向众议院要求八小时工作日。在总委员会里占多数的可能派作出了拒绝派代表团的决议。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退出委员会并决定象去年一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组织示威。

当可能派施展阴谋手段破坏任何示威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也反对五一节。他们劝说工人不要放下工作，因为他们会因此而丧失一天的工钱；但是他们劝说工人立即举行社会革命。这些可爱的家伙不愿意为五一节失去一天工钱，却想要说服工人为了一次暴乱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大家知道，几年以前，警察利用无政府主义者来阻止失业者的宣传活动。它同样妄想利用他们来反对五一节示威，但是结果表明，它完全打错了算盘。

尽管有可能派的阴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相当多的工人仍然举行了庆祝活动。工人大批地拥向议会，为外省和巴黎的组织派出的三十七人的强大代表团（其中还有英国下院的一个社会主义议员肯宁安·格莱安）助威。要不是上面提到的破坏任何街头示威的阴谋，示威者肯定会有十倍于此的人数，而正是这种示威才是振奋巴黎人民群众和向当局的决定施加压力的唯一手段。议会议长和激进党滑稽剧的丑角弗洛凯先生拒绝接见代表，因为据他说他们的人数太多。可见，当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和平地派代表团要求实行立法改革的时候，政府当局的大门是紧闭的，而大门

对一切资本家代表团却是敞开的。

三 外省的五一节

在外省的城市里，1890年的五一节庆祝活动搞得比预料的要热烈。例如，在鲁贝工人们认为，停工一天不足以显示力量，所以他们整整庆祝了三天；有些地方人们利用这个机会要求企业主改善劳动条件并宣布罢工。这次示威在工人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利尔和加来代表大会（1890年10月）的全体代表受委托要求今后五月一日仍将举行无产阶级的大规模示威，但每个地区的工人可以自由选择适合于他们的和可能的示威形式。

从2月开始，各省工团和社会主义团体根据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宣布的口号在劳动居民中展开宣传。在较大的城市里成立了委员会，委员会组织集会和委派演讲者到需要的地方去。我本人受全国委员会的委派到下塞纳、下卢瓦尔、加来海峡和诺尔等省的一些城市和工业中心去宣传。我们宣传之行所到的地方，如象富尔米、维涅伊、阿奴阿等地，是过去从来还没有举行过社会主义集会的地方。参加集会的听众之多，他们欢迎社会主义理论之热情，使我感到惊奇，我也请我的读者注意到这一点。一家反动报纸宣称社会主义理论是狂妄的和罪恶的，但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只有它才能征服人心并唤醒工人群众。这话是完全合乎实际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天才思想家的乌托邦幻想，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过程和现象在思想上的反映。它的不可抗拒的宣传力量就在于此。资本家阶级不仅为了本身的利益实现了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而且也创造了将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夺取这些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资本家阶级压榨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把贫困的沉重负担加在他们身上，从而使他们的生活不堪忍受，迫使他们成为革命者。

在我的宣传旅行中,我得以看到,工人群众由于资本家的剥削而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当我在南特逗留的时候,一个工人代表团邀请我到圣纳泽尔作报告;它向我保证,只要作一次报告,就足以使造船厂的停工变成总罢工。因为我的全部时间已经安排在其他地方了,所以我没有能满足这个请求,但是代表团的期望被证明并不是夸大的。尽管没有举行公开的集会,但圣纳泽尔的大约五百名五金工人在五月一日全部停了工。在诺尔省的工业小城弗勒努瓦-勒-格朗,在三千五百居民中有三分之一,即一千多人(男人、女人和孩子)出席了我的报告会,而五月一日有三个织布厂和两个纺纱厂关了门,因为它们的全体员工举行了庆祝活动。谁还记得当初让群众关心社会问题是何等困难,他就会惊奇地发现,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1890年五一节之后。五一节示威是法国社会主义者迄今所掌握的影响工人群众和推动他们前进的最强大的杠杆。

如果谁想要了解社会主义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发展,那他就应当访问一下外省的工业中心。在巴黎,以及在某些主要是商业而不是工业的大城市,工人一向参加政治斗争;他们十分热衷于干预资产阶级的家庭纠纷,以致因此而忘记了自己的要求;除了政治斗争,还有宗教分歧,各种精神需要,以及吸引大城市居民的各种娱乐和消遣。相反,在工业中心经济问题没有被政治和宗教问题所掩盖,而是赤裸裸地表现为劳动同资本的斗争。因此,在那里工人把自己的一切思想和追求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种状况使外省的工人运动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目前外省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觉悟比巴黎的工人居民高。这个事实对我们的历史性运动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从本世纪初,巴黎发出一切政治革命的信号。只有巴黎成为1830年、1848年和1870年革命的发祥地,——外省只是认可在首都

已经完成的统治形式的变革。但是，当1871年3月18日巴黎不再朝着政治革命而是朝着可以同1789年大革命相提并论的社会革命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没有思想准备和惊慌失措的外省却抛弃了巴黎。这就是为什么巴黎不得不孤军抵抗反动派的进攻，而这正是公社失败的原因。而现在外省在准备社会革命，甚至准备得比巴黎好。如果首都居民——它非常敏感和活跃，以致一天之内就可以被风暴吸引到革命运动里去——再次发出革命的信号，那末外省就会象一个人一样起来支持它，甚至象1789年那样迎头赶上。当时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最初攻击是农村居民发动的，——农民和市民夺取了城堡并烧毁地契和家谱；而在香榭丽舍林荫大道露营的马赛人8月10日对土伊勒里宫发起进攻，从而一举摧毁了神授王权。

许多年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在外省大大加强了，从而对市参议会的选举产生了影响。直到不久前，城市和乡镇还由市参议员来管理，这些人不是资产阶级就是受其主子和老板信赖的所谓“操行良好的”工人。资本家千方百计不让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进入市政机构。为此明文规定这类职务必须是无报酬的，哪个工人敢于出来竞选这些职位，就会被开除工作。但是，尽管存在这些障碍，每一次新的选举之后社会主义市参议员的人数都在增加；在某些城市现在社会主义者已经成为市参议会的多数。无产阶级以此为夺取政权奠定了始基。这个事实的意义是多么巨大，是不言自明的，而且它的意义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更加巨大：彼此有联系的社会主义市参议会对于事态的发展将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在某些城市里，由于它们的帮助，成立了**劳动介绍所**，在经济斗争领域把工人的力量集中起来了。

因此五一节在法国外省必定获得重大的意义。在一切存在工团和社会主义团体的地方，人们采取一切措施来组织尽可能广泛

的停工和街头示威。尽管企业主和政府竭力阻止鼓动，人们不予理睬，依然积极地进行鼓动。在某些地方，如象富尔米，工人在五一节前一个星期就通知资本家说，这一天他们打算举行庆祝，把这一天当作节日。在其他一些城市，如象加来，关于停工的问题不是在街头集会上由于受演讲者的影响而决定的。这个城市所有一百二十家织细纱和花边的工厂全体工人都被征求了意见，他们全体一致赞成停工一天。

暴跳如雷的企业主们狂叫，他在自己的工厂里不再是主人了，但是他们不敢反对通过的决议。在鲁贝，工厂主想到，去年他们的反抗引起了许多起罢工，因此，他们宣布他们打算提出一个建议，应当承认五月一日是和七月十四日一样的法定节日。有些煤矿当局作出明智的决定，宣布它虽然不同意停工一天，但不打算采取措施反对五一节不下井的矿工。在阿韦龙省的矿区矿业工程师们以种种威胁阻止庆祝五一节，可是第二天矿工们拒绝下井。

四 富尔米的屠杀

孔斯坦先生是这样一位部长，他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不是实行什么改革和把国家管理好，而是不得不经常地拯救共和国或社会。他曾经从布朗热的危险中拯救了共和国；在最近的选举中，他成为共和派议员的拯救者，因为他通过罕见的行政压力和从特别基金中拿出大笔款项来帮助他们进入了议会；1890年五一节之后，他向小市民们反复说，他从社会主义者手里拯救了社会，而今年他还必须再次充当社会的拯救者的角色。为此目的，他应当制造一个危险或至少使人相信存在危险。他下令在巴黎张贴杀气腾腾的无政府主义招贴画，使善良的资产者从画上知道，五月一日可怕的无政府主义者打算用火和剑毁灭一切。虽然警察接到了撕掉这些

招贴画的命令，但是急于发表这些招贴画的内容的报刊已经详细地加以报道了。资产阶级报纸同样刊载了所谓的无政府主义传单，传单上号召士兵造反并打死自己的军官。警察当局硬说这个号召书是在兵营的士兵当中散发的，而实际上不过是有人把它交给了巴黎报纸的编辑部。值得指出的是，警察当局虽然进行了最仔细的搜查，但并没有发现这些无政府主义号召书的印刷者和起草者，张贴者和传播者。这个把戏搞得如此笨拙，甚至《太阳报》一类的反动报纸都暗示，孔斯坦先生本人很可能就是血腥的煽动性传单的作者，至少他参与了起草。

孔斯坦先生用这种办法制造了“危险”之后，五月一日便着手从危险中拯救社会。他调动军队到巴黎和所有会举行示威的城市；据说，甚至驻守边境的一些团也接到命令准备出击，只要一接到信号就马上从要塞出动。整个法国军队已处于战备状态；为了粉碎五一节示威，可以格杀勿论。如果为了拯救社会需要调动这样多的军队，这个危险该是多么大啊！

警察接到命令：在五月一日这一天驱散任何集合在一起的人群和用粗暴的行动挑拨群众；宪兵和军队只要遇到一点点反抗的表示就应当动用武器。在马赛、克利希、里昂、圣康坦、夏尔维尔、波尔多、南特等地，总之，几乎在工人举行和平示威向省政府或市政府要求八小时工作日和劳动保护立法的一切地方，工人们都遭到野蛮的袭击和被宪兵和骑兵以最野蛮的方式驱散。人们用喊叫和口哨回答，有些地方投了石头和开了枪。

在富尔米军队表现了前所未闻的残酷和野蛮。该地的工人党组织在4月20日的全体会议上一致决定庆祝五一节并通知工厂主打算在这一天停工。该地参加辛迪加的企业主也开会通过一项决议，他们把这个决议张贴出来，扬言谁如果在五月一日不上工就要被开除。他们本来希望吓唬一下工人，但只是激起了工人的愤怒；

这种威胁甚至在最漠不关心的工人当中引起了不满，结果发生了总停工。五月一日上工的工人寥寥无几，工厂主只好让他们回家。工厂里空空荡荡，而在街头和广场上在灿烂的阳光下游度节日的身穿假日盛装的工人人山人海；从来没有见到过比这更和平的人群。在一家纺织厂的前面聚集了許多人。人们看到有些工人走进厂里，而当这些工人出来时，向他们吹口哨和呼喊，骂他们是胆小鬼和叛徒。

这样一来就找到了用武装力量干涉的求之不得的借口。宪兵袭击了人群并逮捕了許多人。午后，一大群青年、妇女和儿童唱着歌来到原来的地方，要求释放被捕者。这时，士兵在人群没有进行任何挑衅和没有按法律规定发出三次警告散开的情况下开了枪。若不是天主教神父马尔热伦从自己的家里冲出来叫喊：“死人够多啦！别打了！”，这场屠杀还会继续下去。从现场抬走九个死者：一个三十岁的男人，两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两个十一、二岁的儿童，四个十七到二十岁的姑娘。其中的一个姑娘手里拿着嫩树枝伴随着她的打着三色旗的未婚夫，也饮弹倒下。这是第一次使用勒贝尔式步枪和无烟火药，而这两样东西创造了奇迹！^①

对丝毫没有破坏秩序的和平老百姓进行的这种可怕的屠杀在全国引起了一片惊骇的呼声。孔斯坦惊慌失措：当格朗热和罗什在议会里大声喊他是杀人凶手的时候，这个向来讲话极端厚颜无耻的人却不敢说个不字。

有人企图把在富尔米犯下的罪行的责任推到孔斯坦一个人身上，但是工人们没有上当。他们清楚地知道，躲在孔斯坦背后的有下令开枪的军官，还有以市长和市参议员为代表的工厂主，正是他们把军队招来并唆使士兵和军官镇压工人。富尔米的工人居民对

^① 在1867年11月3日法国军队在教皇领地打败加里波第志愿军团的门塔纳战役之后，法伊将军致电巴黎说：“针发枪创造了奇迹”。——《新时代》杂志编者注

造成流血事件的第一百四十五团发出嘘声并骂士兵是凶手和“普鲁士鬼子”。相反，第八十四团却受到欢迎，因为它的下级军官拒绝下令“开火！”。第一百四十五团的一名士兵也拒绝开枪，而当军官拿着手枪冲到他跟前时，士兵回答说：“我在人群中看见我的母亲”。如果说孔斯坦和内阁代表拒绝对富尔米事件进行调查，那是因为他们担心暴露真正的罪犯并使各界人士知道有多少士兵和下级军官对接到的命令不满而拒绝服从。一位代表说：“调查会在军队中瓦解士气并导致士兵们有一天会调转枪口。”

工厂主本来希望吓唬居民，却反而把他们激怒了。工人们改变了发生血案的地方的名称；人群聚集的集市广场现在被叫作“勒贝尔广场”；烈士倒下的那条埃利奥特大街被叫作“罪恶大街”。一位酒馆老板用一个铜圈把一颗射进他的厨柜门板的子弹镶嵌起来并写上几个字：“1890年五一节纪念——我打死了人”。整个富尔米为九位死难者送葬，市长和市参议员被禁止进入墓地，死者的家属拒绝接受市政当局发给他们的丧葬费和急需的生活补贴，工人们自己募集了为此所必需的钱。在富尔米周围还有许多工业中心，人口二千到五千不等，它们相距只有几公里。所有这些小城市的工人都派代表来参加葬礼；一些较大的城市，如利尔、鲁贝等，派代表送来花圈。墓地成为瞻仰地，每个星期天都有工人从邻近的地区汇集到这里，向死难者的坟墓献花圈。在富尔米几乎整整一星期没有上工，在周围的工业中心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修改工厂规则，解除不受欢迎的工头和厂长的职务，总之，整个地区群情激昂。

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巴黎、鲁贝、塞特、卢昂、里昂、加来等市参议会拨出一笔款项帮助死难者的家庭；以罗什弗尔为主编的《不妥协派报》和其他报纸发起为他们募捐；钱从法国各地源源而来。富尔米的屠杀被看成是民族灾难。^①

五一节已经有了自己的殉难者。1869年，八里桥将军^②的部队在里卡马里和圣奥本枪杀闹事的矿工。过了两年，全法国欢迎把宣布成立共和国的1871年9月4日^③作为解放日。社会主义者在想：再过多少年法国将会高兴地庆祝社会革命的胜利呢？

* * *

在法国，五一节不同于其他著名的示威日：七月十四日、三月十八日、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三月十八日，全法国的工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集会庆祝社会革命曙光的出现。在五月流血周的星期日，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去瞻仰公社最后一批战士长眠的拉雪兹神甫墓地的公社社员墙，以追悼他们的壮烈牺牲并宣誓为他们复仇。

正象我在宣传旅行时所到之处能证实的那样，五一节示威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任何一个工人，如果参加五一节的示威，或者至少愿意参加示威，即使他被剥夺了这种机会，他就会深信全世界工人跟他齐心协力和同心同德。无论他处于何等孤立的状况，即使生活在国家最边远的角落，他也会清楚地意识到，示威是响应

① 富尔米和附近地区的资本主义报刊竭力掩盖事实真相并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实际上工人根本没有不满情绪，而他们的不满情绪只是由雷纳尔、居林和拉法格的社会主义宣传人为造成的。它们骂社会主义者是魔法师，只要他们一出现在哪里，就能立即把一切东西都变成自己的对立面。他们一出现在某个地方，本来自己满足于粗茶淡饭而用佳肴美酒来供养工人的资本家就变成了强迫工人为了不足以糊口的工资每天劳动十二小时的剥削者；而从前对自己的命运心满意足的工人突然开始想象他们不如路上的石头。如果资本家能够公开地说出自己由衷的希望，那么他们就会要求执行火刑，把社会主义者强盗活活地烧死。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们暂且把富尔米工人党组织的书记居林关进监狱。加给他的罪名是，他是作为屠杀的导火线的这次聚众闹事的主谋。因为对他恨之入骨的企业主不能把他枪毙，所以他们让他至少尝尝长期监禁的滋味。但是选民将会替他报仇，明年市参议会选举时会选他当富尔米市的市长。——拉法格注

② 八里桥伯爵，即古赞-蒙多邦（1796—1878）——法国将军，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法侵华远征军指挥官（1860），因在北京附近的八里桥战胜清兵，被拿破仑第三授予八里桥伯爵的封号。——编者注

③ 原文如此。应为1870年9月4日。——编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宣布的强有力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国际主义使五一节示威带有独特的、几乎是神秘的色彩。那些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小工业区而与任何宣传隔绝的工人急切地打听他们刚刚知道名字而肯定完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其他国家里五一节示威的情况，这种情景是令人感动的。他们盼望五一节象盼望解救日一样，因为他们对自己说，在某个地方——他们并不确切知道什么地方——同伴们进行的斗争，必定也会帮助改善他们的可怜的处境。最胆小的人在这一天会变成勇敢的人并乘机要求企业主改善劳动条件，或甚至宣布罢工，但并不知道如何举行和坚持罢工。他们觉得，五一节示威中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将帮助他们取得胜利。^①富尔米的屠杀更加深了这种神秘的情绪。在某些城市人们已经谈论1892年五一节派代表到富尔米去的问题。看来，那里的墓地应当成为法国社会主义者瞻仰的地方。

五一节给资本家阶级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一切政治和宗教流派的富人的报纸《费加罗报》想要消除去年对五一节示威的恐怖情绪，在五一节前几星期就把即将来临的工人节日描绘成“闹剧”。但是，5月2日它改变了腔调，它的一位撰稿人圣塞尔写道：“即使在比利时和德国一切平安无事，但还是应当继续非常认真地对待这种工人示威的有规律的重演和普遍性所造成的形势。今年这也

^① 过去曾经多次试图把巴黎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和其他营业员组织起来，但没有成功。在最近的五一节之后，这些人联合起来，建立了工团，并向经营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交通的股份公司提出如下的适度的要求：把每天工作时间从十六小时或十七小时缩减到十二小时；只有在违反章程得到证实的情况下才能判处罚款；罚款转入养老金基金；付给每个职员必须缴纳的保证金三厘利息。这些非常适度的要求应当交给强大的股份公司。它们无疑会拒绝接受，这样，人们不得不最后举行公共汽车公司营业员的总罢工（大家知道，这次罢工在这期间已经举行并取得了胜利。——《新时代》杂志编者注）。——拉法格注

只不过是我们在我们面前举行的总排练。但是，如果人们考虑一下，同样的示威在同一时刻发生在费拉得尔菲亚和克拉科夫，在克利斯提阿纳和塞维尔，那么人们无论如何不得不承认——甚至有被看成是悲观者的危险——这出剧的排练会继续进行，它的首次演出不论是多么遥远的事情，也将是可怕的”。

发行一百多万份的《小报》和发行几十万份的《小巴黎人报》深入到最小的村庄，其主要的读者是在中等居民阶层中间。这两家报纸为五一节示威和八小时工作日作宣传；它们对社会主义表示尊重。上述两家报纸的言论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中尚处在政治和工会组织之外的那一部分工人的观点。5月8日，《小巴黎人报》在一篇题为《流血的罢工》的文章中写了如下一段话：

“运动在不断地发展，而且越来越快。如果人们回忆一下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那么人们就看到不断发生的暴乱，如象圣玛丽修道院暴乱^①，不过那时闹事的只有几百个暴乱者，很容易镇压。后来到1848年，经过六月的三天的战斗，牺牲了两万名战斗者。镇压是可怕的，当它结束时，盲目的人们以为，社会战争永远消灭了。尽管如此，1871年又爆发了可怕的兄弟相残的战斗，导致组成一系列内战的大军。

全世界举行的五一节示威的同时性和一致性本身包含有更加严重的警告。显然，潮水还在上涨，体力劳动者将不再会老老实实地屈从现代社会制度给他们安排的命运。

进步的敌人回答说，解决问题是困难的。但是，这难道不是这个世界的幸运者一向到处说的话吗？古代世界不懂得，社会没有奴隶怎么能存在；中世纪根本不想听到解放农奴；在旧制度的心目中，贵族的特权是不可动摇的教条。过去的时代一个跟着一个崩溃了，而伟大的革命创立了新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还没有结出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社会果实，而古老的百年大厦崩溃的

^① 它发生在1832年6月5日；它的导火线是在拉马克将军的葬礼时举行的共和派示威。——编者注

时刻日益临近，那时只有用让步的办法才能拯救自己，否则将压死在倒塌的废墟下面。”

五一节示威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以致使克列孟梭这个激进派的死火山在议会中发表了如下的讲话：

他说：“先生们，你们对五一节所取得的意义不感到惊讶吗？你们在报纸上看到从欧美各地发来的许多电讯中关于五一节在所有工人中心所说的或所做的报道，不感到惊异吗？你们已经在精神上伴随某些城市里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盛大的游行行列行进。你们知道，在另一些地方发生了同武装力量的冲突，发生了战斗；你们在这里遇到热情，在那里遇到愤怒，但到处遇到激情。甚至最近视的人也必定会看清楚，在工人世界里民怨沸腾，在历史上正在形成新的因素，出现今后政治家必须加以考虑的新的和可怕的力量。

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应当有勇气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要以这个运动的先驱者所赋予它的那种形式：这是第四等级^①站起来了，现在想要夺取政权。

我可以断言，现代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事实是不可避免的革命。这个革命正在成熟：组成第四等级。你们应当容忍它，你们要末用武力反对它，要末展开双臂拥抱它。

如果你们用武力反对它，那就意味着内战……多么不幸的命运！难道议会共和制和君主制都注定会通过不同的道路走向同样的灾难？”

法国的统治阶级不能理解这样的话。当它们感到害怕的时候，它们只有一个想法：躲到某个拿破仑第三，或某个梯也尔，或某个孔斯坦的保护之下，以为他们会代表天意，永远保护他们免遭任何不幸。它们决不会想起要实行最紧迫的社会改革。经济发展和统治阶级的极端的愚蠢在法国正在造成可怕的事件。这些事件将会引起的已经不再是象1830年、1848年和1871年那样的政治革命，而

^① 克列孟梭用拉萨尔的术语“第四等级”来称呼无产阶级，这个术语是不正确的，在中世纪社会分为等级，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各自的特权，处于行会和公会之外的工人没有任何特权，所以不能构成单独的阶层。阶层标志着拥有各自的特权的有组织的团体。无产阶级的特权是什么呢？是贫困和繁重的劳动，——拉法格注

是社会变革。

五一节表明，在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国家里工人阶级受着同样的桎梏的奴役，遭受着同样的不幸，但是也有同样的需要和有追求解放的同样的热情；五一节表明，全世界无产者决心并能够彼此取得一致意见，共同行动。这一事实值得特别注意。

译自《新时代》第9年卷(1890—1891)第2册
第289—304页。

(孙 魁译)

社会主义候选人的声明*

(1891年10月)

公民们!

根据把你们召集起来的那个法令,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国民陪审团的成员了。

你们将在10月25日审理富尔米流血事件一案。在杜埃法庭作出判决之后,司法部长法利埃先生声称:“诺尔省陪审团在处理这起不幸事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你们必须对此作出回答。

你们还将通过投票来表明你们的态度:由十来个工厂主和地主资本家组成的陪审团判处社会主义者几年徒刑,这是否就足以洗刷用勒贝尔式步枪向妇女和儿童开火的血腥罪行。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才同意担任“抗议派”的候选人。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在人民法庭上——我所唯一承认的法庭——控告那些唆使军队开往富尔米的企业主,控告直接指挥这一流血事件的军政当局,控告那些在一个打着共和国招牌的政府指使下充

* 1891年5月1日富尔米流血事件发生后,杜埃重罪法庭在7月间以“煽动武装聚众闹事”、“唆使凶杀”等罪名判处保尔·拉法格一年徒刑。因利尔市的一名议员去世,需要补选,于是,保尔·拉法格被提名为“抗议富尔米流血事件”的候选人。1889年,德洛里曾在同一选区里获得一万四千零六张选票。起初,在圣·珀拉惹监狱里服刑的拉法格拒绝接受提名,因为他想让和他同时被判刑的居林出面竞选。但是,根据法院的判决,居林已被剥夺被选举权。1891年10月3日,《社会主义者报》公布了候选人的名字。1891年10月5日,拉法格作为候选人在圣·珀拉惹监狱向利尔市第一选区的选民发表书面声明。这份声明登在1891年10月10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并在整个竞选期间广泛张贴和散发。——编者注

当帮凶的法官——他们的判决掩盖了比在奥班和里卡马里发生的事件^①更为严重的又一起流血事件的真相。

但是，你们不但要审判在五月一日蓄意制造事端的肇事者，而且还应该谴责那种越来越普遍地动用所谓的国民军去对付工人群众的作法，因为这些工人群众提出的经济要求是最合法最温和不过的了。你们应当说明，你们做父母的是否同意让人家在保卫祖国的借口下夺走你们的孩子，并把他们变成替企业主卖命的雇佣军，变成资本家的警犬，变成屠杀与他们自己血肉相连的工人群众的刽子手。

你们还将审判这个依靠你们的巨大努力和牺牲才得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二十年来，你们为了这个共和国忍受着贫困的煎熬，而它却只知道一味地增加预算开支，纵容营私舞弊行为，听凭奸商哄抬面包和肉类的价格。

你们应该说明，这个代表总公司^②利益的、制造巴拿马丑闻的以及导致其他企业纷纷象路特希尔德银行那样破产倒闭的共和国，是不是你们所希望建立的共和国；或者，这只是一个原来的君主制的继续或者比它还要恶劣的共和国，而你们本以为推翻了帝国就可以彻底消灭一切君主制度。

最后，你们还应该审判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它把工农业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寄生虫手里，使无产者的人数与日俱增；它把无产者以及他们的妻儿变成创造利润的机器，并且认为只要建立一些救济署和医院就可以向被剥夺全部劳动果实的生产者交账了。

你们还应该说明，象你们目前这样的状况是否应该继续下去：

① 指1869年10月8日在奥班和6月16日在里卡马里发生的罢工遭到当局的血腥镇压。——编者注

② 指1876年建立的天主教银行。——编者注

每月的工资不足以糊口，失业现象日趋严重，生产出来的产品全被他人占有，而自己则一贫如洗，虽然是自由劳动者，但劳动强度却大大超过过去的奴隶；或者，你们应该宣布：你们知道，科学的发展已使消费资料极为丰富，今天有条件使每个人都享受一定的福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只需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你们决心在解放的大道上迈出第一步，以工人党的胜利宣告新秩序即将来临。

利尔的劳动者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

译自《拉法格选集》1970年巴黎法文版
第255—257页。

（冯嘉瑞译）

左拉的《金钱》*

(1891年)

一 左拉对于小说的贡献

一种很有意思的天真的怪癖，流行在巴黎的那帮作家之间：他们人人自以为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创造者，这个人在诗歌方面，那个人在小说方面；个个都自命为一种流派的领袖；个个在自己心目中都以为与众不同到这种程度，简直把自己放在和那些可尊敬的同行有天渊之别的地位。虽然如此，通过他们对各人的天才作品互相回敬的轻视，通过他们唯恐自己的独特性被人否认的耽心，这些先生们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当彼此招呼的时候，他们不会忽略以最大的礼貌和最郑重的姿态互相尊为“大师”。以沉闷可厌的写作艺术见长的龚古尔兄弟，认为官办的学院太小了，不能容纳所有以追逐满街跑的隽智^①为务的天才，于是他们在安都昂先生的自由剧场^②旁边，依样画葫芦地设立了一家“不朽之士”^③的

* 本文首次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第10年卷（1891—1892）第1册第4—10、41—46、76—86、101—110页。——编者注

① “隽智”(esprit)是十七、十八世纪以来，法国(尤其是巴黎)宫廷和沙龙中大为提倡的一种说八面玲珑的俏皮话的小聪明。——编者注

② 安都昂(1857—1943)——法国话剧演员，曾任国立话剧院主任，最后自己办了一个自由剧场。——编者注

③ 法兰西学院的四十个院士都是终身制，同时也因在一般人眼中以为一入学院，就名垂千古，所以院士的通俗称号是“四十位不朽之士。”——编者注

自由作坊^①；他们捐给这作坊一笔款项，不过必须在他们去世之后才能支付这笔钱，这倒是实话！

为了争取自己给自己戴上桂冠——最好的恭维是出于自己之口的——诗人和小说家并不用自出心裁的思想和思索，象笨重的行李一样给自己添累赘，他们甚至没有费事去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形式。

这些先生们所垂涎的掌声以及那些叮叮当当的沉甸甸的钱币是来自广大公众的，而使公众茫然或惊讶是用不着独创性的，因此作家就满足于培植前辈已经利用过并且用旧了的各种形式。历史将要在当代各“流派”的“领袖”们的绝对缺乏想象这点上，看出他们最突出的特征。他们的全部努力和想望只限于从诗歌和小说中——至于戏剧方面，他们已经被观众的倒采驱逐出来了——抽掉曾经是1830年的浪漫主义的动人之处青春活力和泛滥的幻想；作为代替品，他们贡献了他们从艰难和耐心的努力中产生的货样。他们给了我们一种沉闷恶俗的塾师文学。

最肤浅的观察在于绝不从结果追究原因，或从眼前的作用探求最后的结果；这就是“现实主义者”的胜利；在他们对自己的愚笨乏味的“自我”作难以言状的庸俗分析时，他们的内心描写，发展到了顶点。对于自己所缺少的，他们设法用语文来补充；这些大师们的全副老练的本领，表现于极端矫揉造作，使自己苦恼，同时也使读者大伤脑筋的语言。他们之中有一个卓越的大师，发表了一本故事集，题名为《没有“那人”和“那个”的故事》，其中严厉地排斥了平白无辜的代名词“那人”和“那个”^②。^③现代诗人和作家在写作时，把注意更多地放在字眼上，而不放在这些字眼所代表的事物

^① 作家龚古尔兄弟捐出住宅和财产，在1903年12月成立龚古尔学会，会员十人，每年发奖金一次，主要给奖对象是新出版的小说。这儿所谓“‘不朽之士’的自由作坊”，就是指这个私人的学会。——编者注

上；他们经常在寻求表现风格的新句型；他们不重视观察得正确和写得正确，却很重视某些没有出现过的句型的树立，和“耀眼的火光”的投射。在他们看来，字眼本身有它们固有的价值，和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无关。字眼包含的思想是正确的或错误的，甚至不包含任何思想，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和安排新颖、出其不意、令人惊讶或使人瞠目就行。诗歌和小说的大师绞尽他们的贫乏的脑汁，为的是找出能够体面地补偿他们的想象力缺乏的一些尊号来。也就因此，几个月以前文学市场上一个新手发表了一篇乔治·桑式的温情故事。于是，自然而然地，他赶忙给自己封了一个尊号：“小说化的小说”^④派的领袖！尊号很多而成绩毫无，这就是，说到最后，现代文学的“大师”们的一篇总账。

* * *

左拉，他也一样，陷于上述错误之中：他自称为实验小说和自然主义小说的创始人，不管在他以前法国已经有了索列尔、普雷服神甫和巴尔扎克^③，英国已经有了菲尔丁和斯莫莱特，西班牙有了奎维陀、塞万提斯和《多梅斯的拉沙利欧》的作者门多萨。左拉自己对于自封的尊号并不给以任何意义，这无非是缀在他帽上的，以便引人注目的一枚徽章。今天，他既经胜利地克服了开始时所遇

② “那人”，法语中的关系代名词 *qui*；“那个”，法语中的关系代名词 *que*。——编者注

③ 风格晦涩到此田地，连龚古尔自己都不得不抗议：“当人们将两个互相从属的 *de* 字同时并用，例如使福楼拜失望的那名句：*une couronne de fleurs d'orangers*（顶橙花编成的花冠），就是写得不好。如果在一句中将用同一音缀开始的两个字放在互相过于接近之处，这也是写得不好。人们要求得比这还多，人们宣称，不能用一个单音字作为句子的开端，因为这两个可怜的小字母不能用来组成一个规模很大的句子或一组排句。”（见《龚古尔日记》第5卷第145页）——拉法格注

④ “小说化的小说”，意谓除了写小说之外别无目的的小说；或者说，为写小说而写的小说。——编者注

到的一切困难，他的传遍全球的名声既经使他在当前的作家之间获得了唯一的地位，他满足于写作有把握可以获得最大的成功和最高的赢利的小说，只有在支持那些追随他的作家时，他才想起他的派别来。

左拉和另一些“大师”一样，只有很少的追随者——现代大师们的特征就在于没有门徒；然而他在我们那些文学派别的领袖群中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使小说增加了一种新的成分。

小说家想使我们相信他们所写的人物的真实性，所以借用《博坦》^⑤上姓名作为小说中人物的姓名，把他们东一点西一点从周围尤其是从报纸上采集起来，并且以仔细保存、集合、比较和分类的言语和行动，作为人物的言语和行动。尽管如此，他们的人物并不给人以有生命、有血肉的真实人物的印象。他们和我们的生存漠不相关，他们不谈烦扰我们心神的利害关系，他们既不被我们的那

⑤ 巴尔扎克，伟大的博物学家若弗卢瓦·圣伊雷尔的私淑弟子，自称为“社会医学的普通医生”，在他的《人间喜剧》的《前言》中说他要写一部社会的自然史。在上世纪末年，多产的小说家雷斯蒂夫·德拉布勒东要想写“毕封的《自然史》的有用的补篇”。他不但口说实验小说，而且确乎进行一些实验。他写道：“因此，不论我获得何种娱乐，不论我如何放肆，我从不浪费光阴。在干了一件傻事，创立了一个‘派别’之后，我的安慰是：‘这使我受到教益；我将从中得到好处，既然我写作是为了自己付出代价去教导别人。’”（见《尼古拉先生》第1卷第236—237页）

雷斯蒂夫·德拉布勒东贯彻现实主义到这样程度，以致他将一些情书，也就是他为了获得按新派的说法所谓“人的资料”而写温柔的信札的复信，穿插在他的小说里。早已在十八世纪，克雷比翁建立了实验的和自然主义的小说理论，而左拉却自以为这是他发明的。克雷比翁在他的《心和精神的迷惘》中说：“这样地被通达情理的人所轻视的小说，而且时常轻视得很对，可能是一切文学体裁之中最能成为有用的一种，如果它被掌握得很好，如果不使它充满阴影的勉强的场面，以及性格与冒险行为都不象真实的英雄，而使它和话周一样，成为人类生活的画图……人终于看见自己的真面目：小说将不再使人那样地眼花缭乱，却更多地教导人。”（见《作品选集》1772年版第1卷第5—6页）——拉法格注

⑥ 《博坦》（1764—1853），本为法国官吏，后因编印《巴黎工商界年鉴》知名，即以其姓氏名其书。这部《年鉴》后来扩大范围，成为巴黎有财产或地位的居户姓名住址录。——编者注

些幻想所支持，也不被我们的那些嗜欲所苦恼。他们就象着糠充塞的傀儡一般，作家牵动他们身上的线，使他们按照情节的发展和所要求的效果而活动。

那些维克多和那些于连，在小说中产生，在小说中生活、恋爱和死亡，可是永远只按照他们自己的高兴而随便动作，并不服从他们自身机体方面发生的不可遏制的需要，也不服从他们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这是些超越人的本性而且支配着社会大事的非凡的人物。

在罗马，喜剧作家为了解决一团乱麻似的剧情，经常仰仗于“*Deus ex machina*”，仰仗于突然从天而降的神明。他们这种十分稚气并且多次被人讪笑的方法，被小说家们所拾取而且加以改进，使男女主人公扮演所说的神明的脚色。左拉竭力从小说中屏斥这种魔术，在这点上他是值得称道的；他至少试图从他的那些人物身上褫夺一部分万能权力，而将他们的行为和先决的原因联系起来；有时甚至使人物失去自由意志，使之屈服于双重的从属性，一种是内在的和生理的从属性，另一种是外部的和社会的从属性。

左拉将他的人物作为沾染了遗传的恶癖者而介绍给我们；这是为了解释他们的行为。其中有几个是酗酒成习的^①，另一些是遗传性的癫狂病患者；在某些情况之下，他的这些人物被意外事变搞得精神失常。他作品中有几个女主人公由于被强暴地破了身，以致终生不正常。他每一部小说中的情节都是为了便于病态现象的发展而加以整理和分类的。^②

支配左拉的人物的那种病理的必要性，不但决定这些人物的性格和行为，并且影响作家自己。它使作家盲目，阻碍他去看清现实生活中事物如何发展，最根深蒂固的遗传品质如何在个人生长的环境中不断地受到改变。关于这种变化，例子有的是。一个世俗的人，只要他生活在不大富裕的和小资产者的条件之下，几辈子

以来都以生活井井有条和节俭为特性的；一旦这个俗物在大商业和高级金融界占了一席之地以后，就会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骤然间转变为放荡不羁和挥金如土。

由于自然科学在今天很时髦，左拉为了使他在小说中所倡导

① 《小酒店》写的是遗传的酗酒病，小说的男主人公的职业是修盖房顶的瓦匠，他是一个极好的工人，为人诚实，很好的丈夫和父亲，可是饮酒的需要却潜伏在他身上。他自己知道这点，并且十分小心地避开一切可以使他发展这种倒楣的嗜好的机会；他从不出入酒店，他的生活是个好榜样。可是有一次遇到在他的职业中常见的意外事故：因为要瞧他的小闺女，他失足从房顶上滑了下来，摔断了腿。在摔交之后不得不歇工的期间，他为了消磨光阴，开始到酒店晃去走走。沉睡在他身上的嗜欲突然以不可遏止的粗暴的猛烈之势发展起来；他变为一个最下贱的酒鬼。这情况多少有点牵强，但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既然要做观察者，就该进行另一些观察。对于现代工人阶级，酒精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品了；在工业中心，酒精消费量的增长和工业的发达并驾齐驱。资本主义生产迫使工人到酒精中去寻求人为的和短暂的刺激，同时也是补剂。某些劳动的性质使得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必须饮酒。另一些情况推动各种各类的劳动者去饮酒。比方瓦匠、排字工人、油漆匠在我们这里不是按照星期雇用的，而是做一天算一天，做半天算半天，甚至按照钟点计算工钱的。往往只靠运气找到工作；而这种运气他们不得不在酒铺里去等候着；酒铺有人“接济”他们，那就是说除给他们吃的和喝的；甚至借钱给他们。这些种类的工人并非出于本愿地常去拜访酒店老板这一事实，很好地解释了饮酒的兴趣为什么在他们之间发展的原因，实在不需要用意外事故来解释。如果左拉描写了瓦匠和另一些工人寻找工作以及被雇用的情况，如果他显示出促使他的主人公酗酒的外在原因，他就可以给《小酒店》以应有的社会意义。

再说，《小酒店》的问世应当被认为不良的行动。出版于巴黎公社之后不多几年，正当最恶劣的反动势力当道，共和政体的形式成为问题的时期，这部小说受到反动派的极大欢迎。反动派乐于保证这部小说获得成功，因为他们看到曾经使他们自己发抖的工人阶级被描写成令人恶心的酒鬼，深为高兴。当左拉在他的小说《家常便饭》中揭露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污泥，曾经热烈欢迎《小酒店》的那些分子，大发其道德与美学之怒，他们用各种调子叫嚣，说《家常便饭》这部小说是对于艺术的亵渎。当工人阶级被人污蔑时，他们深为庆幸，但是对于资产阶级风俗的忠实的描写，他们当然是丝毫不愿意理睬的。——拉法格注

② 在《小酒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左拉如何写他的那些小说。这位作家先在报纸上以及各种书籍中拾取市民中最低下的阶层所说的熟语短句；为了利用这些材料，他布置成套的情节。《小酒店》并不是直接观察的成果；这部小说毋宁说是为了能够长篇大段地复制巴黎工人的口语而写的。——拉法格注

的新鲜东西具有科学的外貌，也就乞灵于自然科学了。他自己号称克劳德·贝尔纳的门生，并且使这位伟大的生理学家，对左拉自己的文学的和病理学方面的想入非非的东西负责。左拉能够获得原谅的理由，那就是他对于克劳德·贝尔纳的学说一无所知，克劳德·贝尔纳认为有机的环境对于生理成分的生命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的。左拉不知不觉地追随的学说并不是克劳德·贝尔纳的，而是龙勃罗索的学说。龙勃罗索自己也没有发明这种学说，他不过利用那些自称有学识的人们的无知，剽窃这种学说来造成自己传播全欧的名声。

龙勃罗索的《犯罪的人》无非是庸俗的定命论。如同《小酒店》的主人公，由于他的沉重的遗传的后果，不能不屈服在酗酒的恶习之下，所有的罪犯由于他们的生理的支配，而注定了要犯罪的。尽管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和情况下，他们到最后不可避免地要完成罪行，不管他们自己愿意不愿意；因此社会必须设法消灭这种人，就象消灭毒蛇猛兽一样。这种定命论引导我们得出结论，和泛神论者关于自由意志的结论完全相同；两种理论都以个人作为自己的行为的唯一负责者；两者都给予社会以毫无内疚地打击个人的权力，也毫不追究对于每一种罪行社会本身是否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如所周知，伟大的统计学家盖德来把几乎和数学一样整齐地年复一年重复发生的罪行归咎于社会。龙勃罗索的犯罪学的理论是从达尔文的教训中引伸出来的，这种教训被海克尔、斯宾塞和加尔东这帮人不正确地阐述，他们借此用世代相传的出色的个人品德来解释资本家们的社会地位。

左拉很巧妙地利用这种“犯罪的人”的理论。它使左拉的风俗记录者的任务简化到极点；它允许左拉使用新的打动读者的方法，并且使他对于他的人物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作用和反作用，避免加以研究，既然这些人物服从于机体方面的先决的命运，而这种宿

命论也就变为一种“Deus ex machina”；这种学说还允许左拉逃避他显然表示瞧不起的内心分析。他在某处这样写：

进行内心分析，这就是拿人的脑子来做实验。

而他自己却表示要拿“整个人来进行实验”的奢望。关于他所理解的“实验”，以及他所理解的脑子在人身机构中的作用，左拉的意见是极端混乱和晦涩的。^①

* * *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我们也碰到一种生理的必要性，可是和左拉作品中的生理必要性却性质完全不同。巴尔扎克祖述若弗卢瓦·圣伊雷尔，他是拉马克的学生和后继者，环境论的天才的代表，这种学说显示出外在世界对于在它怀抱中发展起来的生存物的作用；他同时也是器官之间相互联系规律的拥护者，歌德也赞成这种互应律。外在世界的每一个变化，在动植物身上的相应的变

① 左拉在他的著作《实验小说》(第12页)中说：“……自然主义的小说家观察和实验，他们的全部劳作产生于他们对于那些没有被清楚地认识的真理，和没有被解释的现象的怀疑，直到有一天，一个实验的思想突然唤醒他们的天才，促使他们进行实验，为了分析事实并且使自己成为这些事实的主宰。”这句话包含三方面的文理不通。人们怎样能面对一个无头无尾、无面无私的真理呢？什么叫“实验的思想”？也许是想进行一场实验的思想？从来有哪一个小说家在一个人身上做过实验呢？至多有过雷斯蒂夫·德拉布勒东在他自己身上进行实验，这样的事左拉是决不干的，他过的是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安静、最呆板的小资产者的生活。

左拉在他的小说《金钱》中，言之成理地批评那些“心理的玩艺儿，这种玩艺趋向于代替钢琴和刺绣品”，它们是在文雅的布瑞，那个为资产阶级太太们所喜爱的内心描写家提倡之下变成时髦的。在上述小说的同一地方，左拉写道：“珈洛林太太是一位通达情理的明白女人，她接受生活上种种事实，却不费尽心思去解释几千种复杂的理由；对她来说，那种倾吐心肺、绞尽脑汁的谈话，那种过分微妙的精细分析，其实只是闲着没事干的社交场上的太太小姐们的无聊消遣，她们既不管家事，又没有孩子要爱抚，这是一批可笑的女知识分子，她们为自己的节操失堕在找推托的理由，她们用自己对人心的一套学问来掩饰自己的肉体欲望，这个欲望是公爵夫人和旅店女侍所共有的。”(《金钱》第1册第175页。)在这儿左拉把他自己的哲学放在珈洛林太太口中。象左拉一样，她把社交界的太太小姐们的多情的闲谈和她们自以为满舒服的弱点混淆起来。而这种闲谈居然自命为心理学，因为它在研究现象背后的复杂原因。——拉法格注

化中可以说是找到它的回声；而发生于一个动物的器官上的任何变化，对于别的器官必然会起作用。比方说，如果有可能将狮子牙齿的形状加以改变，这就会引起它的上下颚的形状的改变，同时还会引起其他一些器官的改变，以致改变它的性格特点，比如勇敢和残暴等等。当人们把兽类从它们的天然环境中移置到一种人为的环境里，上述的各种现象也会发生，例如家畜的情况就是这样。这种变化必然引起动物的器官、精神和性格的改变。

深信这种理论的正确性的巴尔扎克，以无穷的细心，去描写他的各种人物用作生活和行动场所的环境。

他没有逃避使左拉害怕的“千种复杂的原因”，然而这些原因却决定人物的行为，影响他们的情欲。尤有进者，巴尔扎克那样津津有味地分析这些原因，以致有时在读者眼中显得可厌，因为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只求消遣，不求教训。福楼拜、左拉、龚古尔兄弟，以及自以为要在文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大多数小说家，乐于作神采焕发的描写，这种描写令人想起钢琴能手的动人的弹奏。这往往只是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特写，作家事先准备好这种画图，仔细地保存在抽屉里以备不时之需。这类画图放在小说中就象每一章末尾的图案画或插图一样。这些画面证明作家的高级特写艺术，在它们本身，这无非是一种辛勤制作成的无用而且有损于全书利益的附属品。如果我们跳过这种描写而不去看它们，整部作品并不因此而受损害，恰好相反，常常还会得到益处。

与此不同，巴尔扎克的庄严和深刻的描写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所写的性格和行动；由于他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生活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之下，他们必须在本身发展一些规定的情欲^①，这些情欲和上述的条件相呼应，而它们的动作是那些条件的后果。

^① *Passion*，或译为“激情”。——编者注

巴尔扎克的人物没有例外地都被一种情欲所控制，这种情欲对于他们来说成了一种生理的命运。即使他们生下来的时候已经带来了这种情欲的苗头，这种情欲也只是在环境影响之下，才慢慢地发展的。可是，情欲一旦发展到最高峰以后，它就变成无上的主宰，它一个接一个地压碎和窒死别的情感，而使它的受害人变成偏执狂的患者，就象高立奥的父爱，葛朗台的吝啬，巴尔达沙·格拉艾^①的科学研究狂，克勒凡^②的虚荣，于洛男爵^③的色情等等。巴尔扎克的小说是叙述获得胜利的情欲的史诗：在这诗篇里，人是某一种情欲的玩物，他受这种情欲的控制和折磨，就如在希腊悲剧中人是一种神道的玩物一样，这种神道有时推动他去犯罪，有时推动他去完成英雄的行动。自从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以来——后者也使他的那些人物成为某种情欲的牺牲品，而且让他们被情欲撕碎——没有一个作家象巴尔扎克那样，用不留余地的严格和那么强大的力量，写出那些一直达到顶点，达到疯狂程度的情欲。

左拉自称继承巴尔扎克，但是，无论是在他的哲学、他的语言、或是在他观察事物、写作小说、安插人物、使他们动作以及描绘他们的情欲的方式上，他和巴尔扎克没有相同之处。左拉和巴尔扎克之所以不同，还在于作为左拉作品的特色，由他首先引用到小说中的一种新的表征，这就使他和别的现代小说家相形之下有了无可否认的优越性，虽然他比少数几个小说家有时还是逊色的，在描写的艺术中他不如都德，在心思细巧方面他比不上阿来维。左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表现了一种社会力量把人打翻在地上，而且将他压得粉碎。按照左拉的说法，巴尔扎克的

伟大的独特性在于在文学上给了金钱以现代的可怖的作用^④；

① 见巴尔扎克《绝对之探求》。——编者注

② 见巴尔扎克《贝德姨母》，中译本名为《贝姨》。——编者注

③ 同上。——编者注

可是，在敢于有意识地表现人如何被一种社会的必要性所控制和消灭这点上，左拉是唯一的现代作家。

在巴尔扎克的时代(他死于 1850 年)，作为我们这时代的特征的巨大的资本集中在法国还不过刚刚开始。那时还没有那种巨大的百货店，店内的走廊连结起来有几公里长，男女售货员数以千计；这种巨人式的商店集中了各种不同的商品，分部陈列，这样，人们可以在那里买到文具、化妆品、家用杂物、帽子、衣服、手套、皮靴、内衣、手巾以及鞍头马鞍等等。那时还没有雇佣男女工人多到象整个民族似的纺纱厂、织布厂、炼钢厂和高炉。那时人们还见不到一手操纵几千万、几万万法郎的金融组织。无疑地，那时已经有为生活的斗争，正如这种斗争一直就有的那样，虽然它还没有自己的理论和名称，可是这种斗争以另一些形式，另一些姿态出现，和我们现在不同。我们今天的生存斗争由于上述的巨大经济机体而起根本性的改变。那时的生存斗争并不使人垂头丧气，并不使人堕落，而是在人身上发展某些品质：勇气、毅力、智慧、注意力与预见、有条不紊的精神，等等。巴尔扎克在那时进行观察，由此之故，他描写了仅仅依靠了自己的体力或智力彼此斗争着的人们。那时人们进行的生存斗争很象野兽之间的生存斗争，它们用爪、用牙、用敏捷和狡猾打败对方。

在我们今天，生存的斗争获得了另一种性质，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相拍合，这种性质越显得狠辣和尖锐。个人之间的斗争被经济机体(银行、工厂、矿山、巨大的百货公司)的斗争所代替。个人的力量与智慧，在这种经济机体的象大自然的力量那样不可遏止和盲目的强力之前消失了。人被卷入这些机体的复杂的齿轮中，被抛掷、摇撼，象皮球似地四面抛来抛去，今天站在幸福的高

④ 《实验小说》第 342 页。——拉法格注

峰，明朝落入万丈深渊，象一根麦秸似的被卷走，他自己即使有智慧和精力，也不能稍微抵抗一下。经济的必要性压碎了这个人。在巴尔扎克的时代允许人向上爬——踮在竞争者的肩上或跨过他们的尸体——的努力，现在只够使他们过半饥半饱的贫困日子。旧式的生存斗争的性质改变了，与此同时，人的本性也改变了，变得更卑劣，更猥琐了。

人只不过是一个残废者和侏儒，而这是反映在现代的小说中的。小说中已经不再是充满疯狂一样的冒险故事，在那些故事中，主人公象斗兽场中的一匹暴怒野兽，以胜利者的姿态冲向最奇妙、最非同小可的事件；着了迷的读者于是赞美魔术一般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人物的勇敢大胆和炽烈的热情；这些人物什么都不怕，作者故意撒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表面看起来不可克服的困难，都不能吓倒他们。当现代的小说家为了满足某些阶级的读者对于个人斗争的经历的兴趣，他们到骗子和偷儿的世界中去选择主人公，在那里，由于环境的条件使然，文明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施展野蛮人的全部狡猾、勇悍和残酷来进行斗争。况且，这斗争是灰色和单调到那种程度，以致不能引起人任何兴趣。为那些自称高级和有文化修养的阶级写作的小说家们，不得不从他们的作品中排斥任何戏剧性的场面。对于新的流派来说，艺术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放弃行动；而由于新派的代表人物既无批评意识，又无哲学意识，他们的作品无非是语言上的腾跃跌打那一套拳脚功夫，他们自己也只不过是修辞学的学生^①。

* * *

当左拉达到他的才华的最高峰时，他有了勇气接触到社会上的一些巨大的现象和现代生活中的大事件；他试图描写那些经济机体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

在他的作品《妇女乐园》中，左拉给我们介绍经济怪物之一种，

巴黎大百货公司的生活。他使我们看见一种牛头妖怪，它吞并附近的小店铺，吸收它们的顾客，役使原来那些东家，使他们成为它的职员和雇工；使我们看到这怪物如何在它的子民——雇员和男女售货员——之间唤醒别处所见不到的利害打算、情欲和互相嫉恨；如何在商品展览的时候，点燃起他们的不顾一切地多销多售的热狂的愿望，如同在战舰上，攻击的信号刺激战斗的热情。

在《萌芽》中，我们看到了矿井，这个埋伏在地底下的妖怪，它吞噬工人、马匹以及机械，它倾吐煤块；它改变自然，使空气浑浊而且毒化，在它的张着的大口周围，草木不生；它将原先作为小土地所有者而分散地生活的那些农民集合为队伍；它窃取他们各人的小块土地，判定他们不能再见天日，而在惨白和摇晃不定的小小的灯火之下作苦工，天天冒着四面包围住他们的各种危险，丝毫不感觉到他们是多么英勇；我们看见这个妖怪隐伏在地底下，通过共同的痛苦和穷困，通过在资本主义桎梏下所受的折磨，把那些人团结在一起。那资本主义的桎梏，就象帕斯卡尔的上帝一样，无往而

① 一个比利时的小说家，加米叶·勒莫尼埃，用了特别熟练的技巧，糟蹋法国语言，使它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他刚刚把他的小说《一个男性》改编为四幕剧，而获得很大的成功。这部小说叙述一个私下打猎的猎人的爱情故事。拿一个私猎者，一个out-law，一个逍遥法外的人作为主人公，对于作者来说一定是件痛心的事，这人被一种猛烈的情欲所推动，和官厅方面以及私有财产进行激烈的斗争。这个私猎者象征自然界的人。为了使他的戏剧更活泼些，为了使它获得比较欢乐的调子——现代的作家和东方的哭丧女人一样愁惨——作者在他剧本中安排了昂利·莫尼埃的一个场面，在那里有两个乡下人争论一条母牛的价钱，并且设法互相欺骗。这一场面引起观众的哄笑。勒莫尼埃后悔在他剧本中插入这样的场面。他反对公众对待他的态度，并且写下了下面的代表新的文学流派的特性的几行话：“这是对当前时髦风气，对公众趣味的一种让步，那就是对于物质的东西，对于充满动作与喧扰的运动的爱好……按照我的想法，这种行动是剧本中的弱点，因为它在大地和造化之间扰乱了谐和。可是我不得不容忍这种行动，一边希望到了更好的时代，那时可能写一篇剧本不要行动，完全由微妙的色调差别、各种画面、情感和思想的迅速的转变组成，一篇代表简单和单一的生活的剧本，不需要我们现代认为必不可少的那些复杂的东西。”——拉法格注

不在，同时却又无形迹可寻，推动那些人们罢工、流血斗争以及犯罪。

在描写和分析现代巨人般的经济机体，以及它们对人类性格和命运的影响时，给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一种大胆的事业；作了这样的尝试，已经足够使左拉成为一个革新者，并且使他在当代文学中获得优选的位置和与众不同的地位。

这样的一本小说迫使作者负担的劳动，比起现在那些文人的屡见不鲜的恋爱故事和通奸故事来，要困难得多。那些文人固然是十足的风格家，但是对于他们自以为在描写的日常生活的现象和事件，他们却异乎寻常地无知；除开他们的语法、他们的词汇，以及从大马路上，或从这一沙龙到那一沙龙贩运来的某些无聊谣传，还有报纸上社会新闻栏内的什么新鲜事件和警察局的公告以外，他们知道的事情那么少，简直可以认为他们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要写一本上面所说的小说，而且要写得象样，作者必须在紧邻那些经济巨人之一的地方生活过，深悉它的内部生活，用他自己的皮肉尝受那个妖怪的爪牙，他应当眼看着那些由于妖怪所引起的可憎可怖的事情而愤怒得发抖。直到如今，这样的作家还不存在，甚至似乎不可能存在。被卷入生产的齿轮系统中的人，由于过度的劳苦和穷困而下降到那样卑微的地步，他们是那样地昏沉，以致仅仅有受苦的力量，而没有叙述他们自己的苦痛的能耐。创作了《伊利亚特》和其他属于人类最优美的精神产品之列的叙事诗的原始人类是无知的，比我们今天识字并且有的能写作的无产阶级更无知，可是他们具有诗的天才，他们歌唱自己的快乐、痛苦、爱情、仇恨，以及他们的节庆和战斗。成了大工业的附属品的无产者，是不允许有这样光彩动人的诗的表达才能的。而野蛮人，没文化的人，甚至布列塔尼地方的半开化的农民都具有这种才能。现代工资生活者的语言，不幸得很，是这样贫乏，以致它今天只包含几百单字，用来

表达最迫切的需要和最简单的情感。从十六世纪以来，法国语言，无论是平民语言或文学语言，越来越虚弱；这一事实是一种日益衰退的征兆。

社会小说，正如我们上面所下的解说一样，只好由那些自己不经经历雇佣工人的生活，而且只从外部来看这种生活的人来写。一个学者，在长期研究现代经济组织的轮子机构，并且观察了这种组织对于工人阶级所引起的何等可怕的后果以后，一定可能接触到写这样的小说的任务，假如今天的学者不是把自己闭塞在各人的专业的墙垣之内，假如他们能够暂时从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抽身出来，以便给他们当代的一些社会现象以艺术的形式。这任务之所以落到一些文人的肩上，理由就如上述。他们由于自己的实际知识，以及生活和思想方式上的弱点，一般地说对于这样的任务是毫无准备的。他们缺少经验，而且他们对于要描写的世界上的人和事物，只作肤浅的观察。虽然他们很自负地以为在描绘现实生活，他们的视线仅仅停留在事物表面，他们对于在自己眼前在演出的日常生活里的戏剧性事件，只能抓住外部的和最表而的形态。布律涅蒂埃，《两大陆评论》^①的批评家，有理由这样说：

他们的眼睛和手是这样生成的，以致他们所看见、观察和表现的，只是他们认为特别地可以吸引他们所面对的公众的兴趣的一切。

在这一点上，可惜我们必须承认左拉也不是例外。

* * *

左拉(生于1840年)以在巴黎一家大书店里当雇员作为他的职业的开始。不久后，他就抛弃了这一职业，而专门去搞新闻工作。起先他在《钟》报上写稿，在帝政时期，这张日报努力使自己成为《共和派的费加罗报》^②。在拿破仑第三垮台以后，左拉跟随甘必大^③

^① 《两大陆评论》——法国资产阶级综合性双周刊，创刊于1829年。——编者注

到图尔和波尔多，到了共和派的资产阶级分子开始拚命地追求禄位和荣名，当他们之间分脏的号角大声吹奏起来的时候，左拉要求一个县长的职位作为他应得的一份。他的要求被拒绝了，这件事的后果就是他转身不理政治，而专一地去从事文学活动，去写他的小说去了。他对政治感到虚荣心受了伤的人的怒意；按照瓦来④所说，左拉提起政治，总是轻蔑地把它称为“不干净的行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象“一只熊”似地深居简出。不久以前，他的虚荣心又苏醒了过来；他从孤寂中走出来，被选为文学家协会的主席，而他正在梦想进入学院和上议院，这两个为年老力衰、干枯发硬、不能取材的作家和政客而设的养老院。

为了给自己的文学著作以统一的外表，左拉仿效巴尔扎克的办法，把它们总称为《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他作了这样的安排：使每一本小说中都有这家族的一个成员演着高于一切的角色。这样得来的统一性，与其说它是真实的，不如说是一种俗套而已。小说的统一性主要不在于这是整个家族的故事，而在于研究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骨胳的各种社会机构的这个计划。

可惜的是象左拉这样一个具有毋庸置疑、也没有人否认的才干的人，却过着隐士生活，这使他不能正确地去描写他要表现的一切。博物学家和化学家离群索居，可是他们关闭在自己的实验室中，为的是能够更仔细地观察使他们感兴趣而且他们愿意认识的有生物和无生物。相反，当左拉在他的隐士之居的深处生活和创

② 《费加罗报》——法国资产阶级日报，创刊于1854年，初为讽刺性的报纸，后来改为政治与文学的日报。——编者注

③ 甘必大（1838—1882）——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81年任内阁总理。——编者注

④ 瓦来（1845—1920）——法国名律师。——编者注

作时，他远离了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有生物和无生物；这样一来，用画家们的一句熟语来说，他不得不“写意”了。

他认为这种方法的缺点可以用对于他所要描写的现实略加一瞥来补救。为此，他乘了火车头旅行五十或一百公里，为了体验司机的感受；他参观百货公司，他在货品展览和大放盘的日子里观察来来去去的人，为的是要乘人不备了解老板和他的全体店员内心活动；他到博斯^①地方一个矿区去住了一星期，为了根据他自己的观察来描绘矿工和农民的生活环境，而这些草率的观察，他用了从书籍、报纸和个别谈话中获得的材料来加以补充。总而言之，左拉的做法和报纸的记者一样。一发生什么事件，记者们就跑了去，毫无准备，但一分钟都不耽误研究他们的题目，他们必须一眼看到全部事件；因此他们只看见谁都看得见的现象的外表。他们不能在事件的主要的发展方而去深入，不能追究事件的原因，不能抓住它们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复杂性。在他们的记录中正如在左拉的记录中一样，独到的观察很少，这是不足为奇的。

左拉用艺术家的眼光，走马看花似地见到事物的外表而把它抓住。由于他具有很大的表达才能，他将他的那些观察的庸俗性藏匿在富于浪漫色彩的能吸引和俘获读者的画而后边，可是不把读者带到发生动作的现场上去，也不给他看动作的正确表演。一个画家，根据旅行者朴实无华、没有文学企图地所叙述的印象，能够没有困难地画出一幅画；相反，根据小说家的一心想用他的语言的色彩和形象的丰富而大事渲染的描写，来画一幅画，那是很困难的，甚至不可能的。

左拉为了成功而追求成功；他按照再版的次数来估计一个作家的才能。由于资产阶级公众憎厌新鲜事物，他决不给这公众提

^① 博斯，法国地名，巴黎西南的一百公里处平原总称。——编者注

供新鲜事物。斯克里伯，深知资产阶级头脑的这种缺点，回答一个对他引用了一句俏皮话的朋友说：“你反复地说这句话吧，把它印出来，等到它到处流传，人人上口的时候，我就把它写入我的一个剧本中。凡是听见过或自己说过这句话的人，都会鼓掌的。”

凡是觉得巴尔扎克沉闷的读者——这种人在读书的公众之间形成大多数——绝不会欣赏一部深刻的作品，用左拉和他朋友们喜欢用的说法：一部严肃的、真正“根据材料”的研究著作。这种读者愿意看到场面和人物很快地在他们眼前接连面过，不需要任何注意力，象幻灯里的形象一样；对于他们来说，任何思想都是白费脑筋。

左拉熟知公众的兴趣所在，他增加无数的描写；相反，他只是匆忙地、粗糙地勾划他的那些走马看花地经过观察和研究的人物，它们常常和环境不相适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的人物是间接材料的产品，它们并不是按照真人实物临摹的。就是这样，有人说左拉叫人画了一个矿工，大小如真人，画成这工人在操劳时的各种姿态，为的是在他的小说《萌芽》里描写这个工人。他的小说《大地》的第一章并不叙述一个真实的场面，那无非是米莱的著名图画《播种者》的诗意的搬套，加上一个中间插入的枝节，牛的交尾，在左拉以前，洛里纳已经用诗句详细叙述过。

保尔·阿莱克西，左拉传记的作者，在对我们讲左拉如何制作小说《娜娜》时，公开了这位大师的工作方法。左拉积累从书籍、报纸和谈话中取得的笔记，加以仔细的选择、归类，写成卡片，编为目录；接着他在这种笔记中间插入一个戏剧性的动作，把那些笔记串连起来，于是他的小说就写成功了。布律涅蒂埃跟左拉为难，证明他曾经抄袭过英国作家奥特韦^①。左拉很可以这样回答：“如果你们知道我搜集材料的那些报纸和书籍，你们可以在我的小说找出成百条类似的抄袭。我要描写我不认识的环境，而且只能用特别

快车的速度穿过这种环境，我怎么能够避免抄袭呢？”

塞万提斯、多比涅、斯莫莱特、卢梭和巴尔扎克只是在和各种不同的环境打交道，在现实中观察了生活和人们的行为，通过生活和学习，熟悉了社会之后，才动笔写作的。与此相反，我们这时代的小说家，自命为自然主义者和写实主义者，而且自以为是按照实物描画的，却关在自己的书斋中，堆积着真正和山一样高的印刷品，上面满是批注，在这些纸堆中他们认为可以感觉到现实生活的脉搏在跳动；他们难得离开自己的舒适住所，去进行一些走马观花式的调查，为的是从他们的漫游中带回最必要、同时也是最肤浅的感受。龚古尔兄弟和福楼拜把这种古怪的现实主义观察方法推向最高峰；他们认为，一个作家不但不应当参加当前的政治斗争，而且应当对于人类的各种情欲保持局外人的态度，以便更好地去描写它们；做个石头人，为了更好地欣赏生活！

谁能想象这样的事：假如但丁以地道的世俗之人的身分，把自己关在斗室之中，对公众生活漠不关心，假如他对当时的政治斗争不是采取热烈参加的态度，而能够写出他的《神曲》来？②

现实主义者的方法对于作家自己很方便，对于他们的作品可

① 我们在下面引述布律涅蒂埃所发现的一段抄袭，因为这是有代表性的。在《娜娜》中人们可以读到：在另一些时候，他是狗。她把一块香手帕扔给他，扔到屋子的一边，而他必须去用牙齿把手帕衔回来，一边用双手双膝爬行。“去捡回来，凯撒！……别忙，你要是游游逛逛，我来叫你受用！……很好，凯撒！听话！乖乖儿的！……来一个好样的！”那男人喜爱自己的下贱。尝味着自己变为畜生的这种乐趣。他还要更加堕落一些，他喊：“打得更重一些……汪，汪，我疯了，打呀！”

在托马斯·奥特韦的著名的小说《被解救的威尼斯》中，上议员安东尼奥是一个名叫亚桂丽娜的妓女的情人，“他淘气，她把他赶走，管他叫白痴，畜生；她告诉他，在他身上唯一的好东西仅仅是他的钱……‘那么我来做狗吧？’‘做狗，老爷！……’说到这儿，他钻到桌子底下，汪汪地叫起来。‘啊，你咬人，当心我踢你。’‘来吧，我从心里高兴，踢吧，踢吧，趁我爬在桌子底下。再踢。踢重些，再重些。汪，汪，呜，呜。’”

左拉并没有在奥特韦的作品中直接找到这种狗性驯服的样子，而是在泰恩的《英国文学史》（第3卷第212页）中看到的。——拉法格注

并不是有利的条件。他们的“文献性”的小说充满不确实的地方，这种缺点既多而又令人生气。

在巴黎下流之处都混过来的奥雷良·肖尔，好玩地把《娜娜》中的无数错误都指了出来。如果说一个初次到巴黎的外省青年会相信那些关于各种卖淫女子的生活描写，而对于一个熟悉这种生活的真正老巴黎来说，这类图画只能使他耸耸肩头而已。

可是左拉的才能是如此之大，所以即使他的观察方法有那些缺点，即使他在材料搜集上有很多错误，他的那些小说仍然是我们这时代最重要的文学大事。它们获得巨大成功是应当的。《卡底内尔先生和夫人》以及另一些规模较小的小说，如果它们并不是杰作，这是可以用需要掌握的材料非常广泛这一事实来解释的，必须有巨人般的力量才能够举起这么大的材料，揉搓它，翻腾它，拿它当作玩具。说实话，左拉和围绕着他的那些侏儒相比较，真也是个巨人。

《金钱》，他最近的，而且也许是最有意义的一部小说，使他的一切优点和一切缺点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② 龚古尔兄弟在他们的日记中叙述了屠格涅夫的这一自白，足以令人赞美地画出那个精力充沛的时代的文学代表人的特性：“由于福楼拜和我不承认爱情对文学家的重要性，那位俄国小说家高声说，同时做了双臂向地面下垂的姿势：‘我哩，我的生活是充满脂粉气息的。对于我来说，世界上任何东西，即使是书籍也罢，都不能代替女人。……怎么说好呢？我发现只有爱情能够产生生命的某种舒展，任何别的事物都办不到……对吗？你们听，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情妇，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磨坊女主人，我去打猎的时候和她见面。她是一个迷人的女子，皮肤洁白，眼中如有一道闪光，这在我们那里是很普通的。她什么也不肯收我的。可是，有一天，她对我说：‘你得送我一件礼物。’‘你想要什么呢？’‘从圣彼得堡给我带一块香胰子来。’我给了她一块胰子。她拿了胰子，跑出去了，过了一阵，她激动得面颊绯红地回来了，一边向我伸出一双可爱的香喷喷的手，一边低声说：‘吻我的双手吧，就象你在沙龙里吻圣彼得堡的夫人们的手一样。’我跪倒在她跟前……你们知道，我生平没有遇到比这更珍贵的时刻。”（《龚古尔日记》第5卷第28页）——拉法格注

二 《金 钱》

《金钱》可以认为是《家常便饭》的答复和补充，在《家常便饭》中，左拉以无情的尖锐和严厉描写了小资产阶级。在过去，这一阶级的特点是它的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生活，严格的诚实，和市侩式的狭窄的头脑，而这些品德曾经给以往的作家提供他们的喜剧人物的模特儿。今天，小资产阶级就如在《家常便饭》中所描写的那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整个儿堕落和腐化了。改变了小资产者而目的不是对于黄金的渴望，而是对于钱的需要，这种需要经常刺激他，折磨他；改变他的面目的也不是对于乐趣和狂欢的追求，而是为了不再过充满忧虑和悲伤的艰苦日子而进行的斗争。要给他的老婆买点微不足道的穿戴饰物，给他孩子买个玩具，小资产者也一定先得锱铢必较地计算和节省；他不得不一生丁一生丁地计算，否则就活不下去。

在他的小说《金钱》中，左拉将我们引导到一个和小资产阶级社会完全相反的不同的世界中，在那里，人们不是按照生丁算计，而是按照一千法郎巨票算计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流动的现金比秘鲁金矿中的金泉流淌得更快、更急促、更汹涌；在这里，黄金成了整个生命、整个思想和整个行动的意义和目的。这个黄金，人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保障追求者个人的和家庭的生存，也不是为了答复那个永恒的问题：“如何求得温饱？”人们操劳，人们受苦，并不是为了迫切的需要，而是为了几百万几百万地积累，因为喜爱黄金，为了黄金本身。左拉在《金钱》中介绍的百万富翁，犹太人龚代曼，没有任何需要。在巴尔扎克的一部作品中，出现过一个大学生，一个快乐的小伙子，钱包虽然贫乏，思想却很丰富。他为了给自己的贫穷找个宽慰，提出这样一个富于哲理的看法。他说不管是拿破仑，

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反正谁也不能一天吃两顿午餐，也不能比一个普通的医科大学生有更多的情妇。龚代曼一天连一顿午餐都咽不下去；女人对于他是不存在的。他的出了毛病的胃只能接受牛奶，当他想吃喝得快活些的时候，也就尝一点葡萄汁而已；他的心脏只在交易所证券涨价或跌价时，才欢腾起来。

左拉所描写的世界中的人物的特点，是对黄金的爱好；但并不是对于金属中的那种坚固、晶亮、闪烁，以灿烂的光芒悦目，以铿锵的响声悦耳的黄金。葛朗台，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一往情深地爱黄金，确是为了黄金的物理的品质，为了它的色泽和声音；他把那亮晶晶的金币收藏在可靠的地方，拿它们来玩弄，抓在手中，让它们从指缝里滑溜下去，当他双手插在宝藏中，摸摸，抓抓，他感到无比的巨大欢喜；他用了温柔的字句，被热情的火焰燃烧着的诗人的陶醉来谈论他的黄金。他对他女儿说：

去吧，去把它拿来，那个小乖乖，你应当亲亲我的眼睛，因为这样，我就把金币的生和死的秘密和奥妙都告诉你了。真的，金币和人们一样，生活着，熙熙攘攘地；它时而去，时而来，它流汗，它生产。^①

几小时之久，他观赏着一个个垒成一大堆的金路易^②作为享乐，金币的挑逗性的闪光确乎迷住了他，以致他热烈地喊道：“真叫我感到温暖！”^③

做交易所生意的人再也见不到被称为“偷来的太阳的眼泪”的黄金；从他们手里滑过的只是一些纸片，他们用发烧般的手势揉着、撕着的只是这些纸片。对于他们说，财产并不是什么瞧得见的，可以接触和可以摸弄的东西，而是一连串的抽象数字，一连串

①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全集第5卷第323页。——拉法格注

② 法国古代金币，因币面铸有法王路易的半身像，故名。这种金币是从法王路易十三朝开始铸造的。——编者注

③ 见前引书第344页。——拉法格注

的形而上学的价值。谈起煤气公司、铁路、煤矿的股票时，他们并不设想一个巨人似的煤气计度仪，它象一座大钟似地接纳和禁闭从煤炭中提炼出来的流动的煤气；他们心目中也看不到喷烟的火车头，延伸到无穷远的铁道，地底坑道和装满煤块的斗车……不，在他们眼前，这种称为股票的烂纸的抽象的牌价在跳舞，做交易所生意的人把这种股票看成无形体的、超尘世的价值；至于这些股票所代表的实物是否存在，对于他是绝对无足重轻的。

左拉本该把他的小说叫做《交易所》，而不叫做《金钱》；因为他给我们描写的，是被交易所的投机生意搞得经常处在发烧一般的紧张和奋亢状态中的环境，以及被这种投机生意搞得神经错乱的那些人。金钱在它的流转中，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过程和一切现象。为了几个法郎，工人按日、按星期、按月出卖自己，他把老婆孩子都交给资本家，判定他们象囚犯一样在工厂里服苦役；为了钱，钢轨制造商伪造检验合格的铃记，使成千的旅客的生命发生危险；为了钱，格雷维总统利用自己的全国最高权位所给予的政治影响，从事肮脏的交易；为了钱，军官甘冒生命之险，会计员不敢舞弊，诗人和作家写他们的作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类堕落到这样卑下的地步，以致人们所认识的和所能够认识的只有一个唯一的动机：金钱。金钱成了人类一切行动的主要原动力，阿尔法和沃美卡^①。巴尔扎克管金钱叫“l'ultima ratio mundi”^②。左拉在他的小说的框子里边，从未试图表现南面称王的金钱所孕育的德行和恶癖。

他最近这部作品中的所有的人物都围绕着一桩金融投机行业；交易所是战场，在那里他们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交易所并

① 阿尔法为希腊字母之第一字（ α ）；沃美卡为希腊字母最末一字（ ω ）；此处之意即为自始至终，全部过程。——编者注

② 拉丁文，意即“最后的心愿”。——编者注

非创造财富的魔法的实验室，它是个强盗窝，在那里边，各以狡猾、无信义、说谎、欺诈为能事的金融家，互相分赃；那就是全世界的田野间、矿井里和大小工厂里的劳动所创造的几百万、几十亿法郎。这些证券交易商，在他们的保险柜和腰包里集中了数量极为巨大的财富，却生平从未生产出任何东西。他们的唯一的智力工作在于钩心斗角地设置陷阱和罗网，要被捕捉的是不论在哪里，不论被什么人所创造的几百万。什么地方？谁？关于这些，那些先生们才不操心哩！

萨卡，左拉这本小说中的主人公，体现了这个奇异的世界。当他出现的时候，他已经一无所有，他的熟人对他都很冷淡，或装着没有看见他；这是个破了产的人，而在那种社会环境中，朋友是不存在的。他虽然成了众人蔑视的对象，却居然自己解救了自己，突然之间获得了胜利。不久前转背不睬他，故意躲避他的人，都来奉承他，恭维他。这突然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萨卡领导的一桩金融投机走了运，获得了成功；他的股票上涨了；并且，尽管他有理由担惊害怕，尽管他的合伙者如何阴谋和背叛，以及他的竞争者如何钩心斗角，他的股票仍然上涨到神话似的高峰。这一宗投机活动的发起人不是萨卡；他并没有管这件事的技术性的一方面。发明这一切，组织这一切的是一个工程师，堕落到这群机灵鬼之间一个不出色的，心灵带有神秘色彩的工程师。萨卡不过是“创办人”，掌握魔法的口诀，可以打开股东们的钱包，具有欺骗人的巧妙本领的人。上他当的人把他们美丽的黄金，丁丁当当的黄金给他，换取一些破纸头，虽然这黄金对于他们说是比自己的信誉、老婆、孩子和心爱的狗都更珍贵些！

左拉的小说是从真实的事件中获得灵感的，他对这些事件作了诗意的安排。这是崩图和弗代所领导一个金融公司“联合银行”的故事，这公司在法国、奥国、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开办银行、矿产

公司、铁路和工厂等，从而在这些国家大事掠夺。在某一个时期，“联合银行”是一个受到教皇的庇护的奇迹一般的储蓄机关；它付给那些善良的天主教徒的息金，即使对于最贪婪的放高利贷的犹太人来说，也是神话般的高价的；它正要变为教皇和全体天主教徒的银行；接着它就垮台了，这个空前巨大的破产事件震动了金融界，使极不相同的各个社会方面都遭受损失。

萨卡是个很机灵的金融家，精通各种策略，他是欺诈性的生意的策动者。他知道得十分清楚，要使一桩投机生意获得成功，不能让诚实谨慎的人来带头，而是要由那些在交易所扮演重要角色的，或由那些有古老门第、议员的头衔，或者只是有一个普通的勋章的人来带头，因为这样的人可以迷惑那些口袋里钱币多于脑袋里智慧的傻瓜。为此，他给他创办的骗人公司选择了一些人组成理事会。萨卡也知道要使一宗生意获得成功，必须大做广告。

人们本来以为左拉既然愿意被目为一个极端现实主义的作家，既然他乐于从事最令人恶心的描写，而且以挑战的态度毫不犹豫地采用最肮脏的字句，那么他可以有这样的勇气；揭穿他所熟知的金融生意的广告宣传方面全部真相，这是一种经常的欺骗诬诈，同时也揭穿新闻界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真相。

可是在《金钱》中正和在《萌芽》中一般，左拉缺乏勇气。在《金钱》中，他不敢得罪报界，用巴尔扎克的话来说，报界是“毒素的储存所”^①。左拉没有勇气揭露全部资产阶级的报界如何把自己出卖给大金融界，这报界如何象娼妓一样，用尽软硬兼施的功夫，借以邀得金融界的宠幸。莫泊桑是现代作家中唯一的例子，他敢于在他的小说《漂亮朋友》中揭开帷幕的一角，暴露巴黎资产阶级报界的贪污和无耻^②。左拉确实也介绍了一个由于满身债务和恶癖而

① 巴尔扎克《幻灭》，全集第8卷第257页。——拉法格注

堕落的记者；他按照定货者的命令给报纸写文章，今天在文章中把白说成黑，明天把黑说成白；这就使他遇到了一些不快意的纠纷。可是这个记者是属于文学流浪人的行列，他不受任何人的尊重，也没有任何势力，他的道德卑下看来好象是一个例外，而诚实倒成了资产阶级报界的规律。如果左拉对于报纸的严重的腐化闭口无言，那决不是他不知道。他很熟悉报界情况，他自己曾经当过记者，他和报界一直维持着经常的联系。这方面的社会环境，他观察过，生活过，并且占有一份探本穷源的确实的资料，可是他不敢把这个世界如实地加以表现。左拉，象以笔耕为业的所有的亲爱的同道一样，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要迁就新闻记者，因为他们通过广告可以影响他的书的销路。首先是做生意要紧；做了生意，尚有余力，再谈艺术！因此，左拉不肯说明为什么那些最可敬，最受尊敬，最严肃同时也是最可厌的报纸拿它们的第一版为金融界的大亨们服务，使他们能够欺骗和剥削爱读这些报纸的资产者^②。相反，对于另一件事他却叙述了两次，津津乐道地。这件事如果真的发生过，不过是恶作剧而不是广告^③。没有任何东西比投机商人的招股广告更为尊严，更为道德的了；这些先生们可以给耶稣会派的教士上课，讲授耶稣会派的手段。在交易所里，萨卡的天主教银行和龚代

^② 不久前，巴黎一家严肃的报纸《十九世纪报》（在这家报纸的撰稿人之中，有众议员，有市参议员等）的主笔波尔塔利，《小报》的经理马里诺尼，以及《今日》报的主笔兼巴黎市参议员罗朗，当众暴露了他们的肮脏内幕。在他们的报纸上，以及他们张贴在巴黎和外省的布告上，他们互相骂为小偷、流氓和金融界的走狗。这种满把满把地投掷污泥，并没有在其他记者之间引起任何公愤；他们一想到卷入那三个狂怒的家伙的争吵中，就吓得发抖，因为他们怕自己的丑史也这样地被揭穿。《小报》手里拿着证据，揭发波尔塔利曾经向铜业托拉斯的商人塞克来当诬骗敲诈，到手过几十万法郎，因而要记者公会开除波尔塔利。“我打赌，他们不会出此一着的，”波尔塔利只不过这样答复了一句。此人虽然被公开揭去了假面具，并且盖上了烙印，今天仍然是上述高贵公会的会员，而且和别的巴黎记者们维持着同行兄弟的友谊关系。正如谚语所说：“物以类聚”。——拉法格注

曼——路特希尔德的化名——的犹太银行在打交手仗。那个冷静沉默的犹太人，平静地退守在他的老窝里，对于他的几百万财产的奇迹般的力量充满信心——图伦说过，上帝总是帮助最大的兵团的——，他让那个急躁得好象发烧似的基督徒在一系列的投机生意中消耗自己的力量，这些生意使他的万有公司的股票从原价五百法郎涨到三千法郎。等到萨卡在他的皮洛士^⑤式的胜利中精疲力竭之后，龚代曼突然把他的几百万抛在市场上，使他的竞争对手破产，被压碎。于是这个人从幸福的高峰上一直滚到监狱中，而那些靠他发了财的人，再一次抛弃他，背叛他。萨卡打了败仗，可是他不认输；在公西哀日利监牢的囚房里，他在筹划新的生意，新的投机的计划。他梦想自己成了富翁，重新在交易所里称霸称雄，掌握着几亿资金。

在本世纪的后半期，路特希尔德商号和那些向它宣战、攻击它独霸天下的那些银行之间，时常发生激烈的战斗。在拿破仑第三当政的头几年，由于公债存放致富的路特希尔德，满足于老式的投机方法；他只从事那些可靠的经营，支配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或者他

③ 去年五月间，政府觉得不能不向舆论作小小的让步，同意用法律追究巴拿马运河公司的一批理事，他们从小款项的积蓄者身上搜刮了十五亿法郎。在众议院里，议员德拉埃攻击了运河公司，控诉它只能报销六亿法郎的正当开支，其余九亿法郎不是被贪污就是被偷窃了，这议员对《闪电报》的访员宣称：“斐迪南·德·累塞普斯先生巧妙地使议会、报界和学院都成了他的同谋，所以他可以保证自己不受司法追究，谁也不会冒失地去逮捕他。”德·累塞普斯买通了所有的人，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伟大的法国人”。法院开始进行的检举，拖延时日，没有结果。德·累塞普斯，他的儿子们和同谋们，在辛苦得来的平静生活中，享用着他们如此辛苦和体面地挣来的几百万法郎。——拉法格注

④ 杨特路，出现在《金钱》中的为金融界服务的记者，“叫人把‘请购万有公司股票’等字样，用刺花的方法刺在可爱的太太们最隐秘最娇嫩的小角落里，再叫她们到处遛。”（第2卷第55页）——拉法格注

⑤ 皮洛士——古代希腊国王，在接连的胜利中耗尽力气，终于失败。——编者注

的银行可以负责的几百万资金。但是贝列拉以及另一些人，深受圣西门的影响，将投机活动引导到另一些道路上去。他们自己没有财产，设法使公众拿出他们需要的资金来；由于他们用别人的钱来投机，丝毫不担风险，一点没有什么可以丧失的，所以他们毫无保留地投入最大胆的金融冒险中。使法国全国处在经常的紧张状况那种投机热是从那时开始的。新派投机商人设法使路特希尔德破产，可是他却一个接一个地击败了那些人：贝列拉、米勒斯、菲力巴、崩图等。那个犹太老头对于自己的最后胜利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听说他把他的最可怕的敌人贝列拉从前在他的银行当雇员时用过的办公桌子保留着不叫别人用；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路特希尔德冷冷地回答说：“有一天他要回到他这位置上来的。”

被路特希尔德战败的那些人是投机场上的革新家。他们设法搞钱的主意、计策和方式，使买卖界和交易所里起了革命。他们把资产阶级和平民大众的积蓄都集中在手里，为着把资金的滚滚洪流引导到工业和商业上去。他们变成了国民财富的抽水和排水的水泵。“小资金组合”的号召是从圣西门那儿借来的一个公式；实现这种组合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了必要的条件。铁路以及现代经济机构是那么巨大的企业，仅仅借助于个人的资金是不可能兴建和经营的。必须用群众的资金，必须有这种资金的巨人式的集中。贝列拉和米勒斯之流担当了这个任务，而他们可以自夸完成了一件比拉撒路的复活^①更大的奇迹：他们说服了小资产者和农民们，舍得拿出他们的心爱的钱来，交托给贝列拉等人。这样，他们就能够找到大工业在突飞猛进之初所需要的资金。贝列拉和米勒斯加速了在帝政之下遭遇过某些困难的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他们的工作尤其是有利于路特希尔德的银行，这当然不是出于他们

① 拉撒路复活，为耶稣“奇迹”之一，见《约翰福音》第 11 章。——编者注

本愿的。后者在用了冷淡的眼光长时期地观望了贝列拉等人的上升和成就之后，打倒了他们，夺取了他们所创办的金融和工业的机构。

左拉不熟悉巴黎的金融界和交易所的历史；作为真正的采访记者，他只满足于到交易所里去生活几小时，去研究一下现场，记下几个搞证券生意的人的闲谈，这种人和左拉一样地很少知道交易所的历史和他们自己的历史是怎么回事；的确，既然这种历史不影响牌价的涨跌，他们是不会对它感到多大兴趣的，按照左拉的看法，萨卡和龚代曼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天主教和犹太人的投机资本之间的决斗。可是贝列拉和米勒斯之流却也是和路特希尔德家里的那些名叫萨洛蒙或纳坦的人一样，都是地道的犹太人；他们责怪路特希尔德等是北方的犹太人，是“阿斯克纳齐”^①，至于他们自己则以代表南方的犹太人，所谓“赛法丹”^②，感到荣幸，按他们的说法，南方犹太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见解比较旷达。

路特希尔德银行抵抗住了一切暴风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要想消灭它，但是它胜利地通过这场革命，并且比以前更为强大了，它曾经和它的那些受帝政和机会主义者们庇护和宠遇的敌人们折冲，而且击败了他们。新的和旧的投机方法的掌握者之间的这一场战斗，本该作为这部小说基本背景，并且给它一种史诗式的伟大气魄。

* * *

要想把交易所的人们和他们的生意经描写得很有趣味，这是很困难的，可是左拉却成功地把放在他眼前的吃力不讨好的材料戏剧化。如果我们考虑到他所克服的困难，细节的丰富，布局的巧妙，人物性格的突出——有几个性格是非常出色地观察得来的，我

① “阿斯克纳齐”，波兰犹太人。——编者注

② “赛法丹”，西班牙、葡萄牙犹太族。——编者注

们应当承认《金钱》是一部杰作。情节的陈述是非常成功的。这一次，左拉不再做小学生的作业了，他不临摹一幅现成的图画，如同在小说《大地》中一样，这次他写生了。

从第一页起，读者就沉浸到这个扰攘喧嚣的生活的中心；左拉把读者带到一家饭馆里，那儿靠交易所生活的人在吃午餐，一边等候吉利的到来，他们好去向“金牛”顶礼膜拜。在那儿，在纷乱杂沓的气氛中，那些投机家在吃、喝、抽烟，走来走去，互相敬礼，大声打招呼，或者低声交换他们的意见、印象和思想，谈的是他们感兴趣的唯一对象，使他们热情冲动的唯一问题：交易所的牌价，以及可能影响牌价的政治事件。从这闹哄哄的、每个人只顾自己的计算和策划，用自私自利的垣墙保护自己的世界中，萨卡的面目突了出来，它的线条是很有力的。这个不知疲倦然而被人冷落的人，在脑袋里翻腾和准备一个新的、广大的投机活动的计划，并且已经把他必须利用和对他可能有用的人名记下来。虽然他是破产了，无处借贷，没有靠山，虽然他那当部长的兄弟为了要摆脱他，给了他一个远在外省的县长的职位，他却在勇敢地起草征服巴黎的计划。

左拉愿意使读者对于那种奇怪而特殊的人物有一个概念；在交易所里，那种人物象着了魔似地指手划脚，把嗓子都喊哑了，而在附近的街道上，到处可以碰到他们。他这部小说介绍了描写得很生动的大群侧影。布虚和夹着充满纸片的黑皮包的梅相，就是专门拾取已经跌到一钱不值的证券的那种卑下的捡破烂者的典型：他们购买那些已经宣告破产的公司的股票、没有人偿付的债票、经人否认的支票等等；他们把所有这些毫无价值的废纸分类编号，接着就耐心等上四年，五年，十年，以便得一个机会把这些废纸卖一点钱；代价是那么微薄，不足以偿付金融界的格杀勿论的战场上的那些肉食的猛兽所费的时间和努力。在交易所房屋旁边，种

有矮小细弱的栗树，矗立着“金牛”之庙的广场的围墙里面，另外有一个交易所，称为“湿脚”交易所。这稀奇古怪的名称之所以给予这个交易所，因为它设立在露天底下。就象以前交易所的房屋还没修建时，有价证券的交易在露天下进行一样。所谓“湿脚”是一些来路不明的人，他们的过去往往也远不是毫无污点的。他们穿着破旧寒伧的外衣，戴着油污、发黄的帽子，他们的裂缝的破皮靴，在下雨天吸的水，比他们自己喝的水还多些，他们在出卖贬了值的证券，从原价一千或五百法郎跌到五十法郎，甚至跌到五生丁的证券；正如那些金融界之王在公债、铁路股票以及利息丰厚的那种企业的股票上进行投机一样。这些“湿脚”把破了产的公司的股票卖给头脑简单的家伙，这种人不管事实是多么不可能，还在希望这种股票有一天会涨价的；可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湿脚”们把股票卖给那些坏蛋，这路人为了想娶一个可以获得一笔遗产作陪嫁的姑娘，需要拿着一笔虚假的资金去迷惑女方的亲长。或者为了逃避法律严格追究，要遮掩一次作弊取巧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假装投机生意上了当的无辜的受害人的姿态。如果到了该结账的时候，钱柜中没有一文钱可满足债权人的要求，他们就可以归咎于这一次倒楣的生意：他们买进五百法郎一张股票——他们手边拿着股票——现在只值五生丁一张了。在《金钱》中，人们没有看见这种很有意思、很有特点的下流生意的描写，这其实可以说是真正的交易所的反面；我们只能感到遗憾，因为“湿脚”交易所是对于黄金之王们的辛辣的讽刺。可是左拉缺乏讽刺的才能。

插曲式的人物在这部小说中是很多而且很有趣味的。特若阿是诚实的职员典型，他一辈子一文钱一文钱地积蓄，为了给他女儿存下一笔陪嫁金；仰仗了萨卡弄到一个小小职位以后，他尽心尽力地为萨卡服务，宁肯自己吃亏，甚至萨卡垮了台大家都不理睬他的时候，特若阿仍然对他忠心耿耿；萨卡的银行的破产把特若阿的

积蓄整个儿吞没了，而这积蓄，是他辛苦了一辈子的一点果实。

侯爵夫人波维利埃，自称十字军的后裔，她曾经非常刻苦熬省，她的健康和她的钱包同样地贫乏可怜；她把自己财产中剩下的最后的一点，她的女儿陪嫁金交托给萨卡，把重光门楣的最后希望放在投机生意上了。

莫尚德代表把铺子卖掉之后退休养老的小资产者，他享受着很起码的小康生活，具有小资产者的一切品德和大量的中庸之道，他痛恨投机商人这种品类，鄙视赌博，然而却上了萨卡的圈套，被他刮得精光。

那个高贵而骄傲的男爵夫人，桑道尔夫夫人，一个大使馆参赞的太太，被这个投机事业的铁钳子夹住而无法脱身了。为了补偿她在交易所里的损失，她把自己出卖给不久可以当部长的一个总检察官；她成了萨卡的情妇，为的是从他身上获得有用线索，去进行有把握的赌博。最后，她又背叛萨卡，趁他睡着的时候翻看他的衣袋，跑去找龚代曼，把她发现的秘密告诉他。她希望获得一份过得去的报酬，因为那犹太人曾经答应过她，如果她能够对他尽力的话，他就替她出一个很好的主意。这一好主意，她不用等多久就知道了，龚代曼对她说：

你好好地听我说。不要去赌钱，永远不要赌。这使你变得丑陋。一个赌钱的女人，多么丑恶。^①

这几句话就是她断送了她的情夫之后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她经常在探听交易所的消息，已经逃不出自己的情欲的魔爪，于是越来越堕落，终于做了杨特路的情妇，这个腐化堕落的交易所记者打她耳光，把她这位高贵而又非常骄傲的桑道尔夫男爵夫人，当做卖淫妇似的随便打。

^① 《金钱》第2册第133页。（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中译本第380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夏甫大尉，为了要使他的养老金凑成可观的数目好满足他这老荒唐鬼的下流嗜欲，用十足的战略家的谨慎态度去搞交易所的赌博。

马克西姆，萨卡的长子，是一个写得很成功的“世纪末”的典型；他讲究衣着和修饰，好象一个挥霍成性的娼妓；虽然他只有二十六岁，却已经活得疲乏不堪了，要是为别人的事，他又自私又吝啬，相反，如果是他的千金之躯发生了问题，那么无论花多少钱他也决不会退缩的；这是个令人生厌的家伙。他自己注视、观察自己的沉闷的生活，他专心从事的仅仅是这一种静观。他很恰当地评论他的父亲。他对珈洛琳太太说：

您瞧，必须了解爸爸。我的上帝！他并不比别人更糟。只不过，他的孩子们，他的那些女人，反正他周围的一切人，对于他说，都没有钱那么重要……可是，您别误解！他并不是象守财奴似地那样爱钱，喜欢要一大堆，藏到自己的地窖里去。不！如果他愿意左右逢源到处都是钱，那是为了使钱川流不息地经过他的手，为了从钱上面获得一切享受：奢华、乐趣、权力……您说有什么办法呢？这对于他说是根深蒂固的。您、我、不论是谁，如果我们当作货物进入什么市场的话，他会把我们卖掉。而且他是用毫不在意和高超的人的态度来干这件事的，因为他确乎是歌唱百万钱财的诗人，钱这样地使他发疯，使他成为混蛋，哦！伟大的意义上的混蛋！①

我略去整整一系列的有趣的人物不谈，因为在这儿我不能逐页介绍这部小说并且加以分析。所有的人物，没有例外地，都是生动活泼的。左拉很巧妙地把他们和主要情节联系在一起，那情节就是萨卡的投机活动。《金钱》是一部结构严谨的小说。

在小说里，我们看到在萨卡身边有一个精力充沛而表情平板

① 《金钱》第2册第17页。（参见中译本第256—257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的女子：珈洛琳太太。她生活在坏蛋和骗子的世界里，好象一支从粪土中长出来的百合花，丝毫没有丧失她天生的纯洁；她的天真使她每次接触污浊的东西而不被沾染，她曾经是她的兄弟哈沫澜工程师的守护天使和聪明的朋友。哈沫澜是个神秘的学者，他有气魄很大的一些设想，但是需要一个金融家来帮助他实现这种设想。珈洛琳是萨卡的极佳的家庭主妇和头脑清晰的顾问，她和萨卡过着夫妻生活，她佩服萨卡的火热的劲头，他的精力和组织的才能，可是她很担心萨卡的道德上的弱点，尤其担心他好冲动。珈洛琳太太帮助和维护她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同时，她既不讨厌，又不蠢笨。因此，她和一般小说，尤其是左拉的小说中的数不清的善良和有操守的人物迥乎不同。因为这类人物一般地说都苦于有上述两个缺点：讨厌和蠢笨。左拉在这部小说中仍然没有忘了这样的人物，他给我们介绍了年轻的约丹夫妇，他把他们写成尽可能地乏味和痴呆。男的是一个品行端方的小说家，他在萨卡的报纸上写文章，既不感到可耻，也不觉得恶心。报纸出钱买他的文章，而他从德行的角度来看，认为这样就可以于心无愧了。一到他们发现缺钱花的时候，那个痴騷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太太就大声说：

对，去，一定会很顺利！……你和我一同回来，对吗？那才有意思呢，我们可以在葛里希街的拐角上买一条熏鱼，明天早上吃，在那儿我看见有极好的熏鱼。今天晚上，我们吃腊肉煮土豆。①

这条美妙的熏鱼和这些腊肉煮土豆！作为现实主义和参考性的细节，还有比这更高明的吗？

《金钱》所描写的世界是不美的；可是人们不能象责备巴尔扎克那样责备左拉，就是说“把丑恶弄得更丑恶了”。在这儿，现实比左拉的一切龌龊和粗俚的描写更为令人作呕。现实超过最令人憎

① 《金钱》第2册第205页。（参见中译本第220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恶的图画。是不是想入学院的愿望，还是作者所处理的主题的特殊性，在这儿影响了他呢？左拉平常乐于在他作品中穿插一些本来用不着写得那么肮脏的场面，而在《金钱》中却没有。总检察官代尔刚勃当场闯见他的情妇桑道尔夫男爵夫人和萨卡在通奸的场面无疑是写得很大胆，但却是真实的，而且有必要用粗线条描下来，为着使这三个人物的性格充分地突出。巴尔扎克和左拉都没有试图避免表现生活中固有的丑恶，但是左拉实在乐于对令人恶心的无耻的事物作多余的、仔细的描写，而这类描写使他的小说广受欢迎。没有疑问，他还比不上昂利·莫尼埃，为了表现生活中的一切见不得人的东西，莫尼埃并不是求助于小说，而是求助于短篇对话。读者不可能忍受更长的描写！

人们能够而且应当责备左拉的，在于他既无风趣，又无讽刺与幽默地描绘了他认为是现实的一切。他写得很沉闷，他决不是下笔奔放而不能自己的作家，毋宁说他是一个认真工作的匠人，埋头从事一件自己并不特别感兴趣的任务。

笑声和雅谑从不使左拉笔下的篇页增加些生趣；然而文明人是喜欢笑的，即使他生活在腐烂与痛苦之中。尽管人类的愚蠢无法衡量，可是即使最十足的蠢货，有时从他嘴边也会漏出几句反映隽智的，有光采的话。交易所这个世界是来自各个社会阶级，大地的各个角落的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在他们之间可以碰到有风趣的人，他们是怀疑派，——说实话，是很迷信的怀疑派，他们比狐狸还狡猾，他们善于从最困难的环境中用幽默的态度脱身，这种是所谓“机灵鬼”。左拉不认识这种人，虽然他自以为搜集了很多材料，他没有用过一次“机灵鬼”这个富于表现力的字。

在那些人之中，时常碰到很有学识的聪明人，他们放荡的生活——和他们流浪汉的外表往往相适应——使他们在道德上堕落了。在这些人的行列中出了一些专替交易所写有关的文章的作

家。只要阅读一下交易所公报和金融杂志，就可以认识和鉴赏这些作家的活跃和才华；他们善于把他们的题目写得很生动，并且给以诗的色彩。正如沙尔·傅立叶已经注意到，交易所的语言是富于诗意的，是十分形象化的，这语言将生命赋予交易所的有价证券，它使证券具有牌价涨跌在投机商人灵魂所引起的情感。交易的有价证券比含羞草更敏感：只要有一点云影出现，证券就蜷缩起来、萎靡不振、苍白失色、憔悴枯萎，吓得躲藏起来，以至脱落伏倒；可是太阳一出，它们就苏醒过来，又开放了，并且挺起腰来，准备斗争，为的是接受胜利的酬报①。

对于这一切，左拉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因而他笔下的人物是单调的。

* * *

哲学是人的特点，是人的精神上的快乐。不发表哲学议论的作家只不过是个工匠而已。自然主义，在文学上它相当于绘画方面的印象派，禁止推理和概括。根据这种理论，作家应当完全站在旁观的地位，他接受某种感觉而加以表现，不能超过这限度，他不应当分析现象和事变的原因，也不应预告它的后果；作家的理想是做到象一张照相底片一样。这种在艺术中重现生活的纯粹机械的方法是很容易的；它不强求任何预先准备的研究工作，只要求智力的很轻微的消耗。可是，如果扮演照相底片角色的脑筋既不很敏感，又不报宽广，那就很难免获得只是很不完整、很不全面的形象，比用最荒唐的幻想画成的图画更远离现实。自然主义作家们的方

① 保尔·阿莱克西是个危险的朋友。由于人们责备左拉把他的小说《作品》中的艺术家都写成毫无风趣的人，在《人民之声报》上用普鲁勃罗这个笔名写文章的保尔·阿莱克西，要想为他所崇拜的偶像复仇，这样回答道：“人们真以为艺术家和作家们有这么多的风趣和幽默吗？拿我自己举例：我并不是每天都那么逗人快乐和富于风趣的。”真所谓有其徒必有其师……——拉法格注

法仅仅证明了他们智慧机能的微弱。

巴尔扎克随时发议论，对于任何事物都发议论；他有时在这方面跑得这样远，以致用一般性的见解充塞了他的作品，使作品成为不易消化的东西。他是个深刻的思想家，他把自己的机智和思想财富赋予他笔下的人物。虽然不能算在他的最好的作品之列的《驴皮记》，包括一连串的，在记者、政客、艺术家以及妓女之间进行的滔滔不绝的会话，在那些谈话中，他发表关于社会、风俗和政治方面的意见，比整个我们现代的报界所包含的意见更为深刻。左拉，惯常很少发议论。在《金钱》中，他例外地把一些一般性的见解放在萨卡和西奇斯蒙·布虚这两个人物口中——题材使他不得不如此——可是在这两个人物之中，谁也不能以他的哲学使我们肃然起敬。

萨卡是个平平常常的人。他曾经有过一段骚动不宁的、充满升沉变化的生活，他见过许多人和许多事物，经历过完全不同的环境，时而富，时而穷；他感受过完全自相矛盾的感觉，战斗和胜利的陶醉，失败后短暂的灰心丧气，无能为力的骄傲给他的刺激；他曾经被人捧到天上去，也曾被人蔑视。他的脑袋里照说应该囤积了一大堆的观察和思想，他的心本该充满对于人类的鄙视和牢骚。

西奇斯蒙·布虚是个颇有智慧的人，疾病使他精神经常奋亢。据左拉肯定，这是一个精通卡尔·马克思的博学而擅长于理论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因此可以设想这是个彻底熟悉金融界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人；设想他能了解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改造的必要。按照小说的线索来说，他和萨卡本来可以很好地扮演思想家的角色，一个从资本主义观点，另一个从社会主义观点去正视现代社会。但是，两人并没有表达深刻的思想，他们仅仅致力于无聊的饶舌。左拉还嫌不够，他叫珈洛琳太太把萨卡说过的话再去说一遍。珈洛琳太太是这样一个女人，她的

学识太渊博了，她从前曾浪费了光阴，亟于想认识广阔的世界，并且想在哲学家们的争论之中决定她自己站在哪一边。^①

在左拉眼中，努力认识世界原来意味着浪费光阴！用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把无知放在科学之上，而使愚蠢给理性领路。这点，是这位作家所没有见到的。

萨卡说话很多，而且滔滔不绝；这不但适应他这南方人的性格，而且和左拉一模一样，左拉喜欢独白甚于对话。萨卡不时地喜欢说几句至理名言式的话；因此，谈到广告的时候，他象煞有介事地宣称：“一切张扬都是好的，从张扬本身来说”^②。他要人们娱乐公众，于是劝告杨特路用文字游戏来把他的交易所公报办得更有趣。左拉本来可以让他那交易所的商人们智慧上的空虚显得更有意思些，如果他把这些经常说的名句和见解放在他的嘴上。他们的空虚将变为一种特性，这样一来，读者就可以估计资本家的智慧了。左拉没有想到这一点。萨卡只发挥了一种理论：赌博和投机的理论：

必需有一个发横财的希望，买奖券的希望：中个头奖，获利十倍；要不然就什么都不中，把本钱赔光。^③

就是这种希望点燃了资产者的贪欲，使得他和他心爱的钱分离，把它交托给狡猾的家伙，交托给金融界的骗子。没有淫欲不会产生孩子，同样，没有投机和被它点燃起来的情欲，占据人心使人狂醉的情欲，不可能将对于发展经济和文化不可缺少的巨大的资金积累起来。金钱这个肮脏东西，成了文明之花托根的粪土。如果说金钱腐蚀了一切，它也给邪恶以一种好闻的气味，风骚的女人

① 《金钱》第1册第175页。（参见中译本第188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② 同上，第124页。（参见中译本第134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③ 《金钱》第1册第120页。（参见中译本第128—129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和她们的可怜的男友是世界上最触鼻的东西；钱使善良的灵魂完成慈善举动，例如沃维埃陀公爵夫人——她的丈夫利用可耻的投机发了财——将贫病儿童收容在很讲究的房子里，给他们衬衣和糖果。以上就是左拉笔下的英雄人物的深刻思想的扼要介绍。这些思想由珈洛琳反复地说，左拉自己也得意地重复了几次，好象是要借此着重指出他的作品在思想上多么贫乏。

西奇斯蒙·布虚比萨卡更饶舌，因而他能够说更多的傻话，事实上他也没有少说。左拉无疑地想把他当作一个异乎寻常的人来介绍：

除开法语，他的国语之外，他还会说英语、德语和俄语。^①

确实，对于只会说国语的法国人来说，你只要懂得几种语言，马上就成为了非同小可的人。

1849年他在科伦认识了卡尔·马克思，做了他的《新莱茵报》的最受爱戴的编辑；于是，从那时起，他的宗教就确定了，他用热烈的信心宣扬社会主义，已经将他整个人都贡献给不久要到来的社会革新的思想，这种革新将保证贫苦和卑微的人们的幸福。^②

西奇斯蒙·布虚按时和他的大师通信，他热烈地研究大师的著作，尤其是被称为他的《圣经》的《资本论》。我们在这儿指出左拉的一个有趣的错误。左拉为了显出他不遗余力地作过一番调查研究，他向读者肯定说《资本论》是用哥特字体印的，可是《资本论》的四种德文版，全是用拉丁字体印的。^③

① 《金钱》第1册第35页。（参见中译本第38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② 同上，第35页。（参见中译本第38—39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③ 拉法格没有指出左拉的另一错误（《金钱》第1册第35页）：“他的大师从德国被放逐出来，而在六月的那些日子以后，又不得不离开巴黎……”按马克思由于1845年1月25日的一道法令的决定，被驱逐出法国，当年2月1日离开巴黎去布鲁塞尔。1848年3月4日，二月革命之后，他又重回巴黎。同年4月初和恩格斯一同启程到德国去。——原书编者注

西奇斯蒙·布虚，马克思的门徒，显然很少阅读《资本论》，正和左拉很少翻开过这部书一样。如果他居然令人难以相信地读过这部著作，那么他从那种阅读中获益是极少的。他也表达过关于财富集中和交易所投机商人的作用方面的一些意见：

因为集体主义的国家将要做的只不过是现在你们正在做的一套，等你们把小私有者的财产零星地没收之后，集体主义的国家将要把你们的财产整个地没收。^①

他说金钱将不再用来分配产品，就象在家庭经济中已经实行的一样。可是在今天，这些已经是社会主义的老生常谈，十年以来被人说得这么频繁，以致它们在世俗之人的窄狭头脑中已经走了一大段路，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也在说这样的话。

这种意见是合理的；因此它们对于左拉说来是不足以使西奇斯蒙·布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他认为必须将蒲鲁东的错误放在这个所谓马克思的门徒嘴上，而那些错误恰好是马克思曾经加以抨击的。这个《资本论》勤勉的读者正和蒲鲁东一样，在利率的低降中看出金钱将要消失的征兆，而这一事实却仅仅证明了在流转中的大量金钱的增加。这个科学社会主义者是充满着矛盾，而他的爸爸左拉对此却毫无概念。他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不容反驳地证明，现代社会在自己怀中创造建设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成分。在同时，他彻夜不眠，大费气力地去想象未来的社会应当如何组织，如何起作用。他力求在人心之中发现某些动机用以代替利己主义，由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的竞争所造成和发展的利己主义。

布虚是个典型的唯心主义者，他甚至连想都没想到：马克思，黑格尔的学生，确信那些所谓不变的原则的辩证的发展，他超过他

^① 《金钱》第2册第91页。（参见中译本第334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的老师而说明这些原则在人们头脑中的出现和改造，是如何密切地和经济关系的发展联系着的。然而布虚肯定说新的社会组织将奠定在不变的原则上，这些原则就是正义以及被认为每个人应有的而且还给了每个人的一些权利！

以马克思为模范

并且和马克思不断地通信的布虚，终日研究这种组织，不停地在纸面上修改、改进明日的社会，用数字写满巨大的篇页，在科学基础上建筑全世界的幸福的复杂的支架。^①

一句话，布虚是一个糊涂混乱的头脑，他纠缠在1848年的“法伦斯泰尔”^②和“伊加利亚”^③式的乌托邦上；左拉却把他当作一个科学的思想家和马克思的得意门生来介绍。可是，马克思坚决相信，企图凭空制造一个社会完全是徒劳无益的，正如不可能创造一个动物一样。只有经济关系才能够创造和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左拉好象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小说创作家。“社会主义者”西奇斯蒙·布虚糟蹋了左拉的小说，他是一种云雾迷漫的幻想的产物。

象《金钱》这样一部远远地超过了普通小说水平的作品，以表现和分析社会现象为己任的作品，本应该表达某种社会的概念。事实上并不如此。

《金钱》不会受到象《娜娜》和《小酒店》那样的欢迎，因为这部作品只能吸引想认识交易所世界的读者。如果广大公众不能按照这部小说的价值加以欣赏，也只好让他们自己去受损失了。

* * *

① 《金钱》第1册第36页。（参见中译本第40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② “法伦斯泰尔”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编者注

③ “伊加利亚”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卡贝的幻想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所描写的理想的共产主义国家。——编者注

在我们这时代，人们大谈文学革新，以致无论谁只要脑袋有了写小说或写诗的意思，就很天真地设想创立一种新的倾向，新的流派。因此可以提出下列各问题：

左拉式的小说^①是否形成资产阶级小说家革新小说和使之重获青春的最大努力？或者说，这些作家是不是注定要重新踏上他们的前辈所开辟的道路，重新拾起陈旧的公式，不过稍作枝节的改变，使这些公式适应时代的要求，而把它一直这样使用到小说这个体裁精疲力竭，结束它的全盛时代而趋于消灭，就象古典悲剧和史诗已归于消灭一样。

在下一篇论文中，我将试答上面提出的问题。^②

选自《拉法格文论集》（罗大冈译）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8—164页。

^① 左拉自己不知道他的最好的几部小说：《萌芽》、《大地》、《妇女乐园》、《家常便饭》和《金钱》等，是属于哪一类的。他挨次使用这些术语：“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实验的”和“文献的”等等。这些称号是不够精确的，它们可以用于和左拉自己的小说完全不相似的一些小说上。——拉法格注

^② 这篇论文不幸没有找到，我们为了搜求这篇文章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原书编者注

赞成共产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

(拉法格和德莫连^①之间的辩论)

(1892年5月21日)

先生们和女士们!

现在这个会的主题，实在说，不是辩论，而是对社会发展的两种对立的观点的简要的叙述。德莫连认为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将导致个人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导致它的极端的形式——分立主义；而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相反地以为经济现象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共产主义的重建，也就是导致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社会化部分地已经实现，和导致使一切消费资料变成公共财产，这消费资料在现在则被一个只是比较不大的阶级所垄断，恰恰由于这种经济关系的发展，这个阶级的人数日益减少。

我很满意利用这个机会在这些与平日经常听我讲演者不同的公众而前发挥共产主义的理论。当在这里执行宣传家的任务时，我想试一试投下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种子，并且力图征集到信从者。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击破某些对共产主义者的

* 拉法格和德莫连之间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是在巴黎地理学会的大厅里举行的。能容千人的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那里坐满了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其中有许多是院士、教授、牧师和法学家。拉法格要在这些享有特权的听众面前发表演说，他只能给自己的朋友——社会主义者送五十张入场券。

拉法格的演说悉照速记稿重印。——原书编者注

① 埃德蒙·德莫连(1852—1907)——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社会科学》杂志编辑，“反社会主义联盟”创建人之一。——编者注

责难。

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宣传凶杀和抢劫。你们自己将会判断这种宣传同我们的理论是否能相容。

我们的敌人中有一部分比较客气，他们把我们看作空想主义者、梦想家。他们对我们说：“对，你们所梦想的社会好得很；使平等在人与人之间占统治，这无疑是的愿望。但是你们不懂得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按其实质来说是倾向恶的。在你们着手改造社会之前，先要改造人。”

然而我们决不是空想主义者，与政治家和慈善家不同，我们不相信靠宗教的或世俗道德的宣传有可能改造人。

为了使人变好，需要改变他们生活的环境。人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社会环境，但是它又是环境的作品。当你改变环境时，你同时也在改变人的风俗、习惯、激情和感情。我们，空想主义者，梦想家，研究社会环境，我们分析经济现象；我们回溯它们的起源，追踪它们的发展，观察它们对家庭、对政治制度的影响，然后决定既无畏惧也无成见地作出相应的结论。

经济现象不仅影响风习，而且也影响家庭的和政治的制度，甚至影响人们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点。

下面就是我认为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在发展的某一阶段，当生产资料很不完善时，一切民族都有过奴隶制度。一切的人，甚至大智大勇的思想家都把奴隶制看作是正义的、自然的现象，而信仰宗教的人甚至认为它来源于上帝。

人类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界创造了专供奴役的人种之一。在这方面他的观点同圣经上关于世界创造的传说相吻合，按照创世记的传说，含^①的后裔

^① 根据《旧约全书》的传说，含是挪亚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对父亲的不敬行为而被挪亚诅咒，必给他兄弟作奴仆的奴仆。——编者注

将为发源于挪亚的民族服役。但是这个希腊的哲学家至少预见到传说所不知道的东西，他预见到生产过程的某种变革必然要引起奴隶制度的消灭。

在他的《政治》一书里有这样一段值得注意的话：“假如每一种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自动地完成指定给它的工作任务，象代达罗斯的巧妙的创造那样自己会运动，或者象赫斐斯塔司的三脚供桌那样独立地完成自己的圣职，假如，比方织布的梭自己会织，那末这时候师傅既不需要助手，主人也不需要奴隶了。”

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在承认奴隶制是自然的经济现象的同时也天才地预见到生产方式的变革将引起奴隶制度的消灭。正因为这种经济变革的实现，正因为大工业的机器自动地完成自己的圣职，所以，我们共产主义者才确信雇佣劳动制度，奴隶劳动的这种最后的和最坏的形式必然要灭亡。

一

的确，在现时代机器掌握着整个工业部门，既包括最原始的和最简单的，也包括最发达的和复杂的。

制油在远古时候早已知道了，现在采用瑞典人拉瓦尔发明的机器来进行，它把刚刚从母牛的乳房中取出的奶变成油。人们借助透光镜和化学制剂之力迫使太阳描画物像；它很快就会画上色彩。巴黎人吉洛找到一种不用刀和甚至不用画家的手参与的雕板方法；他只使用油质的墨水和硝酸。雕板是靠太阳和电之力来实现的。甚至还发明了计算机，它比数学家还要可靠。我本来还可以列举出各种各样的工业部门，并指给你们看，所有它们都被机械化触动了。

使用机器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机器的采用使个人主义的工业变成共产主义的。我来比较详细地解释这点。从前在每一家中纺线和编织，并在每一乡村中都有自己的织工。这些工业部门分散在全国，现在则集中在一定的地点，那里用机器来编、织和纺，以供应共同的需要。

织布机和纺纱机在大型的纺织工厂里都“社会化了”。

制成品失去了自己的个人主义的性质。在小生产时代皮鞋匠包管制成一双鞋的全部工作；他亲自量尺寸，做鞋底，剪皮和缝制。鞋或便鞋完全是个人的产品，因为一个人就足以完成它的制作。可是在鞋厂里的工作却要通过许多的手。一个工人剪皮，另一个在机器上磨光皮靴筒，第三个钉鞋底，装上鞋后跟等等。一双鞋是相当数目的生产者的共同的工作。个人主义的产品变成共产主义的^①。

这种共产主义的变革也见之于商业。在上一世纪每个小铺子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商品，按照行会规章，它应当严格地限制在这种商品上。呢绒商在自己的铺子里只能出售呢绒，正如刀铺只能卖刀一样。

现在你在“卢浮”，在“邦马舍”或在其它的百货商店里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截然不同的物品，它们集中在一起，在同一资本的管理下“社会化了”。在英国商业中的这种共产主义普及的规模还要大。舒尔不来德公司出卖人们的衣、食、住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伦敦的大消费股份公司除此以外还有医药商品，这就使得健康和病人都能在那里买到所需的一切。

工业集中的影响在农村里也明显可以看出。小的分地“社会化了”而构成大地产。我知道你们是不会同意我的，你们打算拿法国土地分散和分散得一天比一天更甚这个事实来反驳我。就算是

^① 拉法格在这里以及在某些其它地方的术语有可能引起混乱。其实这不是共产主义的生产，而是由于劳动分工形成的集体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编者注

这样罢，然而这无论如何没有妨碍大地产的形成，农村人口减少的——事实足资佐证。凡是打算丢掉自己祖先的土地而投入工业城市的农民都把自己的土地出卖给大的土地所有者。在最近的时期，沙耳曼尔-拉库尔^①依据官方的、谁也驳不倒的统计材料在参议院宣称法国全部可耕地的百分之四十五是握在十四万二千个大土地所有者的手里。因此，在我们面前也摆着土地已经相当社会化的例子。

现在在法国完成的过程在英国早已结束；那里全部土地是握在几千个人的手里。所有文明民族都被卷进这个集中的过程。英国也曾经有过自己的小农；还在十九世纪之初，威尔士的土地是在相当数目的小白耕农(yeomen)的手里，他们都消灭了，让位于为数不多的大所有者。

封建的领地在自己的时代是非常宽广的，但是土地的耕种是个入进行的。土地被分成许多小块的租田，由农奴的或自由农民的家庭来进行耕作。现时代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了，只要哪里存在着大地产，那里就建立起大规模的耕作土地的共产主义的制度。为了看一看这种制度已达到多么高的发展程度，需要横渡大西洋到美国遥远的西部去；小麦田绵亘数公里，那里是靠机器耕种。

先生们，我们还应当来看一看第四种的集中形式——金融的集中，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当工业还是个体的时候，它只需要很少的一点资本就能买到工具，因为生产工具是很简陋的；为要纺纱，只需要有纺车和纺锤就行了。每个生产者收集了一点小小的资本就能成为老板，靠家庭、几个学徒和艺徒独立地进行工作。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大的机器生产发达之前，工人可能想望独立经营，这些想望也经常

^① 保尔·阿尔芒·沙耳曼尔-拉库尔(1827—1896)——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唯心主义哲学家。——编者注

得到实现。而现在这些想望却成了空想。

现代工业的生产工具是这么大，为要取得它必须握有不是几百法郎，而是几十万和几百万法郎。我们的世纪，特别是它的后半期，在法国造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从事一种专门把小资本汇集成大资本的职业，使它们“社会化”，目的是使大工业有资金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建立织布工厂和纺纱工厂，修建高炉等等。我很清楚，照那些官方的经济学者的看法，把大的工业企业的资本分成股票和证券是使财产分散，使它民主化的一种办法。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财产的这种民主化使得金融家有可能从所有的旧长统袜子里和秘藏的保险箱中把贮蓄统统搜刮出来，把它们抓在自己手里，实行垄断管理，一直到他们使用狡猾的手法完全占有货币才肯罢休。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形成了数以几亿和几十亿计的巨额财富。大工业企业和大商业企业的这种财产的分散和分割只引起一个后果，就是居民群众为了几个金融大亨的利益而失掉了自己的资本。

由此你们可以看到，生产和交换过程具有共产主义的形式。个体的生产和交换的这种改造是经济现象发展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它的完成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甚至违反它。什么也不能停止这个进化的进程，什么也不能阻止它所要达到的最后的结果。**生产资料的日益加强的社会化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消费资料的社会化。**

但是当生产和交换已经是共产主义的了的时候，占有形式却仍然是个人的。

对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大的生产资料，例如制造厂、工厂、铁路和百货商店，象“卢浮”和“邦马舍”，虽然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却构成一个人或几个人，或股票小组或证券持有者的私有财产。占有仍然是个人的，象过去时候一样，那时工业和商业曾按照自己的

不大的规模采取了个体的形式。在这里包含着矛盾，或者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与个人主义的占有方式之间的二律背反和反题。正因为存在着这种反题，存在着痛苦和贫困，因此社会才会走向解决这种反题的危机。

经济现象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发展曾引起生产和交换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后果。而这发展本身又创造了解决生产和交换的共产主义方式和占有的个人主义方式之间的矛盾的手段。换句话说，经济的发展，一面使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共产主义化”（恕我用了个新名词），同时也准备着消费资料的共产主义化。

我的第二个任务将是指出未来的革命的因素的存在，这个革命将导致一切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

二

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第一个和最积极的结果乃是人们的生产力巨大的增长。

现在人类的或社会的需要没有不能满足的，不仅能满足，而且甚至有余裕。

下面就是证明。在本世纪的后半期为了修铁路、造轮船和为了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机械工具，产生了对钢铁的空前需要。于是就进行了紧张的工作，需要虽然得到满足，可是日复一日地发生了铁的生产过剩，它引起了周期性的危机，这时因为生产太多，以致没有销路和需要停滞。而在这五十年中终究装配了这么多的机器和铁的建筑物，铺了这么多的钢轨，致使地球的外壳好象被铁包了起来。假如把所有的机器，所有的钢轨，所有生产出来的铁垛成堆，那末就会形成一座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的山。这是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奇迹之一。

还有另外的证明。获得足够数量的粮食是使社会有可能存在的第一个条件。这问题已解决了，甚至还有多余：在那些土地集中并使用机械工具和科学方法耕作的省份，每一公顷的产量达到二千五百——三千公升，甚至还要多；而平均产量只达到一千五百公升，而在有些年景却降到一千三百、一千二百和甚至一千一百公升。假如土地的共产主义耕种不限于东北部的几个省份，而是普遍采用，则法国将收获二百亿到三百亿公升，而不是现在每年的收获量一百多亿公升。不久以前一个美国的农学家公布了哈得逊湾以西开发的新的土地的记载。他指出，假如这些肥美无比的土地也照遥远的西部的农场那样组织起来一百万工人，配上机械化的工具去耕种，不必使用肥料，那末在几年之内就可以达到生产足供全球人口所需数量的谷物；其余的土地就可休耕以恢复其原来的肥沃。

我举了铁和粮食这两种最必需的物品来作例证；我还可以接二连三地列举出全部的生产品并且向你们指出生产到处都达到这样大的规模，远远超过了需要。如今工厂主所关心的已不是如何生产，而是如何找寻消费者；他们到亚洲，到非洲去找，甚至准备到魔鬼那里去找。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欧洲各民族相互争夺殖民地；他们掠夺殖民地，输出皮货、香料、贵重木材和金属。在十九世纪争夺殖民地还是继续进行着，但是现在所争的是向殖民地推销从生产者手里抢来的商品；掠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生产品的这种丰裕，甚至是过度的丰裕，在以前的时代是想象不到的，本来应当使一切生产者享受富裕的后果；然而事实上它却使他们变穷。只因为商店里的商品充满货架，失业便来光临，使饥饿成为工人住宅的经常客人；许多人饿死就因为生产品生产得太多了。在中世纪只在歉收之年饥饿曾减少人口。现代的贫乏则由

丰裕而引起。

这种明显的荒唐事实促使工人倾向革命，它是以上所讲的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同个人主义的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的结果。生产者处于经常的贫乏的境况，是因为资本家日复一日地把他们的劳动果实侵占去了。

劳动产品的这种占有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市场，在那里一切都能出卖——不仅是人们劳动的成果，而且也包括人本身。工人之所以能出卖是因为筋力，脑力工作者之所以能出卖是因为有知识——工程师、化学家、农学家掌握了组织和管理企业的力量。共产主义的生产同个人主义的占有之间的矛盾贬低了人的身价，使它成为商品，我再重复说一遍，并且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大规模的商店。

“从小商店里还能找出什么好东西？”——西塞罗在自己的《论义务》一文中说道，他用这句话来表达他那时代的意见，整个古代世界以及一切不是建立在商业和资本主义生产之上的社会的意见。

“从小商店中还能找出什么好东西和商业能否产生诚实的人？凡是称为商业的一切，都不值得诚实的人去做；商人若不欺骗便会一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比撒谎更可耻呢？因此应当把那些出卖自己的劳动和自己的手艺的人的职业看得低一等和不体面的；因为那些为钱而出卖劳动的人是在出卖自己和站上了同奴隶一般高的等级。”（大厅里响起了不赞成的喊声）

这最后的几句话曾经引起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热烈的赞同，但是在你们中间却激起了不满。然而，能否举出比出卖自己的手力和自己的脑力更能说明人的受屈辱的例子呢！

这种对每一个斯巴达人和罗马人都是屈辱的行为在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却成了生产者的唯一的出路。雇佣劳动的制度就是

一种奴隶制形式。

唉！西塞罗是对的，商店只会导致撒谎。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大商店中一切都是虚伪的。

拿产品来说罢，它们都是伪造的、掺假的。

被人们大加称颂的资本主义的文明将被打上制造冒牌货的世纪的烙印。现在已不满足于自然的物品的伪造，甚至再搞假货的伪造。人造奶油本是油的造假，现在又在造假货。

但不只是物品是虚伪的，虚伪不仅在物质的领域而且在道德的领域也占统治地位。大概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社会虚伪，可以说全部的道德和全部的政治都是虚伪。我不可能列举出上层阶级的高贵代表人物所惯常使用的全部虚伪的形式。我只从其中选择几种同我的题目有关的来讲一讲。

财产是社会的基础，人们经常这么讲。保住“私有财产”成为统治阶级永远关心的事情。崇拜金犊偶像的教士——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与和谐大加赞美。这一切都是虚伪！

在哪一个社会里也没有过这么大的不协调和矛盾。不断的、无情的内战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两个出卖同一种商品的商人，两个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工厂主难道不是经常处于敌对状态吗？其中的每一个不都是拿出全力企图从自己的同行的手里把购买者勾引过来，把自己的同行排出市场，使他破产，变成穷光蛋吗？

这个战争称为竞争。这就是坚定不移的逻辑学家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中世纪封建男爵也是互相敌对的，也进行战争，只是有时为休战所中断；但是这些战争是用利剑和枪矛来进行的；它们在封建男爵身上发展了肉体的和道德的品质（勇敢、责任感、忠实于诺言、力量、对困难、强烈的疲劳、恶劣的天气的忍受能力），使得人的肉体和精神都高尚起来。现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优势的情欲是追求暴利，对不劳而获的财富的无厌

的贪求。经济竞争在人的灵魂里只发展了钩心斗角、耍滑头、弄虚作假、贪得无厌、利己主义的能力。只要我能发财，让社会、祖国、人类破灭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口号。

资本家的经济战争也同封建主的军事竞争达到同样的结果，财产的集中。封建男爵把被击败者的土地和农奴归并于自己的领地。资本家则夺取破产了的竞争敌手的工厂和顾客。

大资本剥削小资本；小地产每天都在消失，让位给大的地产。因此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这个社会本身破坏了小的财产而只留下大的。

在一七八九年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曾以人权保卫者和反对非正义的战士的姿态出现；它宣传将要实现**平等、自由、博爱**。这些话都写进了宪法，甚至在监狱的墙上也能读到，但是任何地方也没有实现过。**自由、平等和博爱**，这是资产阶级扯谎的三个主要的形式。

进步的倡导者曾经许诺说，现在还在说，机器一定会减轻人的劳动。又一次可耻的扯谎！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机器技术的成就反而增加劳动。革命前夜工是被禁止的，在现时的资本主义工厂里，男人、妇女甚至儿童都在日夜工作，这是真正的苦役。

在十八世纪国家和教堂曾保护过工人；他们规定了一年中有**一定数目的休息日**——五十二个星期日和四十个节日，还不算地方的和行会的节日。那时稍微找到一点理由就可以玩乐一番，那时不乏空闲的时间来花天酒地和借神圣的懒惰之名来吃喝玩乐。在我们的世纪这样的时间谁都没有了，因为一星期必须劳动七天。信奉天主教的主人忘记了甚至全能的上帝也感到在六天劳动之后**必须休息**。

家庭！这是牢不可破的神圣的社会柱石之一！它曾受过多少人的赞美啊！工厂主、金融家、道德家、政治家，假如听一听他们讲

什么，他们全都只想到如何保存家庭，发展它和使它更完美。可惜事实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的社会瓦解和破坏家庭。工厂使妇女和儿童脱离家庭的炉灶，它从吃奶的婴儿身边夺去了母亲，从丈夫那里夺去了妻子；铁路管理局和金融机关完成这个掠夺。妇女失去当家庭主妇的资格达到这样的程度，如在工业区的年轻女子在工厂里劳动和已经当了母亲，但是她既不懂得用针，也不会用锅。

慈善家总是用花言巧语来掩盖工人阶级的愈来愈恶劣的状况，据他们说，妇女和儿童在资本主义的苦役之下劳动只是促进家庭命运的改善，增加它的工资收入。扯谎，又一次可耻的扯谎！妇女之所以被迫从事强制的工业劳动，其目的只是为了有可能降低她丈夫的工资，而儿童之所以碰到同样的命运是为了减少母亲的工资。慈善的资本家就给家庭内部带进了纠纷和竞争：他们迫使父亲、母亲和儿童争着出卖自己的劳动。

在个人主义的工业时期，家庭是靠父亲的劳动养活；在资本主义的工业中母亲和儿童不仅用自己的劳动来帮助维持家庭，而且常常是父亲靠她们的工资生活。在美国有些工业城市，那里妇女的劳动比男人的劳动更受欢迎，因此男人留在家里照看儿童和做饭。这些城市称为“she-towns”，即妇女之城。

妇女遭到比男人更大的痛苦。但是工业劳动，为社会的劳动，现在是这样压迫她们，以后将解脱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其程度远远超过罗马国家衰落时期拿嫁妆来解放女贵族的风俗。

脱离了家务劳动并且同男人平等地参加社会劳动，妇女将有权，而且甚至有义务从事政治活动和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我们将为她们开放通向我们的队伍的道路。在工人的政党里，她们可以担任一切适合她们的能力的职务，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她们将重新取得从父系家庭代替母系家庭时起便失掉了的全部自己的公民权。

摆脱了家庭的从属地位和男人的道德的压迫，妇女便有可能自由发展全部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这时她们将重新发挥过去在人类生活初期曾经起过的那种首创者的伟大作用，关于这种作用的回忆保存在古代传说和原始宗教神话里。

实际上，在印度、埃及、小亚细亚、希腊，在这些人类文化的摇篮里，艺术和手工艺的发明都归功于女神而不归功于神。根据这些神话传说可以设想妇女的头脑比男人的头脑发达更早。难道我们今天没有注意小女孩比小男孩更活泼和更聪明吗？假如后来她们丧失掉这些优点，那末这就得完全归罪于德、智、体三方面的不良教育制度，多少世纪以来她们一直处于这样的教育制度之下。资本主义的伪学者说：“妇女是低劣的人”；但是，活见鬼，这是因为从小就不让她们有发展的机会。假如兔子的四条腿都被捆起来，它就会比乌龟跑得慢。

我们的世纪是劳动的世纪。光荣归于劳动，智慧和知识受奖赏，人们都这么告诉我们。这还是扯谎。

小工业的劳动者是手工业者，他兼做体力的和脑力的劳动。例如细木匠亲自描画所需制作的物件的图样；他在动手做之前头脑里先已有了式样。手要服从他的脑子的命令。现在在机械生产里的情况是否也如此呢？现在工人的思想无事可做；象机器的轮子一样，他只是机器整体的一部分，机械替他想。资本主义的生产把工人降为机器的简单的仆役。

脑力劳动者的命运并不更为诱人。既然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群众只是生产的机器的轮子，那末就需要创造一批优秀的劳动者，以便从事发明、思考、管理；需要脑力劳动者，让他们担任经理、管理员、技师、工程师、化学家、农学家等等的职务。假如知识和智慧受奖赏是的话，那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第一把交椅就得归属于这些担负生产中的全部脑力工作的劳动者，象在宗教垄断科学

时代古代神权国家的这把交椅是归属于祭司一样。

然而这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们也同那些体力劳动者一样屈从于资本主义的带侮辱性的桎梏之下。这只是一些工资收入微薄的雇工；他们耗尽和绞干脑汁使大资本家发财，而大资本家丝毫用不着努力去获得知识，因为每月出一百五十——二百法郎就可以在在市场上找到化学家、工程师、农学家。人们学会了把一切东西都生产得绰有裕余，从短袜一直到知识分子。制造化学家和电工技师多得象菜园主栽种胡萝卜一样，因此他们的价格便大大低落。贬低知识和智慧，这就是资本主义所做的一切，为的是表示对脑力劳动者的尊敬和给予他们应得的奖励。

三

让我们来看看事情的另一方面。

我向你们表明的只是全部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共产主义地集中化了的生产中的痛苦，这是少数资本家占统治的结果。

但是这种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垄断对于资本家所有主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是否发生过良好的影响？他们所受到的尊敬和他们所享受的快乐是否同他们对社会的功劳相适合？

在个人主义的工业中所有主是真正有用的人。他靠自己家庭、几个学徒和艺徒的帮助从事生产。假如他生了病或者沉湎于放荡的生活，那末他的事业就会破产，因为他是自己的作坊或小铺子的主要的动力。

在共产主义的生产中真正的主人消失了。试把糖厂、铁道、矿山或冶金工厂的所有主找出来看看！你们在工作的车间里，在收利息和股息的出纳处的小窗口都找不到他。所有主住的地点远远离开那使他们成为百万豪富的劳动，他们住在巴黎、柏林、北京，为

了发挥他们在自己的产业中的作用，他们也可以很顺利地住到月亮上去。

在生产和交换资料集中的第一个发展的时期，财产主还担负着监察人和主管人的有用的职务。但是自从集中终结之时起，这些职务就由别人代替，而在个人主义工业时代监视一切的主人的“眼睛”就不再执行自己的任务了。

自从资本主义的财产采取股份公司这种最发达的形式之时起，所有主变成无用之物表现得特别明显。而既然成为无用的，他就是有害的了。不是我故意危言耸听，这是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著名的经济学家，一家大的经济杂志的领导人莫利纳里先生的意见。他在1880年出版的《经济的进化》一书中这样写道：

“具有股份公司形式的企业的管理处可能只占有一小部分资本。一般情况之下它可能完全不占有资本，与多数人的看法相反，从管好公司事业的观点来说，这种状况反而是最好的，因为不掌握股票的管理处，便没有权控制自己。对于它只要掌握着自己的职务所需要的能力、知识、道德品质就足够了，这些东西在市场上离开资本的情况比同它发生联系的情况要频繁得多。”

莫利纳里先生仅仅讲出事实，但是必须向他致谢，因为他不怕说出官方经济学家竭力想用一堆空洞而庸俗的话来加以掩盖的真理。

资本主义所有主在生产中已不再起什么作用了。当工商业的共产主义体系使他们失去一切有用的职能的时候，它同时也就宣判了资本家阶级的死刑。贵族阶级的命运正在等待着他们。

历史在重演：在贵族阶级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同资本家阶级的发展有许多类似之处。当封建的男爵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和还有用处的时候，贵族阶级不会被消灭，象一七八九年所作那样。事实上，贵族阶级当时是自己的农奴和家臣的庇护者，保护他们对付周

围的敌人，封建主是欧洲国家的保卫本土军队。但是自从骑士取下盔甲并披上宫廷衣服，用优美的细长的佩剑来代替笨重的战斗的利剑之日起，自从封建男爵变成凡尔赛的侍官，投身在皇帝的和大主教的宫廷之内生活之日起，便宣判了贵族阶级的死刑。社会革命以命定的必然性将结束资本主义的纪元，将执行经济现象对资本家阶级判决的死刑。

我利用这个机会来宣布，依照我的深刻的信念，我们不会看到那使资产阶级革命蒙受耻辱的流血的农神节重来。无产阶级不象资产阶级那样残忍。（大厅里一片呼喊之声）

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互相残杀，依次消灭革命的保卫者，致使自己的伟大事业受到威胁。而每一次，当无产阶级在这世纪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和自己在太阳底下的位置的时候，他们的运动总是遭到最残酷的镇压。在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资产阶级使两万和三万个尸体盖满巴黎的街道。然而，你们只要回想一下就能记得巴黎在无产阶级当权的两个月里面，那些人质的头上连一根头发也没有落下。（大厅里发出大声的抗议）只是在战斗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大厅里有嘈杂的声音）主席：先生们，让演说的人讲下去。

拉法格：只是在战斗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当人民由于自己失败和反动将军们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而几乎被引到疯狂的时候，只是那个时候才处决了人质。（大厅里一片呼喊之声）但是在两个月中间，这是历史事实，统治巴黎的无产阶级没有触动人质头上的一根头发，然而在这时候公社的被俘的将军却被阴险地杀死。（嘈杂和喊叫之声再起）

主席：不要打断，先生们。德莫连先生将会回答。

拉法格：我想着重指出，这个社会变革的一般轮廓我们已经可以预见，这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它将没有过去革命的血腥的性

质,只有资产阶级的残忍成性才犯这种罪。

四

经济现象使生产者失去他们的劳动工具,它把这些工具集中起来和使之社会化,又把以前分散在各乡村营独立生活的工人集中在工业城市里,把他们结合在公共的工场里。

这里他们最后地摆脱了小所有者的本能,这种本能可能保留在他们对以前的个体财产的回忆里。工人们永远面对着复杂机器的巨大轮子,他们必须在它的旁边工作,他们于是本能地开始意识到这里只能是公有财产。机器生产从无产阶级的头脑里把一切个体财产的思想都赶跑,而使之具有公有财产的观念。

这个精神革命的完成并没有共产主义者参加。它是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管理之下组织起来的机器生产的结果。共产主义的观念早就以隐蔽的状态存在雇佣工人的头脑里面了。共产主义的鼓动家只不过唤醒这些观念和使它实现。

由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集中起来和把他们的劳动联合起来,社会主义的宣传就获得了巨大的力量。资产阶级不仅准备了思想,而且还提供了影响思想的手段。在工业城市里我们可以找到联合起来的、准备热烈地欢迎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人群众;我们并没有把这些思想从外面带给他们,我们做的只是从那戏弄和折磨工人的经济现象中引出这些思想。

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在生产要求的影响之下使无产阶级群众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鼓动,它还给我们提供手段去唤起这些群众,把他们从政治上组织起来和准备即将到来的革命行动。

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治统治之后就想把它独占起来。他们实行有限制的选举法,想排除没有财产的阶级参加国家管理,无论在法

国、在英国、在德国和在荷兰，到处都是一样。但是几乎在一切号称资本主义文明的国家里它很快地就不得不作让步并且或迟或早地同意普选权。

这么一来，资产阶级本身便被迫把这危险的武器交给雇佣劳动者之手。然而，这双而刃的武器一直到现在只是给尚未学会使用的工人阶级带来创伤。从1848年起在我们法国就已存在普选权，而议会的大多数总是由资本家或资本主义利益的保护者组成。工人选举资本家充当自己的代表；他们把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件事委托给凶恶的敌人。虽然有普选权，政府还是象在有限制的选举权时一样掌握在有产阶级的手里，有产阶级发布法令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厅里响起嘈杂和呼喊之声）你们反对吗？难道使每年食品的价值提高到十亿的关税率的规定不是为了增加地租这个唯一的目的吗？

然而社会党人逐渐把工人阶级的教育抓在自己手里，他们教它正确利用普选权，而工人也已经表明能够利用共产主义者的教导。在最近的市政选举中，我所属的工人党参加了七十七个城市的竞选，提出里昂纲领。在二十七个市镇中，我们获得了胜利，在那里而现在的多数，而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整个市参议会都是由我们的人组成。在其余的里面我们就形成显明的少数。只在选举第一轮中投给我们的票数便达到十万零两千张。这已是取得市镇管理权的第一步。

工人阶级（我们不仅用这个词来表示体力劳动者，而且也包括脑力劳动者，因为后者也是受雇佣的工作者）被召来不仅为了创造产品，而且还要管理生产。在现时代这是唯一有用的阶级。为了执行自己的社会职能它只是还缺乏领导民族的政治利益的能力。社会党人逐渐掌握在手的市参议会正在变为训练人们学会管理国家的学校。（大厅里喊声大作）

掌握了地方政权和全国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将按照资产阶级在前一世纪所作的范例行事。继对资本家实行政治上的剥夺之后便是经济上的剥夺。以上我所讲的生产的共产主义组织同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个人主义的占有之间的矛盾将得到解决——无产阶级将使资本主义的财产社会化。这么一来，便将建立不仅是生产资料的，而且是消费物品的社会化。

既然机器生产使生产力发展到这么高的程度，以致有可能生产出为满足人们正常需要的一切必需品，甚至还有富裕，因此将实现普遍的繁荣，并且同特权阶级的道德家和政治家一再重复和套用的基督的话相反，在世界上不再有贫困者。

五

你们可以看到，先生们，我不是在捏造。我不要求社会运动是靠感情或正义和平等的绝对观念来作指导。我只是研究在我们眼前发展着的现象，并给你们指出它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我指给你们看经济机体如何逐渐地获得共产主义的性质，同时占有形式又如何仍然是个人主义的；个体财产的性质如何起变化，集中如何发生，家庭如何被破坏和如何在丰裕中产生贫困，以前的劳动条件如何起变化，同时体力活动又如何同脑力活动分开而形成两种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的所有主如何由于它的阶级的优越地位不再能用它的个人的和社会的效劳来补偿，因而成为多余之物；雇佣劳动者如何集聚在工业城市里；如何从他们的头脑中驱出个人财产的最后本能；如何从他们身上产生出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使他们为接受社会主义的鼓动作好准备，利用选举权和夺取市镇和全国的政权，其结果将实现资本家阶级的个人主义的财产向全民族的公有财产的过渡。

难道这是捏造吗？更确切地说，难道这不是对待事物的清醒观点吗？当我们帮助工人群众准备担起革命的使命，他们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负有这样的使命，难道这是宣传凶杀和抢劫吗？

经济现象——这才是真正的祸首，改变着人们的一切习惯、破坏着社会的永久的柱石的严厉的革命者。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派的共产主义者，只是经济现象的表达者。象海鸟一样，它的出现是风暴即将来临的标志，我们向统治阶级预告可怕的暴风雨就要来了，它将消灭他们的一切特权，然而这暴风雨并不是我们引起的。

这个社会革命改革社会也要付出点痛苦的代价，但比起资本主义统治下生产过剩的周期危机所带来的痛苦却要少得多。当由此而得到改造的社会里将建立起秩序与财富的创造和平均分配中的和谐，那时，机器这个曾经掌握在有产阶级手里的最可怕的压迫的工具，将成为人类的解放者。那时将证实亚里士多德的强大的天才的预言的正确，奴隶劳动的结束就要到来。

* * *

在拉法格之后是德莫连讲话。可是他并不想反驳拉法格的演说，而只限于阐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理论。

但是既然他至少必须说到共产主义和宣传个人主义是未来的学说，于是他就急急忙忙地仿照沉思的和全知的赫伯特·斯宾塞的范例把共产主义同官僚主义的管理（fonctionnarisme）混为一谈。一经走上这条道路，他就到处发现共产主义者。深居宫廷的贵族是共产主义者；资产者害怕工商业的危险而宁愿担任安静的国家职务，因此也是共产主义者。但愿这些资产者小心谨慎，以免碰到贵族阶级的命运。

按照德莫连的意见，共产主义比什么都坏，它使人们冷漠无情，妨碍个性的发展和使人的能力衰退。不久以前人们都在说懒

惰的(l'indolent)东方，那里一切部落都是按共产主义的方式组织的。共产主义，这是游牧部落的社会组织；草不需要人的劳动就能自己生长；草就是共产主义的象征。

相反地，那些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有文化的民族都是个人主义的。征服过旧大陆的罗马人是这样，使新大陆变成殖民地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也是这样；新大陆起初曾属于罗曼语系的民族，但是他们未能保住新大陆，这是由于他们有共产主义的趋向和经常指望国家帮助的习惯。

因此，共产主义，如德莫连所说，这是社会构造的低级形式，只适合亚洲高原的野蛮部落。相反地，个人主义是先进的民族所固有的高级的社会形式。盎格鲁萨克逊种族达到了个人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如果罗曼语系诸民族不摆脱自己的冷漠无情的状态和不能不靠国家的帮助就开始行动起来，那末全世界都将属于盎格鲁萨克逊种族。

公民保尔·拉法格的回答

主席：拉法格先生请求允许说几句话来回答德莫连先生。没有反对的吧？（大厅里：没有，没有！）请拉法格先生讲话。

拉法格：先生们，我将说得很简短，因为德莫连把我的任务简化了。他攻击国家，而这个也恰恰是我们所攻击的。（笑声，鼓掌）我们想消灭它。我们认为国家只起资本主义支柱的作用。假如国家不给资本家提供警察、军队、法庭和狱吏来保护他们，那末人数这么少的一个阶级只要工人第一次暴动就会把它消灭。（鼓掌）回想一下历史你就会看到，国家是特权阶级的压迫的和压榨的力量，国家政权的夺取常常保证某一阶级的社会统治权。

在旧的法国国家是属于贵族，它的最高表现是国王，国家保卫贵族阶级的利益。自从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日起，它就成为

社会的统治阶级，现在则受着国家的保护。（鼓掌）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将没有特权的阶级。那里只有劳动者，享有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的人们。因此那里不需要国家，因为在这里没有需要保护的阶级，而每一个人应当都会保护自己，（大厅里发出赞叹声和笑声）因为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我可以补充一句，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损人利己的事。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仅特权阶级损害劳动阶级，而且这个阶级的每个成员也在互相损害。

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统治着经常的战争——工厂主反对工厂主，商人反对商人，一部分人的繁荣是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不幸上面。例如医生就需要有流行性的感冒和肺病才能挣钱吃饭。在与我们今天不同的那个社会里，个人的利益不是处于彼此冲突的状态，不需要保护，因为人们不是彼此敌对的。

德莫连先生刚刚说到共产主义社会并告诉我们说草是一切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请允许我提醒你们注意，在墨西哥存在过大型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象在亚洲高原上游牧的小型共产主义部落那样拥有畜群。在秘鲁存在过奇怪的共产主义国家，使一切从秘鲁的破坏者——征服者的有关记载上研究过秘鲁的人们都感到理所当然的惊异。在那里唯一的吃草的动物是美洲驼，并且这种动物传播的数目非常之少，因而受到加意保护。由此可知，草不是共产主义的必要的前提。这种财产形式在一切民族中都存在过，正如现在正经历着解体过程的父系家庭一样。亚洲高原的居民也好，不列颠诸岛的居民也好，同样都是从共产主义开始。英国的农学家马塞尔，他在上世纪末写过书，梅恩在自己的著作《东方和西方的农村公社》内又加以引用，提到某些同俄国的“米尔”完全相似的不列颠农民的组织。到达北美海岸的第一批移民是组织在农村公社之内的。我所讲的事实是根据梅恩的出色著作，在这个问题

上他算得一个权威。

存在着一种情况，不能默不作声地绕过去，对此我请你们特别加以注意，因为从哲学观点来看它也是很有趣味的。梅恩，曾担任过英国在印度的政府的法律顾问，据他对印度的农村公社的详细研究，认为那里没有象我们所讲的正义、权利和义务这样的观念^①。

为什么？因为在公社里没有对立的利益，换言之，一个人所受到的损害反映在全公社的利益上，而既然利益是共同的，不是互相矛盾的，象在我们的社会里一样，因此就既不需要政权，也不需要官吏来保护私人的利益。

显然你们都把共产主义认为是官吏的组织，而你们认为官吏只是国家的。但是在巨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如铁道、银行、矿山、百货公司里难道不也充满官吏吗？

无论在哪里，在商店里，在银行里或是在部里，工作摧残和压制人的个性，到处都一样，可以写满一张纸。但是为国家服务至少工资待遇比在工商企业里服务要好些。因此争取为国家服务的风气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很流行。在英国人们发疯似的追求爵位，争相以职务自夸，沾沾自喜地在名片上印着“财政和邮政部职员”，象其他人写“使馆随员”一样。

官吏不仅在国家机关的办公厅里有；哪里有大工业，那里便能找到。因此即使消灭了国家，你们也不能躲避这个使你们害怕的

^① 这是从梅恩书中摘出的有关部分的译文：

“就法律意义来说在印度的公社里既不存在权利，也不存在义务。遭难的人感到痛心的不是他所受到的损失，而是这个小小的社会秩序的破坏”。

这个意见证实了洛克在十七世纪就说过的天才的思想，这就是认为正义的观念只是由于实行个人财产的结果才在人类社会里出现。一旦恢复公有财产和只留下原始的报复法，它就会消失，这种报复法由于各种不同的民族和种族的人们所依以生活的和平与友谊的条件而大大缓和。——拉法格注

稻草人。只有我们共产主义者才能消灭它。当共产主义的工业企业由个人之手转为全社会的财产，那时人民将把它交给工会，一说到英国的工会组织你们就只会赞叹。你们之所以赞叹它们只因为我们是处在法国。但是假如你们追溯到二十年前，那末就会听到英国的这些工会遭受的残酷攻击远比现在的法国的工会为甚。在现时代它们才被承认而且甚至变成反动的因素，以致英国有这么多的政治家都对它赞美，为的是可以利用它来达到政治目的。格莱斯顿和自由党人在选举时期最善于玩弄旧工会的领袖。

这么一来，当大型的生产资料变成民族的财产时，便把它交给有组织的工人。这时不再需要那些为了特权者集团的利益而监督工人工作的官吏，那时将只有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他们每人都担负自己的任务而且知道他们的劳动果实将属于他们全体。

你们说共产主义制度的缺点是在于它麻痹人们的精力，打击独立自主精神，既然劳动果实不属于个人，因此每人都想把自己的工作转嫁到邻人身上去。但资本主义社会里情况恰恰是这样的。在现时代工人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劳动果实不属于他们，分给他们的只是采取工资形式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都落入了资本家的腰包。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他将知道，一切产品除去维持社会所必要的之外，其余都是他的财产。

在资本主义的工业里工人被束缚在自己的工厂里。哪里出生，他终生就停留在那里，假如某些人也能改一改环境，那是由于服兵役所引起。这里的原因是什么？是在于他们一旦离开工厂，饥饿和失业就在等着他们。象树木一样，他们的根子扎在他们生活的土地上。

在我们的理想社会里，为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消费所必需的劳动量可以预先规定好。（大厅里响起嘈杂的声音）

现在已在规定供养全国所需的粮食的数量。规定全法国人口

所需的鞋子将更是轻而易举的事。(大厅里发出呼喊声)这全部工作将在有劳动能力的全体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并给每一个人规定一定数量的、必要的劳动时间,以便使每个人都有可能自由地享受共同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财富。只有那时人才会成为社会的自由的成员;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迁移或停留在这一个或那一个地点和经常变换生产活动的样式。从前为了熟悉某一种手艺需要学几年;机器把这时间缩短为几个月。你们坐在这里的人全都从没有拿过针,靠机器可以在一个月内学会缝并且也会很快地学会织、纺等等。(大厅里有笑声)

将来存在的唯一职业是机械师。一个人可以轮流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并且这会给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发展带来极大的益处。(大厅里发出呼喊)

你们不赞成吗?但是恰恰在这里包括着你们所赞叹的美洲的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优点。遥远的西部的居民往往都会几种职业,而且经常学新的。由一种活动到另一种的这种过渡对于脑力的发展,对于个性的发展都是最好的办法。因此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在那里对个人财产关心不再压制人们了,每个人将只需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以便有可能享受全部社会财富,只有在那里人们才能自由地由北方旅行到南方,由织布工厂转到耕地或者转到任何其他职业,并且全面地不受阻碍地发展自己的个性。

德莫连在这里所说的精神教育,且不管怎么令人失望,对于工人阶级都是空话;在工厂里的苦役劳动十小时之后,一个人哪里还有精力去听教授的演讲,——疲倦压倒了他,他要睡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的工厂里担负着过度的劳动,他们的脑子已被大工业毁坏了。

你拿起中世纪的民歌或像俄国这种资本主义工业尚未确立的国家的歌谣来读一读,你就会看出一切都可以检验我的话的正确

性，这是多么惊奇的诗作。伊利亚特，人类的最美丽的史诗，不是别的，只是民歌的结集。

随后你再出发到北方省份去，你就会听到那里唱着的悲惨的歌声，你就会懂得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人同资本主义工业的不幸的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有多么大。

假如你真心想发展人的个性，那么最低限度按照逻辑应当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的财产，因为它压抑着人们。

选自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王子野译）1962年三联书店版第1—25页，并根据瓦尔莱编辑的《拉法格文选》1933年巴黎法文版第23—40页作了校订。

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 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1892年9月)

官方经济学家为了挣钱糊口，装出一副也能做点事情的样子，把攻击《资本论》看作是自己的职责，——我不说批评，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批评《资本论》。为了减轻自己的任务，为了使那些庸人、墨守成规者以及一向是任何新思想的敌人的人站到自己一边。他们断言马克思的理论与他在经济科学中的前辈的理论毫无联系，并把这一点看作是已经被证明了的事实。确实，就分析和概括的能力和深度来说，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同马克思相比，但是马克思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自己臆造出一门全新的科学；相反，他从研究所有国家和所有时代的经济科学开始，尽量引用那些为他铺平道路的著作家的意见。

既然官方经济学家为了适合反社会主义的辩论而根本不提古典作家，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就有义务提醒他们并指出，被这些先生们称之为马克思的胡言乱语和左道邪说的思想，在马克思从中得出结论并利用它们建立起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前，在经济科学中就已经为世人所公认了。

我在本文中主要引证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及萨伊的观点。斯密和李嘉图被认为是经济科学的泰斗，让·巴·萨伊也是一个

* 本文首次发表于1892年9月《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16卷第93期。——编者注

泰斗，但却是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的泰斗。博利约之流这些先生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一类人是有可能达到重复（当然是拙劣的重复）斯密和李嘉图发现的某些真理的高度的。

一 价值实体

拉维勒在他的著作《当代社会主义》（第26、27页）中说：“只要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价值的源泉的前提成立，那么他就会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向你们证明，资本是掠夺”无酬劳动即窃得的劳动的“产物”。我们来看看经济学家们对这个问题持什么态度，这个问题是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会给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问题的研究提供一把钥匙。

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中间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

重农主义者认为价值的最初源泉和唯一源泉是土地，而且他们把水也包括在土地这一概念中。他们只把农民、渔夫和矿工的职业称做生产职业。

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说，手工业者的劳动只创造表面上的产品，因为他在改变原料时加进原料的价值恰好等于生产过程期间他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因为他的需要一方面会消灭他所生产的东西，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的财富就丝毫没有增长。

相反，亚当·斯密，后来是李嘉图，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和尺度”，当然，劳动要同土地及其他自然力结合在一起，没有这些东西的协助就什么也创造不出来。

斯密说：“商品的价值等于该商品的所有者能够用这个商品购得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任何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①

^①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5卷第5章。——拉法格注

李嘉图说：“我把劳动看作一切价值的源泉，而把劳动的相对量看作尺度，几乎只是这个尺度决定着商品的相对价值。”^①

还在表述这个意见之前，李嘉图在回答反对意见时说：“有一些东西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的稀少性……如珍贵的图画、雕像、稀有的书籍和古钱，用只有在特定的土壤中才能培育的葡萄酿成的数量极为有限的精美葡萄酒”，“不过，这些商品在每天在市场上交换的商品中只占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因为人们想得到的物品大部分是工业的产品，所以它们的数量不只是一个国家里可以增长，而且可以在若干个国家里增长，这种增长的规模几乎可以是无限的，只要让为此所必需的工业部门来生产这些产品。”^②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说：“众所周知，我们的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能力是我们的唯一天赋的财富，使用这种能力，也就是从事某种劳动，是我们最初的唯一财产，只有从这种使用中才能产生出我们称之为财货的一切东西……所以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财货只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如果说它们有价值或者甚至有两种不同的价值，那么它们只能从创造它们的劳动的价值中得到这些价值。”^③

本·富兰克林说：“因为一般说来商业不过是劳动的交换，所以劳动能最精确地决定一切物品的价值。”^④

现在我们来谈谈著名的让·巴·萨伊，这是一个庸俗经济学过去和现在都拿来与斯密和李嘉图并列的伟大人物。不错，他在价值问题上不是个别的观点，而是一系列观点有些自相矛盾，但是这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对他这一类经济学家来说，逻辑是

①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1章，参见第2章。——拉法格注

② 同上，第1章。——拉法格注

③ 《思想的要素》1826年巴黎版第35—36页。——拉法格注

④ 《富兰克林全集》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第267页。——拉法格注

可有可无的。

萨伊同斯密一样用价值的购买能力来确定价值：“价值是用要卖出的物换得的任何另一种物品的数量。”^①

他以为用物来代替劳动就能掩盖他的剽窃行为了。

萨伊在他的《论政治经济学》的末尾简要地总结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他在那里下了另一个定义：

“价值的两个基础是：一、**效用**，这是对它的需求的基础^②，二、**它的生产费用**，生产费用会限制这种需求的规模，因为对生产费用太高的东西的需求会停止不前。”

但他在另一个地方说：“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并不仅仅是生产费用……因为交换价值不会象生产费用那样自己提高，而是必须有需求的提高”^③。因此，决定商品价值的已经不是商品的效用和生产费用，而是对商品的需求了。

萨伊还找到了价值的另一个源泉。他说，斯密在把劳动当作价值的尺度时犯了双重的错误，因为“并不是世界上的一切财货都是靠人的劳动获得的。自然也参与某些生产，而自然的工作也会给人的劳动以追加价值。这种情况在农业中非常明显。农业的产品除了支付人的工资以外还支付资本（这也可以是**积累的劳动**）的利润，即土地收入^④。这样，萨伊这个重农学派理论的反对者也就承认了土地是价值的源泉。

此外，在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中还可以找到另一种意见，按照这种意见，被他称为“人的技艺”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萨伊的下述意见又同他对斯密的反驳相矛盾：“效用中无需人

① 《论政治经济学》第2卷第4章。——拉法格注

② 萨伊的原文是：“物品的效用是对物品的需求的基础。”——编者注

③ 《李嘉图全集》1847年版。——萨伊注

④ 布朗基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萨伊注

及其工具的协助而由自然赋予价值的部分，不是产品的部分，不是产品的价值，这是未曾耗费生产费用的自然财富。”^①

萨伊把赋予价值以效用的自然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为人们所占有的东西，如田野或水流，另一类是不能为人们所占有的东西，如“海洋、河流、风、物体相互之间的物理作用和化学作用”^②。

“因为机器迫使自然力和自然因素的各种属性为人的利益而工作，所以从机器得到的好处是明显的。它们不断地增加产品或者降低生产费用。”^③“推而广之，我们可以把土地想象为一个巨大的机器，我们用这个机器制造面包，我们开动这个机器，同时又对它进行加工。”^④

既然机器以及土地是工厂主独占的，所以由此得到的节约也只属于它的所有者。“实际上，如果工厂主能成功地借助只有他知道的方法，耗费十五法郎生产出以前要耗费二十法郎的产品，那么，只要他的方法别人不知道，只有他一个人利用着自然的无偿劳动，他就可以赚到五法郎；而当这种方法已经普遍地为他人所知，竞争促使生产者把自己的产品的价格从二十法郎降到十五法郎，这时消费者就会获得这五法郎。”^⑤

因此，商品的生产费用只由人的劳动和机器、工具的磨损构成，“我们利用机器和工具作为我们双手的补充，以便增大双手的力量，获得自然因素的协助”^⑥。因此，如果作为生产小麦的机器的土地没有被人占领，而仍然象其他自然因素那样是公共财产，

① 《论政治经济学》，对“产品”的“简述”。——拉法格注

② 《论政治经济学》第1卷第4章。——拉法格注

③ 同上，第7章。——拉法格注

④ 同上，第7章。——拉法格注

⑤ 同上，第4章。——拉法格注

⑥ 同上，第7章。——拉法格注

它给产品价值追加的就不是“土地收入”，而只是自己的单纯的磨损，即肥料的价格和恢复土地肥力所必需的机械劳动、牲畜劳动和人力劳动的价格。

当让·巴·萨伊象一个经济学家那样思考或者说感到了承认亚·斯密和李嘉图（他们是科学家，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庸俗的辩护士）所说的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会产生危险时，他竭力避开这种可怕的承认；他千方百计避免最终承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正是从这一甚至对于萨伊这一类经济学家来说也如同白昼一样清楚的事实出发，马克思以其“铁的逻辑”得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即资本就是无酬劳动，窃得的劳动。

二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

虽然正是马克思论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构成剩余价值或资本主义利润的是剩余劳动，也就是工人的体力或脑力劳动中的无酬劳动，但是，在他之前的经济学家已经（当然不是十分明确）指出了这个事实。

李嘉图说：“农场主和工厂主的全部产品价值只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构成资本的利润，另一个部分是付给工人的工资……如果工厂主总是按同一货币额卖出自己的商品，例如一千镑，那么他的利润就取决于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的价格。工资为八百镑时的利润小于工资为六百镑时的利润。因此，利润会随着工资的提高而减少。”^①

斯密说：“在土地占有和资本积累之前的这种原始状态中，全部劳动产品属于生产者。既没有所有者也没有主人来同他分享

^①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6章“利润”。——拉法格注

产品。

如果这种状态继续下去，那么随着劳动的生产力获得那些由分工所造成的改善，工资或者说劳动的报酬也就会提高。”^①

“工人追加到材料上的价值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补偿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作为企业主的利润，等于预付工资和购进原料所需要的金额。如果企业主在出售工人的制品以后得到的金额不大于补偿投入资本所必需的金额，他就不会有任何兴趣雇用工人。”^②

“主人从工人的劳动产品中分得的部分，或者说，主人从这种劳动加到工人所加工的原料上的价值中分得的部分，就是他的利润。”^③

斯密和杜尔哥以及重农学派一样认为，自由劳动使资本家有可能比在奴隶劳动下获得更大的价值部分。第一，当奴隶由于年龄和疾病而不能再劳动时，所有者就会由此受到损失。第二，“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经验都同样表明，自由工人所从事的劳动最终要比奴隶所进行的劳动便宜。这种情况甚至可以在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看到，在那里粗活的工资是很高的。”^④

而既然“健康奴隶的劳动比维持他的生活的花费贵一倍”^⑤，而他的主人因而就把奴隶所生产的价值的一半占为己有，那么，使用自由工人劳动的资本家所得的份额就应该大于工人所生产的价值的一半。

因此，李嘉图和斯密都丝毫不怀疑，资本的利润是无酬劳

①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8章。——拉法格注

② 同上，第6章。——拉法格注

③ 同上，第8章。——拉法格注

④ 同上。——拉法格注

⑤ 同上。——拉法格注

动，是马克思所说的盗窃来的劳动。在1848年，为了推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去反对共产党人，反动派指责共产党人，说他们力图瓜分财产，想分掉一切财产，而在实际上他们是要结束劳动产品在生产者和游手好闲的、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资本家之间的不公平的分配。

我们已经知道了科学家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看法，现在我们来考察庸俗经济学的观点。让·巴·萨伊表述这些观点的方式，是当代的勒卢阿-博利约和布洛克之流望尘莫及的。

这些经济学家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如何能使资本家剥夺剩余价值的行为合法化。他们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下述的发现：资本家是一个有善意的人，他以自己的节制促进生产的发展，而且正因为他的善意地节制自己不参与任何劳动，他有权分得劳动产品的最大部分。萨伊自己知道，这种论断一文不值，因此他用自己的想象力把资本家变成了生产者。他为什么要把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称为生产者呢？“因为，即使他们本人不参加生产，那他们也以自己的工具参加了生产。如果他们让自己的工具不起作用，他们也就不再是生产者了。”这些绝妙的话是他在上述那段解释“生产者”的简短结论中说的。

如果一个思想家作出了类似的发现，他就有权休息了，因为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因此令人惊奇的是，萨伊却继续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胡说八道，最后竟在资本主义利润的起源问题上同李嘉图和斯密取得了一致意见。他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而跟随在他们的后面。

萨伊把“出租自己的生产能力和出卖自己的劳动、因而为了工资而拒绝工业利润的人”称为工人^①。因此，只是因为资本家向工

^① 《论政治经济学》，对“工人”一词的解释。——拉法格注

人购买了他的劳动，资本家才把这种劳动的利润占为己有，也就是把工人超过自身的价值所生产的东西占为己有。这一点萨伊将在下面告诉我们。

他说：“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断言，劳动不创造任何价值，因为它在创造价值时消费了与这一价值相等的价值，因而它不会提供任何余额，任何新产品（纯产品），只有土地会在无偿地带来价值时提供新的产品。但是事实表明，生产出来的价值就其起源来说应归功于人类劳动、资本和自然力的作用，除了这三者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源泉创造价值，即新的财富。”^①

现在我们按照萨伊的划分来看看这三种源泉中的每一种源泉在新产品或剩余价值的创造中所占的份额。

1、**自然力**。“可以指出，自然力，如蒸汽机中的大气压力，不是私有财产，不是价值的生产者。因为它们的协助是无偿的，所以，产品的交换价值即财富的唯一尺度不会由此而得到任何增长。但是我们在以后将会看到，消费者没有支付的任何已生产出来的效用，等于给予他的赠品，他的收入的增长。”^②

2、**资本**。任何“耗费了货币价值”的机器，都会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好处，但只是在它还是一个秘密的时候是这样；“但还没有能长久保持秘密的例子。一切在最终都会让别人知道，特别是当私人的利益要求揭示这个秘密时是这样。这时，竞争会降低产品的价值，而降低的部分就是在生产费用上节约的全部价值，从这时起，好处就归消费者享用了。把谷物磨成粉给现代的磨坊主带来的东西大概不会比过去时代多，但是消费者所花的钱却要少得多”^③。因此，机器只是再生产出耗费在它上面的资本，但是不创

① 《论政治经济学》第1卷第4章。——拉法格注

② 同上。——拉法格注

③ 同上，第7章。——拉法格注

造剩余价值。

3、因此，生产工资和资本家利润的就只剩下工业劳动了，萨伊把这种劳动称为“用于生产的人的体力和智力的作用”。

没有别的选择：或者必须否定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或者必须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直至其最终的结论。

译自《拉法格选集》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
俄文版第2卷第3—11页。

（冯文光译）

法国工人党土地纲领

(1894年)

(由1892年9月24—27日在马赛举行的工人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1894年9月14—16日在南特举行的工人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增补)

· 鉴于党的总纲载明:“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

鉴于这些生产资料在工业领域中已达到了高度的资本主义的集中,以致只有以集体占有或社会占有的方式才能归还生产者,但在农业领域中,至少是在法国境内,目前的情况却不一样,这里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生产者自己占有的个人财产;

鉴于这种以农民所有制为特征的状况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可是社会主义却不应加速它的灭亡,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在于把所有权和劳动分隔开来,而在于把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因为把这两者分隔开来,只会使陷入无产者境地的劳动者遭受奴役和贫困;

鉴于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职责是没收游手好闲的占有者手中的大地产,就象没收铁路、矿山、工厂等一样,并以集体占有或社会占有的方式交还农业无产者掌握,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同样迫切的职责就在于保护自食其力的农民的小块土地,使之免受国库、高利贷者和新的大土地所有者的侵犯;

鉴于对那些租种他人土地、即使剥削短工但也是因为自己受剥削而被迫这样做的佃农和分成制佃农等生产者也应加以保护；

工人党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不把社会制度的改造寄托于贫困的蔓延和加剧，而认为劳动和社会的解放只有靠城乡劳动者组织起来和共同努力，夺取行政和立法的权力，才能实现，所以工人党通过了下列土地纲领，以便把一切农业生产者和以各种不同方式经营全国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联合起来，一起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共同敌人：

第一条 由农业工人工会和市参议会规定短工和长工(牧工、男女佣工等)的最低工资额。

第二条 设立农业劳资纠纷仲裁委员会。

第三条 禁止市镇出让公共土地，国家将目前尚未开垦的国有土地、海滩地和其他土地租给市镇；将市镇预算的结余用于扩大公共财产。

第四条 市镇将国家转让的、市镇拥有的或购置的土地交给组成协作社的或仅仅享有土地用益权的无地农户，但禁止雇工，并必须缴纳税金，用于公共福利事业。

第五条 向大地产征收特别所得税，用来为残废者和老年人设立农业退休基金。

第六条 以区为单位实行免费医疗并按成本供给药品。

第七条 预备役军人在应召服役期间，国家、省和市镇应向其家属发放补贴。

第八条 市镇在国家资助下购置或租借农业机器，免费交给小农使用；建立农业劳动者协作社以购置肥料、种子、葡萄藤等，以及销售产品。

第九条 价值五千法郎以下的地产转让时，免征财产转移税。

第十条 取消一切间接税，直接税改为从三千法郎起征的单

一累进所得税；作为过渡措施，免除自耕农的土地税，减轻那些把土地典押出去的农户的土地税。

第十一条 降低法定的和约定的利率。

第十二条 降低肥料、农业机器和农产品的运费。

第十三条 按照爱尔兰实行的办法，建立仲裁委员会，以削减地租。佃农和分成制佃农退佃时补偿他们提高土地价值的费用。

第十四条 废除《民法》第二一〇二条关于土地所有者对分成制佃农的收获物拥有特权的规定，禁止土地所有者将青苗作抵押，为农民规定不受侵犯的财产的数额，其中包括从事耕作所必需的农具、部分收获物、肥料和牲畜。

第十五条 修订地籍册，在普遍实行这项措施之前，暂时由各市镇局部修订。

第十六条 立即着手研究改良土壤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公共工程计划。

第十七条 渔猎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须遵守保护野物和鱼类资源以及庄稼的必要措施；禁止设置禁猎区和猎场看守人。

第十八条 免费教授农艺学，建立农业试验田。

告农业劳动者书

工人们！我们实行普选制已近五十年了，实行共和制也已近二十五年了；然而，本来应为公共福利服务的共和制却被大土地所有者、大工业家、大商人和大金融家所侵占。这是因为你们没有选举农民进入议会代表你们的利益，而是选举大土地所有者去做这样的事情。

结果怎样呢？共和国不是由工人和农民来管理并为全体劳动者谋福利，而是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操纵，这些先生们制定法

律完全是为了谋取他们的私利。

他们实行的各种捐税全都落到劳动者身上，劳动者不断地纳税，但从来也得不到什么。

当社会主义政党的议员要求救济劳动者时，政府回答说，它没有钱，然而土地所有者资本家的议员却总是找得到好几亿法郎来资助富有的铁路公司，来进行对东京和马达加斯加的远征。

土地所有者资本家议员全都是铁路公司、矿场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董事和股东。这些公司的代理人在农村到处奔走，用虚伪的诺言骗取你们的储蓄；而这些公司往往象巴拿马运河公司那样以倒闭告终，使那些天真地把自己的储蓄交给它们的穷人遭到破产。

巴拿马运河公司是一个最大的骗局，它曾受到资本主义报刊的大肆赞扬，教区牧师和副司铎曾推销股票，每推销一张股票可以得到二十法郎。

地主资本家议员从他们所支持的盗窃犯和投机分子那里得到许多好处，因此，当激进社会党议员拉斯拜尔提议禁止众议员和参议员加入金融公司时，他的提案遭到绝大多数的否决。工人党是法国唯一禁止自己的议员参加任何金融公司的政党。

议员本来应当保护你们不受购买你们的农产品的厂主和商人的侵犯，可是他们却让这些厂主和商人任意勾结在一起，压低你们的谷物、葡萄、酒类、甜菜以及牲畜的价格。

你们选举的议员在出卖你们的利益，与此同时，抵押贷款和债务把你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大土地所有者可以采用机器并拥有资本来改善对土地的耕作，他们的竞争使你们遭到破产；因此，小农的数量日益减少，他们的土地转到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手里。迄今为止，二万九千个大土地所有者在法国已把全国一半可耕地，即一千二百万公顷土地攫为己有。而其余的一半可耕地则属于七百万小农所有。正是这二万九千个大土地所有者对目前剩下的七百万

小农发号施令。

这些小农中的许多人每天在失去自己的财产；他们常常不得不替大土地所有者耕种他们自己世代相传的那块土地。

农业劳动者们，你们不应该再受人愚弄，你们应该选举维护你们的利益的人当议员。

农业劳动者们，你们应当学习讨论工人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纲领**。如果你们认为这个纲领没有包括你们需要的全部改革，可以提出补充，并且责成你们的代表或候选人把这些要求提出来。你们只有自己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才能迫使政府为你们做一些事情，并把资本家的共和国变为劳动者的共和国。

对土地纲领的说明

第一条 由农业工人工会和市参议会规定短工和长工（牧工、男女佣工等）的最低工资额。

连最小的一块土地都不占有的农业工人懂得，生活是多么困苦，必须干多少活才能得到微不足道的工资！假如在一年里都有工作，这还不怎么要紧。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内，找不到任何农业工作；不得不失业，无活可干，向面包房赊账，或者离乡背井，到城里去寻找工作，然而，即使在城里也并不总是能够找到工作。

但是，工人必须在一年的劳动季节里挣得全年养活自己和一家的工资。这就是工人党所要求的给工人规定的**最低工资额**。

这个**最低工资额**可以由市参议会以及凡是可能建立农业工人工会的地方由农业工人工会来规定。

这是完全公正的。当大土地所有者看到他们无法高价出租自己的土地时，他们就对酒类、谷物和畜类实行保护关税；这些关税

只对他们有利，而对佃农、分成制佃农以及长工和短工没有任何好处。伐木工和农业工人的日工资并没有增加，虽然由于实行进口税，木材和谷物的价格都上涨了。

工人党要求，对大土地所有者的保护也推行于短工、牧工、男女佣工以及其他农业无产者的工资，这些人的总数达三百五十万。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农民们必须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把自己的人选进众议院并建立劳动共和国。

第二条 建立农业劳资纠纷仲裁委员会。

这个仲裁法庭由同等数量的老板和工人组成。老板和工人各自选举自己的代表。

当劳资之间就工资问题以及一般劳动条件问题发生纠纷时，双方诉诸仲裁法庭，由后者进行调解。每一方都申述自己的理由。工人看到裁判者是自己的劳动伙伴，就敢于说话；他相信，如果受到委屈，在这里会得到保护并作出公正的裁决。用不着花钱去请律师，也不用诉讼费。

对于城市工人有利的事情，同样也对农业工人有利；因此工人党要求，在每一个市镇都设立仲裁法庭，这个法庭一方面由土地所有者、佃农和分成制佃农，另一方面由农业工人选举产生。这个法庭每星期日开庭，如果有需要，可以增加开庭的次数。

老板和工人可以将自己的争端提交仲裁法庭作出裁决。由于仲裁法庭是由十分熟悉农业的人员组成的，因此它可以解决一切纠纷，而不必花费过多的时间和金钱。

第三条 禁止市镇出让公共土地，国家将目前尚未开垦的国有土地、海滩地和其他土地租给市镇；将市镇预算的结余用于扩大公共财产。

可供经营的公共土地应当成为穷苦人的财产。在有些地方，例如在比利牛斯山区，这种公共土地很多，市镇的全体成员，甚至

只拥有畜栏的最贫穷的人，都可以养羊、牛和猪，并且在公共牧场上放牧。在有些市镇，牧人由全镇付给工钱，负责将全镇居民的牲畜赶到山上放牧。其他的市镇拥有森林，全体居民可以利用它来取暖，甚至建筑房屋。

从前，所有市镇都拥有大量公共土地，这些公共土地使穷人得以维持生计；在公共土地上饲养的母牛、猪和羊使农民家庭得到纺织用的毛、奶、油、干酪和肉。

但是很久以来就力图消灭公共土地，许多市镇已经完全没有公共土地。

工人党认识到公共土地对于小农和贫农的全部好处，因此希望，在还存在公共土地的地方，国家要阻止它遭到消灭，在已经不存在公共土地的地方，要划出公共土地。为此工人党要求，将市镇预算的结余用于扩大公共财产。

此外，工人党要求国家将自己的可供经营的土地和目前尚未开垦的国有土地（例如海滩地）交给市镇共同使用，而不是象现在所做的那样把这些土地以过于低廉的价格转让给资本家。

第四条 市镇将国家转让的、市镇拥有的或购置的土地交给组成协作社的或仅仅享有土地用益权的无地农户，但禁止雇工，并必须缴纳税金，用于公共福利事业。

工人党要求，市镇所占有的或者国家转让给市镇的可供耕种的土地，由协作社在市镇的监督下进行耕种，这些协作社由市镇的贫苦成员组成，这些成员根据每人投入的劳动量在彼此之间分配收获物，但是要扣除一部分，用于公共福利事业。

工人党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纳尔榜实现，根据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市长费鲁耳的提案，纳尔榜的社会主义市镇委员会决定把一些公共土地转让给无地农户，在这些土地上种植葡萄。

在其他市镇，联合起来的农户可以在这些土地上按照气候和

土壤的性质生产谷物、蔬菜或其他产品。

用不着作进一步的解释，农业工人就会懂得，如果公共土地很多，如果按照工人党所建议的那样去利用它，这些公共土地对他们来说就会有怎样的意义。

第五条 向大地产征收特别所得税，用来为残废者和老年人设立农业退休基金。

当农民和农业工人在饱尝了饥寒交加的繁重劳动生活之后进入老年时，他们落到最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为别人劳动了一辈子，沦为乞丐，不得不靠求人施舍为生。

在这一方面，他们比煤矿工人和政府职员或铁路员工更为不幸。当煤矿工人和政府职员或铁路员工由于受伤或年老而无法谋生的时候，还有退休金而不致饿死。

谁也从来没有对农民的悲惨命运表示过同情，谁也不关心使农民老年的生活得到保障，而免遭贫困之苦。工人党一贯捍卫贫民和被压迫者，它要求国家设立农业退休基金，每天至少发给残废者和老年人两法郎的津贴。

不错，在 1893 年选举之前，政府曾答应为所有工人设立退休基金，但是这只是一种手腕，其目的是为官方的候选人谋取选票。

政府建议城乡工人自己为这一基金提供相当部分的金钱。当农民们和短工们很难维持生计，当他们连一个铜板都无法储存起来的时候，他们怎能找到必要的金钱呢？此外，这个政府基金只是在二、三十年后才开始分配退休金；而穷人们到那时早已饿死。

工人党关于退休基金的方案不是这样。它不主张穷人们用自己的铜板来充实这个基金，而是要求国家立即向大土地所有者征收特别税，来设立这个基金。这样一来就可以立即开始救济残废者和老年人。这种捐税是最为合理的，因为农业工人在年富力强时为大土地所有者干活而耗尽自己的体力，所以当他们年老时，由

那些靠剥削他们才发了财的人来救济他们，这是完全合理的。

第六条 以区为单位实行免费医疗并按成本供给药品。

只要读完这一条，就可以懂得它的意义。

工人党的要求不止于此。拉法格同志在1893年向众议院提出一个法案，要求给予孕妇在产前和产后一个月的补贴。

社会主义者认为，妇女生育孩子是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因此必须给予补贴。大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议员们否决了社会主义者议员提出的法案，借口是他们没有钱来给法国的妇女和孩子，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同一年筹到一亿零六百万法郎来交给富有的铁路股票持有者。

第七条 预备役军人在应召服役期间，国家、省和市镇应向其家属发放补贴。

国家每年召集工人服役十三天至二十八天，而不关心他们的妻子儿女在这一期间是否能糊口，也不考虑当他们从军队复员时往往失去自己原先的工作。

既然大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经常强调爱国主义，他们就至少应该想一想祖国的保卫者，并且补偿他们在服役期间遭受的损失；但是他们对此漠不关心。

第八条 市镇在国家资助下购置或租借农业机器，免费交给小农使用；建立农业劳动者协作社以购置肥料、种子、葡萄藤等，以及销售产品。

小农没有多少钱，无法购置农业机器，而且他们的土地也不太多，即使他们有钱，购置机器也没有意思。^①当他们需要机器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花费昂贵的租金去租借机器，或者通过手工劳动来

^① 小农（一公顷至五公顷土地）的数目达到七百三十万，但他们总共只拥有一千一百万公顷土地，而二万九千个大土地所有者则拥有一千二百万公顷土地。——拉法格注

完成大土地所有者花费很少的费用靠机器的帮助所完成的工作。

完全依靠自己的个人力量的小农无法做到的事情，市镇可以做到。工人党要求每个市镇在国家资助下根据自己的经济需要购置农业机器，并把它们交给小农支配。

农民经常遭到向他们出售肥料、种子、葡萄藤、排水管等的商人的盘剥。工人党建议他们效法大土地所有者的榜样组成协会，使他们能够以批发方式购买物品，而且质量比较好，价格比较便宜。

这些小农协会同样可以负责在比目前较好的条件下出售收获物和牲畜。

在目前，工人党要求国家和市镇设置专门的官员来监督商业事务，保护小农不受盘剥，例如，保护甜菜生产者免遭炼糖厂老板的盘剥。

农业市镇也可以成为购买种子、肥料等或者出售产品的中间人，在后一种情况下，农业市镇同城市的市政机关直接进行交往，正如工人党的议员保尔·拉法格公民所建议的那样。

第九条 价值五千法郎以下的地产转让时，免征财产转移税。

小农缴纳大部分赋税，但由此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例如，他们为修路所缴的税比大土地所有者缴的税多，然而损坏道路的不是他们，而是拥有载重车辆的大土地所有者。

赋税对于穷人是残酷无情的：在平等的借口下，穷人拥有的资金越少，他们负担的赋税就越重。购买或继承价值二百法郎的小地产的农民必须按比例缴纳同购买或继承几十万法郎财产的富翁一样多的税。因为在出售或继承财产时，富人和穷人所缴的税是同样的。

对证明转让财产的文据课以百分之四的税，此外还有百分之一点五的注册税，这就是说，每一百法郎缴税五点五法郎。但是每一百法郎缴税五点五法郎对于拥有亿万法郎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

的数目，而对于总共只有几千法郎并且往往是赊购的人来说，这五点五法郎就是相当大的开支。这是多么出色的平等——迫使穷人同富人缴纳一样多的税！

工人党致力于实现真正的平等，要求废除沉重地压在小农身上的捐税，首先废除在活着的人之间转让和继承五千法郎以下的财产时征收的捐税。

在德国，不超过一百八十七法郎的遗产不课税；在法国，继承的财产哪怕是只值五十或二十五法郎的猪栏，都必须向国家缴税。^①

工人党为小农提出的要求，同社会主义者已经成功地在许多城市为小房客所做到的一样，这些小房客免除了动产税和人身税。

① 为了使小农清楚地看到他们从工人党倡议的这一改革中所能得到的好处，我们将在死后以及在活着的人之间转让不动产时必须缴纳的税额列举如下：

每 100 法郎	
转让税.....	4.0 法郎
注册税.....	1.5 法郎
总计 5.5 法郎	
在活着的人之间无偿转让税	
1, 直系亲属或根据婚约.....	2.75 法郎
无婚约.....	4.00 法郎
2, 夫妇之间, 根据婚约.....	3.00 法郎
无婚约.....	4.00 法郎
3, 兄弟姊妹、叔伯阿姨舅父母、侄儿外甥、侄女外甥女之间,	
根据婚约.....	4.50 法郎
无婚约.....	6.50 法郎
死后转让税	
1, 直系亲属, 包括溯叙亲属和卑亲属.....	1.00 法郎
2, 夫妇之间(赠予证书或遗嘱)	
.....	3.00 法郎
3, 旁系亲属、兄弟姊妹、叔伯阿姨父母、侄儿外甥、侄女外甥女之间.....	6.50 法郎

——拉法格注

第十条 取消一切间接税，直接税改为从三千法郎起征的单一累进所得税；作为过渡措施，免除自耕农的土地税，减轻那些把土地典押出去的农户的土地税。

对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是掠夺工人的手段，而又不致引起工人的不满，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为保护大地产而纳税。实际上，当农民购买一磅糖或咖啡时，他并不知道或者忘记他所付的一半以上的钱用于纳税；即使当他从钱包里拿出这十二或四十个苏时表示不满，他也没有想到为此要咒骂大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议员们，正是这些人通过决议对糖、咖啡和其他消费品课税。

工人党力图使工人清楚地了解他所支付的全部捐税，要求把所有间接税改为直接税，而且仅仅由收入在三千法郎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缴纳。到目前为止全部捐税都压在工人身上，由于间接税制度，他们没有觉察到这一点；现在该是富人们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多余的钱并且代替穷人缴税的时候了。这样做是完全公平的，因为正是穷人们的劳动使大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得以过优裕的生活。

饶勒斯公民以社会主义政党的名义在众议院要求免除自食其力的小农的土地税，因为他们只有作了很大的努力才能用从自己的小块土地上收获的东西糊口。

在流行葡萄根瘤蚜病的地区，土地税是小农破产的原因。他们连一串葡萄都摘不到，然而必须缴纳土地税。当他们没有钱的时候，不得不出售土地，以便向国库缴税。但是没有有一个资本家议员起来要求遭受葡萄根瘤蚜病的地块延期缴纳土地税，因为这样一来会使大土地所有者和金融家受到损失，后者用贱价收购遭到破产的葡萄种植者的土地。

第十一条 降低法定的和约定的利率。

大土地所有者不断地要求只对他们有利的农业信贷，但从来

不打算要求降低借款的法定利率。只有社会主义议员鲁瓦奈公民在1893年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说，既然政府、外国和金融公司可以在法国按百分之三的利率任意借贷数百万法郎，那么，现在该是降低法定的利率的时候了。目前法定的利率对于商业贷款是百分之六，对于私人贷款是百分之五。但是大土地所有者及其同伙高利贷者先生们不喜欢降低法定的利率；他们迫使小农为借款支付百分之六的利息，而自己却按百分之三和三点五的利息借钱。

资金太多了，以致资本家不知道该把它们投放到何处去；目前他们把资金投放到德兰士瓦，投放到南非；他们把一百一十亿法郎投到俄国。多年来，俄国政府只是借助于向国外借款才能使自己的预算保持平衡，一旦俄国政府得不到贷款，它将不得不宣布破产，那时在整个欧洲将爆发金融危机。小土地所有者和小资本家由于受到金融掠夺者的爱国主义号召的欺骗，把自己的储蓄用来购买俄国股票。他们将会明白，当社会主义者勇敢地宣布自己是沙皇的敌人时，是多么有道理，多么有远见，这个沙皇独裁政府压迫俄国人民，并且盗窃法国人民的财产。

第十二条 降低肥料、农业机器和农产品的运费。

大土地所有者以保护农业为借口，只致力于征收谷物、酒类和其他食品的进口税；这些税提高了这些物品的价格。这对于不得不购买这些物品的小土地所有者和佃农都是不利的。因为虽然佃农可以把自己的谷物卖得贵一些，但大土地所有者将提高地租，只有他们才从这些关税获得好处。但是想把自己的粮食卖个好价钱的大土地所有者从来不设法降低铁路的运费，以便使小农享有大发货人所享有的那些好处。如果那样的话对于农民将会极其有利，因为这会大大降低肥料以及他们的产品的运费；他们就可以同大发货人竞争，以更加有利的价格销售和购进产品，从而得到更多的好处。

但是担任铁路股东的大土地所有者不希望减少自己的利润，也不希望损害大发货人的贸易。这些先生们只不过是剥削农民并掠夺他们的储蓄的金融投机家——巴拿马分子和商人的奴仆。

第十三条 按照爱尔兰实行的办法，建立仲裁委员会，以削减地租。佃农和分成制佃农退佃时补偿他们提高土地价值的费用。

在君主制的英国，仅仅在几年以前，不得不设立仲裁委员会，爱尔兰的佃农被邀去说明自己的要求。当他们能够证明他们经常遭到歉收并且不得不缴纳过高的地租时，委员会就修订他们的租约，有时削减一半地租。

工人党要求共和国保护法国的佃农，使他们免遭破产，这种破产使不劳而食的大土地所有者发财致富。为此目的，工人党认为必须在所有各省建立由农民和调解法官组成的仲裁委员会。

由于下述原因建立这样的委员会是更加必要的：佃农为了不致失去工作或者由于激烈的竞争，常常不得不为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

此外，分成制佃农和佃农为了耕种租来的土地，不得不花钱购买肥料、购置排水设备、建筑房屋、植树造林等等。当租约到期的时候，所有这些花费财力和劳动的改良设施都转归土地所有者所有，而地主对此一个钱也没有花，却由于这些条件而提高地租，从而更加发财。

工人党要求在所有各省设立特别委员会，负责计算在租种土地的时间内花费的补充费用，迫使土地所有者在佃农和分成制佃农退佃时作出补偿。

第十四条 废除《民法》第二一〇二条关于土地所有者对分成制佃农的收获物拥有特权的规定，禁止土地所有者将青苗作抵押，为农民规定不受侵犯的财产的数额，其中包括从事耕作所必需的农具、部分收获物、肥料和牲畜。

工人党所要求废除的《民法》第二一〇二条给予土地所有者以国王在旧制度下所享有的那种权利；土地所有者对佃农或承佃人的全部财产，对全年的收获物，对他的全部家具和农场的全部设备，对他的全部农具拥有特权。

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不拥有土地所有者这样的绝对权利；普通的债权人不能夺取自己的债务人的财产，除非根据法庭的判决。

土地所有者则不经任何法庭的判决就可以夺取家中和农场的全部家具和设备，甚至当这些家具和设备已经从那里搬走时也是这样。土地所有者在四十天的期限内对农场的设备和在十五天的期限内对家中的家具拥有这种权利。

土地所有者的这种权利是非常专横的，他甚至可以扣押和出售不属于他的佃农、而是由佃农租借或赊购的动产和工具。

只要不废除这一条，佃农就很难利用贷款。他无法向债权人提供任何保证，因为土地所有者可以先于其他任何债权人将收获物、家具和工具据为己有以清偿债务。

将青苗作抵押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同样必须废除的另一种权利，因为持有执行票的债权人可以在收获物（例如小麦、葡萄、牧草、蔬菜）成熟前六星期将青苗作抵押，从而使佃农及其全家失去维持生计的手段。这是真正的掠夺。

为了使小农、佃农和分成制佃农免遭这样的破产，保护小农不受高利贷者的侵犯，保护佃农和分成制佃农不受大土地所有者的侵犯，工人党在自己的土地纲领的这一条中要求为了农民的利益确定不受侵犯的财产的数额，其中包括为维持生计和从事耕作所必需的农具、机器、部分收获物、种子、肥料以及牲畜。

第十五条 修订地籍册；在普遍实行这项措施之前，暂时由各市镇局部修订。

许多年来一直在争取修订地籍册，但没有结果。修订地籍册

对于公平地分摊土地税是极为必要的。

八十多年前制订地籍册时，许多土地还覆盖着森林，没有得到耕种或者被看作是不适于耕种的；现在这些土地上已没有森林，得到耕种并且情况良好。然而这些土地有的完全不缴税，有的只缴数量很少的税。

全面修订地籍册当然需要好多年，要花费数百万法郎，但这不能成为不修订地籍册的理由。暂时则必须要求每个市镇着手局部修订各自的地籍册（这是法律允许的），以便审查赋税的分摊情况，减少沉重地、不合理地由小农负担的赋税。

第十六条 立即着手研究改良土壤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公共工程计划。

土地所有者资本家议员们投票赞成对东京^①和马达加斯加的掠夺性殖民主义远征，在这些远征中耗费了数百万法郎并且使数千名穿着士兵服装的农民和工人丧命。这数百万法郎本可以用来从事给土壤施肥和发展农业的大规模的有益工作，例如：绿化山区，建筑引水渠和大水库，那里可以蓄水以备干旱时之需，等等。

第十七条 渔猎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须遵守保护野物和鱼类资源以及庄稼的必要措施；禁止设置禁猎区和猎场看守人。

在革命前，农民们对贵族最大的不满之一是他们不能打猎，特别是野物损坏他们的庄稼。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些不满。例如，罗伯斯比尔甚至起来“反对只限于所有主享有打猎权的原则本身”，并要求“不受限制的打猎自由，但须遵守保护庄稼和社会安全的必要措施”。在1789年8月11日之后，打猎权成为普遍的。连资产阶级在很长时间内也维护农民的这一权利。农民在复辟时期反对大地主的斗争中曾支持过资产阶级。

^① 指越南北部。——编者注

但是现在资产者和大土地所有者象昔日的贵族一样禁止所有不拥有大批财产的人打猎。为了保护自己的花园和禁猎区，他们组织了自己的由宣誓过誓的守护人组成的宪兵队，这些人写出真正的（甚至伪造的）警察笔录，随时准备向他们未能捉住的猎人开枪。

资产者在革命前曾证明，野物属于大家，因为野物是在大家的土地上养大的，现在，资本家收买了几百公顷和几千公顷土地，他们就说，野物只应归大土地所有者所有；而农民则受到损害，因为野物吃了他们种的庄稼，损害了他们的收获物。

第十八条 免费教授农艺学，建立农业试验田。

现在的农民应当成为受过教育的人，要懂得化学肥料和按照土壤和作物的特性使用化肥的方法，懂得能带来最好的收成并且最适合于气候和土壤特点的种子；还必须注意新的农业机器的出现并且学会使用它们。

因此工人党要求在每省都有若干名农艺学教师，他们巡视各个市镇，向农民讲授农艺学方面的最新成果以及农业技术方面的改进。国民学校的男女教师听了这些农艺学课程后，自己也可以传授给农民；为此市镇和省可以增加他们的低微的工资。

工人党同样要求在每省建立一块或数块试验田，以便进行实际教育。在这些试验田上可以对农作物、种子、其他新的作物以及化肥进行试验；可以讲授果树和蔬菜的栽培和管理。

农民所有制和经济发展^①

—

一七八九年革命使土地所有制摆脱了封建羁绊，这些封建羁

^① 这是拉法格代表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向南特代表大会（1894年）所作的报告。——编者注

绊曾阻碍土地所有制采取个体所有制或资产阶级所有制形式，但是一七八九年革命并没有象资产阶级作家所断言的那样把土地交给农民，这些资产阶级作家是厚颜无耻的历史伪造者。农民所有制在革命前就已存在；它起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发端于对野蛮时期集体财产的瓜分，另一方面，它来源于对封建地产的分割。从中世纪起，贵族把土地赠送和出售给别人，这些土地常常落到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农民手里。

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革命严重触犯了农民的权利，如同触犯了贵族和僧侣的特权一样。它消灭了或大大削减了公共财产的规模，这些财产被大土地所有者所独占，就象在英国那样；它还不加补偿地消灭了农民的许多使用权，其中有些权利，例如**共同放牧权**，对于农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当存在这种共同放牧权的时候，谁也不能把自己的土地圈起来；无论是贵族或者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土地在收割庄稼后重新归公共使用，市镇的全体居民都可以把自己的牲畜赶到那里去放牧，直到播种为止。他还有权利用森林，在一年的一部分时间内可以在林中放牧，还可以从那里取得燃料和建筑材料。公共土地以及对这些土地的使用权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最后残余，它使农民能够繁殖牲畜，从而得到肥料、奶、肉和毛。

革命改变了或取消了旧的租种土地的方式以及有利于农民的耕作契约。

其中有些契约给予农民共有权，这些契约直至现在还以葡萄苗圃租约、永佃契约以及可以随时收回土地的租约的名称存在于布列塔尼。^① 国民公会拒绝废除这些契约，以此来惩罚贵族的叛

^① 根据这些耕作契约，所有主被认为只是土地的所有主，而农民则是土地上的一切东西（建筑物、树木、收获物等）的所有主。农民对于地主只须缴纳固定不变的实物地租；但有时则是同收获成比例的。永佃契约这种最古老的形式在十六世纪以前是

乱,而废除这些契约只会有利于贵族。

相反,革命却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和贵族的地产;它使这些地产摆脱了沉重的封建贡赋和租约,使**黑帮**投机分子获得了通过买卖贵族领地和零散的**国有土地**而大发横财的难得机会。

摆脱了封建羁绊的地产可以采取个体所有的形式,采用别的耕作方法并提高价格。福尔邦奈和拉瓦锡在革命前估计平均每公顷土地四百法郎;按莱昂斯·德·拉维涅的意见,这种平均价格在1815年提高到六百法郎,在1859年提高到一千法郎。这低于现在的价格,目前每公顷土地平均价格为一千八百法郎和二千法郎。由此可见,在一个世纪内,土地的价格上涨了五倍。这种漫无节制的上涨是经常的农业危机的基本的、甚至唯一的原因。卖价的上涨是革命的后果之一,这使农民无法得到土地;农民没有能力购买土地,甚至没有能力租种土地。这是革命的资产者力求达到的结果之一。

二

对地产进行资产阶级改造以及改善地产的耕作方式在上一世纪是不可避免的。

在整个中世纪,由于缺乏道路和交通的不安全,使得农产品的运输和贸易无法进行。村镇和城市只是靠附近地区收集来的粮食为生。除了若干例外,城乡居民几乎全部是农民,而且往往是土地所有者。

王权的巩固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安定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于

普遍流行的。按照这种契约租种土地的农民无论以任何形式都不能被剥夺,根据可以随时收回土地的租约进行耕作的农民则可以被赶走,虽然要补偿收获物和地面建筑物的价值。这种较为现代的形式标志着按照资产阶级方式改造封建所有制。——拉法格注

是城市得以扩展，并通过吸引农村居民来增加自己的手工业居民。城市居民现在完全脱离了农业劳动，不再生产自己的食品，因此发生了粮食困难，引起在十八世纪发生众多的、频繁的饥荒和暴动。这些饥荒和暴动深深地震撼了国家，使人民为走向革命作好准备。旧的农业已经无法满足脱离了农业劳动并聚集在城市里的工人的需要。

只有在地产摆脱封建贡赋的条件下，农业才能得到改造；因此，革命刚刚完成自己的解放事业，给予所有主把自己的土地圈起来，按照自己的方式耕种并且不容许市镇的牲畜进入自己的土地的权利，有着各种各样的农作物以及人工牧场的现代农业就开始发展起来。^① 为了增加适宜于耕种的土地的数量，人们以极大的努力抽干沼泽和池塘的积水，砍掉平原和山区的树木，从而使温顺的河水变成毁灭性的湍流。粮食作物的种植得到迅速的发展，导致在复辟时期出现过剩危机，这种危机经常伴随着缺粮危机，因为在生产过剩年份之后削减了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这时在法国市场上就出现来自俄国黑土地带的粮食。土地所有者发出了惊呼声。毕若元帅在众议院大声疾呼：“俄国粮食的入侵比哥萨克的入侵更加可怕！”土地所有者放弃了在革命前一直坚持的自由贸易的原则，企图借助于关税来使自己免遭外国的竞争，这使土地所有者得以按照关税提高地租，从而抵销对农业保护的影响。保护远远没

^① 1791年9月28日关于农村的产业及其使用的法律赋予地产以个体所有的性质。

第一条 法国的领土在自己的全部领域内是自由的，正如居住在法国领土上的所有人是自由的一样，因此，任何地产都只能是以法律为基础或者得到法律（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法律，而不是通常的封建习惯法）承认的使用对象。

第二条 所有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种植各种不同的农作物，采取不同的方法耕种自己的土地，根据自己的意愿保护自己的收获物并且在王国内以及在王国外支配从自己地产所得的全部产品，但不得损害其他人的权利，同时必须遵守法律。——拉法格注

有给农民带来好处，相反，却带来损害。

随着这种**粗放经营**的第一个时期接踵而来的是**集约经营**时期，其特点是使用机器、化学肥料、精选种子、繁殖牲畜、提高生产率等等。集约经营把农业变成资本主义工业，它为了发挥自己的作用需要专门的知识 and 相当多的资本，而因循守旧和缺乏资金的中等地产和农民都不掌握这样的专门知识和资本。

它们反对资本主义大地产的经济斗争在当时是不可能的。革命使小地产失去了公共财产、牧场和其他使用权，而高利贷和抵押贷款使小地产遭到破产，这些小地产终于被资本主义地产所吞噬，就象中世纪的小贵族的城堡和土地被大采邑主吞噬一样。这个吞噬小地产的过程由于歉收、瘟疫和其他疾病而加速。

尽管政府的名称发生了变化，但总是维护有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商人、工业家和金融家）的利益。它在小地产反对大地产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不去帮助小地产，而是增加和提高小地产所负担的捐税，现在这些捐税不是象从前那样用实物并且按照收成好坏来征收，而是用贷款来支付，而且不管收成的好坏。捐税使农民不得不依赖有钱的人，即收购农产品的商人。农民负担的捐税越重，他的收成就越坏，他就越迫切需要货币。

资产阶级宣告，它的政治和社会统治将是和平的王国，但是它的和平不断遭到可怕的欧洲战争以及同样毁灭性的殖民地远征的破坏。这些殖民地远征仅仅是为了销售资产阶级从工人那里夺取来的商品这样的自私目的而举行的。为了进行这些战争和维持武装的和平，资本主义政府迫使农民服义务兵役，而在旧制度下农民是不知道义务兵役的。这种新的血税把农民的儿子夺走好几年，并且用他们来反对农民自己，因为在收获季节土地所有者利用士兵来压低农村中的工资。

当农民急于用自己的积蓄来引进集约耕作的方法时，金融家

就象一群蝗虫那样扑向农村，把许多世代以来小农存放自己的储蓄的丝袜和藏物处劫掠一空。

实行新的公债制度并且给予地产银行和现代金融制度的其他机构以保护和资助的拿破仑第三，以及为世界性的实业家们效劳的机会主义派帮助金融家们通过巴拿马运河公司和其他同拦路抢劫的强盗毫无差别的公司掠夺农民的积蓄。

他们只有在最苛刻的条件下，只有在债务人同意简化通常的出售不动产的手续，承认在宣布破产时债权人有权把债务人的全部积蓄挤干后将土地没收时，才答应把他们从农村中榨取来的这些钱借给农民。

已经大吹大擂半个世纪的**农业银行**只是为资本主义地产效劳。

土地所有者们在路易-菲力浦执政时厚颜无耻地要求，应给予他们贷款的**农业银行**的资本取之于储蓄银行的基金。这些寄生虫在收购国有土地后为了开垦这些土地竟想染指于人民的储蓄。但是，金融巨头认为这些储蓄只归他们所有，因此坚决反对这样做，终于否决了土地所有者们的这一草案，认为它是对财产的侵犯。

三

农业竞争、集约经营、掠夺农村的储蓄、捐税，总之，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经济现象促使将土地集中在愈来愈少的所有主手中。这种土地集中在英国已经完成，在法国正处于迅速实现的过程中。

直接税厅在1884年根据它在地方上和各省的代表收集到的统计资料查明，在缴纳土地税的四千九百万公顷土地中，一千二百万公顷土地，即四分之一左右，属于二万九千二百零一个所有主，每个所有主平均拥有四百五十三公顷土地（其中路特希尔德拥有二

十万公顷土地),而五百万农民总共拥有二百五十万公顷土地,平均每个农民只有半公顷。

大地产靠牺牲中等地产(它逐步在消失)和农民地产(它在不断减少)而得到加强。只留给农民们不足以糊口的小块土地,但這些小块土地使农民留在土地上,从而使所有主—资本家经常拥有劳动力;在革命前,所有主为了在收获季节以及在整年一年里找得到工人,在外省许多地方不得不让他们定居在自己的领地上,住在小房子里,并且拨给他们一、二公顷土地。以一定数量的劳动日为代价交给农民使用的这些小农场被称作**雇农农场**。现代农民的小地产起着十八世纪的雇农农场的作⽤。

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土地被租出去,或者由金融公司负担费用让农艺师根据科学和农业技术的最新成果进行耕种;但是被土地寄生虫侵占的一部分土地变成了猎场以供消遣,人们被赶出这些土地,由野鸡和野兔取而代之。

这种有利于不劳而食者的残酷无情的集中不可能停止自己的进展;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社会主义政党即使在取得政权之前也可以迫使资本主义政府进行改革,从而缓和这种集中的致命后果,并且改善各类农民(短工、小农、分成制佃农和佃农)的悲惨境遇。

小块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工具,就象刨子对于木匠、刀子对于外科医生一样。农民、木匠和外科医生并不用自己的劳动工具剥削他人的劳动,因此不应担心社会主义革命将剥夺他们的这些工具。社会主义革命的使命在于剥夺那些夺走农民的土地和工人的机器并利用这些土地和机器来剥削生产者的人。

从新的土地贵族手中夺取过来的大地产不会分割成小块土地并且象从僧侣和旧贵族那里没收过来的**国有财产**那样加以出售,而是由组织起来的农民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经营;同样,交给联合

起来的工人管理的工业技术生产工具也将为全体的福利效劳。

社会主义政党在取得政权后并不想妨碍农民私有主安静地占有他用自己的汗水浇灌的小块土地；它“将取消他所负担的捐税，取消由于期票和抵押借款而产生的债务，使之摆脱促使他破产的高利贷者，帮助他的经济，给予贷款、机器、肥料、种子、牲畜等，使他能够用实物偿还自己的债务”。（1882年保尔·拉法格公民向卢昂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

出生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且受到共产主义精神教育的人们，将把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交给他们的父辈支配的土地归还给国家。

译自拉法格《法国工人党土地纲领》

1895年巴黎法文版。

（李兴耕译）

赫伯特·斯宾塞和社会主义*

(1894年5月)

全世界闻名的英国哲学家赫·斯宾塞在1884年4月号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未来的奴隶制度》的文章，颇值得社会主义者注意，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预言，“各种已经实现的、现在正在实现的和刚刚要求实现的社会变革会使我们笔直地达到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其所以如此，因为据他说，甚至自由派，社会主义的这些最凶恶的敌人“也在为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土地、银行、工厂等等生产工具的国有化在最近的将来就要成为现实；最后，因为如此深奥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如此激励人心的见解将使战斗的社会主义者勇气倍增，促使他们比以往更加积极地宣传共产主义理论。

但是，他的文章引起我们注意，还有其他的原因。它妄想对社会主义进行无法反驳的和不容反驳的批判，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流行的、人们经常提到的各种论据的大杂烩。如果像斯宾塞这样的学者都找不到更有份量的批评论据来驳倒社会主义，那么，这就表明，这样的论据是根本找不到的。不过，既然连这位大思想家——资产阶级的一盏明灯都不敢轻视这些论据，那么，他的对手们就非要驳倒这些论据不可，尽管它们是毫无价值和陈腐不堪的。

—

斯宾塞在结束自己的文章时提出下面这段据称可致人死命的

* 本文首次发表于1894年5月的《新世纪》杂志。——编者注

机智论断：“任何政治炼金术都不可能从铅的本能中引出金的行为；不要指望恶人会作出任何善良的决定。”因此，人类应当放弃改善社会制度和消除不公正与贫困的愿望。^①

曾经普遍流行的看法是：斯宾塞听惯了达尔文的理论，他成了这一理论的鼓吹者。上面所引证的这段反社会主义的论断，使我们感到这种流行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动物的机体，动物的习性和本能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生存竞争的必然结果，它们必须服从于这一竞争的条件”。老虎的锋利牙齿和凶猛，羚羊的快腿和胆怯，正象斯宾塞的机智一样，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周围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下逐渐演变成的。无论是动物还是人，其不同本能和习惯归根到底都是由不同的生存条件造成的。例如，在一切畜类中都可看到的最有威力的本能之一就是母性的本能，没有它幼仔就养不活，然而这种母性的本能在某些过群体生活的昆虫中却完全消失了。达尔文说道：“蜂王要把幼小的后蜂，自己的女儿弄死，因为一旦这样做对群体有利，灭子的意向就会取母爱而代替之。”

对于保全生命更为重要的另一种本能，即自我保全的本能，在群居动物中已经消失：雄性时刻准备迎向危险和牺牲自己的生命，以保卫雌性、幼仔和群体中的弱者。这些如此反常的、舍己的和违反母性的本能——象企业主的贪婪和斯宾塞的悲观主义一样——是生存条件的产物，这些本能的所有者不得不服从于这些条件。

有人用神来解释世界的创造，把神当作万物的创造者，这样的人当然会相信，小商人的掠夺本性、外交家的伪善、金融家的招摇

^① 社会制度不可能得到改善，这是他摆脱不掉的思想；他在自己的《公正》一书中论述土地国有化时写道：“如果上千年间所造成的不公正状态竟能改正过来，如果一种新的公正的制度竟能在补偿所有者的当前的损失和过去的损失的基础上按抽象的概念加以实现，那么，我敢断定，其结果将会出现一种比现行状况还要糟糕的状况。”——拉法格注

撞骗、资本家阶级的文学和哲学卫士的奴颜婢膝行为，这一切都来源于神意。但是，属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派的共产主义者却认为，这些高贵的资产阶级气质是资产阶级环境的必然产物。正象从腐败的有机物质中必然产生出臭气一样，只要造成这些高贵本能的社会环境不发生变化，这些本能就始终会是资产阶级本性的组成部分。

人类的历史向我们指明，这些资产阶级的美德并非一向就是人的装饰品。在尚未出现土地私有制的印度村社里，我们看不到如此败坏欧洲文明民族声誉的寄生现象，看不到靠劳动者为生并由仆人和妓女服侍的无所事事的资产者；在那里人并不相互为敌，不设金钱陷阱，不撒谎，不为侵占他人财产而诈骗。这种村社的每个成员的私人利益为整个村社的利益所淹没，以致“受委屈者不去抱怨个人所遭受的损失，而是抱怨他的不幸使整个村社秩序招致损害”^①。这种使私人利益溶化在公共利益之中的状态，促使印度村社社员为公共幸福而牺牲个人幸福。

但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全社会的幸福同个人的幸福是相对立的，而这种对抗性的利益所造成的本能则促使每个成员为自己的幸福而牺牲公共的利益。尊敬的慈善家和著名的伦敦制药厂主高洛韦先生为了赚钱，也许期望整个盎格鲁撒克逊种族都患有胃病，当然，著名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也不会例外。如果有一名无政府主义纵火犯，想放火烧毁其棉纺厂主的竞争对手的工厂，从而使这位厂主成为市场的主宰，那么，这位厂主决不会不为此而感激涕零。为了获取巨额利润，没有一个英国商人会拒绝把武器弹药卖给同自己的同胞作战的苏丹人。没有一个伦敦的金融家会拒绝向俄国提供贷款，——当然，要有良好保证和足够高的利率，——让俄国去组织和武装士兵，占领英属印度。人不为

^① 亨·萨·梅恩《东方和西方的村社》。——拉法格注

己，天诛地灭，——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座右铭。

使资产者的“铅的本能”得到盛行的土壤就是私有制。利己主义、招摇撞骗、狡猾、伪善、欺诈，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必不可少的气质；资产者靠这些气质赚钱，而钱带来尘世的享受——鲜嫩的肉，美味的酒，华丽的衣裳，人们的尊敬，美人的笑容，牧师的祝福以及哲学家的阿谀奉承。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人的卑鄙特性的发展。

与此相反，忠诚，勇敢，有干劲，能吃苦耐劳，遇到不幸仍坚韧不拔，这一切是野蛮人的部落里培养起来的精神，因为这些优秀品质是连续不断的斗争所要求的，人们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前进的。

人的癖好、习性和本能是由人的生活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产生私有财产的社会环境使人的本性变坏。自从确立父系制血缘关系以来，遭到全人类谴责的一种最可怕的罪行就是杀父，这一罪行在小农所有制取得优势的地方十分盛行。酷爱土地，热中继承双亲财产的折磨人的和按捺不住的愿望，使杀父者用双手拿起刀子。私有制——这是培育最卑鄙的和最丑恶的本能的母亲，任何残酷的和野蛮的刑罚都不可能根除这种本能。

斯宾塞这位只是名义上的进化论者所谴责的“铅的本能”，决不会产生出社会主义者所力图改造的那些机构；相反，只要这些糟糕的机构仍然存在，“铅的本能”也就将继续存在，只要私有制仍然盛行，资本家就将继续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种利己主义的、眼光狭小的和冷酷的动物。

只要生活的无保障和贫困还成为劳动人民命中注定的东西，只要毫无用处的资本家的奢侈生活还在戏弄着劳动者，那么，就连酷爱人类的哲学家所吹得天花乱坠的并在我们的社会中如此广泛流行的鞭笞、苦役和单人牢房，也不可能把人的“铅的本能”变成

“金的美德”。统计学的一位创始人凯特洛在他的《社会物理学》一书中指出，从1826年到1844年，法国犯罪数字是随着粮价的波动而上下波动的。

正因为我们的这位哲学家不了解他在自己的亲近者资本家身上所看到的那种“铅的本能”的来源，正因为他曲解了进化理论，所以他才敢于断言，私有制所造成的这些本能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将依然存在。我们的这位大思想家的逻辑和下面这种人的逻辑多么相似，此人眼望着长满杂草和荨麻的田地，居然声称，这块地上永远也长不出粮食来，哪怕经过开垦、施肥、播种，仍是枉然。

二

人们不识斯宾塞真面目，误把他当作进化论者，因为他惯于把他所研究的事物按照表面现象进行分类整理，从不肯花费力气分析事物的内在特性和外部原因，研究它们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位大哲学家把自己所研究的事物列入进化论的族系，他这样做时几乎和小商贩一模一样，后者按照商品的明显特性，把它们陈列出来，也就是说把衬衫和衬衫摆在一起，把袜子和袜子放在一处，如此等等，而根本用不着考虑它们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用不着过问它们的产地和生产方法。

斯宾塞在自己的《未来的奴隶制度》一文中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小商贩式的进化论的惊人例证，正是在众多的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者当中可以说唯一风行的一种进化论。

斯宾塞说，奴隶制的特征就是“奴隶必须为他人完成一定量劳动，并为自己完成一定量劳动”，但是，自从沦为奴隶的战俘只为自己的主人劳动，转变为农奴，依附于土地，不得不从事徭役和交纳贡赋，然后象在俄国那样，又从依附于土地的状态中被解放出来，不过还保留着交纳代役租即一定量货币的义务，——自从这个时

候起，奴隶制就逐渐衰落了。鉴于英国不存在代役租，并且耕种者不依附于土地，斯宾塞便得意地说，英国不再存在奴隶制，任何一个英国人没有义务为他人劳动。

我不准备详谈有关强制劳动进化状况的这种幼稚解释；但必须指出，从生产者大众——奴隶或农奴——身上榨取的劳动量不取决于榨取方式，而取决于在一定国家和一定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只要奴隶主和封建领主终身生活在自己的领地里，他们要求奴隶和农奴提供的便是一个不大的强制劳动量；但是，自从生产农产品和工业品不再是为自身的消费，不再是为自己家庭的消费，而是要把产品用于交换，拿到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起，强制劳动量就显著增加了。在北美的一些蓄奴州，在黑奴获得解放前不久，人们认为，成年奴隶在七年的劳动后势必耗尽自己的精力，劳动和鞭打使他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强制劳动的这种增长不是奴隶制的开始，而是奴隶制结束时期的标志。

从社会现象追溯这种现象的经济原因的方法同斯宾塞的唯灵论是不相符合的；他宁愿想入非非和痛斥他目力所及的不同种类的事实。应当承认，他的方法有许多优点：非常方便而不费脑筋，可以用来证实任何问题。因此，斯宾塞一会儿自我陶醉地证明，以替他人从事强制劳动为特征的奴隶制在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再存在了，一会儿又同样放肆地证明，奴隶制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将重新恢复。

难怪资本家把斯宾塞称作大哲学家，因为他毫不费力地用超科学的和非同寻常的哲学论断证明，企业主让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工厂和矿山做苦工，并不是为了榨取强制劳动，而是出于纯粹的人类之爱。企业主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制服人们性格上的懒惰，因为懒惰是万恶之源；强迫他们获得进天堂的待遇，因为谁劳动，

谁就祷告。不言而喻，这种如此仁慈地赏赐的工作会带来利润；但是成千上万的利润被具有自由思想的和信奉基督的企业主攫为己有了，这只不过是对他们的“金的行为”的奖赏。这种基督教的热爱人类的感情促使布莱特和其他自由主义首领们对将工作日缩短为十小时的法案提出异议，并驱使斯宾塞对保护无产阶级妇女和儿童免受主人贪得无厌剥削的一切法案进行指责。这些有害于自由的法案妨害资本家最大程度地榨取自己的工人的“自由劳动”。这些法案多么可耻，这些法案是自由英国的污点，是对资本主义自由的侮辱！

如果说奴隶制——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者同这位大哲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的特征是“为他人从事强制劳动”，那么，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不管是封建时代还是奴隶制时代，都不曾从生产者阶级身上榨取如此多的强制劳动。奴隶占有者不会让自己的年轻的奴隶劳累过度，因为他们是宝贵的牲畜，不应当过早地耗尽精力。资本家对此则毫不关心。童工调查表明，在劳动法公布之前，英国工厂主通常迫使儿童每天劳动十四至十五小时，为了防止孩子们打瞌睡，他们采用鞭打、泼冷水和诸如此类的其他种种客气的方法。这些儿童都是英国人，出身于自由人的家庭，但是他们在老板的眼里分文不值，老板毫不关心他们的死活。

奴隶制是一种榨取强制劳动的野蛮制度；自从大机器工业兴起后，这种制度不再是有利的了。奴隶主必须喂养奴隶，而不管他们年轻或年老，干活或不干活；企业主对自己的工人则不负有这种义务。每当定货减少，企业主就把工人轰出大门，让他们沿街乞讨，眼巴巴地望着肉铺里陈列的牛肉和羊肉，用这种方法来充饥。

尽管本世纪的慈善家们发明并且应用了单人牢房制度，而野蛮的俄国则从文明的欧洲那里搬用了这种制度，尽管大哲学家斯宾塞把鞭子、苦役和绞架吹得天花乱坠，但是，我们毕竟可以夸耀

说，我们是生活在人道的社会制度里，因为工人已不再象奴隶那样不得不在鞭子的抽打下从事劳动了。这种刑具已经过时了，代之出现的是另一种更为精巧、更为有效的刑具——饥饿，正是这条由千百根皮条编成的鞭子把无产阶级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统统赶进工厂。只有少数人对游手好闲阶级赖以过奢侈生活的这种强制劳动无动于衷，而斯宾塞就是其中的一个。正因为这样，他也就看不见我们时代的令人震惊的奴隶制，虽然他对“未来的奴隶制”洞若观火。

斯宾塞宣称共产主义不仅是未来奴隶制的重建者，而且是官僚制度的发明者和传播者。共产主义——这是官僚制度的胜利，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人都是官吏！当这位大哲学家凭证领取或购买火车票的时候，没有看到一批职员和官僚为公众服务吗？难道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瞎子吗？难道他认为银行、铁路及其他工商业没有职员和官吏也可以维持下去吗？认为它们的工作同国家管理下的邮局、电报局、军火库以及其他工业企业的工作应当迥然不同吗？如果问题仅仅在于官僚制度，那么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又有什么差别呢？无论在前一种企业或后一种企业里，一部分工作都是由职员，也就是由官僚或官吏完成的，在这里如何称呼并不重要；他们和木工、机械工以及其他体力劳动者一样，也是雇佣工人；他们不能获得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他们不得不同国家或企业主分享他们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而企业主虽然没有义务参加劳动，却有权没收他人劳动的产品。

资本主义生产，不管是在国家监督下进行的，或是在私人监督下进行的，其特征就在于：无论从事体力劳动的还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都对他们就业的企业的兴旺漠不关心。

不管收入大于支出一倍还是二十倍，这对机械工和铁路职员来说又有什么利益呢？尽管报纸的发行量提高到上万份，这对排

字工和校对员又有什么好处呢？企业主认为，他一旦发放了工资，便和自己的工人和职员不再有任何别的关系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者在生产中只关心一件事，即只关心工资；一旦他们得到了工资，他们就不再关心事业的盛衰。但是，一旦股东、地主和其他寄生虫统统消灭，生产者不再同资本家分享自己的劳动产品，这时他就不再作为雇佣工人，而是作为合伙人从事工作，于是对企业的成就就会关心起来。甚至连这位资产阶级的哲学家都懂得，如果参加生产的人是占有者而不是雇佣工人，那么，生产取得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得多。现在工人干活懒洋洋，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他们的切身利益将促使他们干劲十足；个人利益——更不要说更加高尚的情操了，这样的情操是资本家以及他们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无法理解的——将代替迄今为止被用来榨取强制劳动的饥饿和鞭笞。正确理解的利益将是使生产者阶级的“铅的本能”变为“金的行为”的炼金术。

斯宾塞抱怨说，银行、工厂和其他生产工具一旦实行国有化，将要在职员和官僚身上支出一大笔费用；但是，难道银行、铁路、工厂等等还没有实行国有化，它们的经理、行政管理人员和其他官吏就不需要任何费用吗？如果这位大哲学家因渴望节约而如此激动，那么，他为什么不起来反对在不断增多的家仆阶级身上支出的费用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阶级。他在分析1861年人口调查资料时，引用了威尔士和英格兰的下列资料：

家仆·····	1 208 648	} 1 605 440
农业工人·····	1 098 261	
纺织工人·····	642 607	
采矿工人·····	565 835	
冶金工人·····	369 998	

可见，在 1861 年，家仆阶级，即不从事任何生产而仅仅为资本家私人需要服务的阶级，在数量上超过了农业工人阶级，占三个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中的工人人数的三分之二。

从 1861 年起，家仆阶级日益扩大。大不列颠的数字如下：

	1861年	1871年	1881年	增加和减少的%	
				10年内	20年内
家仆	1 367 782	1 633 514	1 803 810	10.4	31.9
农业工人	2 010 545	1 657 138	1 383 184	15.9	31.2
工业工人	5 184 201	5 940 028	6 373 367	7.3	22.9

从 1861 年到 1881 年这二十年间，农业工人人数减少的百分比同家仆人数增加的百分比相等。家仆人数不断增加这一祸患是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丰硕成果。这些数字可能使斯宾塞心平气和下来，因为任何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都不会允许有如此众多的官吏，象我们时代的家仆阶级那样，处于社会不生产的状态之中。

在达尔文主义者建立起来的达尔文崇拜者的社会里，斯宾塞被称颂为第一流的哲学家。一切都是相对的，对这些进化论者来说他可能是一位大哲学家。社会主义者一点也不想破坏他们的无害游戏；但是如果斯宾塞珍惜自己的大哲学家的声誉，他也应当不再过问社会问题和科学社会主义问题，而去撰写有关先验论的多卷集著作，那种拙劣的、晦涩难懂的著作，其中塞满种种微不足道的、未经检验的、捕风捉影的事实。社会主义者不会打扰他这项自由选择的工作。恰恰相反，他们要永远感激他过去以及现在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因为他使自己的资产阶级朋友和崇拜者的头脑陷入混乱之中。

译自《拉法格选集》第 2 卷 1928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 332—341 页。

（刘焱译 王锡君校）